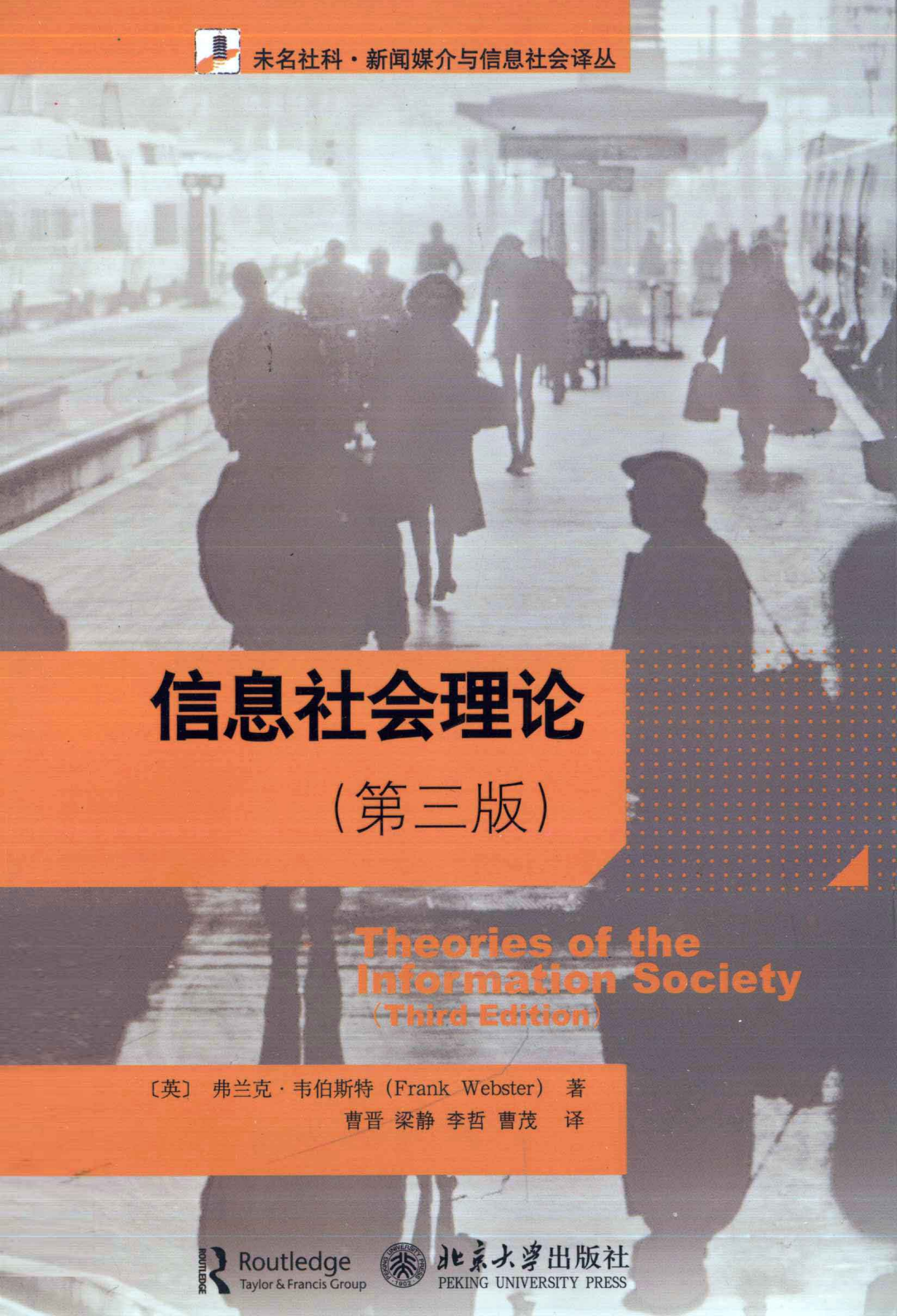


未名社科·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

信息社会理论

（第三版）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ird Edition)

〔英〕 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 著
曹晋 梁静 李哲 曹茂 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坚持从梳理资本主义的历史脉络中洞察信息社会的本质，借助勾勒贝尔、吉登斯、哈贝马斯、卡斯特等重要信息社会理论家的论述优劣，敏锐揭示了信息社会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展示出商业文明覆盖全球的所向披靡之势，而政治压力与商业、技术迷思经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整合，严重削弱了公共服务与民主基础。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ird E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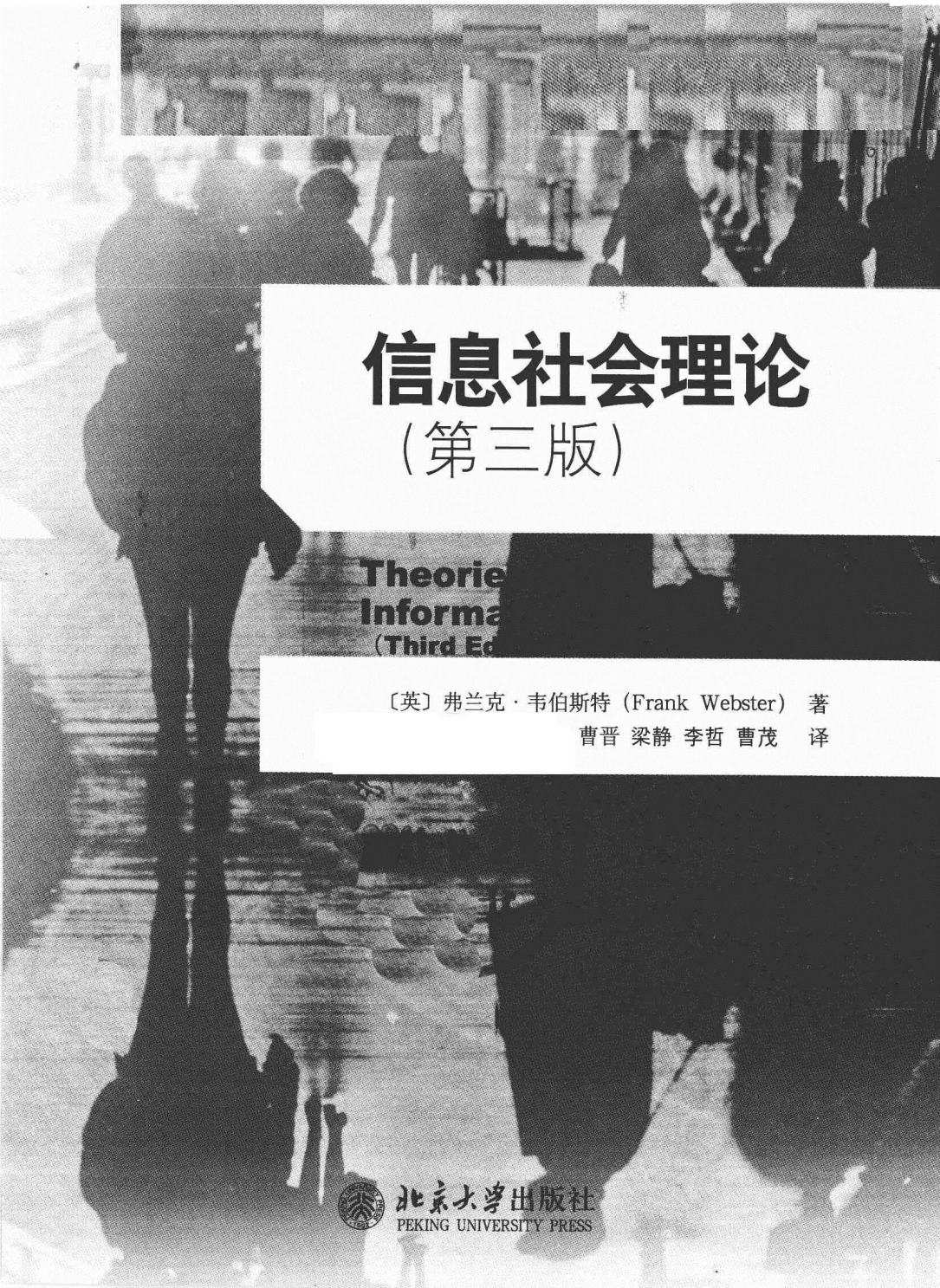
ISBN 978-7-301-18955-9



9 787301 189559 >

定价：26.00元





信息社会理论
（第三版）

Theorie
Informa
(Third Ed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 著
曹晋 梁静 李哲 曹茂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52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英)韦伯斯特(Webster,F.)著；曹晋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
(未名社科·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
ISBN 978-7-301-18955-9

Ⅰ.①信…　Ⅱ.①韦…②曹…　Ⅲ.①信息化社会—理论研究
Ⅳ.①G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2377 号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rd Edition/by Frank Webster/ISNB:0-415-40633-1

Copyright © 2006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著作责任者：〔英〕弗兰克·韦伯斯特　著　曹晋 梁静 李哲 曹茂　译
责 任 编 辑：卢旖旎
封 面 设 计：奇文云海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8955-9/C·0674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
印 刷 者：河北滦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2.75 印张　352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译丛总序[①]

笔者一直渴望梳理出美国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以便为选修硕士课程《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的学生准备必读文献。但在翻阅若干美国传播研究文献之后，甚感困惑，因为处于绝对优势的实证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和笔者课程设计的媒介社会学路径相去甚远。在疑虑重重之际，幸获李金铨教授的教诲，他多次推荐了不同于实证传统的若干传播研究论著，本套译丛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诞生的。数年之后，笔者仍然对李教授的引路感念至深，而且对他关于译丛所选著作的社会学论述的赞誉和他对美国传播研究的评论记忆犹新。他认为前者的遗憾之处是缺少国际视野；而后者则在积极为行政与市场的权力机制提供合理化阐释中陷入了统计技术的泥淖，研究旨趣和社会脉络脱节，缺少社会批判与弱势关怀（李金铨，2004：8—12）。

我们看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提出的“媒介场域”（media field）概念为中心的

---

① 本套译丛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曹晋主持的“复旦大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创新基地全球媒介化社会研究”项目和上海市 2007 届“曙光”计划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也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出版研究中心系列读本和硕士课程“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的配套阅读资料。

新闻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引领了媒介社会学的典范研究。[①] 同时，在西方学术界，“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基本分析范畴，也成为传播研究讨论大众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中建构社会权力关系的三个轴心，对深入探索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等范畴的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中，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甚有助益（曹晋，2008）。这大大有别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中增进社会控制的行政导向（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研究和扩大媒介影响消费效果的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研究。本土媒介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由更加广阔的，交织着国家、阶级、社会性别、城乡、区域、公民、性存在等范畴的权力等级关系的分析的研究路径来建构中国媒介制度、媒介产业与媒介技术领域的社会学研究理论。因此，本套译丛乃抛砖引玉之举，仅仅是我们认识国际传播学界成果的一个步骤，并不是研究目的所在。作为本土传播学的研究者，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回到中国的社会情境来提炼本土的媒介社会学理论。但笔者以为了解国际传播学界的多种图貌是追求上述建树的必要之旅，因为其对建构中国自己的东方社会情境中的媒介社会学理论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尽管甘斯（Herbert J. Gans）、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论著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作品，但时至今日，其经典的洞见与其开创的研究方法仍然为学者们津津乐道。

---

① 1994年3月，皮埃尔·布尔迪厄和他的合作者 Alain Accardo、Patrick Champagne、Rémi Lenoir、Dominique Marchetti 及 Louis Pinto 编写的以“新闻的影响”为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专集，发展了一种以“媒介场域”（media field）概念为中心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其中心论点是面对经济场域已然增强的影响和渗透性，新闻的自主（autonomous）性减弱了。新闻媒介，作为统治权力的代言人（agent），正在削弱其他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autonomy），因此也损害了科学知识生产和艺术创新的最佳社会条件（罗德尼·本森文，韩纲译，2003）。布尔迪厄两年后出版的《关于电视》（法文原著出版于1996年，简体中文版许均翻译，2000）与上述研究保持一致的内在逻辑；该书作为媒介社会学的新范式，深刻地揭示了新闻生产如何被高度的商业化所侵蚀。作者敏锐地感悟到，伴随西方媒体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的彻底私有化，新闻场域的生产过程与市场竞争、商业利润密切纠葛。因此，布尔迪厄认为，一个传播机构的“内部自主性”与广告的进账或是国家补助的多寡成反比关系；换句话说，传播机构愈是依赖于政府的补助与广告代理商所提供的广告收益，其内在自主化的程度就愈低（参见舒嘉兴，2001：18）。

笔者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邀，遵循学术前辈的文献阅读路径，组织了“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译丛所收书目是理解西方新闻生产和信息社会的基础研究。甘斯所著《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是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实地调查研究，李立峰学者的译本导读对该书的原创价值有丰富的钩沉，笔者不再赘述，仅借用莫斯可在其《传播政治经济学》(Mosco，1996)中的评论来深刻解读甘斯论著的光芒和局限性。莫斯可认为，塔克曼(Tuchman，1978)、费什曼(Fishman，1980)和甘斯(Gans，1979)等人的著作考察了官僚主义控制的系统如何经营管理复杂的生产过程，特别是新闻生产过程。他们的研究阐释了那些简化的机械流程，包括突发新闻如何报道、繁琐的分工、程式化的特写文章等等，说明新闻机构运用大量的组织计划和预先处理，通过机械流程来收集、整理并发布新闻与信息。这项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很重要，它强调的是劳动过程，用丰富的经验性细节描述了有助于建构生产过程的社会—技术进程。然而，这类研究虽然涉及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新闻过程的影响，却没有把它们纳入理论中进行探讨；研究者们更喜欢以官僚机构和组织为基础建立理论框架，强调的是抽象的行政上的需要和职能(Mosco，1996)。

舒德森的《发掘新闻》原本是想成为论述新闻行业历史和专业意识形态发端的案例研究，但其围绕新闻的客观性问题所展开的论述却成为全书的核心思考。可以说，他在探索新闻客观性的生产机制。作者认为，在当代各专业、行业将知识和权威正规化的过程中，客观性是一种主导性理念。该书绪论部分指出：“显然同其他专业一样，新闻业对客观性的信念不仅关乎我们应信赖何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观，关乎我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应遵从何种标准。它同时还是一种政治承诺，指导人们应该选择哪些人来评判我们的言行。评判者的选择是由社会机制来决定的。通常认为，有两种社会控制机制在不同领域内保障着客观性。第一是高级教育和职业培训，用科学知识和客观的态度，使受教育者放下个人的喜好和情绪。比如，医学培训能使医生冷静超然，从而可以面对一般人无法面对的病痛。

法学学生在培训中要区别'法律'问题(通常是技术性的)和'道德'问题(通常在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之外)。第二种社会控制的基本形式是与公众绝缘。科技语言、行话术语等等就是这样的一种绝缘机制。其他的还有制度性的机制。譬如,法律学者认为法庭能比立法机构更加客观,因为从体制上来看,法官比议员要更加远离选举政治的压力。这样一来,自主的专业团体就保证了业内客观性的存在,因为它摆脱了市场和大众意愿的束缚,而独立的职业个体通过业内培训,也不会受自身价值取向的影响。"(中译本第5—6页)舒德森发现新闻的客观性与上述原则相违背,记者也不掌握高深的技术和语言。报纸直接依赖市场生存,直接面对着民意取向,新闻业无法与大众绝缘。新闻业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法律界和医学界确保客观性的种种条件,那为什么客观性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作者没有一味纠结于关于新闻客观性的论辩,而是将重点放在对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互动关系的阐释之中。关于新闻从业者之所以如此信奉客观性,尾声的总结如是:"一方面是因为想要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在大众深深怀疑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一种逃避。托马斯·曼(Thomas Mann)曾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就'为什么'、'目的何在'等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席话不得不让人正视。当然,客观性作为一种理想,在过去,乃至今天,都常被用来作为权力的掩饰,有时甚至是用不诚实的方式去掩饰。但客观性的根源并没有那么肤浅,它不是用来为权威、特权提供掩饰,而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中译本第145页)。

大卫·克罗图(David Croteau)与威廉·霍伊尼斯(William Hoynes)的著作《媒介·社会》以作者建立的"媒介与社会世界的模型"为基本框架,分析了媒介产业、媒介内容、媒介技术、积极的受众以及媒介外的社会世界诸多要素之间的关联,为我们勾勒出媒介与社会世界关系的生动图景。该书共分为十章:第一部分以作者所构建的"媒介与社会世界"模型为基础(第一章);第二部分以"新闻生产的视角"考察经济、政治和组织性因素对媒介决策和产品的影响(第

二、三、四章)；第三部分侧重于讨论媒介产品的内容以及媒介是如何表现社会世界的(第五、六章)；第四部分描述了受众与媒介的关系，研究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方式和人类活动对媒介的解读及运用(第七、八章)；第五部分则将重点转向媒介技术的作用，研究了在不同的媒介形式推动下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技术间的交互作用(第九章)；最后探究大众媒介全球化的本质及可能的结果(第十章)。《媒介·社会》以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大众媒介，高屋建瓴，尤其强调大众媒介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中的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不失为一本综合性的基础文献。

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的《信息社会理论》的英文第一版曾经由台湾的冯建三教授翻译为中文(繁体版，《资讯社会理论》，台湾远流，1999)。韦伯斯特发现，当下社会中所有与创意产业相关的生意人、管理人员、软件工程师和媒体创作者等等，都被视为信息社会的核心。在大众对信息的持续关注的过程中，分析家的注意力已逐渐从科技转移到人的身上，这种转变鼓励韦伯斯特修订出《信息社会理论》的第三版。为了细察人们对信息的共同关注，韦氏关注了不同学者对信息内涵大相径庭的定义与论证。而为了研究有关信息社会的各种图景，该书细察了现代世界中几种对于信息概念的主要理解方式。之后，该书每章集中讨论一个特定的理论和它突出的代表人物，并根据另一种理论分析和经验观察来评估它的优点与不足。当中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概念；在后工业社会中，贝尔特别强调信息的重要性(第三章)。接着，读者会了解到主张社会正从福特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的论点，这些思想家也认为在这个过渡过程中产生了信息，同时也必须依靠信息才能取得成功(第四章)。读者还会接触到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理论，他提出了“信息资本主义”操纵着“网络社会”这个有影响力的观点(第五章)。除此以外，读者还能读到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前者主张，先进的资本主义必须依靠对信息的控制(第六章)；后者则认为，随着信息的整合，“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正在不断被削弱(第

七章)。另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现代化自反性”论述,他聚焦于信息所发挥的监督和控制功能(第八章)。最后,该书为读者介绍了吉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论点,他们两位都特别关注现代的符号爆炸(第九章)。韦伯斯特确信现代全球化经济象征着资本主义行为方式的蔓延和发展,见证着市场机制的增加、私人而不是公共财产的膨胀、收益性成为各种组织存在的理由、工资劳动的出现以及支付能力支配着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等现象。简而言之,我

生存于其中的“全球网络社会”延续(有人喜欢用“转变”)着长久以来的资本主义原则(第十章)。韦伯斯特不主张运用测量的方法来统计信息社会,而是强调那些以历史发展解释信息化趋势的理论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在现今世界的意义。因为“一方面,他们抵制了用人为的测量方法观察信息社会和信息本身。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思想家承认信息科技、信息流通和信息网络等在量上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但是他们厌恶这些去社会化的孤立的概念,他们喜欢回到现实社会中寻找解释。利用大量的历史知识,他们能够准确地定位信息膨胀的意义,辨析出每种信息都有一个确定的起源和背景:这种类型的信息是为了某个目的,为吸引拥有某种共同兴趣的群体而设的”(第十章)。韦伯斯特坚持从梳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考察信息社会的本质,他敏锐地洞察到全球化使我们所说的“商业文明”(business civilisation)压倒性地覆盖全世界,全球化使美国成为引领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同质化意味着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必须接受美国化,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球推进正是捍卫了美国霸权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赫伯特·席勒提出的“我们能够对信息做什么?”的问题,就能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需求上,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需要利用广告、信息与通讯科技、公司计划和有效销售等手段。

的确,迈入21世纪,西方传媒产业的彻底商业化、去管制化、集中化不是被削弱,而是更加剧烈。詹森(Jansen,2002)发现,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结构性变化,在西方已有长期的酝酿过程,且在近二

十年中明显加速，已经被新保守主义理论视为向后工业主义的转变，被左派视为向后福特主义的前进，被所有意识形态阶层中的许多人视为信息或后现代时代的来临。她还指出：从新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这种资本扩张中的转变描述为牵涉到一种他称之为“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新布局(Harvey,1989:123)，它“以消费行为中地理流动性和快速变化引发的更具弹性的劳动过程及市场为特征”。在这种布局中，对准确及时的信息和即时的数据分析能力的把握变成了高价值商品。科学知识的价值上升了，对信息流和“流行品味、大众文化传播工具的控制……成为竞争中的致命武器”(Harvey,1989:160,quoted from Jansen,2002:170)。詹森又引雅克·安塔里(Jacques Attali)指出：“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意识形态的市场，生命被围绕着普通消费需求加以安排，不管这些需求是否可以得到满足。”(Attali,1992)在这种崭新的后工业，或者后福特世界秩序中，政治候选人、立场和节目就像音乐影带、华夫饼干模子和去头屑香波那样被推向市场(Jansen,2002:180)。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营造的世界秩序中，处于新全球市场结构中的新闻和超市商品一样被推向全球意识形态市场。

在甘斯和舒德森论著产生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英、美拉开序幕，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与渗透达到空前状态。《信息社会理论》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激烈的商业竞争与资本扩张语境中的信息社会属性颇具现实性意义。

在被媒介生产市场化、商业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笼罩的21世纪的媒介生产环境中，如果再次审视曾经被甘斯与舒德森论述过的美国新闻生产，那么罗伯特·麦可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2004)的力作《媒体问题:21世纪美国的传播政治》是最佳读本，它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美国媒体系统及建立并维系此系统的决策过程全然受制于企业财团的支配。毋庸置疑，美国新闻与娱乐媒体的表现自然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化，美国媒体之所以受企业财团之操纵且受到保护，主因是政策制定的堕落。除了媒体所有权之外，商业

支配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广告越来越成为媒体公司的收入来源。归根结底，这是回应以大型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与扩张的需要，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与传播科技发展更加得到强化。作者专门举例论述了“新闻实务的商业化”形式与危害：其一是商业利益产生于或直接渗透入新闻本身，损及其诚信；其二是新闻记者使用他们的特权去报道有利于其雇主的商业投机或投资，也就是说，商业化让记者制作迎合媒体产权所有者和广告商的特定内容，专业主义不再提供抵抗商业压力的保护，这对民主与健康文化的运行，业已构成严峻的挑战。

研究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都体察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加速催生了传媒产业的彻底商业化，表现形式之一是媒介产权的高度集中化（媒介公司的纵向整合与横向整合）。这导致了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公共”服务完全转换成为由市场竞争者提供的“以成本为基础”的服务，广告严重制约传媒的内容生产与受众的共识，传媒技术的更新再造新的国际传媒分工利益的不平等（涵盖阶级、种族与社会性别等范畴）。所有这些都腐蚀了媒体从业者的操守，摧折了媒介产品的质量，削弱了民主社会的根基，压制和排斥了民众的意见表达（曹晋，赵月枝，2007：10）。笔者以为上述研究揭示的媒介生态状况正在塑造中国本土的媒介生产场域。有鉴于传播产业产权高度集中与经营的绝对垄断，在今天的本土传播学界，政治经济取向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是认识中国当下媒介化社会（也是信息社会）的关键途径之一。

另外，因为版权问题，本套译丛未能囊括所有关键性的媒介社会学研究论著，目前仅能呈现四部论著以飨读者，所幸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同时热情引荐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论著。

作为主编，笔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周丽锦女士的积极推动和数位译者的辛勤劳动。遗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曹晋　吴冬妮

参考文献

1. 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2.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 A Reader*),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3. 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4. 舒嘉兴,《新闻卸妆:布尔迪厄新闻场域理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版。

5. 布尔迪厄著,许均译,《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6. 罗德尼·本森(Rodney Benson)文,韩纲译,《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 年第 1 期。罗德尼·本森认为:致力于该知识性课题的布尔迪厄和他的合作者至少在三个重要的方面对英—美式的新闻媒介研究传统贡献良多。首先,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场域"为传统上割裂的宏观的新闻媒介"社会"(societal)模式(诸如政治经济、霸权、文化和技术理论)和微观的"组织"(organizational)研究路径架设了理论与实证合而为一的桥梁。其次,相对于不是集中于新闻机构就是集中于受众(但很少同时集中于这两者)的那些研究,他们的场域理论侧重于两者间的联系。此外,它挑战"被动"—"主动"受众这种二分法,坚持生产和接受周期的预设的和谐。再次,场域理论突显变化的过程,包括媒介场域自身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一个重组(reconfigured)的媒介场域是如何影响其他主要的社会部门的。最后,与英—美式的严格区分研究与政治间关联(engagement)的趋势相反,布尔迪厄、尚帕涅(Champagne)等人建议并实施一个将政治和知识分子行动混合在一起的项目,以此为他们所认定的社会顽疾疗伤。每个场域在"经济的"和"政治的"两极之间复制更大的社会区隔(societal division),围绕着"他律的"极(pole,代表经济和政治资本,是场域的外力)与"自主的"极(代表特定的资本,例如,艺术的,或科学的,或其他的文化资本类别)之间的对立而建构。

7. Croteau, David and William Hoynes (1997), *Media Society: Industries, Images, and Audience*, Pine Forge Press.

8. Gans, Herbert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9.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10. Jansen, Sue Curry(200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Media, Power, Gender, and Technology*, Rowman & Littlefield.

11. McChesney, Robert W. (2004),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 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N. Y.

12. Mosco, Vincent(1996),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Sage, London.

13. Schudson, Michael(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14. Webster, Frank(2006),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Routledge.

致　谢

2003年底，我加入了伦敦城市大学的社会学系。之后，我撰写了《信息社会理论》的第三版。城市大学的教学是本次修订内容的主要源泉，我十分感激社会学、新闻学和工程学的本科生，以及研究传播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生的反馈，他们对本书最新一版的出版工作贡献良多。

笔者还要感谢城市大学的新同事，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智力的启发。近年来，社会学系茁壮成长，伴随着社会学系的发展，我的研究也从中获益匪浅。在此，我要特别感谢 Howard Tumber，Tony Woodiwiss，John Solomos，Carolyn Vogler，Jeremy Tunstall，Aeron Davis，Petros Iosifides，Jean Chalaby，Alice Bloch 和 Rosemary Crompton。还有现正在牛津互联网学院读书的博士生 Rebecca Eynon，他曾在我失落的时候给予了莫大的鼓舞。

我要再次感谢我的妻子 Liz Chapman，她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在本论著历经第一版到第三版出版的岁月里，时光流转，一晃我们的孩子 Frank 和 Isabelle 已经长大成人，并离家自立门户了。我和我的妻子十分想念他们，因此跟随他们来到了伦敦。我还非常感谢我的老朋友和长期合作伙伴 Kevin Robins。在2005年初，他也加入了城市大学的社会学系，对我来说，真是锦上添花、激励备至。毕竟我

们曾一起研究和创作将近三十年，但是在1978年以后，彼此就再也没有在同一个机构共事。无论信息社会为我带来什么，它给予我的满足绝对不能与家庭和朋友为我所带来的幸福感相提并论。

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

目录
Contents

致谢 / 1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二章 什么是信息社会 / 10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 41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 78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 123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 157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 205

第八章 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 260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 293

第十章 信息社会 / 342

人名和学术关键词 / 355

参考书目 / 366

第一章 导论

就像我一样，许多人应该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们当今生活在怎样的社会？我们怎么才能理解生活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主宰了我们的生活？这是一堆常常令人困惑且望而生畏的难题，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充满矛盾的复杂而多变的形势的总体轮廓。以我的观点来看，社会科学义不容辞地应当识别和解释影响我们生活的重要因素，最好是我们清楚自己所前行的方向，那么我们就能游刃有余地把握未来。面对问题，有的人很快就前功尽弃，坦然地糊糊涂涂。有人甚至但凡遇到争议，就退缩回去抓取自我慰藉（而且懒惰）的信仰稻草——我们既来之，则安之。但所幸大部分人仍然坚持不懈地尝试认识世界的周遭，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才能够触及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极权主义”和“自由的民主”之类的辞令。我们中的大多数应该都对此类辞令有所耳闻，每当我们试图说明一些事件和社会剧变，重要历史事件，甚至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总体趋势时，我们都会对自己说出这类术语。

当与其他人讨论某种特定情势时，我们会尽可能地为之贴上合适的标签。我们甚至会争论，这些术语到底意味着什么。例如，虽然我们都会同意俄罗斯已经远离了共产主义发展的轨迹，但并不是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的转型就能准确地被描述为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的转变。此外，大多数分析家都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市场发展趋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市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我们在西欧所说的市场。我们需要不断地限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术语：像“前工业”、“新兴民主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威权民粹主义”等。

尽管这些术语都需要做必要的提炼，不过很少人会拒绝承认这类术语所表达的概念和其他意义。很明显的原因是，虽然这些术语宏大、粗糙，需要修改且会引起误解，但它们给予我们一种手段去认识和开始理解我们生存与源起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为了理解不同社会和情况的最主要特征，我们必须得采用宏大概念。毕竟，宏大术语适配宏大议题。

显然，最近涌现出许多研究当代社会的新方法，而本书正是应此语境之运而生。评论家逐渐开始将“信息”视为最近 30 年来或更早以前的显著特征。信息在社会上的优先性力量已经维持了好几十年，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信息将要退出人们的视线。我们得知此刻正在进入由新“信息模式”支配的时代，我们正处于“电子化的社会(e-society)”，人类不得不忍受被信息所驱动的“无重经济(weightless economy)”，我们已步入“全球化信息经济”的时代。许多评论家把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和其他类似的国家看作是步入“信息社会”的国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和政策决策者们，伴随欧盟紧随日本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就着手于建设信息社会，加快了向“全球信息经济”发展的步伐(Duff，2000)，纷纷把“信息社会”的理念铭刻心间。

信息社会的意义其实是矛盾的根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有的人来说，信息社会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专业化和爱心洋溢的社会，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它表征着对公民的紧密监控；而对有的人来说，它预示着社会将会涌现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它不过意味着琐细之事、轰动煽情和误导宣传的泛滥。在政治经济学家的演讲中，信息社会是新型的“电子经济(e-economy)”，在此，思维敏捷的知识型企业家将占据优势；但在文化界的煽情作品中，信息社会是一个“赛博空间”、一个“虚构的现实”，是一个无法容

纳想象和创造力之地。

虽然上述观点各执一词，甚至意见相左，但显然所有的学者都承认“信息”的确有特别之处。在日益扩展的、方兴未艾的关注信息时代的研究文献中，信息的主要特征和意义都分歧较多，不过，文献最低限度的共识就是“信息”在当代世界已经取得重中之重的地位。研究信息的论著极具思辨性，尽管彻底迥异的前提和结论标榜无疑，但在论述“信息”的特殊显著性上，论著的意见却很一致。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对“信息”之风行的好奇心，激发笔者投石问路，于是创作本书第一版的理念油然而生。从多方面来看，人们似乎想总结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术语来贴切地描述我们时代的特征。但同时，思想家们对“信息的形式是什么?”、“为什么信息对现代社会系统至关重要”、“信息怎样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等问题的诠释却明显各抒己见，难以有一致的定论。

笔者对“信息”的浓厚兴趣，并不仅仅因为持续关注“信息”，分析家们变化多姿的论述也点燃了我的好奇心。当我写作本书第一版的时候，科技变革激起了人们对“信息”的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问世的“微电子革命”，又引发了一阵短暂的论争，大家对信息科技(IT)能为人类带来什么拭目以待。接着，人们讨论的热点议题转向了“工作的终结”、“休闲社会”的来临、在“全自动化的工厂”中的万能机器人等等。不过这些主题也很快过时了，毕竟全职工作形式依旧保持不变，但人们对驱动变革的科技仍然兴致勃勃。现在所有议程都关注网络，尤其是由信息和传播科技(ICTs)所产生的“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社会。电子民主、虚拟关系、互动、个人化、赛博人和网上社团等等成为当今热门议题。当下，许多评论聚焦于引起我们可能遭遇彻底转型的新媒体的速度和多功能性。在2004年12月26日，海啸席卷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此时，通讯失灵，电子邮件和网络迅速取代了电话，成为寻找失踪人口的有效手段。在2005年7月7日，恐怖分子炸毁伦敦地铁和公车系统，迫使电话系统关闭(可能是处于安全的原因)，人们立刻转移到网络上寻求信息与相互支持，手机拍照设备取代了传统媒体，在毁坏现场拍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照片。

不过，与此同时，人们在某些方面开始把注意力从科技转移到信息的软实力上。那些领衔潮流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具有引领适应性和持续得到再培训的“信息劳工”和“符号分析家”，他们是时代的标杆。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只要有幸获得生存于新全球化经济时代所具有的信息能力的一流教育，就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现在，所有与创意产业相关的商业人士、管理人员、软件工程师和媒体创作者等等，都被视为信息社会的执掌牛耳之人。伴随大众对信息的持续关注，学界从科技到人的分析转型，激励笔者创作出《信息社会理论》(*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的第三版。

笔者集中注意力于重要的各不相同的信息阐释，意在细察人们对信息共同的关注旨趣，即便如此，我们看到人们对于信息的意义和角色的理解大相径庭。实际上，越是更加深入地研究人们所运用的参照术语，不难发现，实际上论者们越是各有所指，缺乏共识，信息不过是表面上他们言说的共同主体。

肇始于研究有关信息社会的各种图景，本书依照细致洞察现代世界中几种关于信息概念的主要贡献来组织章节。有鉴于此，第二章聚焦信息的定义进行批判性的回顾(在整本书中都会反复被强调)。接下来的每一章，我都会集中讨论一个特定的理论及其卓越的代表人物，同时我会根据另一种理论分析和经验观察来评估其优劣。本论著以此方式开始讨论思想家和他们的理论确实有点问题。毕竟读者都渴望了解网络和网上、网下的关系，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信息流通，MP3 播放器普及所带来的音乐消费，或者媒介化时代的政策等等，不过，遗憾的是读者无法在本书中找到上述热点内容的相关专题。但本书确实涵盖了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每一章节所介绍的主要思想家及其理论当中无不涉猎与之相关的议题。也正因为如此，有的读者可能会把本书作为一个空想理论家的著作而不屑一顾。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笔者的粗陋在所难免。当读者展读本论著时，他们会不期而遇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强调信息的重要性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第三章)。接着，读者会了解到主张社会正从福特主义转型到后福特主义的论点，同样地，这些思想家也认为在这

个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信息，同时也必须依靠信息才能取得成功（第四章）。读者还会接触到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理论，他提出了“信息资本主义”操纵着“网络社会”这个影响卓异的观点（第五章）。除此以外，读者还能读到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主张先进的资本主义必须仰赖信息的控制（第六章）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认为随着信息的整合，“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正在不断遭到削弱的论述（第七章）。接着还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现代化自反性”理念，他聚焦于信息所发挥的监视和控制功能（第八章）。最后，我会为读者介绍吉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论点，他们两位都对现代的符号爆炸情有独钟（第九章）。

显然，这些思想家及其理论相互关联，跨越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内容仍然是当代社会科学讨论的重镇。当然，毋庸惊异，社会思想家都尝试理解和解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正是信息领域之变迁。毕竟，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大众媒介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信息和传播科技的最新发展，职业的新形式以及教育系统的转变，就妄谈要考量世界的现状，这是多么匪夷所思。

在此，我得承认：由于本书开篇以讲述当代社会科学为起点，部分读者阅读某些章节时，难免有困难。毫无疑问，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理论讳莫如深，丹尼尔·贝尔的著作虽然得到普及，但他也是一个十分复杂难解的社会学家，读者如果要理解他的思想，的确，需要非同一般的功夫。同样地，让·鲍德里亚是以他晦涩难懂的表达方式而闻名的（同时也让人感到不快）。因此，困惑重重的读者，绝对不胜枚举。那些对信息时代兴趣浓浓的读者，本书的内容令他们疑虑不安，因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些异质而神秘的社会理论家。读者们都知道，在科技领域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突破。从而，他们也希望直接明了科技发展对社会和经济领域所造成的影响。不过，市场上也有许多相关的平装书能满足他们这方面的求知

欲。但是,“理论”——特别是曾经雄心勃勃地解析当代生活显著特征的和那些常常追溯历史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以及发明这些理论的大批“理论家”(其中很多人已经仙逝),事事如要引经据典地使用这些理论,实在困惑重重,因为这些理论大部分都令人难以理解、深奥含混。

有鉴于此,在“何必谈理论”的氛围里,我必须说出本书以“理论”为出发点的价值。我刻意(intentionally)通过与主要社会理论家碰撞对话的方法让读者理解信息的概念,并以此驳斥那些宣称信息时代诞生的草率主张。社会上有许多“务实”的男性(和一些女性)发出了太多那样的宣言,他们被“信息科技革命”所震撼,他们热衷于网络,他们无法离开电子邮件,他们为博客而欣喜若狂,他们被“虚拟现实”经历所迷惑,他们喜欢抽离出随着信息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和经济结果。在这个架构下,职业模式会改革、教育模式会转变、企业结构会重组,最后连民主本身也会被重新评估,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信息革命”所引发。

上述路径的熏陶(并继续作用)了关于信息社会跌宕多姿的观点:在平装书中,我们能看到诸如“强大的微电子(The Mighty Micro)”、“无线社会(The Wired Society)”、“数字化(Being Digital)”和“什么将会发生(What Will Be)”等等诸如此类的题目。在大学里,我们会有讨论“电脑革命的社会影响”的相关课程,不计其数的政治商业事务和新闻事件都不断提醒广大的受众,未雨绸缪,迎接将在生活各方面发生的剧变,因为信息时代即将到来。

笔者另辟蹊径,以当代社会科学理论(至少是与经验证据相结合的)作为信息研究的起点,意在证明,(前述的)信息的社会影响路径的研究绝不能过于简单化,任何渴望理解世界将如何,未来又将怎样的人们,必然会因简单化导致误解。除此以外,笔者另有用意,目的是说明,与经验证据相结合的社会理论,意涵深透,因此最终看来,这样的理论更加切合实际且甚有助益,能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和诠释信息领域的最新趋势。

本书所研究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直接提出了不少信息化的趋势,

当然并不是每位理论家都如此。过去一个世代以来，丹尼尔·贝尔和赫伯特·席勒就以值得称誉的预见各持迥异之论点，不过，他们都认定信息和传播一直是战后的几十年社会变迁的核心。而本书的其他思想家，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安东尼·吉登斯，他们则较少地直接关注信息领域。但我要补充一句，虽然他们较少直接研究信息领域，但并不是说他们对信息理解没有什么贡献，或者说他们并不认同信息的重要性，其实，只是由于他们论辩的术语与本书以“信息”为聚焦主题不甚相同，因此在讨论我感兴趣的信息主题前，笔者会先介绍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念，以及讨论那些宣称社会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的主张。虽然笔者无意对某个社会理论提供尽善尽美的诠释，但本书会尝试用目前最具相适性的概念工具阐释信息领域的意义，此取向自然不失学术写作的正当性了。

贯穿本书全部章节，笔者一直以质疑的态度审视信息社会这一概念。有一两个评论员曾经批评《信息社会理论》的早期版本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概念，看起来，笔者根本用不着整本书讨论信息社会。在第十章中，我会再次论述此问题，但在此，我必须指出——只有深入洞察每个术语才能发现思想潮流的力量，即便是某种思想存在严重的错误。虽然信息社会可能被误解了，但它还是具有启发的价值。同时，关键问题在于“信息社会”这一概念常常伴随着精心修饰的假设，思想家们总是推测什么变化已经或者正在发生，推想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信息社会”似乎总是理所当然地被一些宽泛的想法所运用。笔者思索至此，“信息社会”自然作为本书论述的主题，因为这意味着至少读者会立刻得以用十分宏大的术语来阐释信息社会是什么？他们坚信信息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并将很快来临。尽管如此，笔者确实希望通过本书的解释动摇那些赞同信息社会的信念。就算这些概念在某些方面也是十分有用的，但我仍然会质疑各种有关“信息社会”概念的准确性和恰当性。所以，读者应该会注意到，虽然我经常批判各种术语，但有时我也会承认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息领域的遭遇。

本书的第二章严谨地审视了“信息社会”的概念。读者会接触到

信息社会的几种主要定义方式。不过，笔者首先会集中讨论本书所提及的思想家关于信息社会的主要分歧。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支持信息社会的理念，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我们生存的社会不过是既有关系的信息化(informatisation)。对比不同的术语并不仅仅为了说明学术上的分歧，而且为了清楚地知道怎样才能最准确地理解信息领域所发生的变化。

突出下文即将展读的色彩纷呈的思想诠释很关键。那些赞同信息社会观念的思想家强调信息社会与过往社会的显著性区别，他们都相信信息社会正在涌现，其中，虽然并非所有思想家都喜欢用“信息社会”这一术语，不过他们都承认当代社会是特别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笔者以为这些思想家是信息社会的认可者；而另一部分学者尽管都欣然承认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坚持——当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对过去社会的延续发展。

信息社会理论家与那些把信息化作为当代社会系统的从属特征的学者之间的分歧，正是在于他们对社会连续统一体的认识各有千秋。明显地，前者强调社会现代进行时的变化特征，而后者则着重关注社会的延续性特征。

当今世界各种论述“信息”的观点，本书都罗列考察。比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吉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主义”、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等。他们每一个人的理论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息化的发展，他们研究了白领工人的角色、信息对已确立的知识结构的破坏、监控的延伸、日常生活的管制以及公民社会的衰落等等。而在本书中，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各种不同的阐释。

不过，在审视学界不同的观点时，我们不能忽略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认同信息社会的思想家与那些把信息化视为过去社会关系延续的学者之间的区别，正是这些观点首要的分歧所在。抓住这一条线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思想家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宣称信息社会是区别于过去的新型社会形态的理论家有：

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丹尼尔·贝尔及其追随者)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让·鲍德里亚、马克·波斯特、保罗·维希留)

弹性专殊化(flexible specialisation)(迈克尔·皮奥雷、查尔斯·萨贝尔、拉里·赫希霍恩)

信息化的发展模式(the 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曼纽尔·卡斯特)

而那些强调延续性的理论家有: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赫伯特·席勒)

调节学派理论(Regulation Theory)(米歇尔·阿格利埃塔、阿兰·利比茨)

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大卫·哈维)

自反性现代主义(reflexive modernisation)(安东尼·吉登斯)

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尤尔根·哈贝马斯、尼古拉斯·加汉姆)

属于后一种分类的理论家并没有否认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过与前者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信息的形式和作用从属于社会长期存在的规则和实践。两类观点,孰是孰非?自当由读者阅读之后评判,他们有机会判断哪一种解释更具说服力。

第二章

什么是信息社会

如果我们想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形形色色的信息与议题的趋势，我们必须留意讨论的参与者提出的定义。当参与者提起“信息社会”这个术语时，对我们甚有助益的是立即开始审视他们所说的含义。面对变迁，一些人可能稳如泰山，依然如往昔。而赞同“信息社会”这个概念的人则会坚持，我们的时代是以新颖的“信息”为特征，后者比前者更为迫切地需要我们的论析。因此，行文至此，本章的用意就在于质问：当人们谈及“信息社会”时，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接着，笔者会对“信息”的各种理解作出评论。这是因为——定义信息现象是一切讨论的基础。同时，定义的不同也反映了信息社会理论家与信息化思想家之间的迥异。前者宣告信息是现今的新奇事物，而后者则意识到当今世界的发展深深地笼罩在过去的力量之中。

信息社会的定义

在阅读有关信息社会的文献时，笔者深受打击，因为许多研究者都在课题中运用尚未发展的定义来界定其主体。在研究者看来，我们生活在信息社会是不言自明的，他们于是欣然假设，大可不必对读者准确地阐明其所运用的信息社会的概念的含义。他们冗长地写了

大量信息社会的特征，但却对其操作标准含糊其辞。为了搞清楚信息变革的意义，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如经济生产、社会交往的新方式、生产进程的革新等等方面展开解释。可是，当理论家如此研究时，他们常常无法确定信息为何，以及以何种方式日渐成为现代生活的核心和关键，并将人类引领至一种新形态的社会。信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者把它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核心？

笔者可以区分五个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因为它们都各自代表着一个识别新事物的标准。具体如下：

1. 科技的(technological)
2. 经济的(economic)
3. 职业的(occupational)
4. 空间的(spatial)
5. 文化的(cultural)

虽然理论家在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时，总是会格外强调某个因素，但其实这五个定义面向之间不必相互排斥。而这些定义的共通点便是绝对信服信息变革在量上的积累，最终形成质变，从而组成一个新的社会类型——信息社会。以此方式，每一个定义面向都能推断出一个相似的结论——因为现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信息，所以我们便拥有了一个信息社会。可是，我们都明白，用这种事后追溯的"马后炮"推论(ex post facto)很难显示出这是引发结论的原因。

在这个范围内，信息社会的第六个定义异常独到，因为它的主论调不是把原因归为现今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虽然现实的确如此)，而是认为信息的特性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它暗示着，理论知识/信息是人类如何表现自我的基础。这个定义很难以类似的方法给它定性，尽管它是证明信息社会特征的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但却没有被大多数的信息社会支持者所接纳。既然如此，就先让我们更进一步地逐一理解以上面向的定义。

科技的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开始，科技的概念主要集中于各式各样

的科技革新。新科技是最明显的新时代标志之一，常常被视为信息社会到来的信号。新科技包括有线和卫星电视、电脑间的通讯系统、个人电脑(PCs)、新的办公室技术、特别的在线信息服务、文书处理以及类似的设备等等。如此不胜枚举的科技革新必然会引起社会的重构，因为它所产生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

新科技引发了系统的社会变革，我们由此可以认识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早期为第一个阶段。在当时，评论家为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超凡的微电子"能力而振奋(Evans，1979；Martin，1978)，而且再没有人会比世界上未来学家的领军人物——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80)更坚信这一点了，他用一个深刻的比喻作了暗示，随着时光流转，世界已完全被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所塑造，这三次浪潮犹如汹涌澎湃之潮汐，后浪推前浪，无法停歇。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第三次便是信息革命，它在席卷我们的同时，也预兆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来临(托夫勒证明，只有我们驾驭了科技浪潮，生活才会变得美好)。

而变革的第二个阶段就在发生近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评论家开始相信信息和传播科技(ICTs)的融合是如此重要，它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型的社会。电脑通讯系统的发展(电子邮件、数据和文本通讯工具、网上信息交换等等)正激发人们进行层出不穷的、与酝酿中的新型社会有关的投机活动(Negroponte，1995；Gates，1995；Dertouzos，1997)。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促进了经济的兴旺、教育和民主的进程，它的能力日新月异，引人注目，激起了浩如烟海的评论。媒体着力渲染"信息高速公路"涌现的特别报道，每每宣称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即使是平民，也可以游刃有余。各种权威的声音高调呐喊："由于电讯科技的前进，一个新的秩序……在一个意料以外的世界中推行。未来正在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s)里诞生……而任何绕开信息高速公路的人将面临毁灭(Angell，1995，p. 10)。"这些报道大部分采用互联网的技术制作而成，尤其是普遍以宽带技术为基础，因为该项技术能一直在线而不影响正常的电话通讯。然而，凭借着以手机为媒介连接上网的方法，无

线连接上网的形式即将产生，此项科技会让那些预言世界将“随时随地连通”的人欣喜，所谓的“随时随地连通”是指使用者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与网络保持联系。因此，上网收集数据的做法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采用，与希腊、墨西哥和肯尼亚等网络技术较落后的国家相比，像芬兰、韩国、美国这些拥有众多互联网用户的国家往往被看作是信息化程度更高的社会。截止到2005年的夏天，在英国差不多有六成家庭使用网络，这一覆盖率虽然与互联网技术领先的国家相比要低一些（如丹麦和瑞典等国家有80%的家庭使用网络），但依然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为了推广在银行、企业、政府、大学以及自发个体之间开展的国内的、国际的甚至真正的全球化信息交换活动，我们将会建立一个能够让即时电脑通讯随时随地进行的科技基础组织（Connors，1993）。

大部分的学术研究者，并不像未来学家或者政治学家一样喜欢夸夸其谈，他们的研究路径在根本上类似，即以数据求证结论（Feather，1998；Hill，1999）。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已经开始尝试测量信息社会的发展数值（Duff et al.，1996）。在1975年，日本邮电局（MPT）着手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他们竭力记录信息量（如，电话通讯的数量）和信息传播媒介（如，电讯设备的渗透性）在使用尖端科技时产生的变化。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学派设想了一套新熊彼特式（neo-Schumpeterian）理论，研究者将熊彼特理论中有关科技创新会带来“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部分与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有关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long waves）相结合，他们主张信息和传播科技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建立（Freeman，1987）。在这个时代创始之际，人们会感到无所适从，但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后，人们会在经济上受益。这一新的“科技经济范式”在20世纪初期便创立了一个成熟的“信息时代”（Hall and Preston，1988；Preston，2001）。

按照常理来说，我们得承认上述有关信息社会科技层面的定义入木三分。毕竟，如果我们可以把一系列发明（Landes，1969），如蒸汽机、内燃机、电力和飞机等看作是“工业社会”的核心特征，那我们

为什么又不能把信息与传播科技领域内发展的高超技艺作为新型社会来临的证据？正如约翰·奈斯彼特(1984)提出的："电脑科技对于信息时代的意义，恰如过去机械化对于工业革命一样重要。"(p. 28)有鉴于此，我们着眼于科技定义信息社会，又未尝不可呢？

显然，这些科技成就正是新型社会引人注目的特征。可是，在大部分情况下，由于科技的不可知性，有的人能探查得更深入，而有的人却备受挫折。在此，不妨问一个测量方面的简单问题：在现今社会(this society)里，到底有多少信息与传播科技？信息与传播科技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我们具有信息社会的身份资格？到底需要多少信息与传播科技才能被视为信息社会？一旦如此思考信息，我们马上会意识到，许许多多强调科技的人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有真正价值的、可测量的数据。信息与传播科技，肇始之初就无处不在，但也不知所终。

不言而喻，测量信息与传播科技问题重重，与此相伴随的难题是无法规定科技的标准，没有了标准我们也便无从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了信息时代。上述问题的解决对于确立新型社会的特别定义尤其关键，但这一点通常会被信息社会的拥护者所忽略，他们认为新科技自身便宣告信息社会的到来。十分意外地，该问题也同样被其他学者回避。他们声称信息与传播科技是信息社会的主要标志，论者们只是满足于阐述科技革新的一般术语，不知为何他们认为这已足够去识别一个新型的社会。

现在，笔者开门见山地陈词，意在直截了当地说明问题——什么是信息社会？既然是信息社会，是不是每人都拥有一台个人电脑？如果是，这些个人电脑需要有什么特别配置吗？电脑是不是需要具备联网功能？把拥有 iPods 和黑莓(BlackBerries)作为信息社会的标志是否更合适？是不是当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数字电视的时候，我们便进入了信息社会？个人采用这些科技是否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关键措施是系统化地合并信息与传播科技？在制度上，采取措施管制科技是因为反对个人私有技术吗？但凡思索至此，我们就意识到信息社会在科技上的定义虽然肇始之初似乎不言而喻，但其实这些

定义的内涵并不是如此明确。那些声明信息与传播科技的采用是信息社会显著特征的人，理应准确地解释他们所说的含义。

另一个反对科技定义的原因司空见惯——批评家反对那些鼓吹科技决定论的人。科技决定论者断言，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先是新科技问世，随后对社会造成冲击，因此便强迫人们适应新型社会情境。有鉴于此，科技高于一切，它能确定整个人类的社会世界——从蒸汽时代到汽车时代再到原子时代(Dickson，1974)。

反对意见的重点并不在于必然出现的科技决定论者将变化工程过度简单化，把科技视为最根本的社会动力；反对的关键理由是科技决定论者把完全独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三个维度归属于科技的革新，他们认为，这三个维度从属于首要的力量——科技。科技影响着社会各方面，而它本身似乎拥有能让自己永久存在的能力。在这种想象中，科技就像一种来自于社会外部的入侵元素，它的发展没有与社会产生联系，当它发挥功能作用于社会时，自有超能动力。

但经过论证后发现，科技并非游离于社会领域之外。相反地，它是构成社会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研究和开发的结果先于科技出现，其中那些有价值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科技(比如，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军事计划比医疗研究获得了更充分的资金，因此高级武器系统的研发阻碍了普通感冒治疗的改善，这样的结果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许多研究显示科技深深地铭刻着社会的价值烙印。比如纽约市桥梁的工业设计，桥所设定的高度是为了阻止公交系统进入某些预留给私家车专用的区域；汽车制造科技也需要接受私家车主的评估，如考虑用车家庭的规模(通常是两个成年人和两个儿童)，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放肆地使用不可再生能量就伴随着污染)，社会地位的象征(保时捷、甲壳虫、斯柯达等)，还要加入个性化的元素以区别于公众交通系统；还有房屋的建造，它不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还是一种生活的表达方式，车的品质象征了威望、权利关系以及生活风格。科技本质化的论点实在不可取，其存在与社会相互建构，现在却要把它视为一种孤立的、脱离社会影响的力量存在，并用来定义一个社会，这种观点又如何让人接受？科技决定论

是很简单的(人类可以用任何生活元素来为社会命名——比如氧气社会、水社会、马铃薯时代)而且是荒谬的(科技事实上就是社会内在的一部分),所以,切不可盲目崇信信息与传播科技在社会变革中的迷思地位(Separate and supreme role)。

经济的

经济面向的定义描绘了信息活动在经济价值上的递增价值。如果有人能统计出由信息商业带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上升的比例,依据逻辑关系,我们便可以宣称这部分增长是信息经济的成就。只要信息活动取代生存农业和工厂制造业而占据经济活动的大部分,那么我们便进入了信息社会(Jonscher,1999)。

上述论断虽然在原理上看来轻而易举,但是实践操作却格外复杂,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 1902—1983)率先承担了这个领域许多开拓性的工作(,1962)。长江后浪推前浪,马克·波拉特(Marc Porat, 1977b)对马克卢普在信息产业,比如教育、法律、出版业、媒体以及电脑技术等各方面经济价值的鉴定以及评估计划,都有所改良更新。

波拉特把经济分为主要信息部门和次要信息部门两部分。主要信息部门由于具有市场价格,所以很容易受现实经济评估的影响。而次要信息部门包含着公司和国家机构内部的信息活动,虽然它很难定价,但却是所有现代组织的基础(比如,一间公司的人员派别、商业中的调查和发展环节)。用这种方法,波拉特将两种信息部门区分开,继而再将它们统合,去除经济中的非信息成分。然后再集中计算美国国内经济统计数据,他最后得出结论——主要信息部门和次要信息部门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半成,因此"现在的美国是以信息为主体的经济体"。同样地,美国是一个"经济活动的舞台主要由信息商品和服务制造商、公共和私有(次要信息部门)行政系统所占据的信息社会(Porat 1978, p. 32)"。

将信息的经济意义量化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成就。那些承认

信息社会的人都会例行地求证于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尤其是后者，把他作为解释信息活动递增的权威论证，波拉特开始引领学界研究信息社会通往新时代的旅程。然而，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路径来决定信息社会也同样困难重重(Monk，1989，pp. 39—63)，主要问题是，在那些代表客观、科学的统计表格背后，其实蕴涵了若干主观的诠释和价值判断，它们决定了如何建构统计门类和信息部门的内涵。

就此格外突出的问题在于不管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关于信息的思想如何存在差异，他们都会创造夸大信息之经济价值的信息部门。其实，这样做的有效性究竟如何，我们不敢恭维，只能是疑云密布。例如，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中包含了“信息建筑物的建造”，此概念的基础是指那些作为大学或者图书馆的建筑物，区别于那些茶或咖啡的储存仓库。可是，如果这些建筑一旦建成后，便改变了原来的用途，这又该如何归类呢(很多大学部门都是位于过去的家庭住宅内，有一些演讲厅也转变为仓库了)？

此外，波拉特把非信息企业内的“准企业(quasi-firm)”定位为信息部门时，他也感到十分棘手。石化公司的调查和发展环节也会涉及信息活动，仅仅为了统计的目的，便把这部分从制造业成分中分离出来，如此做法真的切合实际吗？信息活动的分类的确是含糊不清，难以明确区分。调查和发展环节与制造部分紧密联系，任何由于数学原因而带来的划分都不符合调查和发展本身的定位。更为荒谬的是，当波拉特划分他主张的“次要信息部门”时，事实上，他把所有的产业都切分为信息领域和非信息领域。但如此主观地以“思考”(脑力劳动)和“执行”(体力劳动)这样的分类来简单切分任何产业的整体进程，实在没有说服力。像电脑数字系统的操作和部门管理都是生产的整体部分之一，是属于“思考”范畴还是属于“执行”范畴？我们又该如何把它归类才合适？波拉特对于产业内部的划分稍微有些武断，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绘制一个对立于非信息领域的“次要信息部门”。虽然这样的反对意见并不会让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的研究发现根本失效，但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在建构统计表格时，不可避免地被价值判断所干扰。同样地，上述反对意

见与怀疑论者一致，质疑信息经济已经来临的论点。

信息经济的另一棘手之处在于统合起来的数据必然使完全不同的经济活动单一化。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在广告和电视方面增长的经济价值象征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但这会让人迫切地想在性质上把各种信息活动区分开。这些信息经济学家热衷于将每件事物与活动贴上价格标签，但不幸的结果是，这往往让我们无法了解信息部门的真正价值维度。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并没有研究信息社会在量与质上的区别。显然地，《太阳报》(*The Sun*)几百万的销量(无疑地，比起信息价值，这里更多的是经济价值)是不能和《经济时报》(*Financial Times*)四十万的发行量相提并论，这就回到我所谈及的差异问题了。有人会建议，信息活动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分，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已生活在一个信息活动价值颇高的社会，但信息对于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活力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如果那样的社会真的能实现，那么一个国家将会充满游手好闲的人和迪士尼风格的寻欢作乐者，他们可以醉生梦死。

职业的

职业是社会学家定义信息社会所推崇的研究路径。这个取向的研究与最重要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后工业社会”是“信息社会”的同义词，这是贝尔个人的用法)丹尼尔·贝尔的研究密切关联。随着时光流转，职业结构不断地经受考验，其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路径的言下之意在于当从事信息工作的职业优势彰显时，我们便进入了信息社会。人们把制造业的减少和服务行业数量上升的现象理解为体力劳动被白领阶层的工作所代替。由于非体力工作(不同于要求强健体魄、熟练度和具有机械化特性的体力工作)的基础是信息，这些工作的实质性增长也就宣告了信息社会的诞生。

此论有初步的数据支持：在西欧、日本和北美，超过70%的劳动力是在服务业部门，而且大部分人从事白领阶层的工作。既然职业的“主要群体”由信息工人组成，仅此而论，我们似乎生活在信息社会

之中(Bell,1979,p. 183)。

人们开始强调职业的变迁是信息社会的标志。它已经代替了曾经占支配地位的观念——技术发展预示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以职业定义信息社会的概念迥异于以信息和传播技术(technologies)的发展区分新时代的研究路径。职业变迁的取向聚焦于强调信息本身的变革力量,而不在于技术。信息在职业内部产生,并为其所用,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收录信息。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1999)洞悉到信息已经成为了现今时代的基础,为了突出这一认识,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知识经济大趋势》(*Living on Thin Air*)。"在稀薄的空气中生存"(Living on thin air),这句话曾是精于世故的智者对那些不愿意通过干苦力活而谋生者的一种忠告。但现在,时过境迁,如此箴言都已经过时了。利德比特认为"在稀薄的空气中生存"的观念在信息时代很受用,它揭示了人们该如何在信息时代里谋生。《知识经济大趋势》一书主张,"聪明地思考"、具有"创造性"并拥有开发"网络"的能力是在新的"无重"(weightless)经济中生存的关键(Coyne,1997;Dertouzos,1997)。财富不再由体力所生产,而是来源于"理念、知识、技术、天赋和创造力"(Leadbeater,1999,p. 18)。利德比特在其论著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设计师、交易商、图像制作人、音乐家、生物工艺学家、基因工程师和投机者等之类的成功案例。利德比特还出神入化地把学问精深的思想家才能理解的结论深入浅出地进行阐述,使人们易于理解其用语。

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tch,1991)、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1993)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96—1998)等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作家都提出,那些以熟练运用信息为职业特征的人们引领和活跃着现在的经济。从"符号分析家"(symbolic analysts)到"知识专家"(knowledge experts),最后到"信息工作者"(informational labour),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者对信息领域工作者的称呼虽然不断地因职业变迁而更新,但现今社会的动摇者和行动者都是那些从事创意工作和使用信息的人,此乃永恒不变之准则。

信息社会引领者的重要性理应犹如煤矿工人在工业中占据的核

心地位那般显赫，但实际上，把职业按照专家分类的专门类型划分务必格外谨慎。研究者往往以一个单调乏味的“信息工作者”的准确百分比那样的统计数字作为最后的研究成果，但这个成果背后所隐藏的研究者如何建构分类范畴，又是如何划分不同职业类型的人们的错综复杂之进程，却没有显示。正如波拉特所言：“如果我们断言某种职业主要从事控制信号的工作，那么我们便是在划分与信息关切的程度而非是否属于信息类的工作类型”(Porat，1977a，p. 3)。例如，铁路的信号员必须了解铁路轨道和时刻表，了解火车站的各项任务和例行公事；他们需要与其他的信号员、车站工作人员以及火车驾驶员进行充分交流；他们需要清楚他们管辖的地段以及其他信号室的管理范畴；他们需要准确而合理地安排所有经过他们管理区域的火车；有了先进设备的帮助，他们不需要耗费体力去拉控制杆(Strangleman，2004)。而在过去的“工业时代”，铁路的信号员无疑是一个体力工人。相反地，修理影印机的工人不了解其他产品，因为他们只在本行业内受过训练。同时他们需要在炎热、肮脏、局促的环境中工作，需要用一定的体力去移动笨重的机器和替换损坏的零件。因此，就算使用符合波拉特定义的新时代机器工作类型，他们也不会被分到“信息工人”的范畴中。不言而喻，我们需要对最后的数据成果有所质疑，因为那只是研究者的一厢情愿的职业分类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

这种分类的结果往往不能分辨出在战略上更具重要意义的信息职业。虽然这一取向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描绘信息产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繁荣景象，可是它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能够区分出最重要的信息职业的途径。任何只追求统计数量层面的信息工作，很可能顺理成章地得出某种信息类职业的增长似乎都会对社会生活带来特别重要的影响的结论，成果貌似客观，但其结论问题重重。既然有些评论家依据“专业性工作优先”来寻求对信息社会的界定，那么进行职业测量的时候，信息职业的级别就尤为重要(Bell，1973)。有的信息职业支配着“组织化的知识”，壮大了“技术结果”的中坚部分；而另外一些信息职业却还只是作为一

些重要信息职业的选择性来源。计算“信息工作者”的总数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些人的层次，及其与之处于共生关系中的权力和地位的变化。例如，我们可以说电脑和电讯工程师的增多是至关紧要的，因为他们对技术革新的步伐执掌牛耳。或者我们也会提出科学研究者的扩充是信息工作中重要的门类增加，因为他们是革新的关键因素。相反地，虽然社会工作者作为信息与传播技术工程师中的一类，会被划分到“信息工作者”中，信息工作者的数量会大幅度地上升，但是这种现象却与信息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社会工作者是为了解决老年人的问题、控制家庭断层的扩大和管治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而增加的。

通过思考社会历史学家哈罗德·柏金(Harold Perkin)的研究，我们会更好地理解为何需要从质的差异上区分不同群体的“信息工作者”。在《专业社会的兴起》(*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中，柏金提出1880年后的英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优秀“专业人士”粉墨登场的历史。这些“专业人士”的优势支配地位是凭借了“由教育打造的人文资本和……淘汰不合格者而得到增强(p. 2)”。柏金认为那些具备资格的专业人士的意见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组织原则”(p. 406)，专业人士取代了过去曾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工人阶级组织、资本企业家和地主贵族)，专业人士的服务、资质和高效的专业精神取代了其过时的理想，比如工人组织的互助团结、资本家财产和市场的体制，以及绅士的父权观念。自然地，在私营部门的专业人士会与公共领域的专家发生激烈的论争，但柏金坚持这仅仅是一个“专业社会”的内部冲突，双方仍然共享一些基本的设想(特别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和根据业绩而给予嘉奖)，不过是把那些非专业人士完全排除在外，使其无法切实参与双方的论辩活动。

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关于“新阶级”的讨论为柏金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补充。古尔德纳认为在20世纪迅速成长起来的，由“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雇员类型就是“新阶级”(Gouldner, 1978, p. 153)。“新阶级”的人既为自己寻求发展机会且往往臣服于权力集团，也能参与竞争商业界控制权和政党领袖

之职。尽管“新阶级”拥有潜在的上升权力，但群体内部会因为不同等级而分裂。其中最关键的区隔存在于大多数技术决定论者、默守成规者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后者倾向于批判性和解放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类人的差异正是哈罗德·柏金关于私营和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的冲突的表述。例如，我们会发现私营部门的会计师是保守的，而人文知识分子更倾向于激进。

笔者以为古尔德纳和柏金两人都确认了信息工作领域里出现的显著变化，其言论对于社会总体来说——冲击深刻。古尔德纳的“新阶级”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和争辩社会变化方向的词汇；而柏金关于专业人士的研究为管理社会事务创造了许多新的理念。如果有人要在这些思想家的理论中寻找信息社会的指标，那肯定是特定群体的业绩品质。无论人们是否同意这些解释，以“信息工作者”纯粹量化的数据来定义信息社会，明显存在挑战。对于像古尔德纳和柏金这样的思想家来说，数量上的变化不是主要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所强调的群体所占的人口比例，即使数量已经扩张了，但仍然是明显的少数人口。

空间的

关于空间层面信息社会的概念虽然受益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但它的核心是地理学者强调的焦点——空间。这一研究路径主要强调的是信息网络，它将各场所连接成网络，对时间和空间的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近几年，信息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显著特点，因此这一定义面向便成为十分热门的信息社会指标。

信息网络的集中性常常受到重视，它能把公司、城镇、区、洲甚至是全世界之间的不同位置连接起来。现在，电力方格（electricity grid）贯穿整个国家，只要个人愿意并采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进入网内。那么，我们便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在国内、国际甚至全球范围内运作的“在线社会”。它为每个家庭、商店、大学、公司，甚至是公文包里放着手提电脑和调制解调器的移动个体提供了一个“信息网圈”

(Barron and Curnow,1979)。

渐渐地,我们都被各式各样的网络联系起来了,而互联网自身也扩张了覆盖的范围,并增强了其运载能力(Urry,2000)。在商场和餐馆里的电子销售终端、跨越大陆的访问记录、与同事发电子邮件或者在互联网上交换信息,网络的运用无处不在。我们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上述"赛博空间"(cyberspace),但信息网圈仍然在国际银行、政府间的机构和公司联盟之中忙碌运行。

在此关注的流行观点就是电子高速公路引发重新强调信息流通(on the flows of information)的重要性(Castells,1996),其中之一便是信息流通彻底修正了时空关系。在"网络社会"里,时间和距离的限制都从根本上解除了,企业甚至个人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心应手地处理他们的事务。学术研究者查阅资料时,不再需要从大学走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因为学者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借助网络完成查询;企业要了解它在远东地区的出口情况时,不再需要定期遣派经理飞行千山万水,处理商务差事,因为电脑信息的交流,公司可以进行系统的远程监督。这种种迹象预示着社会的主要秩序将要发生变化(Mulagn,1991),甚至充分标志着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无人可以否认信息网络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人造卫星让地球内的即时通讯成为可能;无论是牛津还是洛杉矶,东京还是巴黎,都可以随时访问数据库;传真机和联网的电脑是现代商业常规设备的一部分。现在的新闻覆盖几乎是及时的,利用手提电脑和人造卫星、视频手机即使是在最荒芜的地区也能实现现场转播。个人不需要与他人共处,也可以完成实时交流(Wellman,2001;http://www.chass,utoronto.ca/~wellman)。但是我们还是会质疑——为什么网络的存在会让分析家将社会分类为信息社会?思索至此,疑云顿生,信息社会的定义并不严谨。例如,在定义上什么网络可以称为网络?是两个人互相对话的时候,以电话或者电脑系统为媒介,通过数据包交换传输了大量的信息便可称为网络呢?还是当办公室区域内以网线连通,或者当家里的电脑终端可以与当地银行和商场连通时,便可称为网络了?究竟什么构成了网络?这个严肃而棘手的问题,不仅

提出了怎么区分不同级别的网络的问题，而且也涉及了如何证明我们已经到达了“网络/信息社会”？言下之意就是究竟什么是“网络/信息社会”？什么不是“网络/信息社会”？区别两者的关键指标又是什么呢？

此外，我们还会再问——网络不是定义为科技系统的一部分吗？那从空间路径界定信息社会，这意味着我们是否在用信息社会的科技定义？有的研究者认为，以信息流通面向界定信息社会更为合适。如果这是一个科技的定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综合服务数字网(ISDN，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的扩展视为信息社会的一个指标，可是关于如何测量具体的数据，几乎没有学者提供任何可以参考的指导。如果以信息的流通为信息社会的特征，那么我们理所当然会问——信息流通的量要多少，速度要多快，才能标志为新型社会？

最后，我们可以说，信息网络，源远流长，由来已久。至少从早期的邮政服务开始，到电报和电话设备就有了信息网络。如果缺少了这些信息网络，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根本无法想象。既然人类生活依赖信息网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信息网络扩展早为人知，为何到现在评论家们才开始论及“信息社会”这个术语？

文化的

文化是最后一个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最容易得到认同，但同时也是最少被测量的。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日常生活的模式中察觉到——社会上流通的信息正明显地增加。而当下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电视机在英国已经普及，时至今日，全天候电视节目简直是琳琅满目。电视频道也从一个发展成为五个，而不断翻新的数字电视将会带给你更丰富的选择。电视机已经发展到一体化视频技术阶段，它拥有有线和卫星频道，甚至计算机的信息服务也可以支持电视。个人电脑已可顺利访问网络，而掌上电脑正持续扩张。比起十年前，本地、国内的

与国际的广播电台节目输出成倍增长。收音机不再是固定在客厅，而是扩展到家庭的每个角落，汽车、办公室，甚至只要带上随身听和iPod都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广播电台的节目。电影虽然一直是人们信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现在，电影仍然广为普及：不仅可以在电影院和电视机前收看，还可以十分便利地从附近的碟铺租借，或者用便宜的价格在连锁商店的货架上买录影带。闲逛街头，目不暇接的广告和商店橱窗的陈设接踵而来。当你乘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的时候，你不得不为应有尽有的平装书和廉价杂志而惊叹。不仅如此，录音磁带、小唱片和收音机唾手可得，为公众提供了更加喜闻乐见的音乐、诗歌、戏剧、幽默和教育。报纸被广泛地传阅，许多新闻标题如免费传单一样落到我们的门前。垃圾邮件每天都在递送。

上述种种迹象都证明了我们正居住在一个媒介化的城市里，但是信息特征对我们世界的渗透，远比上述例子全面、深刻。这意味着新媒体正笼罩着我们，不管人们是否会对此作出反应，媒介信息都萦绕着人类的生活。实际上，信息环境与我们的关系比以上所说的结合更加紧密。例如，我们的穿着打扮、发型和化妆，以及我们每天塑造自己形象的方式，都有象征的作用，其间透露的信息投射着多重意义。潮流的复杂性反映在我们日常自我形象的设计方式上，相比从前，现在的社会交往包含了更丰富的信息内容。穿着打扮过去只是身体的装饰品，而现在已经成为标志我们身份、权力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符号。明显地，当今时代极大地提高了衣着和形体的符号象征意义。在过去一个世纪，毫无个性的农民罩衣成为主流，直到20世纪50年代，产业工人阶级依旧穿着一模一样的制服进进出出，当我们意识到衣着打扮引人注目时，意义爆炸的时代也来临了。便宜且时髦的服饰流行，人们具有购买能力，无论生活方式和文化类似或迥异的任何群体都易接受，这一切令人乐于鉴赏服饰，甚至是身体的信息内涵。

相较从前，当代文化承载了更多的信息色彩。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饱和的环境里，意味着生活的精髓在于符号化、交换和接收（或者是尝试交换和抵制接收）有关个人自身与其他人的信息。如此表

意爆炸让许多学者以为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他们很少试图用量化的方法去测量这种发展，仅仅是主观地定论——我们“明显地”生活在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满溢符号的海洋。

充满悖论的是，某些研究者却主张信息爆炸意味着符号的死亡。因为人类深陷在符号海洋的包围之中，用符号来自我设计、装扮自己，天涯海角也无法逃离符号的控制。到最后，结果便是意义的崩溃。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经说过：“信息越来越多，意义却是越来越贫乏(1983a, p. 95)。”根据其观点，符号曾经指涉了明确的意义(比如，服饰意味着特定的地位，政治宣言是独特的哲学)。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人类陷入了令人迷惑的符号网，我们生在其中，不知轻重，符号丧失了特色。符号来自于四面八方，意义变换迅速，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于是它们的表意能力便被模糊了，且变得混乱不清。另外，受众极具创造才情，思路清晰且善于反思，他们不会轻易迷信符号，反而用质疑和试探性的眼光审视所有的符号。因此，符号本来的意义就会被曲解、颠覆或者重新定义。此外，当人们的直接经验不断减少时，符号也就不再能简单明白地代表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符号代表“真实”的经验已经不能获得人们的信誉，因为符号是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它们——模拟(simulation)——就是一切的所有。在此要再次援用鲍德里亚的专业术语，符号是“超真实的”(hyper-reality)。

人们对此情境了如指掌：于是嘲笑那些装腔作势的人，但内心明白此等人物不过是扭捏作态；面对政客利用机敏的公关策略而经营媒体及打造其形象，人们顿生质疑，但转念又想，这不过是信息的管理和操作罢了。人们不再渴求任何真实的符号，因为他们都认为，所有的符号已不再真实。这样一来，我们进入了一个“看热闹”(spectacle)的年代，人们心知肚明，所有发出的符号都是虚伪的(“这仅仅是总理最新的照片”、“这不过是加工过的新闻”、“杰克正在和恶棍玩耍”)。同时，人们也知道，他们过去用于建构自我的符号都不具信誉(“我正在虚张声势”或者如“我正在扮演焦虑的父母亲角色”)。

如此一来，符号丧失了它的意义，人们只会在随机遇到的符号中

选取他们喜欢的符号享用(这些符号到了人们手里,意义往往又迥异于发送者的想法)。继而,人们为自身、家庭以及工作整理符号时,会为他们自己创造的符号所雀跃。他们"开玩笑地"混合许多不同的形象来代表同样的意义,并转型到从模仿和伪造符号上获取"乐趣"。在这样的信息社会里,我们"有传播,但却没意义。"(Poster,1990,p. 63)

根据经验,我们很容易知道这样的信息社会确实存在,但作为新型社会的定义,与先前的定义相比较,更不靠谱。倘若缺乏标准,那么,我们无法测量表意在近几年的发展,我们很难明白像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如何把现在的社会描述为一个新型的"信息模式"。我们怎么知道在我们的感觉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符号在相互作用?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和 20 世纪 20 年代的社会完全迥异,根据何在?我们会在本书的第九章看到,那些反思"后现代情境"的人谈到当代文化的特征时津津乐道,但对创立信息社会的清晰定义,他们却感到无能为力。

质化和量化

以上回顾了各种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显然上述定义有待提升,要么不完善,要么不精确,又或者两者兼具。无论是从技术的、经济的、职业的、空间的面向,还是从文化的面向来定义,我们所得出的——究竟是什么构成信息社会?我们又该如何区别信息社会?这些概念和定义都问题重重,争议多多。

我们意识到上述棘手的难题尤其重要。虽然"信息社会"作为一个启发性的策略,十分有利于探究当今世界的特征,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权威性定义的术语,那实在是太不精确了。正因此,虽然笔者有时会用到"信息社会"的概念,也确实承认信息在当今时代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但是本人质疑有关信息社会的描述,同时也对信息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区分特征这个观点保留怀疑意见。

目前,笔者想对信息社会这个术语提出重重疑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前文曾经提到的定量与定性的测量。笔者之前的考虑主要是

定量的方法无法区分那些日常的、不显著的信息活动和更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活动之差异，两者的混同会对人造成误导。把这些活动眉毛胡子一把抓，实在荒谬，就像将办公室主管和首席执行官混为一谈。在此，我想要再次提出质化与量化的问题，因为这两种路径对于厘清“信息社会”是否标志着当下社会与先前社会存在断裂会有助益。

大部分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都以定量的测量方法作为途径，测量出具体数据（白领工人的数量、信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等等），这种方法还假定，统计出的数据超过某一定点（定点不具明确性）则可以说明信息处于支配地位，继而我们就进入了信息社会。虽然，我们都目睹了如山似海的信息储存与流通，但并没有确凿的理由指明这就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如果信息社会仅仅以信息如此剧增的量来作为标准，那么，让人难以理解当前社会与先前社会的根本不同。

实际上，抛开量化的方法，把信息定位于不同性质的秩序和功能，也可以作为描述新型社会的途径。如果这样，就不必在意测量信息职业的数量比例，或是计算信息活动所占经济收入的成分，例如，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信息社会可以只由少数的“信息专家”掌握着决定性的权力。你只要看看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的科幻小说，就可以想象那样的社会，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所支配，由于劳动者的供给大于经济上的需求，因此大多数人成为好吃懒做的失业者。按照定量测量的方法，也就是职业的模式，这种情况还不具备信息社会的资格，但我们不得不说，这就是信息社会！因为当下的信息/知识对权力结构和社会改革的方向，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不能把信息的定量测量（仅仅是信息量的增加）视为当前社会与先前社会的断裂根据。最起码从理论上来说，一些在性质上细小却具有决定性的变化才可能标志为社会系统的新发展。毕竟，仅仅因为现在的社会比起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拥有更多的汽车，并不足以界定当代社会为“汽车社会”。无论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时代”，还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信

息模式的发展”，或者是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信息模式”，这些描写信息社会的学者都希望把焦点聚集到社会所发生的系统性的变化上。

此类批评看起来似乎颇有逻辑。若干学者坚持推陈出新的信息与传播科技改革明显地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这一定是信息社会到来的信号。日新月异的科技驾驭着舆论，力量是如此的新奇和重要，它们一定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比起从前琳琅满目的符号包围着我们，如果以此类推，那么也一定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不过，通过对食物的反思，此种想法的缺陷与弊端就昭然若揭。

你们都会认同笔者的假设——食物是生命的根本。一个粗略的分析显示，现在我们所有拥有的丰富多样的食品是我们的祖先(即使是50年前的人)不曾奢想的。超级市场、冷藏法和现代交通工具意味着我们具备前所未有的途径和超级扩增的规模去成功获取食物。食品商店基本上都拥有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产品，像新鲜水果和鲜花之类的商品能够全年长期供货，不会因季节不同而断货。

上述情况显而易见。在此，需要补充的是，食物价格比起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要便宜得多。我们用在吃喝上面的开支，比起我们父母的时代要少得多，就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遥远时代，需要抗争才能维持生存的祖先。今天过量的食品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真正价值，这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如此富足的境遇，富裕国家的居民可以任意择食，今晚吃意大利菜，明天吃印度菜，中午吃素食，接着吃中国菜等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多数时光里人类所食之物仰赖于获得的种类，品种往往雷同。今天，由于农业企业、农业工厂、自动化、基因工程、全球化、农业化学等等因素的整合(cf. Lang and Heasman, 2004)，人们已经可以廉价享用丰富的食物供应(结果是过多的食物供应导致肥胖，体重超标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健康问题)。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人类的生存，食物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和世俗的经历。而最近，食物的价格正大幅度地下降，可是却没有人认为我们正生活在“食物社会”，或者是把它标记为与以往社会迥异的系统性断裂。既然如此，那么，为什

么说到信息，就可以另当别论呢？

那些把信息社会看作是新型社会的学者，认为通过计算信息流通总量或者在信息产业中工作的人口比例就能简单地定义社会的质变，而别无根据，这实在令人觉得奇怪。此论断依托的设想就是纯粹的信息量的膨胀导致了新型社会的产生。的确，笔者也认同大量的信息增长对于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不可或缺。其实，大家心照不宣，即使失去了大量的电脑交流工具，我们还可以继续现在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不应该对必须定义社会秩序的能力感到迷惑，食物就是一个切中要害的反例。相比信息，食物绝对是生命里更加不可或缺的元素，可是我们却没有把它确立为当前社会的标志。贯穿社会的发展，量变（以一种未加说明的方式）积累到质变的这个假设，有必要挑战我们的思考。

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1986）在关于信息社会主题的批评中，提供了他对这个矛盾的洞见。他强调区分信息性质的重要性，并延伸至我们如何区分如数据、知识、经验和智慧等日常基本现象。毫无疑问，这些现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变量——个人获得知识的方式（比如毕业证）可以作为另一种信息（比如大学的通过率）——但它们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基础部分。在罗斯扎克看来，“信息崇拜”（cult of information）的功用破坏了信息品质的区分，在真实生活中，分清其差异，才是生活所需。那些“信息崇拜者”一直坚持信息是纯粹的数量物，只能通过统计学上的方法测量。为了测量信息产业的经济价值、测量花费在信息活动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测量转到信息职业上的国民收入百分数等等，信息的性质维度（信息是否有用？这是真实的信息，还是错误的信息？）便被搁置一旁了。“信息理论家一点也不在乎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是一个事实、意见、肤浅的陈词滥调、深刻的教训、庄严的真理，还是一句肮脏猥亵的话（Roszak，1986，p. 14）。”这些有关定性的问题通通都被束之高阁，就像信息是同一化的，而且通过计量来表达：“信息成为纯粹衡量传播交换、流量多寡的工具。”（p. 11）

伴随信息的量化测量方法，那些研究者继而断定越来越多的信

息深刻地转变了社会生活，罗斯扎克觉得此论不可理解。尽管我们需要区分信息的性质才可以使日常生活有条不紊，但信息社会理论家却发明了令人敬畏的信息活动统计方法，再进一步断言信息爆炸这一趋势在性质上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罗斯扎克认为，这是一个关于"信息"的迷思学(mythology)——信息的辞令掩盖了各式各样的区别，然后信息理论家把所有类型的信息混为一谈，并且坚持我们最后得到的是万能药而不是平淡无奇的汤水。正如罗斯扎克所说的，这个论断看起来毫无争议，对于希望公众接受这个变化的人来说很有用。

> 信息带有安全的中立特征；研究者堆砌的数据意味着无懈可击的事实，这既简单，又有助益。如此单纯的外表，正是一个技术决定论尽可能掩盖其目标的行政议程中最完美的起点。毕竟，谁又会说反对信息？
>
> (Roszak, 1986, p. 19)

罗斯扎克不遗余力地与量化信息的想法论战。无论是电脑的使用普及程度如何飙升，或是新科技数据处理能力如何增强，或是新科技的数字程序处理能力如何提升，或是数字网络的创造力如何强大，这些统计数据不断堆积、翻新的结果，就是人们欣然地相信信息是社会系统的基础。上述现象不胜枚举，意在促使我们认同信息社会理论家所坚持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的观点。但西奥多·罗斯扎克向来反对"信息数量增多，新型社会就产生"这个论点，他坚持维系人类文明的"统治意识"(master ideas)并不是完全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像"是对是错，吾爱吾国"、"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原则都是我们社会的中心理念——但它们在信息理论家所言说的信息出现以前便存在了。罗斯扎克并不认为这些或其他"统治意识"都必须得正确(实际上，很多都充满偏见——比如，"所有犹太人都腰缠万贯"、"女人天生柔顺"、"黑人是天生的运动健将")，他所强调的是这些理念及其必需的质化评估(qualitative engagement)胜于信息的定量测

量路径。

我们很容易低估社会理念的重要性，与科技、增长的生产力或者现在市场上数万亿的美元交易相比较，社会理念几乎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但请在脑海里领悟罗斯扎克所言，以及下述思想的重要性：

>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
> （《独立宣言》，1776 年 7 月 4 日）

这些句子不断在世界上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中回响。“人人生而平等”的这理念激励着那些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的人。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战场上再次提起了这个理念，葛底斯堡三天的战争就已经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美国南北战争中所牺牲的生命是过去所有美国战争伤亡的总和——共有 60 万人死于战争中），亚伯拉罕·林肯在他简短的演讲中重新唤起了 1776 年的理念：

>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
> （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1863 年 11 月 19 日）

一百年以后，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马丁·路德·金记起了林肯的理念。在美国黑人仍然在某些州受尽虐待的时刻，马丁·路德·金向着一大群民权支持者和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声宣布：

>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冈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

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马丁·路德·金，对在华盛顿争取工作和自由的游行队伍的演讲，1963 年 8 月 28 日）

我们很难想象，在现代世界会有比“人人生而平等”更具感召力的言辞。虽然大量信息可能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罗斯扎克入木三分，因为他坚持这种或者与此相类似的理念是奠定社会的基石，比起任何积累的、可测量的信息都要更重要。因此，他反对信息社会理论家把先后次序颠倒，同时还偷进了一个错误的概念——信息增多（通过测量计算），社会就产生根本的变革。

信息是什么？

罗斯扎克对信息的统计测量不以为然，因此，学者开始意识到什么可能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我们能如此思考信息的问题，归功于罗斯扎克一直呼吁要再次以质的判断来衡量各种不同的信息，而不是信息理论家的量化测算。他提出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信息量的增加是不是使公民见识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否只要利用越来越多的信息，我们便能见多识广？什么类型的信息正被生产和存储，对于广阔的社会来说，这些信息的价值是什么？什么类型的信息职业正在猛增，为什么？又有什么信息职业正在走向终结？

上述问题意在促使我们一定要坚持检查信息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当然，信息是一个基于常识理解的术语。毕竟，第一个浮现于我们脑海的定义是信息的语义（semantic）定义——信息是有意义的，它有一个主题——是有关于某人或者某物的情报或者指令。如果我们把信息概念用于定义信息社会，接下来我们便会讨论到信息的特征。我们肯定说，有关这些论题、那些领域、某个经济过程的信息组成了新的时代。然而，这种基本常识的定义一定会被信息理论家所唾弃，因为在他们的视野里，信息是可以被测量的信息，不屑于信息所拥有的语义内涵。

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如此丰富，本书所回顾的文献都无视信息的意义。大部分的思想家不断地寻找信息增长的数量证据，并都相信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的信息论创建了经典的信息定义。他们的信息论用了一个相当特别的定义，区别于平常说法里的语义概念，其信息论认为，信息是一个数量，它以“位元”(bits)为单位测量并通过符号出现的概率来定义。该定义由通讯机器产生并在其中通用，通讯机器的主要功能是存储和交换符号，它们最小的指标是开/关(是/否或者0/1)。

这种方法把其他棘手的信息概念都变成用计算方法就能简易处理的数据，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排除了那些让人相当头痛但却极其重要的意义问题，以及构成意义的信息性质问题。每天，当我们接收或者交换信息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信息的意义和价值：这信息是否有意义、准确、荒谬、有趣、恰当或者有用？但是在信息论里，它所支持的信息增长测量方法与信息意义的维度毫无关系。在信息理论家的视野中，信息独立于它的内容而被定义为一种类似于能量和物质的物理元素。研究信息社会的一位先驱曾提出：

> 信息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它的存在不需要被感知；它的存在不需要被理解；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情报去解释；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意义；它就是存在着。
>
> (Stonier, 1990, p. 21, original emphasis)

事实上，如果用这些方法来衡量，一个载满意义的信息和另一个毫无意义的信息，这两者是相等的。正如罗斯扎克所说的，在那些重量化的信息理论家看来“信息是在连接发送者与接受者的渠道里进行传递的编码，而不管信息的语义内涵如何”(1986, p. 13)。这种方法让我们可以为信息定量，但必须以抛弃信息的意义和性质为代价。

如果这种定义信息属于信息社会技术的和空间的定义范畴(把一定量的信息存储、处理和传递作为新型社会产生的指标)，而不考虑信息的意义，那么，信息经济学家的定义与此类似，也存在避而不谈信息意义的问题。在信息经济学家的定义中，他们不用“位元”定

义信息社会，而是认为信息有价，以“价格”的最小公约数替代信息的意义性质(Arrow，1979)。信息机器首先考虑是/否(yes/no)这两种符号出现的次数，而信息经济学家则考虑信息的销售量。然而，当经济学家把信息的概念发展到信息的测量方法，都忽略了产生信息意义多样性的异质性。经济学家“尽力想使教育、研究以及艺术等明码标价”(Machlup，1980，p. 23)，就不可避免地抛弃了信息的语义性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观察到：

> 位元的计算……完全抽离于信息的内容之外……对于电话工程师有巨大的用途……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理论家，我们需要考虑信息的意义以及一种衡量信息重要性的方法，比如，青少年间的流言飞语，琐碎无聊，而连通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热线电话交流则事关重大。
>
> (Boulding，1966)

经济学家认为量化研究的路径，主要依靠成本和价格的计算来解决信息的本质问题，这其实就是“一种猜测信息内在性质的工作”，令人匪夷所思。援用马克卢普的术语形容，“为无价的物体定价”意味着用金钱的量杆代替信息的内容。接着，我们可以打造影响深刻的统计法，但在此进程中，信息是有关某种事实、意义的概念，已荡然无存(Maasoumi，1987)。

最后，虽然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意义，在于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但是令人吃惊的是，钟情于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为符号再无任何指涉特征而呐喊，他们不禁和经济学家的信息测量取向合流了。现在，后现代的理论家着迷于信息的丰富多样，他们以为信息的猛然增长，造成信息失去了本来拥有的语义。符号无处不在，无时不生，如此之多的符号导致了意义的“内部崩溃”(imploded)，意义已不再能够表意。

现在最显著的是那些信息理论家们抛弃了信息内涵的意义，只是为了创作出信息增长的定量方法，然后根据数量得出结论——信

息的经济价值如此快速增长;信息产生的规模如此快速扩展;围绕于我们周围的符号如此纷繁,社会必然发生具有深刻意义的变革。也就是说,信息理论家认为信息与社会无关(信息就是信息),但同时信息导致空前的社会效应。这种情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并不陌生,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主张某些现象是远离社会发展的(比如技术和科学就是明显的例子),但这些现象内部都藏着巨大的社会影响。作为一种社会变化来分析,这种主张荒谬不经(Woolgar,1985)。

毋庸置疑,研究信息扩张的定量方法在很多方面都受用,但这肯定不足以让我们信服——信息爆炸的结果会让社会产生深刻的变革。为了正确评价什么是信息社会,它和其他社会系统有什么不同或相似之处,我们必然需要清楚信息的性质和意义。什么类型的信息正在增长?谁产生了什么类型的信息,是为了什么目的和出现了什么后果?正如我们所见,从以上问题着手研究的学者都执著于思考信息的意义和性质,其阐释与那些运用无语义的定量方法的人明显不同。前者对新时代到来的宣言感到疑问重重,他们都同意现在社会的信息量是在不断增多,不过拒绝把这些隔离于信息的内容之外(他们总是会问:什么是信息?)。他们不认为仅仅是信息量的增多便引发了向信息社会的转型。

如果你考虑一下"拥有着信息"和"已知晓"之间的差别,也能从另一方面引出同样的问题。"已知晓"也就需要一个人拥有信息,比起单纯使用大量的信息,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阶段。记住这个区别,它鼓励着怀疑者向那些相信信息的巨大增长标志着新的、更高级时代的人挑战。例如,请试着比较一下,19 世纪的政治领袖与今天的政治领袖,前者的阅读量局限于少部分经典的哲学家,比如《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们的教育课程通常是简要的和不精确的。对比之下,乔治·W. 布什(美国总统,2000—2008)手上则掌握着数量多得不可想象的信息来源,为了保证没有任何信息的缺口,他聘用了数以千计的雇员去转换和分类信息。虽然同样接受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育,但是亚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1861—1865)和乔治·布什(1789—1797)的信息资源则十分匮乏。不过比起现在的美国总统,

没有人会说林肯和老布什孤陋寡闻，毕竟他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老练得多。

理论知识

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意见主张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此论不需要在信息意义上作深入的思考，而且同样不需要对信息增长进行定量测量，比如信息工作和信息经济的增长量，其考量的是信息运用方式上决定性的转变。有鉴于这样的主张，信息社会被定义为一个理论知识占据关键地位的社会，而社会对理论知识的重视程度是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这个论题把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团结在一起，因为在这个信息社会里（似乎用"知识社会"可能更为恰当，比起大量的信息，它唤起了更多的知识），事情都在理论优先的条件下被组织和裁决。虽然理论知识的优先权对裁定信息社会理论的作用不大，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它可以作为当今生活的区别性特征。在本书中，笔者会不时地涉及该概念（在第三、五、八章以及最后的总结章节），所以在此只需简略提及。

所谓理论知识，意味着抽象的、概括的和在各种媒体上已经系统化的知识，其抽象在于它不能直接适应于特定的情形，其概括性在于对目前任何动向来说都是适当的，它们通常会在诸如书本、论文、电视和教育课程等文本中再现出来。理论知识和以前实践知识统治的时代相比，在当代社会扮演的关键角色会受到争议。例如，如果有人在思考谁是工业革命的制造者，那肯定就是丹尼尔·贝尔（1973）提到的"天才工匠"，他们对"科学和他们的发明中最根本的原理漠不关心"（p. 20）；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改进的鼓风炉；乔治·斯蒂芬逊（George Stephenson）的火车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机；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的工程改革，以及涌现于 1750—1850 年间的不计其数的发明，那都是脚踏实地的改革者和企业家的作品，人们用实践的方法解决实践上遇到的问题。虽然在 19 世纪结束以前，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已经塑造着工业的进

程，但还是遗留着上世纪未解决的问题。

> 大部分的人类生活依旧还是由经验、实验、技巧、提炼的常识所支配，最多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实践和技术系统化的普及知识。在农业、建筑、医学以及众多供应人类生活必需和奢侈品的领域，这都是司空见惯的问题。
>
> (Hobsbawm,1994,p,525)

相比之下，今天的改革都肇始于已知的原理，最明显的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虽然这些原理可能只有少数专家明白)。那些写进课本中的理论原理是改革的起点，比如基因进化是人类基因工程的奠基，而物理和数学则是信息与传播科技和其关联软件的基础。理论知识中的航空、塑料、医学和药学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是今天生活的基础。

我们应该很难想象理论知识的优势会在尖端革新中受到制约。任何一项技术应用，如果没有理论做先决条件支持它的发展，就会令人匪夷所思。例如，道路修理、房屋建造、污水处理或者摩托车制造等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以有关材料耐久性、结构法则、毒素、能量消耗等等已知的理论原理为先决条件。理论知识形式化地载入课本，而且通过课程教育进行专门化传播，这种教育模式意味着大部分人对他们专业技术以外的理论知识一无所知。虽然如此，在今天，无人不知理论的深刻影响，我们可能会把理论知识想象成为像微波炉、CD播放器和电子钟这类日常的科技产品，把建筑师、水利工程师和技术工看作一个实际的人，如此想法肯定没错。他们也确实是一个实际的人，但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理论知识已经被这些从业者掌握了，并已把它融入实际工作之中(而且通常会用结合了理论知识的测量、测试和设计等新科技补充)。

理论知识的优先性现在已经到达了科学和技术以外的领域。比如，政治学，我们可能会重视理论知识在大部分政策和辩论中的核心作用。政治学固然是“可能性的艺术”，它必然会受到偶然性的影响，但是无论我们观察交通、环境还是经济，我们都会看到理论以主要角

色发挥作用(支出收入分析模型、环境可承受度的概念、通货膨胀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所有领域的理论标准(抽象、概括、系统)都让人感到满意。理论知识可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不能限制核子物理和生物化学的运用,但它在类似的地方也起着作用,理论知识已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生活中,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确实,理论知识进入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1994)所提出的——从家庭室内设计到健身计划安排,在我们所有进行的事情中,理论知识都发挥主要作用。这种观点与吉登斯(Giddens)的"自反性现代化社会"如出一辙,可见,社会是以高度社会化和自省为生活方式构建的基础来组织的。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我们将日益依靠反思和以评估风险为基础的决定来建设我们生活的世界(而不是根据自然或者传统的命令),对于形成我们的反思,理论知识举重若轻。比如,在发达社会的人们已非常了解人口统计学的模型(我们是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南部的世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等知识,这类知识是理论的,因为经过抽象和概括才得到,而且通过专家的收集和分析,流通于各种各样的媒体。此类知识不能直接被应用,但是它不可置疑地影响着社会政策和个人计划(从养老金的分配到个人的生育安排)。由此,理论知识已经成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定义性特征。

我们很难想出一个方法去测量理论知识的量。类似于大学毕业生和科学期刊的增长率这类数据简直太小儿科,不足以说明理论知识的含量,虽然如此,理论知识依然可以作为信息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因为它是生活怎样运作的公理,而相比之下,我们祖先的生存则受到了环境、无知和自然力的制约。正如笔者所言,罕有信息社会思想家注意到理论知识的作用。他们都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科技的、经济的和职业的等容易观察但却与理论无太大关系的现象上。而且,我们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理论知识在近几十年里已经呈现出它的优势。把理论知识看作是现代化发展(现代化在 20 世纪的中期开始加速发展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并出现了吉登斯所说的"高度现代化")的内部成果更具有说服力。

结论

本章对信息社会这个概念的关注与质疑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检视了各式各样声称可以考量信息社会的标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里我们要讨论不同的思想家，他们都用各种不同的标准表明我们正在或正准备进入信息社会。他们以相当不同的路径、方法与标准去论证信息社会的时候，我们不禁疑云顿生。而且，这些标准——从科技的到职业的变迁，再到空间的特点——虽然它们一开始出现时都显得理所应当、振振有词，但再一推敲，其模糊含混的问题就昭然若揭，它们都不能自圆其说——信息社会是否已经到来，或是信息社会未来何时来临。

其二是信息社会的支持者不断地寻找测量信息增长的定量方法，然后断言这就意味着在社会组织上出现了性质上的变化，此种做法让我们更加怀疑信息社会的图景（但不是怀疑目前生活的信息化）。同样的事情也明显地出现在信息的定义上，信息社会的支持者认可了信息无语义的定义。越来越多的“位元”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信息经济价值，这是十分容易计量的，因此，他们就可以减轻在性质上分析信息的意义和价值的痛苦。而且，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越过了信息的基本定义，而把它看作是没有内涵的物件。正如我们所见，从以上方法着手研究信息领域改革的学者，明显不同于那些虽然认识到信息爆炸的现象，但仍不抛弃信息意义和目的问题的学者。

最后，有人提出了理论知识的优先性是信息社会有趣的区别性特征，但这个主张依然具有争议。它既没有借助定量方法，也不需要深层次地分析信息的语义。理论知识不可能完全是新的，但其重要性正不断彰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虽然我笔者强调的理论知识，罕有信息社会支持者进行关切，但笔者会在以后的章节里不时地提到这种现象。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在那些赞同新型社会来临的思想家中，久负盛名的“信息社会”特征的论述来自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后工业社会”术语与“信息社会”是同义的，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虽然，贝尔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创造了“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PIS）一词，但大约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人们对计算机和传播科技发展的兴趣盎然，未来学思潮所向披靡，贝尔才开始用“信息”和“知识”替换了“后工业”这个前缀。

不过，丹尼尔·贝尔（b. 1919）从对后工业社会感兴趣开始，便一直强调信息/知识将在新型社会中扮演关键角色。在他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书中，贝尔描绘了一幅有关未来雏形的复杂社会图景，虽然有关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早已在一篇论文中问世，但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间，该理论正好契合了当时在发达社会中发生的爆炸性科技改革。新的科技快速渗透入办公室、工业生产过程、学校和家庭，转眼间，电脑无所不在。面对诸多新科技的突然来临，人们迫切地需要用一种易于理解的调查去发现时代跳动的脉搏。而在丹尼尔·贝尔的重量级论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中能发现这种现成的模型，因此，我们毋庸惊异，当谈到上述问题时，许多评论家直接援用贝尔的理

论。尽管贝尔只把“后工业社会的概念看作是一个解析的建构，而不是一幅具体而有形的社会图景”(Bell,1973,p.483)，但这无关紧要，尤其对于记者和作家来说，后工业社会看起来恰恰就是未来世界的蓝图。贝尔似乎早已预见了电脑传播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震荡，确实，他早已描写了人类对信息科技大幅度增长的需求，事实如此，不言而喻，社会发展应验了他的预言。继而，贝尔因“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而赢得了声誉，此乃时势造人，他的名声鹊起自在情理之中。自此之后，贝尔开始采用“信息革命”这一流行的词语。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伴随着人类对“强大的微电子”兴趣的淡化而衰落的未来学研究，因90年代出现的互联网和国际万维网而再度复兴了。在这次未来学发展的高潮中，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预见和思考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要挑剔一个历经不止一代人精益求精地琢磨的概念，并非难事。罕有社会科学能经受住十年的考验，有鉴于此，丹尼尔·贝尔能够让“后工业社会”这个术语持续成为重点讨论的议题，成就不凡，令人称羡，这就是贝尔强大的想象力和智慧的精神遗产的明证，直到现在，任何人想要将“信息时代”概念化都必须追想且拜读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论著实乃学术的压轴之作，克里夏·库马(Krishan Kumar)是研究贝尔理论的最尖锐的批评家，但当谈及后工业主义理论时，他也承认该论著“比起目前其他有关未来学的著作而言，在知识水平上绝对更开阔和严谨”(p.7)。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社会变化的方向，在观察未来发展时，他们大部分都强调专业技术、科技和知识的作用。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像贝尔那样可以对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系统性和实质性的考量。此外，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首次尝试去掌握信息和信息科技进展，而此先驱表率所建立的原则至今仍然垂范世人(cf. Touraine,1971)。由此，丹尼尔·贝尔作为该领域的第一批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诊断如此灵验，风头十足，堪称泰斗，望重士林(Jumonville,1991; Liebowitz,1985; Waters,1996)。从《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1)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贝尔的多部论著影响卓越，声誉斐然。

为了了解丹尼尔·贝尔，笔者渴望知道他的思想风格、关切要点及其论著产生的历史语境等，洞察这些要素非常必要。首先，虽然他确实发明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但丹尼尔·贝尔并非一个脱离现实的理论家和超脱尘世的模型构建者。相反，贝尔的路径与真实世界紧密关联，他在深入分析现实世界之后构建理论化诠释——也就是建立归纳性综述。因此，他的理论与对现实的分析密切结合。贝尔的生活背景让他充满热忱地理解世界，并为了更好地改变世界而努力。贝尔出身贫寒，成长于纽约市下东区的一个贫穷的波兰移民家庭，从少年时期开始，贝尔就极其热衷于政治。岁月流转，贝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之前曾是一名报道劳工事件的记者，而后成长为一名最具影响力的“纽约知识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Bloom，1986）。狭窄的学术生涯对于他的品质与能力而言，有些大材小用，但他还是在哈佛大学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要与众多的社会学家竞争，对于贝尔来说，哈佛教职来之不易。论文集《意识形态的终结》为他赢得博士头衔、美国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卓越的科技成就，这些荣誉奠定的声誉几乎都不属于正统的渠道。此外，他所从事的研究问题宏大却不实用，视野开阔而雄心勃勃，因此为了得到研究主流的认同，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设计调查研究。贝尔在学术上的业绩并非完全仰赖社会学家的身份，他可能就像《圣经》和莎士比亚罕有调查数据。他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但其大部分作品都是非主流的。贝尔最喜欢的出版物并不是学界的权威期刊，而是《异议》（*Dissent*）、《新领导》（*The New Leader*）和《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等针对政策决定者和政治思想家的智慧型期刊。当他在英国写作的时候，别人很难想象他的作品会出现在《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上，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在《展望》（*Prospect*）、《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和《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的文章。

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尔作为非学术主流的正规军，就会遭遇解职；他参与政治活动，但并不意味着他缺乏高质量的学术工作所必需的

公正客观。这些品质反而意味着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去厘清世界的意义，他为了改变世界而渴望更好地理解世界，他在写作大题材的论文时同样表现出此种资质与品性。贝尔建立理论时所考虑的关切点高屋建瓴，他尝试区分出现今社会最重要的特征、社会变化的元素和主要原因，他的雄心抱负就是要勾画出当今生活的基本轮廓。然而在专业的社会学家看来，贝尔有点另类，因此笔者以为他的观点缺乏同一时代研究者的认同。一方面，他对大问题的关注使他疏远了从事实际问题的专业人士，所谓的实际问题可能是一款软件的开创，又或者是实验室中科学家们的互动。对于专业人士而言，贝尔太急于概括了，他的解释也比较粗糙。在贝尔的时代，对特殊现象的复杂性和偶然性进行复杂的研究更受关注(Webster，2005)。

另一方面，贝尔深信理论一定与真实世界紧密结合，此一理念让他与那些认为理论远离现实的学者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同时也让他可以排除干扰作出系统而详细的论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生不逢时，此乃贝尔之不幸，该书出版之际，许多社会学家都质疑他描绘宏大图景的路径，回顾那个时代，人们预期理论类似于哲学(纯粹抽象)，具有深刻的诠释力(Mouzelis，1995)。受制于当时的学术氛围，贝尔的理论受到了普遍的敌视。一方面，他被指责过度单纯化和拥有政治的党派偏见；而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理论主张与经验分析紧密结合，所以不能取悦那些认为理论必须纯粹抽象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后一原因导致他与当时的主流学界格格不入。

尽管《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敏锐地把握了社会的新趋势并得到学术界以外人士的认同，但该论著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版后很快就停止印刷了。在笔者看来，丹尼尔·贝尔描绘宏大图景的决定，正是坚持了理论建构与现实世界的分析存在无形的相互关联，它展现了社会学的优秀传统，而某些学者往往在专业领域轻视这一传统。学界后起之秀拉尔夫·米利本德(Ralph Miliband)和拉尔夫·达伦多夫(Ralph Dahrendorf)紧步贝尔后尘，研究路径别无两样，也因自己的研究方法与主流专业人士格格不入，他们的学术声誉深受其害。

不言而喻，笔者异常敬重丹尼尔·贝尔，尤其要重申他在专业上

未获承认的成就以及他所展示的社会学研究类型是如此值得人们尊重。确实，他对理解信息社会的贡献，虽然一开始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很快便退出人们讨论的范围了。本章将集中讨论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尽管笔者对他心存敬意，但还是会批判性地审视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笔者将铺陈若干可靠的证据去证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充满漏洞。不过，需要申明的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虽然并非尽善尽美，但这与我们敬重贝尔的努力成果并不矛盾。在笔者看来，贝尔用适当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同样地，他的研究一直都很中肯，而且总是能激发人们讨论的兴致。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在那么多信息社会的拥护者中，为什么贝尔的后工业概念能够保持吸引力？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问题。浅薄的评论家在论述信息社会的问题上，经常会挪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图景。他们喜欢这样说："这是一个'后工业信息社会'，在哈佛教授丹尼尔·贝尔长达500页的论著中有特别重要而详细的阐述。"因《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不凡声誉，所有引述其阐释的论文、著作和电视专辑都沾光得道，被赋予了权威性、洞察力和重要性，而对当代方向和特征的问题，却夸大其词，实际上，这些建议并不值得人们去严肃关注。笔者之所以说后工业社会理论漏洞百出，原因在于其削弱了许多通俗解释的框架，而人类恰恰要仰赖这个框架，才能找到自我。

然而，就贝尔在社会学研究上的谬误而谴责他，并非公正之举，尝试忽视贝尔更是不可取的做法，因为他在社会学里找到了自我。由于丹尼尔·贝尔在社会学上的误解，他没有留下太多能让后来的思想家紧紧追随的思想，但在详述他的错误之前，还是让我们为他的能力而鼓掌吧，因为他劈荆斩棘，引领我们开始深刻思考一个信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新型社会。后工业社会可能在构思上未必尽善尽美，在经验上仍然有缺失，而且内在逻辑也是矛盾重重，但借用乔治·奥威尔的一句短语说，他最负盛名的论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就是一本"品质上乘的坏书"。像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约翰·奈斯比

特(John Naisbitt)等未来学家,他们在平装书中的论点曾经风行一时,但他们的论著也不过如此——几乎他们考虑的每个问题都显得弱智、无创意、分析不当且幼稚天真。但另一方面,丹尼尔·贝尔却创造了一本"品质上乘的坏书",尽管该书仍有瑕疵,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其呈现的价值——学术内涵如此之丰富,而且内容建构如此具有胆识、充满想象力,成就实在引人注目。

贝尔认为人类正进入一个新的系统,也就是后工业社会,信息出现频率的增加和重要性的提升是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丹尼尔·贝尔认为无论是在量的层面,还是质的层面,信息和知识都是后工业社会的重心。一方面,后工业主义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利用;而另一方面,贝尔声称后工业社会在性质上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尤其是他所说的"理论知识"在显著地增长。换句话说,在后工业社会的世界里,不仅仅只是信息量增长了,还有新的信息/理论也在发挥作用。认识了后工业社会的上述种种特征,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对于那些希望诠释"信息社会"的学者,如此具有吸引力。

贝尔认为信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毫无疑问,这一预见性,一语中的。然而,丹尼尔·贝尔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类型——"后工业"时代出现的信号,如此阐释却是谬误连连。如果对照现实世界,把后工业社会当作新的社会趋势来检验时,人们会发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并不能被证实。也就是说,当把"解析性概念"与真实的社会存在相比较时,我们会发现"解析性概念"并不实用。此外,只有把一些特定的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应用于社会分析,后工业社会作为"理想类型"的建构才能言之有物。但是当人们考察真实的社会关系时,会发现这些理论和方法破绽百出。简而言之,后工业社会的设计在经验上、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缺陷重重,本章以下篇幅就将逐一论述。

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

丹尼尔·贝尔提出美国正引领着全世界通往一个新的社会系

统——后工业社会。虽然，贝尔并没有开门见山指出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是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但他认为历史的轨迹沿着前工业、工业到后工业社会发展，预期可考，贝尔以并不严谨的年表来描述了颇具特色的历史轨迹。的确，援用贝尔的术语来勾勒历史的各个时期并不困难。比如，在18世纪初，英国就处于前工业时代——也就是农业时代；而到了19世纪末，英国便进入了工业时代——也就是制造业兴旺发展的时代；而现在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后工业主义的信号——服务业成为社会的主流。看看贝尔的社会路线设计，我们会轻易地认为，历史成了自行发动的机器，正向着完全成熟的后工业社会迈进。对于社会发展，贝尔信心百倍，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宣称后工业主义"将在21世纪成为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等国家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Bell,1973,p. x)。

尽管社会发展的确有一个消长历程，但社会科学界已扬弃进化论的线性思维模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m)往往自鸣得意(相关论著的作者恰好都舒适地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他们认为人类居住的社会任何时候都在前进，那些没有我们幸运的人们应该雄心勃勃地追随发达国家的脚步，从而扭转乾坤，因为社会进化论乃历史之必然趋势，势不可当。进化论者自以为是的论调不仅令人讨厌，而且在学术上也常常备受谴责。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而言，有两个互相关联、尤其著名的论点问题重重。第一个是历史论(historicism)的谬误(此论认为我们可以发掘出历史发展趋势潜在的规律而去预测未来)；第二个便是目的论(teleological)的思想陷阱(该观念认为社会一直向着某个终极美好的目标进发)。如果以当代的观点和进化论思想来看，批评家都会说贝尔是进化论者。因为他认为，按照西欧、日本，尤其是美国的发展方向来看，历史有明显的发展趋势。依据上述观点，人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或者担忧任何发生于他们社会中的问题，比如不公正、不平等或者人性的变化无常或是冷漠无情，因为根据历史的逻辑，他们不可动摇地朝着更好更理想的状态发展，会迈向尽善尽美的社会。

丹尼尔·贝尔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思辨严谨，以至于不容我们

指责。其实这就是他工作的特点，他已经对这些谴责或者其他相关的社会科学里多次出现的错误有所警惕（比如，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恐惧设想）。面对进化论的谴责，贝尔很快就能作出反驳，但单纯的否认并不能证明他的无辜与清白。在笔者看来，难免觉得以贝尔之见——后工业社会比起过去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更具优势，这就像我们很难抗拒后工业必然来临的观点一样——根据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向着“后工业主义”前进。本书下文将评论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阐述，读者可以亲自判断贝尔的言论是否有步进化论者后尘的嫌疑。

各自独立的领域

丹尼尔·贝尔最重要的理论和基本的方法论在于总结了后工业社会的变迁源自于社会结构，而不是因为政治或文化上的变化。在社会结构的发展过程中，肯定对政治和文化领域“构成挑战”，但贝尔强调变迁不可能从单独一个方面开始散发到社会各个侧面。在他看来，发达社会“根本上是分离的”（Bell，1980，p. 329），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作为各自独立的“领域”，各自自主，在一个领域里出现的事物不一定会在另一个领域中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在经济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它将会为政客提供机会或者制造困难，但贝尔坚持这样的回应并不会自动产生，社会结构领域（包括经济）与政体各自为政，并不相互塑造。

如果用另外一个术语来说，贝尔是一个“反整体论者”（anti-holist），他一次又一次地重申，社会并不是“有机的组织，它的整合程度还不足以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系统来分析”（Bell，1973，p，114）。贝尔拒斥一切极权主义/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无论（尤其）是来自于左派思想，并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入侵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理论，还是保守且相信社会功能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在，并向着秩序和平衡方向发展的理论。为了反对这些理论，贝尔我行我素，不作解释，武断地把当代社会分成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领域（为什么只有三个领

域？为什么不是法律、家庭和教育这三个独立的领域?)。正如笔者前文所述，贝尔教授并没有为现代社会中“各自分离的领域”提供论据，他只是说，在当今社会就是存在着几个独立的范围，其他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的社会科学家都是错误的。

贝尔坚持主张社会分成几个各自独立的领域，他的立场与论点值得我们费神吗？笔者以为这是贝尔思想的关键，绝对值得探讨。首先，各自独立的领域充斥着贝尔几个明显矛盾的观点。贝尔经常重申：“我是文化上的保守派、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Bell，1976，p. xi)。这一切取决于他坚信社会上有三个独立自治的领域，顺理成章，他可以拥有三个不同的立场，只要他支持文化独立于经济，而经济又独立于政治之外，那么他所扮演的三个角色也就安然稳当、振振有词，而不像其他迷惑而矛盾的思想家一样摇摆不定。

其次，贝尔利用这种根本上的独立领域回避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不用理会每个领域的发展会对其他领域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凭借这一立足点，贝尔可以承认一个领域的事件的确可以引起其他的领域产生“问题”，但是他并不会对此作更多的解释，因为他决定只考虑特定领域的问题。显然很难让人接受贝尔的这种做法，他坚持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各领域根本分离的理论和方法的假设前提，正是他回避棘手的各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这一问题的救命稻草。

此外，贝尔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研究的出发点(Ross，1974，pp. 332—334)。虽然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中，我们每天一定得面对不少涉及文化、政体和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问题，不过，贝尔坚持这三个领域“根本分离的”立场的托词，实在是他聪明的权宜之计。

最后，后工业社会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贝尔揭示了过去存在的“共同价值体系”(common value system)已经失范(Bell，1973，p. 12)，这种体系曾经为社会所共享，但现在已经崩塌，贝尔确确实实坚持着“在我们的时代，这三种领域在不断地分离”(p. 13)。他的另一论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讨论了曾经整合的文化精华和社会结

构需求的崩溃(贝尔认为冷静、节制和勤奋是19世纪的清教徒组织的特征,它鼓励投资和节俭,因此特别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的主题。此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强调了如专业人才增多等趋势,而这些趋势都对政治有重要的影响(我们马上会问:专业人才会占据支配地位吗?)。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贝尔一定会强调这些领域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它们的独立性。按照贝尔的论述立场,我们不禁要问——过去曾经统一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是怎样分裂的,它们又是怎样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的?到底它们之间还存留着多少和什么类型的联系?其中一个领域的发展是不是真的会对其他造成影响,它们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正如评论家彼得·斯泰因弗尔(Peter Steinfels)所说的:

> 显然,经济、政体与文化三个领域是紧密关联的,贝尔正好需要认真地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贝尔解释性地把社会分割为三个领域,但是他始终无法摆脱一个观点,那就是社会是一个整体;这个观点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论文中突然出现,虽然没有被明显指出,但这个观点一直隐含在贝尔的思想中,这个观点是他焦虑的源泉……(这也就是说)贝尔需要一个联系这三个领域的理论和一个有关它们分歧的理论……某一领域的简单理论是不适用的……但他不需要指出有关三个领域相互作用的程度、方向和模式。
>
> (Steinfels,1979,p.169)

后工业社会

概括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读者需要记住贝尔研究的出发点——社会结构与政治根本分离。至关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该社会结构包含了经济、职业结构和阶级系统,但排除了政治和文化议题。因此,《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只考虑了发生在一个社会部门的变化,而且贝尔认为,人们切忌假设这些变化

是最重要的部分。

贝尔根据每个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职业模式，提供了几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其中，工作类型是最普遍的现象，它能成为区分不同社会的特征。因此，贝尔说——在前工业社会，农业劳动是最普遍存在的工作，而在工业社会，工厂工作则成为典范，到了后工业社会服务性工作就占据了支配地位。

当贝尔认识到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变化的缘由时，他开始解释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型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关键因素，是因为“理性化”(rationalisation)原则(效率)的应用，工作中“少做多得”(more for less)的状况成为可能。在前工业时代，每个人都必须到土地上工作以竭力维持生计。然而，当农业技术的创新使整体人口的生计已经不是生存的基本问题时(比如，可以通过改善农业实践、农作物轮作和动物管理)，所有人不再需要都固定在土地上工作，其中部分人口可以从农田中解放出来，在食物的供应得到保证之后，他们就能从事其他的工作。因此，他们流移到城镇和农村，为正在发展的工厂充当劳动力后备军，并且从农村购买多出来的粮食。当这种趋势继续向前推动，越来越少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产品(农业的理性化越来越多地依赖科技，它所需的农民就越来越少)，所以大部分人从农田中得到解放，投身到新兴的工厂系统工作。这种合理化的过程并没有在农业中停止，虽然现在只有很少的人在农田工作，但是因为如联合收割机、工厂化农场经营和基因工程等高科技的作用，现代生产力空前巨大。在英国，曾经所有的人都在土地上劳作，但依然无法完全满足生存的需要；但现在，少于3%的劳动力就能为全国超过一半的人口提供食物。

随着这种过程的推进，我们进入了工厂劳动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业时代，其间的转型，“少做多得”的原则功不可没。因此，工业社会随着工厂应用更多高效率的技术而兴旺发达，生产力也在稳定提高。蒸汽机在增加输出的同时减少了劳力的需求量；电力允许装配线批量生产同一规格的商品，其中不少曾经是奢侈品；现在有不少的工厂因为有了高配置的电脑，几乎不需要工人。工业化的发展

可以描述为机械化和自动化联合缔造了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的奇迹。越来越少的人力，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这是恒久不变的逻辑。

随着生产力的剧增，工厂生产出的剩余产品让人们可以消费过去难以想象的奢侈品：例如教育、医疗、娱乐甚至假期。与此伴随的是这些工业上的财富所创造的消费为服务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以满足新的需求为目标的职业已经诞生，并作为工业社会的恩惠而被接受。工业创造的财富越多，所需要的工人就越少。由于科技改革，越来越多的服务性工作方兴未艾，接着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工业中解放出来，既而投身于服务业。

只要这种发展的过程继续推进，也如贝尔所坚持的——我们正一步一步迈向后工业社会，我们可以确定下述情况必然出现：

> 从事工业的工人数量不断下降，最后几乎没有人会在工业领域找工作（“机器人工厂”、“全自动”的时代）。
>
> 伴随着工业从业人员数量的下降，工业的产量却持续增长，这是因为一直坚持不懈地实施理性化原则。
>
> 工业的产量转化为不断增加的社会财富，这部分的财富会用于发现和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就像从医疗设备的消费转向按摩师）。
>
> 越来越多的人口持续从工业工作中被解放出来。
>
> 旨在满足新需求的服务业不断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也就是，当人变得富有的时候，他就必须发现新的消费点，而这些工作都需要服务人员）。

贝尔对后工业主义的论述，证据源自于我们熟悉的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就已详细地阐述了类似的情形，后来维克托·富克斯（Victor Fuchs，1968）对此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数量明显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产业或者服务性部门的从业人数的增长。对于贝尔来说，“服务业社会”也就是后工业社会。

然而，在详细论述后工业社会之前，我们必须强调服务业的就业状态是人力资源漫长迁移史的真正终结。究其原因，直言不讳地说“少做多得”的原则引发了农业转型到工业自动化的趋势，工业社会淘汰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随后产业工人阶级也因为社会转型而遭淘汰，数量顿减，但同时社会财富仍然递增。像贝尔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这种职业淘汰未必是坏事，说明社会在积极发展.因为社会正走向“工业社会”时代的终结。“工业社会”结束后，既摆脱了体力劳动工人，同时又歼灭了激进的政治对立。原因何在呢？贝尔尖锐地提出，如果无产阶级消失了，无产阶级的抗争又从何而来？激进运动如何展开？自动化机器生产摧毁了工人阶级，但同时社会还是保持着旺盛的财富增长。根据恩斯特·恩格尔(Christian Engel)的理论，社会得到这种额外的资源，也就发展出人类新的需求，同时损耗了额外的资源。正如前文所说，社会的额外财富引发了服务部门的就业增长，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富裕吗？新的需求正在被创造吗？这些都导致了服务性行业的增加，比如酒店、旅游和精神病治疗。实际上，人类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只要有钱，人类就会创造出新的需求，比如按摩师、业余运动员和精神治疗师。此外，服务性行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的人工服务很难被自动化所代替。既然服务业是人工操作的取向，而且常常是无形的资产，那么生产量不断提高的机器就不能真正地适用于服务业。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能够使社会工作者、护士和教师自动化呢？

简而言之，服务业能够在农业和工业以外创造更多生产力/财富，但我们不需要担心服务业的工作会趋向自动化。正因为如此，遍及前工业和工业时期的进化过程在成熟的后工业社会失去了它的前进动力。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由技术革新所引起的就业转移历史也走向了终结。也就是说，就业是有保障的，科技创新替代工作的情况不复再生。

信息的角色

如果我们相信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造就了服务业的支配地位，

那么我们还是想知道在这个等号中，信息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贝尔能够大胆地宣布“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1973，p. 467)，以及为什么“服务业经济”预示着后工业主义的来临？要理解信息在这个理论化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困难；贝尔利用许多相关的观察资料去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类生活。在前工业社会，生活是“一场与自然竞争的游戏”，在那里，“人们用原始的体力进行劳动”(Bell，1973，p. 126)；而在工业时代，在“技术和合乎经济利益”的条件下，“机器占据着优势”，生活是“一场与虚拟自然竞争的游戏”(p. 126)。与过去的两个社会相比，“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生活是一场人与人竞争的游戏”(p. 127)。“竞争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既不是体力，也不是能源，而是信息”(p. 127)。

换句话说，在前工业社会，为了生存，我们只能依靠强壮的体格和传统的办法与土地抗争，而接着在工业社会，我们要把命运与机器生产紧密相连，但是到了服务性/后工业社会，信息成为主要的工作原料。毕竟，在“人与人竞争的游戏”中，信息必须是基本的资源。请想想，银行家怎样才能处理金钱交易？临床医学家怎样与他的病人对话？广告商怎样创造和传播形象和符号？教师怎样传播知识？其实服务性工作就是信息工作。在社会上占据优势的服务性工作必然需要大量的信息。为了在以后的叙述中再次运用贝尔的术语，在此我们要分清三种类型的工作，分别是“采掘工作(extractive)”、“制造(fabrication)”和“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Bell，1979，p. 178)。这三种工作的平衡性早就在几百年前被打破，因此在后工业社会，“信息工作组成了职业结构的支配性群体”(p. 183)。

丹尼尔·贝尔深入地描述了为什么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生活环境。首先，信息产业中大部分都是白领的职业，因为它需要处理人而不是处理物，诚信在大部分工作中的地位变得比以前重要。其次，在服务业中，专业人士十分活跃。通过计算，贝尔宣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人力资源中超过 30%的人是专业人士(Bell，1989，p. 168)。这意味着在后工业社会的“核心人才”是“专业人士，因为教育和培训，专业人士已经具备了专业知识，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技术

以满足人们在后工业社会不断增加的需求”(1973，p. 127)。此外，“后工业社会的核心是专业技术服务工作”(Bell，1987，p. 33)，“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了后工业社会的主要优势群体”(Bell，1973，p. 17)。最后，服务业中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对“后工业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由医疗、教育、研究和政府的专业人士所构成的群体，通过他们，可以证明“学校、研究机构、专业工作和政府的新知识阶层的扩张”(p. 15)。

如果社会上的专业工作越多，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重要，对质量的要求也就越高，人对人的工作也会随之而增加。这不仅展示了一幅令人憧憬的图景，同时提升了信息/知识的地位。我必须得说，除了描述后工业社会的积极特征之外，贝尔的论述，道理还很深沉。他认为，因为专业性工作产生了大量的信息，专业人士的增加，不仅意味着比起以前流动的信息持续大爆炸，而且也说明了社会经历着决定性的变革。那是因为社会利用专业人士，也就是知识专家，进行工作前的计划安排。如果这种部署成为社会的重要特征，那么变化无常的自由放任主义将被取代。专家并不会让自由市场出现不确定的未来，他们用预测、战略和计划取代了市场调节那双“看不见的手”。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路径，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意识，命运之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服务业是由专家管理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游戏”，因此人际关系的性质便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这是后工业社会另一个本质上的改变。学者并不会关注他们对单独一个学生个体发展的影响；他们关心的是全体人员在知识、性格和技术方面的成长。医生同样不会把一个病人看成是收入的几分之一。在这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中，专家知识十分有效力。按理论上的逻辑发展而言，社会将会发展为人道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人不再被看作一个个体单位(工业工人的命运必须要与机器和金钱相联系)，而是从以人为本的服务产业中受益，专业人士都首先以顾客的需求为工作前提。计划推进的方向需要领导的作用，如贝尔所说，在后工业社会“新的意识”就是把社会看作一个“公共的社会”(1973，p. 220)，促使“团体而不是个人”成为关

键的参考点。对环境保护、长者的照顾和教育的成就等问题的考虑必须超出职业的范畴，这些问题的考量必须优先于经济的收入和商业竞争。由于专家的专业意见，优先权得以提上议事日程。贝尔证明，这意味着从“节约”（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原则）原则转换到以“社会效益”为主的生活模式（以“公众兴趣”为基础……努力满足社会的需求，Bell，1973，p. 283）。

在此时，读者可能会对谴责“后工业”社会理论中含有进化论假设的论点进行反思。我想，我们很难否定后工业社会是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因为比起后工业之前的社会，它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从前所有社会追求生产力的目标在后工业社会里已不复存在。

知识保守主义

信息工作和大量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工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丹尼尔·贝尔所论述的区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断裂标志。不可否认，比起过去的社会，现在的社会拥有更多的信息工作，而且信息的使用也在明显地增加，但贝尔又执意认为这些都标志着后现代社会与先前社会产生的系统突变，如果按照这个论断，不又有问题了吗？

根据贝尔的理论，第一棘手之处就在于他的新型社会类型构建的根基并不稳当。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任何内在的理由去解释专业人才为什么会如此猛增，即使增速惊人，我们也不会就此相信专业人才猛增而导致新时代的来临。例如，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工业的所有制还是保持不变，驱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持续运作，而社会系统（除了职业结构以外）还是未受损伤，这听起来也显得合情合理。比如，虽然瑞士主要依赖银行业和金融业，而挪威和西班牙的职业结构较为分散，但没有人会认为像瑞士这样的国家与挪威和西班牙是根本不同的两个社会。无论国家所展示的表面特征如何，它们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对此问题，贝尔和他的支持者有两个回应。首先围绕以下问题

展开——到底要发生了怎样程度的变化才足以让人肯定这是一个系统的断裂？对此论题，最诚实的回答就是笔者的判断和理由充分的论点，本书立即会提供理由去支持笔者对系统连贯性的判断。其次，贝尔用自己所信奉的各自分离的“领域”分析去回应，中轴所发生的变化仍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即使其他领域未必与中轴发生的变化相关联，各自也会连贯性地发生变化。如果以职业的和信息的发展来作为区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标准，证据确凿而可靠。笔者将在下述篇幅与贝尔讨论，我认为贝尔的反整体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证明社会是一个整体系统，而且持续关联性地运作。

但是，在开始实质性讨论之前，笔者再举一个质疑“后工业”时代来临的理由。贝尔提出的有关从旧时代转型到新制度的解释，正是问题所在。当我们询问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发生时，贝尔会诉诸于社会科学中明显而常见的论点，比如知识保守主义。那么我们就有根据去怀疑他的理论的合理性，怀疑他所主张的新系统是否已经粉墨登场。

按照贝尔的理论，社会类型的变化源自于生产力的提高，它使人力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再转移到服务业成为可能。生产力的提高源于科技的革新，它让我们从较少的农场中获得较多的食物、从较少工人工作的工厂中获得更多的产品。正如贝尔所说：“科技……是生产力提高的基础，生产力是经济生活转化的关键”(1973，p. 191)。正是生产力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因为它生产的财富开创了所有的服务性职业。

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社会学理论的形成与科技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表述十分相似，而后者是在社会科学上受到严重质疑的观点。科技决定论存在两个疑问：第一，科技乃社会变化中决定性的动力源泉；第二，科技本身远离社会世界发展，但是它却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评论家不禁会问——真如上述所论，那么，人类、资金、政治、阶级(Webster and Robins，1986，ch. 2)又在何处？科技是变化的动力，但同时与社会关系毫无关联，此论认真严谨吗？为什么是由价值和权力决定研究开发的预算？团体投

资科研革新的优先权由什么决定？政府凭什么选择这个研究计划而不是另一个计划？

与其清理科技决定论的缺陷，不如全面理解贝尔的知识保守主义的个性。例如，科技是变化的驱动力这个源远流长的思潮，至少可以追溯至亨利·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18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工业化的最早阶段就如此提倡了。实际上，该思潮在所有的社会学初级读本中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社会思想史中根深蒂固的知识保守主义已遭人诟病，贝尔却自以为新奇，以“后工业主义”概括社会类型，难怪人们要讨伐他的学术破绽。

此外，贝尔深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熏陶，这也导致人们对他的保守立场的质疑。马克斯·韦伯是经典社会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他记录下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发生的工业改革。贝尔把韦伯看作是“理性化原则”的主要思想家，推崇备至。韦伯认为“西方社会主要的特征就是理性化原则”（Bell，1973，p. 67），在贝尔的术语中，这意味着“少做多得”原则的产生，更简单地说，“拥有功能效率和测量精神的规则正到处扩散，‘节约’观念（利益最大化、最佳化、消耗最小化）不仅体现在材料资源上，而且扩散到生活的每部分”（p. 67）。此外，生产力的提高实际上是新科技的应用，它是“理性化原则”的基础。贝尔教授认为，“社会结构的轴心原则是节约，也就是根据损耗最少化、可替代性、利益最佳化和最大化等类似的条件进行资源配置”（p. 12）。

接着为了诠释社会变迁，贝尔提出了一个人们非常熟悉且激烈争辩的论题，但遭到诸多驳斥（cf. Janowitz，1974）。生产力的提高源于技术的革新，该论点一直潜藏在他的理论中。贝尔拒斥有关技术决定论的谴责，但他认为引起变化更基本和决定性的因素是“理性化原则”，这是“少做多得”出现的根本动力，它驱动着科技的发展。作为研究贝尔思想的当家花旦，克里夏·库马（Krishan Kumar）一语中的，他说：“贝尔所有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特征都可以看作是韦伯思想的延伸和精髓，他们都认为‘理性化原则’一直在西方工业社会稳定

地发挥着作用”(Krishan,1978,p. 235)。知识保守主义满意地解释新型社会在根本上发生的社会变化，但这一论点可能会遭到唾弃。可是贝尔的论述并非如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贝尔在引用韦伯的思想时，他反复重申的论点不是强调现代社会与过去的断裂，而是现代社会一直持续的变化。

贝尔的研究论题仰赖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探究工业主义的来临及其发展方向的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贝尔的研究路径削弱了后工业社会的新颖性。毕竟，向经典社会理论家汲取营养，原本是理解工业主义的发展，但贝尔借道开路的同时，却又声称他们实际上诠释了新型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实在太离谱。克里夏·库马对此再次进行了生动的评论：

> 后工业主义的理论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承认知识导师的重要性。他们显然不明白，如果他们的理论从工业主义的经典分析中吸取太多核心的内容，然后再用这理论去解释新型社会秩序的转型，实在没有说服力。如果经典工业主义的定义作用依然支配着社会，那么新的元素又怎能组成新的秩序？
>
> (Krishan,1978,p. 237)

贝尔对“理性化原则”作用的推崇，进入前人已开创的康庄大道，每一条道路上都有来自同辈社会科学家的警告信号。在他有关“理性化原则”的论点中，最著名的箴言是——所有的工业社会“都是依靠功能效率原则组织起来的，功能效率原则迫切地需要达到‘少做多得’的境界并且选择更‘理性’的方法行动”(Bell,1973,pp. 75—76)。贝尔必然会认可收敛论(convergence theory)，但如此论调忽视了不涉及“理性化原则”的因素，或者说贝尔唯“理性化原则”马首是瞻，无视政治、文化、历史的差异(Kleinberg,1973)。贝尔坚持“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科技力量无所不同；科技和工程知识的类型是相同的(或者教育方式是相同的)；职业和专业分类基本是相同的”(p. 75)，贝尔主张所有的社会都设定了相同的发展旅程，它们必然跟随着后工业社会的路径前行。

另一个与“理性化原则”相联系的棘手难题就是贝尔如何自圆其说，他既同意生产力可以从社会结构（工业社会的“节约”模式）上获得，从而服务部门继续扩张，又强调服务部门的扩大会产生“社会效益”和社区意识。虽然，贝尔告诉我们后者将会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决定性特征，但我们还是会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纯粹的经济生产。如果经济不发展，工业社会如何运作？也就是说后工业社会同时需要经济发展的支撑，那我们不禁会问——我们是否还陷在“工业社会”中？即使有众多的服务业人员，社会的根基是否还是“少做多得”？我们何时才能超越这个社会潮流？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贝尔预期的“后工业”变迁的必要条件，依然仰赖于自动化和多产的工业系统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我们绝不能说这是一个后工业社会。

后工业服务社会？

笔者怀疑后工业主义理论沿袭了研究工业主义主要特征的社会学。我也同样对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表示怀疑，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专业性工作的增加（伴随着信息活动的增加）表明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的降临。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还有更多充分的论据去驳斥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描述。

贝尔把服务业的发展看作是后工业社会出现的经典符号，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贝尔的这个观点就能理解他的谬误了。接下来，本文将证明服务业的扩张所象征的意义，正是各种关系的连续体（continuities），其与贝尔所假设的服务业的扩张是现代社会与过去社会的一种断裂的事实完全背道而驰。笔者通过回顾格舒尼和迈尔斯（Gershuny & Miles）的评述，在最权威的系统解释之后，我们就会再次明白“后工业社会”的理念破绽纷呈。

本文再次重述要点——贝尔引用了一个不可置疑的事实作为“后工业主义”到来的首要证据——在工业和农业部门衰落的同时，服务性部门的经济正在扩张。从理论上而言，当服务业持续扩张，其内部的专业性工作同样也会飞速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给予了支持服

务业发展的资金，其源泉是工业与农业效率的提升，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在服务业找到工作。财富是由工业和农业部门创造的，原则上，只要人们继续渴望消费他们的财富（这是刺激服务业发展的原因），服务业的扩张就不会终止。而服务性工作天生注定是要以人为导向的，它与自动化绝缘。贝尔的结论浸透着历史的见解，他引经据典说明在 1947 年，超过一半的美国劳动力在“商品生产”部门，而 49％的劳动力在服务性部门；到了 1980 年，“商品生产”部门只剩下 32％的劳动力，而服务性部门则占 68％（Bell，1973，p. 132）。这种趋势不断被后来的事件所证实，每一个数据不断用服务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证明了服务业的增长，到现在服务业职员大概在总劳动力中超过了 70％。因此，贝尔利用这些表面上成立的证据预示新型社会的来临，“后工业主义”便在既定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在此，我们理解贝尔所应用的推理是很重要的。贝尔将职业划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就是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但他又果断地将它们以下述方式联系起来。他认为服务业是依靠其他两个产业的产出，服务业消耗的资源都是由工业和制造业生产的。以更通俗的话来说，贝尔假设社会财富生产部门必须帮补财富消费领域。司空见惯的例子就是学校和医院不能生产财富，只能消费“我们可以花费得起”的经济，那就是工业所创造的财富。

在此需要掌握的关键点是贝尔并非简单地将职业分成不同的部门，且以此作为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象征，他同时运用因果理论去巩固统计分类，使其互为因果。虽然现在此论已鲜有人关注，但在贝尔的论述中却时时体现出这样的假设——第一和第二产业生产力的提高是“驱动社会变化的动力”（Browning and Singelmann，1978，p. 485），社会将迈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十分不幸的是，对于贝尔的假设来说，谬误重重。

首先，笔者认为比较次要的问题是关于贝尔的“阶段”发展论。从前工业到工业，最后到后工业主义，财富一开始主要聚集在制造业上，伴随财富增长到合适的程度，大部分的财富就会移向服务部门，

从历史观点上说，这个变化实在唐突。“第三产业泛化”(over-tertiarisation)的第三世界国家被视为经济体制不协调的典型，但这也说明了在工业基础上建立服务业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对贝尔的观点更有效的回击在于并没有证据说明发达社会的前进过程一定是把大部分的工业生产职位转向服务业，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并非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而是从农业转向服务业(from agriculture to services)。此外，即使是在英国，历史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从 1840 年到 1980 年期间，制造业工人占总体劳动力比例相当稳定，基本保持在 45%～50%之间，而伴随制造业的崩溃，就算加上妇女劳动力，工业人口也锐减至不足总体的三分之一，这归因于经济的衰退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府政策。

根据以上资料显示，社会从一个产业进化到下一个产业的说法有待商榷。除了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产业工人并没有占据总劳动力的大多数，但即使是在英国，也很难证明就业转型的井然有序，即是从一个产业相继转移到下一个产业。完全可以说，后工业社会理论就是“蛙跳”(leapfrog)诠释，能说明从农业直接转移到服务业的普通就业实践类型。这种情况犹如农业和工业的先进生产力所向披靡，导致自动化程度的飞速发展，仅在一个世纪之间，社会便从前工业时代跳跃(jump)到后工业时代。有鉴于此，我们仍然质疑贝尔“从商品到服务”的主题，而认同他提出的另一理念——服务业的发展所需的财富由其他两个部门共同创造。

对贝尔理论的第二个批判要害在于他坚持农业和工业所创造的财富是服务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个观点遭遇攻击的原因首先在于“服务业”是统计学家在经济领域统计工作分类中的剩余部分，统计学家把那些既不属于第一产业的职业门类，也不属于第二产业任何部门的职业类型，统统纳入服务业，那么服务业就成为“产业中的破旧袋子，但凡房地产、按摩院、交通、计算机室、公众管理和公众娱乐等之流的部门都可以纳入囊中”(Jones，1980，P. 147)。这里所强调的正是服务产业的无所不包及其作为其他产业的剩余部门的“属性”，那么，仅仅因为便于统计而将第三产业与其他两类产业区分，起

步就误入歧途。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social construction)，“服务业”作为单独的一个产业部门类别，既分离于制造业和农业，却又仰赖这两个部门创造的成果，所以这误导了贝尔，使他从表面看来似乎振振有词，服务业的扩张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力提高为基础，然而，只有从概念的范畴来说，服务业才能被视为独立于其他产业部门，且同时又依靠农业、制造业而存在。

乔纳森·格舒尼和伊恩·迈尔斯(Jonathan Gershuny & Ian Miles)的实证研究为我们贡献了“服务”的更深一层含义，以此检视贝尔的破绽就很清楚问题的根由了。两相对比可知，丹尼尔·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定义是错误的，服务部门是与工业相对的，只要完成“从商品到服务”的转型，后工业社会就来临了，但是贝尔并没有清晰地定义服务业由何构成？其内涵是什么？

> 如果与商品的本质作比较，服务业的定义就一目了然：商品是物质，恒久存在，由使用机器的工人制造，商品用于销售，得到商品的人可以按意愿使用商品。相比之下，服务是非物质和暂时的，由人制造而且由人享用。
>
> (Gershuny, 1978, p. 56)

贝尔认为整个后工业社会处于一个社会发展的特别阶段，为了把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他把服务行业作为商品生产的对立面看待，因为服务业提供的是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游戏”，是信息的和无形的)，而在工业社会中，工人都从事商品制造。贝尔理论的主题意在指出——当社会上有足够的财富投资非物质服务业时，社会就离开了工业主义，而新增的服务性工作吸纳大部分的就业人员，但是它不生产商品，而是消费其他部门创造的资源。

当有人检查服务性工作的实质(也就是，服务业其实只是一种职业形式，而不是一种社会部门分类)和第三产业与其他工业部门之间的真实关系时，这种有关社会和社会变化的模型的假设就会变得岌岌可危。如果我们仔细地检查一下服务性工作的定义——生产非物质和短暂产品的职业(Gershuny and Mile, 1983, p. 47)，我们就会发

现，这种职业并不仅仅局限在服务业。虽然工作性质有一点不同，但银行或者发电厂的会计工作就可同时归属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类似的，在大学或者建筑工地工作的木匠也可以同时被分到两大类中。这也就意味着，产业的分类标准并没有明确说明劳动者的工作类型，服务部门中会有许多商品生产者，而在第一和第二产业中也会有许多非生产者。实际上，根据格舒尼和迈尔斯的统计，在扩张的服务性工作中，有超过一半的服务工作机会的剧增是源自于“第三产业部门内部交换”的成果，而不是部门与部门之间就业机会的转向。

例如，当一个制造厂商扩招白领职员时，扩招有可能发生在市场部、培训部或者人事部，公司接纳更多的服务性人才，以便公司业务卓有成效，比如是为了改进销售方式、对工人进行训练使其工作更有效率，又或者是为了公司更谨慎地选择职员。这里增加每个特定部门的劳动力分工，也就推动了服务性工作的增加。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例子令贝尔对服务业的阐述相形见绌，他认为服务业是寄生在工业基础上的一种产业，实在太离谱了。如果我们知道在不同的产业中有类似的职业（各种行业的经理、书记员和律师等等），我们肯定不会说在该产业中，这些职业是具有生产性质的，而在另外的一些产业，它们是消费其他产业生产的资源。人们会对产业分离的价值产生质疑，因为以产业作为区分标准，就说有的部门完全是生产性质的，而另外的部门则完全只是消费，那么区分的价值又该如何衡量呢？

上述解释让人们开始质疑把社会分解为不同产业部门是否合适？当我们深入仔细地考量服务产业本身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实质性的反对意见。人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服务性工作不是在消费工业创造的财富，而是协助工业生产财富。格舒尼主张“服务性工作的增加……主要是劳动力分工作用的表现”（Gershuny，1978，p. 92），他让人注意到“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间的系统性关联”的根由（Kumar，1978，p. 204）。如此一来，我们就洞察到贝尔严格地区分不同产业部门的荒谬之处了。

例如，勃朗宁和辛格曼把银行和保险业看作是“服务业生产者”，

它主要“反映了劳动力分工的增加”(Browning and Singelmann, 1978, p. 30)。只有在理论上故意熟视无睹的人，才会觉得服务业远离生产活动。格舒尼以下这一段论述，颠覆了过去所有认为服务业来源于“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理论：

> 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家需要知道。第三产业虽然不直接生产原料商品，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大部分的第三产业都是与生产过程紧密联系的。比如，工业分配和流通的部门虽然不生产任何原料，但是它是产品制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产品不能被销售，那么它们就不会被生产。类似的，金融和保险的主要部门推进了生产和购买商品……虽然在1971年，几乎一半的劳工人口都受雇于第三产业，但其中有少于四分之一的部门(23.1%)在提供最后的消费服务。
>
> (Gershuny, 1977, pp. 109—110)

即使是教育部门，在其创建初期，也是一个完全脱离生产且不断消耗资源的服务业原型，但是为了满足社会对系统化训练劳动力的广泛需求，学校也开始从事研究活动以保证生产力的提高和管理人员的有效供应，并为企业生产足够的工程师和语言学家。

再直白而言，将社会分成财富创造和财富消费两个部分，或者如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中，明确将社会分为商品生产和服务产业的做法堪称“冒失且过度简化”(Perkin, 1989, p. 501)。贝尔的路径满足了一般人的常规思考，但是哈罗德·柏金(Harold Perkin)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对此观点及其关联的对立面都进行了尖锐批判：

> 许多企业管理人员认为，私人部门生产财富，却供给公共部门挥霍，这种观念谬以千里。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公共部门生产并维持教育和医疗服务，更重要的是公共部门生产私人部门所依赖的技术，此论在理。在当下复杂和相互依赖的社会中，上述相互攻击的言论，幼稚荒谬，而且于事无补，不就是锅笑壶黑嘛。
>
> (Perkin, 1989, p. 502)

服务业和制造业

这样看来，即使不是在职业分类范畴中，服务业也不能独立于其他工作活动，贝尔的分类欠妥当。如果我们深入地阅读格舒尼和迈尔斯的著作，就会豁然开朗，真相大白，对贝尔把服务业单独分类的路径错在何处也就一目了然了。在他们撰写的《新服务经济》(*The New Service Economy*，1983)一书中，格舒尼和迈尔斯一开始便运用恩格尔的理论去分析问题，这提醒我们，丹尼尔·贝尔是利用事后回溯的逻辑(ex post facto)去解释服务性工作就业人数的扩张。

在此，我简要重申一次——贝尔的研究从现今社会服务性工作不断增加的事实入手，然后根据恩格尔的规则作出推论——服务业的扩张源自于个人财富的积聚，个人的额外收入会开支于服务业。贝尔认为，因为现在有更多的服务人员，所以人们一定在服务业上花了更多的钱。一开始，此论似乎令人信服，但它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贝尔对服务业实际干什么(service workers actually do)这个问题的思考不靠谱。我们已经明白，为了使商品生产变得更有效率，大量的服务性工作是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分化所致，而与贝尔关于服务业扩张的结论是两回事。

贝尔理论的另一个主要错误就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人们只要购买商品就能满足他们对服务的需求，而不是雇用服务人员为他们服务。格舒尼和迈尔斯谈到这个主张时，他们反向思考恩格尔定理(Engel's theorem)，他们想知道情况是不是真的会那样——财富的增加并不会增加个性化服务的消费。因为相比较贵的雇用服务人员消费，便宜的服务性产品似乎更实用，人们会通过购买商品满足自己对服务的需求，而不是通过雇用服务人员。毋庸讳言，按照恩格尔定理来说，当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人们希望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人工太贵，人们并没有准备好支付那昂贵的雇用服务人员费用，当他们看到商场上有合适的服务性产品时，他们便会选择购买和使用服务性产品来满足他们对服务的需求。比如，人们想要用更便捷的方式打

扫房子，但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请清洁工，于是真空吸尘器取而代之，这是人们消费得起的商品服务；或者，他们想要不时地装饰他们的房子，但因为他们不想付钱雇用油漆工，他们会买一套自助设备来自己动手完成装修。

格舒尼和迈尔斯同意恩格尔定理仍然具有诠释效果，人们确实需要服务，但是与买一台机器的价格相比，雇用服务人员的昂贵价格，令消费者望而却步，雇用人工的服务显然没有吸引力。于是消费者需要商品形式的服务，这类需求“产生了改革服务供应的动力”(Gershuny and Miles，1983，p. 42)，同时也意味着服务业的需求影响了制造业本身(impact on manufacture itself)。人们对服务的需求经由商品满足而不是通过雇用服务人员满足，比如摩托车工业和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这种趋势的发展。格舒尼提出，根据过去印象深刻的经验资料，服务性产品的增加意味着“自己服务自己的经济”(self-service economy)的扩张，这与贝尔的“后工业服务社会”理论几乎背道而驰(Gershuny，1978，p. 81)，此种趋势正渗透到服务业和服务性就业两个领域。格舒尼说：

> 仔细地研究工作和消费两个模式的转变……揭示出逐渐呈现的不是“服务业经济”，而是与此相反。根据……(贝尔的)教条，我们希望发现服务消费正在可观地增长，可实际上，我们发现服务消费占总体消费的比例在明显下降。比起购买服务，普通家庭似乎更喜欢购买耐用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可以让最后的消费者为自己生产服务。
>
> (格舒尼，1978，p. 8)

此外，服务性产品“是工业结构全面改革的重要基础来源”(Gershuny and Miles，1983，p. 121)。“服务性产品已经工业化”的观点颇具穿透力，就是本书所说的“消费至上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按照“消费至上资本主义”的逻辑，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过程都紧密关联。格舒尼和迈尔斯不断批判丹尼尔·贝尔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假设，他们认为贝尔把社会分隔成各自独立的领域，完全

是严重的误导。历史记录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得力于社会和技术革新的成果，这些改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服务业中交通运输、家政服务和娱乐等领域的需求而兴起”(p.121)。换句话说，二战后的社会并非由“工业”部门创造的财富(或商品)补偿人们雇用服务人员的花费，当时社会上主要的产业活动都是制造服务性产品，从而满足消费者明显存在的需求，服务性产品替代了雇用服务人员的消费。贝尔的理论阐述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这个因素，他一直坚持社会领域各自独立的立场，以至于南辕北辙了。

格舒尼的合理批评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反对，而且是全盘否定贝尔有关后工业社会的观念，我们毫无保留地拒斥贝尔所有反整体论的理论(社会并不是完全不相关联，而是内在地相互关联)以及他把社会变化视为向着“服务经济”进化的想法。他对后工业社会的解释是错误的，他对“人皆有所养”社会的阐述缺乏说服力，而他对社会独立产业的坚持(社会各产业间靠因果关系联系着，服务业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更是漏洞百出。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观点——随着服务性工作的增加，社会上会有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作，甚至更多的专业性职业，尽管这些情况都属实，但贝尔强调的理由并不能宣告“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相反，该趋势都清楚地说明了已建立的社会—经济系统是相互依赖且连续统一的。而且，此一转变确实导致了信息和信息活动的增加，就此而直接宣称“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那就离谱了。

且容笔者最后再赘言几句。我们可以肯定当代社会比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拥有更多的信息工作，这就是笔者的论述起点。但我们已经明白，贝尔把信息工作的增加降级为扩张的服务业就业的增加，所以抨击贝尔的观点易如反掌。现实社会的经济是整合的，许多服务性职业是为了帮助产业运作而发展，而不是单纯消费商业生产部门的资源。该情况也说明了在当下情境中，信息和信息工作的意义何在。

在一般的商业事务中，信息活动备受重视。一些评论家认为今

天的经济(不仅是农业和制造业,还包括所有对国民生产总值作出贡献的企业)特别需要信息,比起贝尔所强调的消费者服务业都更紧迫地需要信息。也就是说,服务业的生产者(producer services)(比如银行、广告公司、研究与发展部门、网上数据服务、电脑软件供应和管理顾问等信息活动)实际上是现在经济活动的轴心。服务业的生产者(如格舒尼证明的,为了援助更广泛的经济部门)在近几十年会促进信息集中性的提高。政治经济学家比尔·麦乐迪也是这样想的,他写到:

> 许多信息商品和服务运用到产业中,而不是作为产业的消费者……我们需要……认识到信息……在现代经济中,几乎是所有生产活动的基础。信息角色的变化重组了产业结构和创造了全球信息经济。
>
> (Melody,1991,p.2)

随着本书的层层递进,我们会遇到志同道合者,他们也反对贝尔"后工业服务业经济的社会"图景,不过,他们都同意信息和信息活动在20世纪后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

理论知识

前文已述贝尔"后工业"模式的根基不牢实。同样地,他把"后工业"社会等同于"信息"社会的论点难以立足:虽然他的主张很专业,但白领和服务性工作并不能象征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他所提出的论断,"后工业主义"是信息时代的典范写照,也是不堪一击。最重要的,与先前的社会相比,似乎并没有显示现在社会与之前社会的断裂,而且实际的情况刚好相反。正如克里夏·库马所评述的,"后工业理论家所挑选的趋势,事实上自工业主义最初诞生时就已显现,该趋势不过是当时那些倾向的推断、强化和澄清"(Kumar,1978,p.322)。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反对把后工业主义的理念作为对现代信

息的正确理解。不过，贝尔的理论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信息工作在发达社会里大量增加，但这并不足以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类型。就像我们不能断言服务性工作的扩张，就证明了新型社会的来临一样，信息量的增加并不能够代表一个新的社会。

然而，虽然我们不能接受贝尔的断然设想——仅仅只是信息自身的增加就创造了新的社会类型，但我们不妨关注他观点中其他有关信息的讨论。贝尔在阐述后工业社会的时候，不仅看到服务部门从业人员的扩张导致了信息的剧增，而且还敏锐捕捉到后工业社会中信息性质上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贝尔所说的社会轴心原则的“理论知识”。现在，随着专业性工作的增加，人们无疑会使用更多的“理论知识”，在此讨论的“理论知识”不是量化能够随便衡量的现象（律师、科学家等的数量容易计算）。“理论知识”既是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也是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标志，而且对后工业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原则上，“理论知识”在后工业社会的中心地位至少会对工作内容或者工作性质进行改革，但是我们还是不完全清楚这些想象是否会与贝尔其他有关后工业社会的描述（比如职业的变革、产业部门的转换等等）吻合。

不过，“理论知识”确实对生活的各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贝尔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现代社会的彻底创新就在于理论知识经典化，无论是在经济生产还是服务领域都有核心作用”（Bell，1989，p. 169）。根据这种特征，贝尔描述到：

> 后工业社会就像知识社会一样，（因为）革新日益来源于研究和发展（并更直接，因为理论知识的核心作用，直接导致科学和技术产生新的联系）。
>
> （贝尔，1973，p. 212）

通过“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充分理解“理论知识”。在过去，革新完全由“天赋优异的科学业余爱好者”引发，科学爱好者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根据经验而研究，不断经由试验发现错误后，继续尝试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比如有人

会想，乔治·斯蒂芬逊(George Stephenson)制造了火车头：当时，他正面对着一个实践的难题：如何才能把煤从路途方便但却远离河流的煤矿中运出，为了回应这个问题，他发明了以蒸气为动力并能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斯蒂芬逊虽然完成了此发明，但他并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和学习过蒸汽机和牵引力的科学知识。或者，我们再看看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机，瓦特发明蒸汽机源于他想尝试改进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的早期蒸汽机模型。而在20世纪早期，天才的思想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虽然没有接受过任何有关工程学的正规学校教育，但他凭借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灵巧的实践天赋成为汽车生产的先驱者。

相比之下，后工业社会以“超越经验主义的理论先行和符号的抽象系统……理论知识可以阐明各种不同领域的实践”(Bell，1973，p. 20)。这意味着现代的改革是以已知的理论原则为前提而推进。比如，电脑科学吸收了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论文《论可计算数》(“On Computable Numbers”)中的精髓，这篇开创性的论文是以二元制数学、整合线路的最小化原则为研究起点的，它让“微型电子电路改革”得以建立在已知的物理原则基础上。此外，人类基因组合系统化所衍生的基因工程潜隐着令人敬畏的影响力，它的发展一直推动着人类基因组合计划前进。正如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的生产“在根本上依靠着理论工作”(Bell，1973，p. 23)。

现代社会的理论知识优先，不仅在技术革新领域，甚至出现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例如，政府制定政策时都要以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为前提。理论知识的形态多样，比如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供应经济学政策等等。政府官员每日应对紧急事件时的决策都依赖着每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支持。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理论在政治事务上的作用。在创造教育机会和药物供应的环节中，专家都会以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人口统计学的趋势等理论模型为决策的基础。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英国常规的政策，比如21世纪中期的养老金供应政策必须考虑年龄结构、国民寿命、就业率和国民迁移类型等模型。

在此，我们不妨看看当代针对环境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我们很快会明白，当代社会的政策并不仅仅是针对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比如海底石油的溢出或沙漠化）；当然，政府还会考虑到这些情况的可能性，但他们的建议更多是基于生态系统可承受能力的理论模型来考虑。因此，通常由人口增长、鱼类资源、臭氧层的情况等理论方案引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讨论。政府只能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实际的政策，比如在英国，针对本国炎热而干旱的夏季的应对政策必须考虑到全球变暖的背景理论模型，同时考虑到全球变暖的延续可能性和影响。当然，这些模型现在说来还是不成熟和不精确的。不过，我们要明白，严格说来，理论知识确实并不完美无瑕，但它在我们生活中却至关重要。以上运用的理论知识常常是不准确的，但这并不会破坏它成为我们行动的前提条件。原因在于我们的行动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比如，技术问题和社会障碍），而现代生活则是基于抽象的、概括的行为理论而得到组织。

贝尔认为该变化意义重大。可能最重要的是理论优先于所有领域，赋予了后工业社会规划能力，因此后工业社会比先前社会，就更能控制未来。这种能力与专业人士组织和管理生活的倾向一致。此外，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理论变得更全面了。计算机理论不仅可以管理“组织复杂的事物”，而且通过编程，还可以创造“智能科技”（Bell，1973，p. 29）。“智能科技”整合了知识（规则、程序等等），并反过来以理论知识为基础推动革新。

不容置疑，理论知识是一个醒目的理念，从表面上看来，它定义了一个依靠生产和使用信息/知识为核心的新型社会。在以前，社会的发展主要为满足实践需求。如果理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起点，那么它的确可以宣告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到来。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并不只是更多的白领工作者，或者更多位元的信息正在被生产，我们讨论的是社会生活的新基本原则。

尽管如此，贝尔论题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准确地定义理论知识，由此导致学者对贝尔的质疑（Kumar，1978，pp. 219—230）。理论造就了抽象而概括的标准、法律和程序，可以认可的是那些先进的知

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就会被系统化地载入典籍，这些经典书籍为其他的从业者所学习，然后他们再把吸收了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人们认为，此原则是研究和发展计划中的核心，它一直处在改革最前沿。而社会上也有许多证据证明，该原则在如建筑学、工程学、食物处理甚至服装设计等专业性工作中色彩纷呈。

然而，有人会拓展理论知识的理念，使它包含更丰富的内涵——所有可以证明社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事实。比如，为了说明知识在当代社会的优先性，有人会把许多白领雇员在法律、社会服务和会计学上接受过的训练也视为理论知识。我们确实可以说，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传播理论知识。毕竟，这是一个普遍的重复过程，至少英国如此。在英国，大众高等教育（适学年龄的人群中大约有30%的人进入大学）需要训练大量合格人才，使他们能在“知识社会”成功运转。这些被传播的知识无疑是系统化、抽象化和概括化的实际应用，不过其中也有大量理论知识是来源于对科学的解释，比如化学和物理。

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1994）就当下我们生活于“知识社会”来扩展理论定义，他论述了知识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构成。实际上，无论是设计新技术，还是生产日常人工制品，包括我们一切的所作所为，理论知识都十分重要。当我们利用渊博的知识去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定位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有意义。

在此，理论知识的理念成倍扩展，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斯特尔仿效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本书的第八章会更深入地讨论吉登斯）而提出的观点。斯特尔指出知识的发展有三种形态：有意义的（meaningful）（知识的启迪目标，为了更好地被理解）、生产性的（productive）（应用于工业的知识）和行动性的（action）（在此，知识要紧密地与生产联系，比如生产智能设备；知识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的日常活动表现）。这里所阐述的最后一个知识形态，与吉登斯所强调的“后现代”存在的强烈自反性（intensified reflexivity）相类似。吉登斯想强调的是，现代性其实是人们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后，受到社会共同体限制的状态。在过去，因为“命运”人们不得不做他从前所做的事

情，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个人和全体都可以为自身做决定，集体的命运掌握在“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中。也就是说，社会日渐摆脱了过去固定不变的界限，变得更易适应，同时也承认了人类的决定效果。这种趋势的发展需要提高个人和集体对社会的反思，或者说是自反性，但这并没有被理解为某些迈向自我沉溺的倾向，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开放性地对待各种不同领域的思想、信息和理论，这些因素之间互相检验、合并交织为语境，根据这一语境，人们才能作决定。

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后传统”(Giddens，1994)社会是个关键概念，其“后传统”社会的特征体现为行动者和制度依靠信息/知识所表现出的强烈自反性。当然，其中有部分自反性是地方性的且特别的(如对个人生平的反思、公司对销售和库存记录的审查)，但大部分是抽象的。它们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电子媒体和学校组织传输到大众。于是，吉登斯认为我们正栖息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世界，自反性比起以前的社会更为显著。如果有人接受了吉登斯以上的观点，那么他就会更为重视信息和知识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因为个人和组织在社会上的选择性依赖于具体而丰富的信息。如果有人同意吉登斯的观点，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具有强烈自反性的时代，并且相信这种自反性是以我们塑造自身和社会的材料为基础的，那么他就会需要一个复杂而深奥的信息环境。吉登斯所说的理论知识可能与丹尼尔·贝尔所假设的并不一样，但它们都是抽象而系统的，它们都包括在同样一个广义的范畴中。

然而，我们还是有理由犹豫是否该用理论知识来描述新的信息社会。至少，安东尼·吉登斯本人也不愿这样做。虽然他强调“拥有强烈自反性的世界就是一个聪明人的世界”(Giddens，1994，p. 7)，但他只是把这视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今天的生活肯定是信息更密集的世界，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此外，吉登斯对理论知识的新颖性还存在疑问。在 1981 年，他观察到“社会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并没有出现特别的创新点……实际上……技术的合理性……是工业主义与先前其他社会秩序区分的

主要因素”(1981,p.262)。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作为新型社会标志的理论知识其实早已普遍流行。

吉登斯的反对意见提出了关键的问题——评论家所说的理论知识到底意味着什么？上面的引文清楚地表明,吉登斯认为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理性化的概念可以应用到理论知识的定义中,韦伯的理性化强调了有目的(直接目的)的行动(最明显地出现在行政系统结构的发展中),同时也涉及抽象和系统的原理、典籍和标准(行政组织的整体)以及行动者对抽象知识的需求(系统应该怎样运作)。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知识只不过是有关行政机构运作的经典规则和程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问——到底理论知识中有什么新的元素？因此,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对知识的强调,本质上不过是延伸和积累了工业主义的优势,那么,我们不禁又要质疑——后工业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新颖性？

这让我们对“理论知识”的准确性产生更大的质疑。如果“理论知识优先”是指那些在课本上经典化的已知科学原理(水的沸点、物体的传导性等),也可以认同。然而,如果理论知识包括了假设的模型,比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关系贫穷和生活机遇的关系、或者社会阶级和教育机会的关系,这又另当别论了。可能理论知识与物理规律的区别只在于程度的高低,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如果理论知识被视为现代生活专业系统的主要因素,它能操纵水力和污水系统、空中交通管治和电话网络等各类服务业的运行,同时它也组建了以确定原理(如毒性、安全极限等等)为基础的活动监控系统,这样的理论知识又是另一种定义路径了。又或者,理论知识被理解为一种趋势,个人和机构倾向于在他们改造未来的行为之上表现出更多的自反性,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后,如果理论知识是由教育证明(一个普通的策略)特许的,那么这又涉及了不同的意义,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义。虽然理论的优先性是当前历史的标志性特征,但不准确的理论知识定义,不禁让人质疑它是否能作为辨析信息社会的标准。

总结

几年前，丹尼尔·贝尔开始用“信息社会”的概念代替“后工业主义”。但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分析术语并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实际上，无论他的意图何在，“信息社会雷同”于“后工业主义”。然而，我们在这一章的阐述中明白，他的分析并不能成立。

毋庸置疑，信息和知识（包括所有伴随着“信息爆炸”出现的科技系统）都在数量上扩张了，我们也欣然地承认，信息和知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管理日常生活的核心力量。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或论点，能够证明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后工业主义”社会已经来临。进一步说，对“后工业社会”的批判是有效的，我们就是要反对所有同意信息处于支配地位，即代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言论。

丹尼尔·贝尔将社会分成几个各自独立的领域，接着将经济分成几个独立的产业，以支持后工业模型的整体结构。但这些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根本原理都无法经受深入的验证。伴随着服务业、白领工作甚至专业性工作的扩张，大量的操作、处理和储存的信息出现，但我们没有理由把它们的扩展看作是因为“商品生产”部门创造了更多财富，使另一部门有条件消费，才造成服务业的扩张。相反地，服务业的扩张支撑着现存的内部互动的经济结构（以及政治和文化关系）。“后工业”社会并没有创新点：服务业及其相关部门的发展强调了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

因为同样的理由，信息社会的热衷者一开始就根究的问题——信息和信息工作者的扩张，并不能代表新的社会系统的来临。克里夏·库马开门见山地说：“人们对信息科技的重要性，甚至是信息革命的承认是一回事；而要人们承认新的工业革命、新的社会类型甚至新的时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p. 52）。

贝尔所强调的“理论知识”，如果没有在实质意义上，但至少在分析上与上述所提及的数量变化是紧密结合的，比起后工业社会的主题——“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理论知识”有更大的吸引力。理论知

识的作用在性质上起了变化，它对计划和控制社会事务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对于社会变化感兴趣的人，信息/知识在当代社会的意义，颇具吸引力。虽然在贝尔的著作中，有关理论知识的论述并不尽善尽美，在书中的重要性也次于他所强调的职业变化，但是在表面上看来，有关理论知识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贝尔的著作中，理论知识不但过于模糊，难以直接应用，而且它的新颖性和重要性也受到了质疑。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理论知识作为证明我们生活在“信息社会”的最有趣和最可信的证据，一点也不离谱。这也是为什么笔者会在本书的后面几章继续谈到理论知识。

我们确实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信息和信息活动形成了日常组织和大量工作的基础部分。信息的规模和范围正在急剧扩大，面对冲击，社会学家渴望分析和解释信息的发展。本章的旨意就是确认贝尔的“后工业”并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现象，他希望把“后工业主义”强加给“信息社会”的宏大抱负，可以说是壮志难酬。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现代信息的意义，则必须另辟蹊径。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我们生活在一个喧嚣的时代。固然，每代人都以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日新月异，所以当有人宣称人类正进入“第二个工业革命”时，不同意见的质疑论调也就应运而生且派上用场。我们的时代确实发生着一些特别的变化，不过，也有一些望重士林且不带偏见的学者注意到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凡的时代。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94）认为，从 1975 年开始到现在的几十年象征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快速的根本（变化）”（p. 8）。许多人都承认，社会既有关系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化的步伐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快速。

以职业为例：不久以前的英国工业区，比如南威尔士和东北部，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年青一代都能安心地（即使不热衷于此）跟随他们的父辈进入煤矿、造船厂和钢铁工厂工作。上述工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期间已经开始萎缩，到了 80 年代便退出历史舞台了。而在这些地区的新职业既有国家创建的“政府机构”，也有旅游、休闲和个人护理等领域。众所周知，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确实，像煤矿工人之类的职业曾经标志着英国的经典认同（在一个世纪以前占据了全部劳动力的 5%），而现在就像斯毕塔菲尔德（Spitalfields）的丝纺工人一样，没有与时俱进，和当下时代格格不入了。

英国大陆在过去25年间一直间断地发生着严重的政治骚乱，冲突通常在伦敦、利物浦、伯明翰、布拉德福和布里斯托尔等中心城市爆发，然后扩散至周边地区，甚至发展到郊区的海威考姆勃。我们不知道此种骚乱什么时候会再次发生，但它们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翩然而至。在遥远的巴黎(2005年底，巴黎的暴乱一直持续了几星期)和洛杉矶(1990年代一直断断续续地爆发骚乱，造成了重大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也发生过类似的骚乱。我们的私人关系也正经历着不那么激烈，但却让人忐忑不安的变化，这一切都集中反映在家庭模式的转换(社会学家喜欢把它称为"家庭的选择"，包含男女同性恋关系、同居和再婚关系的家庭)以及父母的焦虑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以身作则、风范后代(离异家庭的子女也日渐普遍)。道德的护卫者会大声疾呼"回归基本的家庭伦理"，而政治家则坚持"尊重"，但城市的非法行为已一发不可收，如果认为儿童仅仅是被"喂养"长大，我们的婚姻也不大可能回到"至死不渝"(till death us do part)的境界。

我们很快就会清楚所有的混乱，归因于这个时代铺天盖地的大众媒介，前所未有，信息唾手可得。每天足不出户，打开电视，我们就能了解政治的不稳定、经济的困难和令人烦扰的社会问题。每个家庭不仅能收看电视，而且还能从广播、报纸、杂志和免费广告上获取资讯。毋庸惊讶，人人皆知现实的瞬息万变。的确，这些变化必然会引发激烈的论争，但变化本身的范围之广和速度之快简直不容置疑。

人们已经十分洞悉这些变化了，因为媒介总是提醒我们——剧变的核心特征是信息和科技，它们操纵着变化。由于收集和传递信息的新方式的出现，大众媒体自身也在根本上嬗变——在过去，轻型摄影机的发明使媒体能够到达过去无法深入的地区拍摄；而现在，全球卫星系统在几分钟内就能接收几千英里之外的图像。全世界都能同时见证柏林墙的倒塌、关注南斯拉夫在1992年到1996年间的分裂，以及2001年9月，双子星楼被恐怖分子所驾驶的民航飞机所撞倒。社会的符号环境包括书本、小册子、广播、电视、录像、网络等各方面，其迅猛扩张意味着有关两性关系、人们的欲求和困难(对艾滋

病所应持有的态度和行为）等议题的信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们的意识，且会受到比以前更多的关注。

但在当前的变化中，重中之重是增加受众接收的信息。例如，今天许多“信息饱和”的新职业，它们不再需要体力工作者，而是需要拥有演讲、写作和领导能力的人才。举一个贴切的例子，过去的煤矿工人，现在只能在比米什和达拉谟镇等地区的工业博物馆向旅客介绍煤矿的改造。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信息传播科技乃构成混乱的必要元素——工厂应用的电脑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增加职位，同时未来的许多工作都需要熟练操作电脑。而且，计算机化加速了现代社会的演变，劳动力也要随之作出适应性的更新。更进一步地说，无线电通讯在全球的延伸，不仅意味着人们足不出户，坐在电话、网吧和电脑前，要联系朋友和世界各地的关系真是易如反掌，同时也说明了经济和政治战略的构建必须敏锐地考量全球性因素。

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信息和信息科技与此巨变相联系，但大家都会承认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近几十年它的速度不断加快，而信息是该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此外，变化并不仅仅只是一连串的事件和紧急状态。过去也常发生比现在更激烈复杂的动乱，例如，在 1939—1945 年发生的剧变，令现在的所有动乱都变得黯然失色。因此，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变化不仅使我们遭遇各种各样的紧急事态，而且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常规挑战。二战后，为了改善战乱生活，国家竭力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创造为大众所熟悉的生活世界，工厂可以重新营运，人们重操旧业，恢复往昔的生活习惯。从过去稳定工作（或职业）的废除到各行各业的重建，从对国民身份的信任到对健康和安全的警惕，在当今社会的各领域，飞速而广阔的变化对我们提出了全面的挑战。

不计其数的人试图去理解这些变化的主要形式，本论著涉猎到一部分，而剩下的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章节继续讨论。某些学者认为，我们正处于工业社会（industrial）到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的转型之中，根据丹尼尔·贝尔和其他学者的意见，社会正从制造业转

换到服务业；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指出，社会是从现代(modern)转型到后现代世界(postmodern world)；对于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约翰·厄尔里(John Urry，1987)来说，社会是从组织化(organised)资本主义到无组织的(disorganised)资本主义；可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却认为这些变化揭示了"历史的终结"，在失败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t)试验面前，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每个学者都试图用不同的侧重点解释完全相同的现象，因此他们对变化的意义的阐释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本章将集中讨论两个互相关联的思想阵营，就分析理由而言，颇为在理。一方提出理解当代发展的模式是福特主义(Fordist)到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或者新福特主义 neo-Fordist)的转型；而另一方则认为，我们正远离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的时代而步入弹性专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宰制的社会。在笔者看来，上述路径是对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思考中最系统化和影响最深远的理解方式之一。

上述两个学派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以自己的分析框架洞察这些评论家之间的分歧所在。在讨论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主张时，本章集中论述发源于调节学派的理论思想。调节学派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有经济学家阿兰·利比茨(Alain Lipietz，1987)、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1998)、罗贝尔·博耶(Robert Boyer，1990)，此外，还会加上几个独立分析的学者，特别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89b)、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尔里，他们就变化的主要观点与调节学派存在着不少共识。当谈到弹性专业主义理论时，笔者会集中讨论在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标志性著作——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的《第二次工业革命》(*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1984)

仅就本章的篇幅难以全面展示上述思想贡献的深度、分歧和差异，笔者只能作一简要追溯与概括，突出这些解释中信息的作用和地位。如此谋篇布局，不只是因为本书的主题是信息，也不仅仅因为信

息是组成这些假设转型的重要元素，笔者更希望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信息在当今社会的特征和形式。

调节学派理论

法国的一群知识分子(Boyer and Sailard,2002)开创并推进了调节学派理论的发展，他们在早期深受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影响，其中有数位健将，特色各异，有像米歇尔·阿格利埃塔这样的代表人物异于学派的传统思想，也有阿兰·利比茨对生态运动有着自己的独特回应。不过，调节学派理论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保持着密切联系，为了掌握某个特定时期的总体特征，调节学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习惯寻找社会关系的整体(holistic)解释。调节学派总是强调一系列的社会特征相互联系，从而维持社会的自身发展。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仅仅单独而集中地分析工厂或家庭中的科技革新，完全不足以理解社会的变化，必须把科技发展置于与其相互联系(interconnect)的因素中分析研究，比如政府角色、阶级成分、集体趋势、消费类型、两性关系的变化和功能系统的其他因素等等。

调节学派的基本问题包括：资本主义怎样保持它的不朽(perpetuation)？资本主义系统怎样实现有效的利润业绩和稳定地保持资本的扩张？按照调节学派理论的思想家的话来说，怎样才能可靠地进行资本主义的积累(capitalism accumulation)？他们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倡放任市场，资本主义会慢慢趋向平衡的论调缺乏兴趣，而调节派理论则坚持，除了依靠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之外，政府还应更为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我们可以论证任何系统都保持着一个动态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其不稳定性已根深蒂固，但调节学派却致力于寻找维持动态经济的稳定根基。这似乎有点古怪，简直就是一意孤行(Sayer and Walker,1992)。调节学派思想家承认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关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雇员总是希望从雇主身上得到更多的薪水，雇员与雇主间相互强有力的竞争意味着改革是永远必需的，因此雇员与雇主的企业接管是经济生活的

一部分。然而，他们还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些压力之下，资本主义如何才能继续维持发展？换句话说，调节学派寻求包容和控制不稳定性的方法，因此资本主义才能在这些变化中继续发展。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他们希望尝试探索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经济整体平衡观点以外的另类选择。①

调节学派的思想家寻找任何时候都能掌握全局的经济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他们计划确定主流的生产组织、收入分配方式、标准的经济部类划分和消费管理模式。他们尝试分析调节的模式(mode of regulation)，也就是"标准、习惯、法律和规则等网络确保(积累)过程的协调统一"(Lipietz,1986,p.19)。接着，他们可能会发现其中的"游戏规则"(rules of game)，以此引领我们去考虑如何从法律条例到教育政策各方面达成社会的控制。

调节学派追随者的目标是研究经济积累体制及其调节模式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学派内部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分析积累的模式，特别是它的构造变化。他们认为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十分熟悉的一系列危机(经济衰退、失业、破产、劳动力断层等)被新建立的经济积累体制所化解，新的积累体制代替了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发挥着稳定作用的旧体制。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变得不再牢固，它一直摇摇欲坠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且开始让位于后福特体制，后福特体制也可能会恢复和维持资本主义的企业兴旺。

接下来，笔者的内容将注意力集中于比较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经济积累体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讨论调节模式的内容减少，但读者应该会对其内容有所知觉(Hirsh,1991)。特别当他们阅读到20世纪80年代尝试构建后福特体制的内容时，读者可能会回想起那个时期的英国境遇——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

① 就某种程度来说，调节学派理论虽然有很多观念和想法都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但与其说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倒不如说它巧妙地把这些理念融合到保守派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功能主义的考虑，它确定维持资本主义的方法，并以某种方法删去了这个系统的粗糙边缘。

garet Thatcher,1979—1990)决定通过改变工会的合法地位以削弱罢工运动;修订学校和高等教育结构和课程提纲;重组地方政府;特别是主要的政府评议机构——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的废除(cf. Gamble,1988;Kavanagh,1990)等等。首相通过这些手段增强新的社会控制。

福特主义的经济积累体制,1945—1973

调节学派理论主张1945—1973年期间的特征——归结为"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Fordist-Keynesian)的时代,在此时期,许多相互联系的社会特征确保社会系统的总体平衡。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急剧扩张的时代,批量生产和消费都得到合理的平衡,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涉维持着社会和谐,政府福利政策支持着社会的稳定。

福特是技术生产的先驱,他以较低的成本制造商品,再以较低的价格售出以鼓励大众消费。同时他还首先支付工人(相对)高工资以刺激商品购买欲。因此,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整个系统。然而,福特的方法并不能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任何地方(Meyer,1981)。更确切地说,该术语源出于福特公司,特别是在二战后到达事业最高峰的时期,代表了其他发达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特征。与此类似,虽然凯恩斯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方针提倡政府对产业的干预以更好地管理事务,但"凯恩斯主义"在此的意义应以其典范性来理解,而不是建议不同国家的政府都用统一的方式处理国内事务。

"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时代有不少显著特征,本书将逐一讨论它们的意义。

批量生产

批量生产商品乃常规的生产方式。在诸如工程设计、电子商品和汽车等生产领域,作为当时以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产品,其制造都使用着同样的流程(流水线系统),它们以相同的模样被批量制造(电冰箱、吸尘器、电视、衣服等等)。典型的制造车间规模都很大,处于

较高水平的美国底特律福特公司拥有4万名雇员，即使是在1960年代后期的英格兰，牛津(Cowley)和伯明翰(Longbridge)的机动车车间也有大约2.5万名工人。既然各地具有经济效益的批量生产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经济力量，因此典型的工厂一般拥有几百甚至几千个工人。在英国，在1963年以前，私人制造部门整体劳动力的1/3都在一个至少有一万人以上的组织工作，超过七成的人在多于500人的公司工作(Westergaard and Resler，1975，pp. 151—152)。如此生产模式必然造就了一些以工业生产为特色的地区的形成(通常是一整座城镇或者一些特别的区域)：比如，德贝的铁路职业和劳斯莱斯工厂，肖登、柯尔贝和康塞特的钢铁工业，考文垂的摩托车和伯明翰的工程企业。

产业工人

在这个时期里，产业工人是主流的工作群体。男性蓝领工人占据工人群体的大多数，集中于制造业和采掘产业，体现出鲜明的地域和阶级成分，并对应于他们的政治联盟和政治态度。在1951年，男性体力劳动者组成英国70%的劳动力，二十年以后，它依然保持占总体的60%(Harrison，1984，p. 381)。在20世纪60年代初，从矿业到化学生产，大范围的工业活动覆盖了几乎60%的职业部门，但只有43%的工作属于制造业(Gershuny and Miles，1983，p. 20)。

各行各业的职员都加入工会组织，很多雇主意识到工会的力量，于是他们刻意将工会引导为制度上的管理，以控制劳动力和管理工人关系。就具体层面而言，工会的基本表述是劳资双方经过协议而达成一致的协商程序，而从高屋建瓴的层面来说，工会迈向企业主义(Middlemass，1979)，雇主代表、工会领导和政客会定期会面讨论劳工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此一浪潮登峰造极，首相和工会代表会在唐宁街10号定期召开“牛肉和三文治”会议，形成一致的社会契约。

首先，这可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兴盛时期，它意味着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充分的就业。除了少量的人以外，失业人口在英国基

本消失了，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2%左右。其中大部分属于“摩擦性失业”，这主要说明了那些失业的人只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去选择另一份职业，对大部分市民来说，也同时意味着社会稳定、可靠和令人充满信心。

大众消费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大众消费也成为一种常规模式，工资的（相对）提高、生活消费品的成本降低、充分的就业、分期付款业务和信用卡设备的飞速发展、广告的欲望刺激、时尚、电视或同类形式的展示和说服等因素都推动着大众消费。在1945年以后的英国，一个稍落后于美国的国家，普通的居民就能接触到过去社会缺乏甚至无法想象的生活消费品：如化妆品、个人卫生产品、时髦流行的服饰、真空吸尘器、合适的地毯、冷气机、收音机、电视和摩托车、汽车等等。到了1970年，九成的家庭拥有电视机，七成拥有冰箱，超过六成拥有洗衣机，而拥有私家车的人从1950年的230万人上升到1970年的1180万，超过一半家庭拥有汽车（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1983，Table 15.4）。

最重要的是，大众消费依赖于工人阶级对市场商品的购买，因为他们是社会上压倒性的多数群体，构成了商品销售的最大市场。当工人阶级进入商场时，他们就证明了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竞争口号——“人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过得这么好”。他们的生活确实今非昔比，因为过去高不可及的生活消费品已经降到了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价格（主要的消费还是“牛肉和烟草”）。

除此以外，大众消费成为维持批量生产稳定发展的轴心。在这个时代，稳定而持续的大众消费是生产发展的必要基础，同时它还能保证人们的充分就业。在福特主义时代，经济的兴旺日渐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以及借贷和信用关系），特别表现在汽车和大型家用电器市场上，并延伸至其他非主流市场的销售。坦白说，消费已经成为一股力量。

大众消费和批量生产之间的相互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两者

达到平衡时会出现一个有效的循环——持续的消费增长保证了充分的就业率，足够的工作推进了消费的膨胀。为了保证持续的发展，市场的整体规划和科学设计都必须与时俱进（每年调整汽车、新型广告工业、商场规划、折扣买卖和便捷购买方式的模式），但最重要的是保证人们充分就业和持续的收入提高。只要消费者需求旺盛（政府定期干预以确保消费者的需求增加），那么经济就能保持活力。

民族国家和国家寡占（national oligopolies）

在这段时期内，民族国家是经济活动的场所，经济活动通常由国家垄断所支配。在工业范围内的调查表明，无论是在电器、服饰、零售还是工程制造业等任何一个领域中，每个领域都明显存在支配该领域的三到四个龙头企业。在 1963 年，领导英国制造业的前五名企业就占了该领域全部销售额的 60%（Westergaard and Resler，1975，p. 152）。在 1960 年，英国制造业的百强企业完成了该领域 1/3 的产量，这些例子都显示了大型企业的控制力。此外，本土的公司对国内市场拥有坚定的控制力，到了 1968 年，英国制造业的 87%产量来自于本国企业。

事后方知英国的产业雄居世界，它控制了大部分的国内市场，鲜有竞争对手可以与之抗衡，其在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市场中运作，而且不断凭借纵向和横向的兼并手段拓展市场，以最大程度地控制市场，运筹帷幄，获利满满。

计划

计划（planning）在社会运作中的必要性已获认同（Addison，1975），福利国家的发展生动地证明了计划的重要性，而且体现为国家合理干预经济的正当性（凯恩斯政策）所得到的广泛共识。二战后，英国出现了国有化的浪潮，国家接管了大部分的能源和通讯业务，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保守党只交出了钢铁工业的私有权，其他如煤、石油、电力等工业领域，则不分党派，均获得所有权。调节学派理论认为这种协定推动了计划在生活各领域的广泛发展，同时也会

赢得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因为民众受益于政府提供的教育和医疗设施，这有利于维持福特主义系统的稳定。

不过，有关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的阐述涉及了太多概括性的思想，难逃评论家的诟病。比如，这一阐述把英国战后几十年的社会描述得太稳定和繁荣，低估了贫穷、冲突和经济不稳定等棘手问题的严重性。生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都觉得费解，这个时期被描述得太美好了，反对贷款的禁忌消失了，而英国的工业也似乎不会受到来自外国的竞争。再进一步看，对于北美和西欧的战后特殊发展经验来说，福特主义的叙述概括过于简单抽象，对于马来西亚、日本甚至意大利和希腊而言，对其应用价值的争论悬而未决。

而且，时代的划分也令人疑惑，我们并不清楚福特主义出现的准确时间。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建立了他的工厂，到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他的论文里原创性地运用了福特主义概念(Gramsci，1971，pp. 277—318)。而我们也清楚，英国落后于福特主义的领先国家——美国，但是为英国贴上政府干预这一标志性标签的固定时间——为什么不是1945年以前？对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例如，比较一下英国和美国的放任政策的分量)。

在本章的后面会介绍更多有关调节学派理论的批判思想，但在此，我们还是需要更好地理解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并把它与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社会经济趋势进行关联性考量。在1973年，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衰退和大范围石油价格的飙升，人们已经意识到，动荡发生了，福特主义体制难以为继。后福特主义体制，以逐渐侵蚀福特主义的趋势为标志，应运而生。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变化的中心是操纵、存储和运用信息的方式。

全球化

全球化是导致福特主义衰落的最主要原因，同时它也被视为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决定性特征。在近几年，全球化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家、政治和企业领导人控制变化时最常用的术语之一(Held et al.，

1999;Steger,2003)。全球化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正在漫漫长路的进程之中,远远没有达到其终极的状态,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快。全球化不仅涉及数量增加的国际化事务,同时它也意味着自治国家间的互动增多。全球化还有更多的含义——伴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生活的融合,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e)与相互渗透(interpenetration)。人们倾向于把全球化视为经济事务的根本元素,它表明了市场、流通和社会组织的紧密联系。事实的确如此,但全球化同时也出现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中,比如,移民和旅游活动的爆发性增长、混合的音乐形式和为了应对生存的挑战而提高对全球政治战略的注意力。

引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了自身的卓越成就——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同时深入了生活的私密领域。例如,资本主义的活动现在已经世界化了(它能马上到达过去孤立于资本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同时,资本主义很好地进入了儿童保护、个人卫生和日常食品供应的领域。此外,资本主义创造了覆盖整个地球的关系网络,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购买咖啡,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地方获得葡萄酒,而我们从当地购买电视,从完全不同的国家购买衣服,对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管理使世界融合为一体。简单地说,世界正成为管理各种关系的环境,即使是地方化和特别的个人生活也要融入其中(Wolf,2005;Bhagwati,2004)。

另外,作为全球化现象的关键基础是形形色色的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其全球扩张是全球化运作的核心,跨国公司已经成为20世纪的特征之一——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它在二战以前已经成为了国际化企业,但是,在近几十年公司跨国化飞速发展,国外子公司不断增多和拓展。到了今天,福特汽车在全球有超过5万家跨国公司。在1950年,北美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覆盖范围大都少于六个城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至今只有极少的跨国公司以如此小的规模运作(Dicken,2003,p. 50)。

我们很难全面掌握跨国公司的规模和范围,但可以用一个方法大概进行计算——当我们测量各个国家和企业所占的财富份额时,

跨国公司的资源占据了前 100 名实体的 50%。实际上，以经济实力来看，只有 24 个国家的资金比最大的跨国公司雄厚。商业周刊《财富》发表的数据证明，像大众汽车(2004—2005 年的收入是 1940 亿美元)、IBM(960 亿美元)、荷兰皇家壳牌公司(2690 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2850 亿美元)、花旗集团(1080 亿美元)和通用电气(1530 亿美元)等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Dicken，1992，p. 49)，跨国公司占据了 25%的全球生产总量和绝大多数的世界交易份额(Held et al.，1999，p. 282)。而且，它们内部有很高的凝聚力，最大的跨国公司在任何领域都能分到红利。例如，迪肯(Dicken，1992)指出，所谓的“十亿美元俱乐部”是为 600 家大型跨国公司而设的，它们为全球农业和工业产品总量提供了超过 20%的份额，在巨无霸型跨国公司中，“仅仅 74 家的跨国公司就占据了其中一半以上的销售额”(p. 49)。

跨国公司作为关键角色操控着全球化的运作和建构，致使全球化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特征，以下内容将会谈到其中最突出的特征。

全球化市场

全球化市场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主体将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它们将与所有的经济企业竞争市场和资源。不过，即使是在今天，以纯粹的全球战略运作的跨国公司较为少见(迪肯估计只有 4%—5%的公司采用纯粹的全球战略)，但毋庸置疑，这将是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球化意味着今天的市场比以前广阔，为了维持全球化现状，市场的拓展会将日渐受制于巨大的资源需求。然而，现在的市场比以前更崇尚激烈的竞争，因为达到国际化规模的大型公司会在全球市场中争夺资源。在过去，国内的市场可能会被本地垄断公司支配，但是过几年，国内市场渐渐被外来者侵占(当然，实力雄厚的本土公司会主动离开国土到外地抢夺市场)。这些建立全球化活动的新竞争者，将会比以前更具实力，且雄心勃勃、势在必得。时局的发展已一目了然——汽车公司正在全球规模中运作，销售活动触及全球。显

然，过去国内市场的赢家不可能永远稳坐太师椅。2005 年初，英国最后一家主要汽车制造商的崩溃便是最好的例证，十年挣扎，罗孚汽车集团(Rover)不断地精简机构和拼命寻找合作伙伴以维持公司正常的经济状态。一开始，罗孚汽车是英国航天工业的附属机构，接着它与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合作，最后被德国宝马汽车公司收购了。但是，这些举措都失败了，罗孚汽车在宝马汽车公司撤资后不久就正式停止生产。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罗孚的前身——英国利兰公司(British Leyland Motor Corporation)曾经是世界排名第四的汽车制造厂商。同样的情势出现在石油、制药、计算机、通讯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等各领域。事实上，今天各地的市场正日渐成为一个全球的市场。

世界市场大概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北美、欧洲和远东地区。而世界市场的其余部分在投资收益上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主要的跨国公司已经广泛地操纵着三大领域。此外，这三大区域的划分会让我们联想起全球化市场的另一种含义。在此，笔者稍微谈一下全球化企业的原型，也就是日本联合企业，它们通常缺乏国内根基(除了它们投资的国家以外)。就像本田汽车(2004 年收入 800 亿美元)、松下集团(810 亿美元)、丰田汽车(1730 亿美元)和索尼集团(670 亿美元)这类联合企业为了拓宽销路，都拥有清晰的全球战略。经过几年打拼后，这类日本联合企业在汽车、消费性电子产品、最新信息和通讯科技领域威胁着原本统治市场的西方企业。在汽车、办公室设备、电视机、摄影机和计算机等产品生产方面，来自日本的挑战动摇了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稳固的经济秩序。笔者需要补充一下，虽然跨国公司在本国内拥有更高比例的资产和雇员，但是跨国公司是超越国界的，它们的发展不会固定在同一个地点。

全球化生产

当公司不断被卷入全球化市场，它们一定会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公司事务，全球生产战略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主要特征。比如，某跨国公司把总部设在纽约城，在维吉利亚设计产品，在远东地区制造产

品，接着可能会在都柏林进行装配，最后在伦敦办公室寻找销售伙伴。此例稍微有些夸张，但跨国公司必须设计出这样的战略以最大化他们的收益，这是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一条不可以动摇的逻辑。

随着市场的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生产的发展再次把信息主题浮现于我们的眼帘。如果没有精妙的信息服务的帮助，我们又该怎样设定市场战略和组织全球性制造机构？本书稍后讨论这个问题。除此以外，全球化生产还会活跃迪肯(1992)所说的“流通活动”(circulation activities)，使“生产系统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p. 5)。全球性的信息服务业(globalization of information)的建立是全球化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比如广告业、银行业、保险业和资讯服务业等行业为全球化生产提供了“一个新近出现的基础架构”(Dicken，1992，p. 5)。例如，美国万国宝通银行、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劳埃德保险和美林资产管理集团都跨越国界，为跨国公司提供全套产业装备，它们的职业结构和策略取向都十分类似。

全球化金融

因此，银行、保险等世界性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内容。银行、保险行业的发展也就是全球化金融的发展，其内涵广泛，至少包括日益加剧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随着信息与传播科技系统的成熟，加上股票市场管制的解除和交易控制的废除，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进行持续不断的实时货币信息流通，进行全天候的股票、债券和货币交易。这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国际金融交易的数量和速度，致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易受货币市场的牵制和影响。

金融交易中的信息流通规模和速度相当惊人。在十年以前，威尔·哈顿(Will Hutton，1994)已经提出，国内经济规模和贸易流通(用进口和出口量来测量国内经济活动的传统方法)与外汇交易的成交量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 1993 年，世界商品贸易总额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但是外汇市场的成交量不到两个星期就达到同样的水平，而且还不算由此衍生的债券和证券市场”(p. 13)。乔易斯·科尔科(Joyce Kolko，1988)早已对此作出历史的

展望，他曾描绘出外汇交易在20世纪下半叶的线性增长。在1993年，《财富》杂志(7月26日)报道，美国票据交换所银行间支付系统每日平均交易额高达8 500亿美元，有时甚至超过1万亿(p. 26)。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每日1.5万亿美元，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此巨资的金额，匪夷所思。

全球化传播

横跨地球的传播网络是全球化的另一个层面，它与其他特征紧密联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化传播明显涉及科技的层面，像卫星系统、无线电通讯设备等等，本书后面有涉猎。但现在笔者集中讨论之前章节谈到的现象，也就是"符号环境"(symbolic environment)的构建。"符号环境"覆盖着全世界，并在很大程度上由跨国的媒体组织操纵。

"符号环境"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但在此笔者仅仅强调它所带来的信息宰制，也就是让人们产生一致的想象。例如，美国拍摄的电影，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放映，都肯定座无虚席，无论何时，世界电影票房的前20位肯定都是美国生产的电影，如《泰坦尼克号》(*Titanic*，1997)、《指环王：王者归来》(*The Lord of the Rings*，2003)、《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2001)、《星球大战Ⅰ》(*Star War Ⅰ*，1999)和《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2003)等票房最高的电影，紧接着还有《阿甘正传》(*Forrest Gump*，1994)、《黑超特警组》(*Men in Black*，1997)、《阿拉丁》(*Aladdin*，1992)和《圣战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1989)。每一部电影的总票房都超过5亿美元，而《泰坦尼克号》甚至高达20亿美元。在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美国，准确来说是在任何有电影院的地方，这些电影都是票房成绩的领军人物。尽管观众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和意向，但他们都共享着同一个符号环境，看着同一部电影。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电视节目、新闻媒介或者时尚产业。笔者并不是要过分夸大此类现象，因为国内主流媒体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Tunstall，

2006)，不过全球化确实带来了全球人类共享的符号环境。

虽然全球化传播对全球经济系统的运作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渴望洞察全球化传播对个人或者某个地方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电视肥皂剧使观众倾向于它所描绘的生活方式，广告具有极大的说服力，电影情节的安排会令观众向往，起源于洛杉矶和伦敦的摇滚音乐鼓励世界的年轻人寻找与表演者风格类似的服饰与食物，但这些都不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此外，这些全球映象总是会混合不同文化的不同元素进行传播，比如乌尔夫·汉纳斯(Ulf Hannerz)所说的“尼日利亚功夫”，因此它们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可是，如果没有这种符号环境的支持，全球经济的力量便无法持续。虽然可能符号环境自身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不过对于大部分贸易事务来说，它的确是必需的。因此有人可能会说，全球化传播起着支援的作用，但这种说法不仅不能完全适用而且自相矛盾，全球化传播在全球市场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无法再找出别的东西取代“品牌”在当代市场的核心影响力。品牌通过媒体宣传成为产品的联想和公司的形象，请考虑，像耐克、卡尔文·克莱恩、维珍等知名品牌符号的影响力，品牌的形象可能会被世界媒体的传播内容破坏或搅乱，但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品牌，跨国公司根本不可能成功。

信息基础结构

全球化的各个维度都需要促成信息基础结构的建立，以应对变化的压力和世界性的运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继续，控制信息(information)和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s)的方式也必须发展到位。我们可以指出信息基础结构几个主要元素：

一、银行、金融、保险和广告等服务业的世界性拓展是全球化的基础构成。失去这些服务业的支撑，跨国公司不可能运作。信息(有关市场、消费者、区域、经济、风险、投资模式、税收系统等等的信息)则是商业、工作的关键成分。这些服务业储存信息的同时，生产和分

配信息，它们通过分析、及时反应和整理为信息添加新的价值。

二、全球化需要建设和提高电脑和传播科技。在近几年，从传真机到国际化电脑网络，我们已经见证了信息科技的快速安装和创新，信息科技是协调全球企业的必要元素。

三、信息基础结构导致了信息流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据商业杂志《财富》(1993 年 12 月 13 日，p. 37)报道，连通美国或从美国打出的国际长途通话次数在 1981 到 1991 年间增长了 500 倍(从 5 000 万到 25 亿)。到了 2002 年，全世界的电话(全球超过 10 亿台电话)一直占线工作 4 万亿分钟(Lyman and Varian，2003)，这意味着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使用了 10 小时的无线电通讯(当然大部分的通讯量都集中在富裕的地区，实际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居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使用过电话)。另外，随着国际化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金融交易也得到了令人惊骇的扩张(不过它们都明显集中在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外汇兑换买卖、直接投资国外的模式和债券、证券市场都快速地发展，这一切都显示了金融信息的流通对国际市场的重要性。

福特主义的死亡?

全球化意味着福特主义已难以为继。当福特主义组织的前提——民族国家的力量，已被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流通所削弱，那么福特主义的其他元素还能发挥作用吗？福特主义依靠主权国家的权力和政府的能力在领土范围内颁布和执行政策，保护本土公司免受来自国外的竞争并区别对待国有企业，但这一局势已为全球化的市场所吞噬。目前，外汇交易和公司的全球扩张依然方兴未艾，生意蒸蒸日上。

国家对于生活的许多方面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比如法律和社会秩序、教育和福利等，国家依然是人民身份的核心成分，但至少在经济方面，它的重要性已经消减了。首先，跨国公司的突飞猛进遮掩了原本由某个国家拥有的成就。比如，有人会把通用电气公司和日立公司看作是某个国家的财产吗？这些公司往往被赋予国家的标

签，但是当它们拥有在国外大量的产品和投资时，我们就很难明确地把它们指定为英国的或日本的公司。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超过五成的制造业拥有较高的科技水平（电脑、电子产品等等）和大量的生活消费品（剃刀、咖啡、谷类食品等），但它们都属于国外公司的附属机构（Pollard，1983）。而那些在英国落户的工业，比如日产（桑德兰）、IBM（朴次茅斯）或者吉列（伦敦），它们到底属于英国、日本，还是美国？而英国50强的制造公司大约有一半的产量在海外，这个事实肯定打乱了政府支持“国内”工业的战略。通用电气公司对英国政府在1998年建立欧洲航空防务与空间公司（Euroco）的回应，生动地说明了确认跨国公司国家身份的困难。通用电气公司的发言人反对这个建议，他说：“通用电气公司乃跨国企业，同时也是美国的第六大公司。我们并不希望被视为英国的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会听见我们谈论欧洲公司的原因”（Guardian，1 June 1998）。

有鉴于此，我们不禁困扰丛生了。这些跨国公司应该对谁负责？如果它们在“原来国家”的权限以外进行实质性的投资，那么他们应该对谁负责？这需要解决所有权的问题，可所有权恰恰是一个相当模糊的问题，但我们应该知道，在全球股票市场交易中，跨国公司不可能由单独一个国家的居民拥有。私人公司依然需要对它们的股东负责，这个国际化的所有权摧毁了“国家利益”的概念和某些国家发展的战略。

而另一个破坏主权国家权力的方式来自于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运作所产生的压力（Sklair，1990）。如果主权国家渐渐远离作为投资者的商业决策而跨国企业则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大的资本回报，那么单独一个国家要加入或者与全球系统保持一致时，必然会遭遇巨大的压力。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2005）坦率地说：“我听到人们说，我们要停止全球化，并要争论全球化现象的正确与否，其实，你就像在争论秋天是否跟着夏天一样。”没有其他什么地方比金融流通领域更能尖锐地反映上述问题，当某个国家的政府尝试对纸币流通和投资作出任何不协调的行为时，马上就会遭受谴责批评。全球经济互相融合和渗透导致各国不得不改造自身以适应国际形势

的发展，结果“面对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事实，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很难保持自己的完整性”(Scott and Storper，1986，p. 7)。

大部分国家现在或多或少地都在热心地向跨国公司寻求投资，但其必要前提则是国家必须服从于按照市场运行的企业利益(也就是最大化企业的利益)，同时市场也不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国土内。因此，某个政府决定自己本国政策的自由往往被国外投资者的需求所限制。

此外，世界金融市场的统一削弱了单一国家的货币主权，无论何时投资者和商人都能感觉到国家货币主权的岌岌可危，此一局势就意味着政策的选择权和政府的权威已荡然无存，因为：

> 匿名的全球资本市场规则是政府信用价值和稳定性的最后仲裁者，它比国家选举人的意见要重要得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面前，许多政府都感到彷徨恐惧。如果他们不遵守……市场批准的政策，那么他们的债务和纸币就会被出售，为此，他们不得不面对一次可怕的紧缩政策。
>
> (Hutton，1994，p. 13)

在20世纪60年代中，来自工党的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抱怨那些炒卖英国货币的神秘“苏黎世侏儒”(gnomes of Zurich)。他们的行为迫使英国政府贬值英镑以降低公众的消费水平。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金融家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政策，国家与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整合程度决定了此类约束力的规模。

后福特主义

19世纪70年代曾经先进的资本主义饱受经济衰败之苦，再加之发展全球性公司战略的必要性，跨国巨头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全球金融事务对国家主权的侵害等趋势的联合作用，刺激了一个新积累制度的诞生，这也就暗示着在25年的平稳期后，福特主义已经走到

了尽头。如果企业希望维持它们的长期扩张，同时又要与它们所处的新环境达成妥协，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组织结构重组，而是一个根本的转型。

重组（再结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劳工组织发动攻击，最初从工会开始，接着渐渐扩展到集体主义的思维。劳工运动的传统是任何深层变迁的障碍，必然遭受攻击；另一方面，这些劳工结构象征着笨拙和固守陈规的福特主义时代。全球化和持续的经济不稳定需要迅速和全面的回应，但福特主义系统及其迟钝的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

有鉴于此，深刻的变迁前提是劳资关系的政策必须使工会运动丧失作用。在美国达成这一目标相对简单，尤其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里根总统摧毁航空交通管制工会之后，就鲜有抵制改革的运动了。在英国有一次颇为强大的劳工运动，但也遭遇政府名目繁多的手段的回击，如立法管治工会纠察员，并在法律上增加工会的资金依赖性；政府对空前增高的失业率熟视无睹，1979 年到 1981 年间失业率飙升 200%，政府依然无动于衷；对工人阶级组织性最高的制造业削减资助；最后，政府坚定地击败了各种以激进的方式来反对工业改革的尝试，其中最著名的 1984 年到 1985 年间矿工们进行的一次长期而艰苦的罢工，也遭受政府的坚决打击。

与打击工会政策相联系的是裁减劳动力，这是企业针对市场不景气所做出的必要措施。裁减劳动力从长期来讲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其一被资方委婉称为“精简规模”，它贯穿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许多成功的企业都证明它们能够实现“不增加就业机会的增长”（jobless growth）。后福特主义体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通过工人的额外工作或者新科技的应用达成资本的增长，有时甚至通过两者结合来实现。因此，许多公司的经济扩张往往伴随着裁员政策，这绝不是一种全球趋势，但是在世界上可以找到许多例子，例如，IBM 在 1983 年到 2001 年期间虽然收入翻倍，但依然裁掉了 400 万员工中的 25%，英国电信在十年收入飙升期间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第二方面常被视为后福特主义组织的显著特征，也就是企业渐

渐开始被纵向分解(vertical disintegration),企业倾向于通过与外部组织签订合约来尽可能多地满足公司的需求,而不是靠扩大企业内部的生产规模(也就是努力地实现纵向一体化)。外包(outsourcing)战略很好地与精简规模相适应,因为它只需要在中心企业中留下较少的员工,而且当企业裁员生产量也不会降低(不解除合作合约以代替解雇员工)。意大利时装生产商 Benetton 是最好的例子(Murry,1985):它利用 12 万工人生产服饰,但只有 1 500 人是直接雇佣关系。Benetton 的特约经销商(在 57 个国家里有 3 000 家)是外包的另外一个表现,如此经营帮助企业从担负编制中大量的长期固定职工的责任中解放出来。类似的战略被大多数主要品牌所应用,从麦克和西潘斯到麦当劳,无不利用这一战略获取利润。

只有当公司拥有足够的通讯基础结构和庞大的电脑设备以协调和控制分散的活动时,纵向解体才会切实可行。Benetton 大约有 140 个代理商,每个都被指派负责一个地理区域,它们之间应该怎样协调业务呢?因此通讯基础结构(除了科技以外,同时也需要一些员工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服务)是后福特主义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它强调着信息的重要地位。在之前的讨论中,笔者已经关注到信息基础结构的几个方面,但现在容我再强调一下它的几个特点:

1. 信息基础结构允许全球化生产和市场战略的和谐结合。一些评论家认为我们见证了"新国际劳动分工"(Frobel et al.,1980)的扩展,这是由分配人手管理生产、分销、国际性销售,并可在众多国际区域中进行协调的跨国公司所运作。例如,跨国公司的外部采办依赖电脑化交流,因为电脑化交流让组织能不间断地观察供应者和分销者,而不需要在组织内聘用大量的员工,也只有在一个复杂的信息网络的基础上,全球企业计划才能实行。更进一步说,在我们上面提到的重组过程中,它所有的层面,特别是它的"全球选择"(把产品运到马尼拉,补给到布拉格,进入莫斯科市场并在科克获得一些设备),"如果离开了信息技术特别是电信的发展,会变得无计可施"(Henderson,1989. p. 3)。

2. 信息基础结构在处理全球金融贸易和同类的信息服务上是

至关紧要的，这些都是全球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离开了可靠和健全的信息网络、巨大的产量和迅速的贸易共享、股票市场的交易、银行内部和银行与客户间的沟通，以及相关活动，会变得无法进行下去，也因此，信息网络成为后福特主义的经济积累体制。

3. 信息基础结构在改进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是关键，它不但能够通过提供精确的检测和有效的控制来提高生产效力和效率，还能经常地引进一些新技术。这些新技术不仅具有成本效应，有的还能提高生产质量（比如正在进行的自动化和机械化、计算机数字控制和办公室的计算机化）。

4. 信息基础结构是在一个更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提高竞争力的一个必要条件。企业要在竞争中处于更领先的地位，拥有前沿的技术是关键。过去的工业大王帕特里克·詹金（Patrick Jenkin）说过，现在的选择是“自动化或破产”。但是改进竞争优势的压力远不止是在车间中拥有尖端的计算机技术。企业网络的发展和运用同样重要：企业内部或者企业之间的网络可以提高效率，企业子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网络可以根除劣势建立优势，企业的市场网络可以抓住机遇。成功的企业在车间中实现高度的自动化并生产着最好的产品，它同时拥有一流的提供出色数据库的网络（其中包括了内部运作、真实和潜在顾客以及其他可能与业务密切相关的资料），并且能够快速地处理它所拥有的信息。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89b）把这些作用看作是“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结果（p. 284）。几个世纪以前，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起，转变进入了特别活跃的时期，从前约束空间的限制已大大降低（信息网络使企业可以跨越遥远距离协调它们的利益），时间的限制也开始松动（实时交易在全球网络时代中渐渐成为一种规范）。过去遥远的异域，需要耗费很多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只要想想一个世纪以前到达美国需要多少时间，或甚至从伦敦到巴黎），现在通过传播与信息科技就能立刻连通两地并能持续不断。理所当然，快捷运输方式的拓展成为时空压缩的一个重要元素，尤其是航空业的发展，只不过是十

多年的时间，飞机航线已经使大陆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除此以外，复杂而全面的信息网络日新月异，这些网络能够细致和持续地精细化管理而不需要过多地担心时间的限制。在21世纪早期，人们开始思考“时间—空间压缩”在生活上的意义。比方说，人们会想，如果超级市场供应全球各地容易腐烂的水果和蔬菜，那么人们全年都能吃到各种蔬菜。相同的想象可以应用到微芯片、冰箱、衣服甚至书本的生产和供应上。最不可思议的是，大量的电话呼叫中心落户在像苏格兰、巴哈马群岛和班加罗尔如此偏远的地方，虽然呼叫中心远离了公司总部和顾客，但是依然具有成本效益和快捷的活动监控优势。

上述特征都暗示着一个在所有有关后福特主义的描述中都强调的性质——弹性(flexibility)。虽然大部分独立思考者在理论阐述的细节上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在定义的范畴中，弹性很快成为标准。弹性作为一种规则，与臃肿的、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福特主义体制截然不同。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弹性的一些普遍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与福特主义的特征正好相反。

对于受到调节学派理论影响的思想者来说，“弹性积累”制度与之前的制度在如下三个方面有所不同。

1. 一个新的雇员弹性制度(flexibility of employee)。也就是说，后福特主义的工人不会受到工作类型的束缚，同时他们也不希望某一职业就书写了人生所有的工作生涯，与“分工争议”和就业“从一而终”的时代不同，今天我们把适应性看作是核心品质，与“多技能”一起成为员工的就业常规。由于新时代变化的不断持续和“终身培训”计划的实施，弹性成为职员的首要原则(Mcgregor &Spoull，1992)。工作和培训的方向只是弹性的一个方面，还有收入的弹性(wage flexibility)(根据个人干了什么来付工资，而不是固定在双方同意的协议或统一的国家薪酬标准上)、劳动力的弹性(labour flexibility，准备每隔几年就改变工作，根据确定期限的合同聘用员工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以及时间弹性(time flexibility，为了充分利用“弹性时间”、减轻转换工作的压力以及消磨周末时光，兼职性职位数量在快速地增长)。

2. 弹性生产(flexibility of production)。支持弹性的主张认为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已过时,多亏了信息网络,更全面的、成本效益更高的生产方式如“即时生产”(JIT)系统产生了,该系统使工厂可以在拿到订单后才开始生产,节省了很多库存空间,当然还减少了待售产品。顾客不会为想要的商品等太久,为了快速响应顾客要求,系统的运行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因此,市场竞争者十分重视弹性,并促使公司投资构建可以传递弹性的信息系统。弹性生产的另一方式是前文所述的纵向分解趋势。显然,转包合同的广泛使用让公司可以轻松做出更换提供者和产品的决定而无需承担解雇自己员工的压力。

3. 弹性消费(flexibility of consumption)。与批量生产、批量消费的福特主义时代相比,现代的电子科技允许工厂提供更多元化的产品。现在短期运作成本效率更高,因为电脑技术给生产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功能。此外,消费者排斥福特主义产品的统一模式,寻求多样化的产品,来表达他们个性化的生活风格和倾向。多亏了信息和传播模式,在后福特主义的新纪元,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产品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最起码的满足。

我们需要明白,弹性的元素实际上或多或少相互交织。一个典型的后福特主义企业组织在接到顾客的订单后,就会将其特殊的要求发送到工厂,机器设置好生产程序,配备复合性人力资源到需要适应性的快速生产中以满足个人独特的要求进行组织计划。我们同时要注意,在每一阶段,信息处理、设备和配送方面是衔接在一起的。从下订单到供应的整个过程中,一个全面和复杂精密的信息网络是所有工作的前提。

伴随着这些趋势,在后福特主义时代中,批量生产不断式微。集中化的大型工厂逐渐隐退,出现了分散在全球的(拥有高科技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最多只聘用几百个员工,不过母公司则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更多的据点。在大城市中心,跨国公司不断进行国际性重组,促使产品流通到国外和市郊。同时银行、保险和商务服务公司的职位迅速增加(在英国,它们的数目是 1970 年的两倍),它们在关键的市区商圈提供着不可或缺的信息服务。

这些趋势也就预示着在诸如英国这样的国家，职业类型将发生深远的转变。男性产业工人已失去往昔的资源配置优势而显得落伍，工厂工作模式开始成为博物馆中的展览，取而代之的是短期合同契约雇用的女性兼职员工在服务行业中兴起，她们没有终身保障。约从1970年开始，尤其当女性进入了“弹性劳动力”的行列后，制造业工作似乎不可避免地逐步衰退(Hakim，1987)。到20世纪90年代，只有1/4左右的工作是属于工业的，同时现在服务业占据了70%以上的工作职位，其中大多数的职位由女性来担任。相应地，我们感觉到联合劳动力在大幅度衰落，这是因为社会正试图组织一种新型的雇员模式。此外，在许多公司开始裁员，只留下一组核心的永久员工，并利用外围劳动力增加组织的弹性(任期不定的兼职者)，就是所谓的“临时劳工”(contingency labour)(聘用仰赖于经济环境的好坏，一旦时局不稳，立即解雇)。据统计，“临时劳工”占美国劳动力市场的25%。在工作中，全才越来越受重视，以信息为导向的员工、管理群中的上层阶级的数量正随着企业结构重组和全球化趋势而增加，甚至较底层的“信息工作”在牧师、售货员、秘书等范畴中也持续扩充。

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也改变了地理区域，打破了人们在工作、阶级、政治面貌中原来截然不同的领域界限。制造业的衰退和服务业的发展已成为职业性别转变的契机，也为北方的居民提供了流动机会。这种形式在美国更为显著，人口从铁锈地带(Rustbelt)向阳光地带(Sunbelt)稳定地转移。即便在英联邦，我们也能看到就业机会和公司在南部增长，而其他区域的就业则遭受重挫。

紧随而来的是政治和社会态度的急剧转变。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其团结的工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情怀，对于后福特主义的居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再度复兴的个人主义和“市场魔法(magic of the market)”，市场宰制的时代替代了已经失去信誉的战后计划年代。历史学家肯尼斯·摩根(Kenneth Morgan，1990)更进一步提出，“如果要讨论英国公共生活中遭受重创者……那就是计划的精神特质”(p，509)。随着变化的迅速和放任主义在新时代的运

作，集体主义和工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将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连阶级语言也黯然失色。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家的核心概念已不再具有标志性（“告诉我你的阶级，那么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倾向、工作、教育期望……甚至性习惯”），今天人们对阶级界限、冲突以及不平等现象的兴趣逐步弱化了。这些社会现象已成往昔的追忆，也就在20世纪60年代，艾伦·西利托（Alan Sillitoe）所写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共鸣，书中描写的单调乏味的北方工业生活，在现在看起来已经相当过时。最好的社会学家继续想证明阶级依然很重要，但即使他们努力去识别一些仅仅一代人之前的语言方式，依然不能有效理解今日英国社会的多样性和不平等。

不过，一些知识界依然对底层阶级（underclass）感兴趣。这些底层阶级居住在城市的隔离区，它们明显被看作是从社会大多数人群中分离（detached）出来的小群体，独立并具有自身连续性（self-perpetuating）。底层阶级与拥有大量贷款、以自我和以工作为中心的大多数居民无所关联，即使在奉公守法的过往者看来，他们仍然碍眼。有趣的是，近来英国一些更激进的阶级研究来自于极端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他们热衷于坚持阶级分析，不过，他们的分析大多数忽略那些在后工业社会没有股份、被抛弃、来自异域并集可怜、忧虑和谴责于一身的底层阶级，他们是现代社会系统的边缘群体。

坚持通过不同的生活风格来理解人口的大多数，乃司空见惯的手法。在后福特主义制度中，阶级分类和与之相关的共同文化（男性的工人阶级：工作、社区、俱乐部、同伴、鸽子、足球、马、啤酒）黯然失色了，已让位给生活方式的分化（differentiated），也就是上述的选择、机会和生产的顾客至上，一致性和共同性被个人和社会群体中的多样性取而代之。

一些评论家坚持这一倾向会导致人们身份的碎片化，使其失去了稳定和满足，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开启新体验和机会的民主力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也激发了对前景的预期。但无论这两种认识如何迥异，两者都认同后福特主义的境遇——不同生活风格的新个人主义所向披靡。而阶级（阶级被指责仅仅是社会学家玩弄研究

题目的建构产物）不仅不能作为各层面态度、行为的预测标准，同时也失去了动员人们参与政治、工业活动的基础力量。

在此，我们再次了解信息和信息流通如何在后福特主义体制中叱咤风云。随着福特主义从以生产为导向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系统转变，社会不仅减少了产业工人的数量，而且产生了更强的个人主义和以消费为中心的个人，信息在个人生活中必然承担了更重要的角色。首先消费者必须找到什么是可以用来消费的，其次拥有个性的个人渴望通过消费来表现自己。这些因素相辅相成，促进了信息的增长，前者是因为它涉及产品和服务的广告和促销（找到消费者的信息），后者包括了消费的符号层面——人们用事物和关系去展示自己，从而生产出更多信息。

赖克主义

赖克主义的主要观点源自于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1991），其论著《国家工作：准备迎接21世纪的资本主义》（*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对此有重要阐述，该研究之所以望重士林，不仅在于其雄辩地说明了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后福特主义的共性，同时因为作者的显赫地位——当时赖克即将上任劳工部部长，他从1992—1996年在克林顿内阁任职，其对新劳工的崛起现象与“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思考非常深入，见解独到。在20世纪结束之际，赖克的影响相当深远，新劳工政策就是其点睛之笔。赖克认为近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影响最深的不是在信息传播科技研究领域，而是在人们处理、分析和分配信息的能力上。

学界围绕赖克关于经济行为的基本规则已经改变的主张展开激烈的争议。赖克提出，那些曾经一度对美国公司有利的制度，实际上是有利于整个美国，因为它们的产品集中在国家内部（为美国人提供了工作），但全球一体化转变了这一得天独厚的状态，今天，制度不再可能为截然不同的国家经济提供任何精确的参考。如今的资金和产

品的流动性致使“‘美国经济的独特想法’失去了意义，随之改变的是美国企业观念、美国资本、美国产品以及美国技术”(Reich，1991，p. 8)。现在，经济运作不考虑国家的边界，它通过被赖克称为林林总总的“全球网络”连通所有国家一同运行，这个网络包括无数不同的股东控股公司组织之间、公司内部甚至跨公司的各种关系。

由全球化推动，企业的垂直解体(vertically disintegrating)经历了行政系统层次的瓦解，在一系列“精简机构”(downsizing)事件中见证了上述过程，中间管理层在企业“重构”中也被剥离。作为高效的行政组织，那些在社会和商业中长期形成的信条是组织有效性的必备要求，因为规则和程序结合卓越的高层指挥，就是行政组织顺利运作的根本。但如今，这些信条都被削弱了。全球化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不允许如此笨拙的规划，公司的竞争力也不能容忍官僚层级的浪费，结果就是中层管理人员随着权力机构的提升而被裁决淘汰，只留下能够在新世界中成功的人。

批量生产向高价值产品和高端服务业转变已成为趋势，这激发了差异化、变革、经济问题上的知识贡献，以及人们更专业地工作，因为差异化市场推陈出新，新颖的产品屡屡问世，符号的引入和/或技术精密性令人目不暇接。

批量生产的福特主义时代正让位给一个全球化的、不断的差异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弹性市场，此市场能灵敏地感应市场需求，产品不断地加强知识化和信息化。例如，衬衫的设计(而且营销与之相对应)变得比实际用于生产的材料更有价值。另外，在全球市场上的运作刺激了某部分能力的提高，该能力包括了跨越全球来定义细分市场，及时敏锐捕捉市场机会，通过巧妙地算账或管理技巧来减少成本，一切能力都是为了把资源优先分给最有可能增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仅仅有生产的能力是不够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增加产品价值和/或组织的成功。如此迈向高端价值的转变增加了生物技术、媒介产品和计算机软件等被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1996)称为“智能产业”的作用，因为此乃全球经济中唯一确定的赌注。在全球经济中，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单凭这点不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优

质的新产品，因为在产品的最初设计和开发之时已确定了最小化的成本。

上述因素导致了某些职业的优势——那些跨越全球网络管理和控制的职业，那些能够提供设计强度的职业，以及那些可以通过科学优势、创造性的技术、财政的敏锐度甚至有效的广告给产品和服务提供高附加价值的职业。

根据罗伯特·赖克(1991)的观点，他定位为“符号分析者”的人占据了总就业人数的20%左右，他们团结一致提升“企业网络”，属于“不断忙碌于管理想法”的人(p. 85)，符号分析者占有21世纪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智力资本”且“通过驾驭符号来解决、识别和协调问题”(p. 178)，他们扮演提取概念、系统思考、试验和协调的角色，在银行、法律、工程、计算机、会计、媒体、管理和学术界等行业工作中，符号分析者是问题解决者、问题确认者和战略协调者。

所有上述工作的共性是信息化，当然它们在特殊领域里各有千秋，不过准确地说，在持续与狂热变化的世界中，符号分析者的工作发挥操控的作用，他们最伟大的能力在于其高层次的弹性，也就是运用其推断的能力去适应崭新环境的才能。信息化劳工总是能够重新训练自己，对其所在领域最新思想保持警觉，在流动性的市场中时刻关注时局变动，留意公众感受的异同，能够持续改进产品。

所以训练有素的符号分析者往往不在固定的公司架构中永久地从事一个职务，而更趋向以短期工作和顾问的职位在项目之间流动，并利用他们广泛的网络和更新的知识来确保效率。信息化劳工的特点是从一个研究项目转到另一研究项目，从一个市场合同转向另一个市场合同，从一个媒体任务转向另一个媒体任务。他们倾向于量身定做“(项目部)部长”生涯，而不是追求在某个企业不断延长行政化职业生涯(Handy, 1995)。

一定程度上，因为社会碎片化的增加(Hutton, 1995)，符号分析者的职业规划可能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但这一发展有更积极的方面。例如，派卡·海曼(Pekka Himanen, 2001)设想出一个“黑客道德规范”，属于新教徒工作道德规范的当代版本，新教徒工作道

德规范曾经鼓励了许多工业资本主义制造者。曾几何时，新教徒以君主的名义完全致力于工作和工业扩张，而现在的“黑客道德规范”结合了开放和无层级的反传统文化观点，并承诺创造改革和随最新科技改变的义务。到达极端时，“黑客”会卑屈地致力于生产一款软件、一件工具或一些新电脑游戏。与此关联的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7)的主张，他认为今天成功的“扁平型”组织授予雇员权利，其可以在他们拥有的自治中找到满足感，同时可能会逐步减少他们对组织的义务。事实上，这些拥有高级技能的自由工作者与志趣相投的人在一些特殊的项目中相互磨砺，可能会激发出“社会资本”，因为他们通过对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忠诚联系成整体。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2005)重申“扁平组织”的出现带给人们独立的空间，那些志趣相投的人将群情激奋，热衷于信息的自由交流。

自 1997 年起，英国首相开始分享这些积极的理解并定期表达他的乐观主义，如此一来，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2005)坚持“在快速全球化的时代中，工作已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身处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时代，为了保持竞争性必须随时准备变化”。在这个全球化世界中，布莱尔首相拒绝在低收入的层面上竞争，他坚信“知识、技术、智力(以及)才干，英国只有释放这些元素才不会造成负累”。他的信念比其他主要政治家的评论更体现赖克主义。

后福特主义的问题

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的理论在知识界受备受关注。某些学者对此最初的兴趣是为了解释英国左派无法获得选举支持的现象，他们认为由于投票人都十分反感工党过时的形象，投票者反复地(在 1979 年、1983 年、1987 年和 1992 年)拒签集体认可。其中肯定有什么原因导致了失败，毕竟，从 1945 年到 70 年代末，人们一直都支持着工党，究竟为什么造成支持者众叛亲离？人们普遍都意识到一场改革正在迅速进行——传统工业生产大量过剩，新的工作层出不穷，

新的科技如雨后春笋涌现，交易速度急剧提升等等，许多评论家相信世界日新月异，因此即使有大量的著作强调这是一个“新时代”(1988)，人们也见怪不惊了。

然而，要把对“新时代”的重视和后福特主义的内容联系起来异常困难，确实，社会经历着深刻而系统的改革。那么，你能总结出什么特征来说明后福特主义与过去的社会有明显的不同呢？事实上，从生产管理、阶级结构、消费方式、工作关系甚至到概念本身，后福特主义各方面特征的展现方式都明显地区别于福特主义时代(cf. Hall and Jacques，1989)。

有人会注意到，后福特主义和第三章中贝尔保守的后工业理论巧妙地一致。虽然这两个理论来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传统，但是在区分现在和过去的方法上、描述新时代到来的形式上，两者都有着高度一致的看法。克里夏·库马(1992)竟然把后福特主义视为“后工业理论的译本”(p. 47)，因为它们都有着非常一致的主题和倾向。

如果要反对以上的想法，我们必须记得调节学派的后福特主义版本承认私人财产、市场标准和集体优先权都拥有着支配地位，资本主义的普通形态依然适用。因此，“新福特主义”强烈号召人们把社会连贯性放在首位，而不是拔高变化的影响，这种做法切中要害，也就是说，新福特主义是竭力重建和巩固资本主义，而不是废黜资本主义。

对福特主义最强烈的异议主要在于反对其概念倾向——着重强调变化而不是连续性，这让理论的追随者各自分道扬镳(福特主义或者后福特主义)。他们将历史的过程过度简单化的同时，又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连续性。在此，受篇幅所限，不宜扩展驳斥的理由，所以仅就几个更有说服力的批评来讨论：

一、福特主义所描述的平衡状态与 1945—1973 年间的情形相差甚远。例如，从 1950 年开始到 70 年代中期，英国 1/3 的农场工人失业(Pollard，1983，p. 275；Newby，1997，p. 81)，这是当时农业问题的重中之重，但却没有一个社会理论探索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

在后福特主义中，也有同样的例子。例如，后福特主义坚持阶级政治已经过时了，因为工人阶级（主要是指体力工作者）正在消失。我们清楚地记得，产业工人阶级在大部分国家中一直都是少数群体，只有英国例外（而且曾经有一段很短时间工人阶级组成了社会的大多数）。在大部分的现代历史中，体力工作很大一部分由农业工人担当。比如，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农业工人占据了25%的工作人数，比在煤矿、交通、建筑和工程领域工作的工人总和都要多（Hobsbawm，1968，pp. 283，279）。自从农业持续衰落后（现在在职业总数中，农业只占据不到3%的份额），工人阶级（也就是体力劳动者）内部开始了结构重组的历史（Miliband，1985），某些职业人数在上升，相反有一些则在下降。

事实如此，接着我们会对那些评论家所作出的结论感到疑惑，为什么白领工人的增加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终结？这其实取决于每个人的定义标准。非体力工作者的队伍扩大的确有特殊的意义，但如果我们决然地把他们区别于工厂工人，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在世纪之交从农业劳动者中分离出来的工程维修工，这未免也有点太武断了。而且，当我们回想起体力劳动行业的分类时，会发现工人阶级并没有出现过像福特主义分类学所说的同质化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尽管体力劳动者压倒性地占据投票人的绝大多数，但保守党仍持续处在优势地位。

总而言之，体力劳动与工人阶级看似同质的综合体，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的建构，这也就暗示两者间的聚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犹如工人阶级与白领（中产阶级呢？）阶级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最后，我们会记得体力劳动者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并没有要消失的迹象，在今天的英国，体力劳动者还占据着总体劳动力的一半。

二、后福特主义削减了大量的工厂工作并把资源转移至金融或休闲娱乐等服务业。在经验上观察，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是在第三章中，我们知道要把这种想象标志为一种深刻的变化是很困难的。相反地，由于劳动力分离而引起的服务业扩张是为了创造更多有效

的资本运作。

三、后福特主义一直强调消费，但这一论点实际上备受抨击。下面列举几个鲜明的批评观点：

(1) 至少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消费就已受到了关注，当时，工业技术已经开始大范围地制造生活消费品(McKendrick et al.，1982)。从长远来看，近期的发展象征着消费趋势的加速，但它绝对不是"从生产到消费"的震撼性变化。因此，后福特主义所描述的新事物又再次受到质疑。

(2) 后福特主义认为，消费赋予了人们个性化(重视差异性)，相应地，今天制造商提供个性化产品的能力也在提升，而此论还有待证实。

围绕该论点的论争与批判层出不穷，最主要原因在于当今社会，大众消费和批量生产依然继续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电视、汽车已经诞生，可是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见汽车，同时我们还有电脑游戏、唱片机、家庭电脑、洗碗机、合适的厨房、平装家具等等象征着最新批量生产的生活消费品(这些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其他领域的商品销售)。当然，更多的生活消费品出现在今天的社会，它们稳定地在传统的批量生产内部增长。但生活消费品完全是标准化的物品(以模板为基础设计生产)，这就预示着购买者有相当大的同质性。

此外，后福特主义断言，大众消费与个人主义格格不入(20世纪50年代沉闷呆滞的个人形象还记忆犹新)，此论相当可疑，至少在今天，情况并非如此(一代人以前也同样类似)，对批量生产的商品，因其不同的使用方法而加强了个人的个性化感觉。例如，人们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衣服配搭以彰显个人品味。生产消费品的模板化生产是供应厂商的一个战略，他们竭力把消费者选择的欲望控制在一个框架内，以维持批量制造。

当人们观察到批量生产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时，他们自然会思考批量生产在组织企业部分的作用。后福特主义理论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就是当代经济生产的弹性特征，它为小的、成长飞快的、

创新的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机会，同时也给予小企业的强大竞争对手得天独厚的机遇，因为大企业可以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更迅速的反应。

我们应该看到，近五十年来，拥有悠久历史的公司正在不断地膨胀和扩大。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跨国公司一直天赐良机，无论它们在哪里运作，它们一定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优势，举目眺望任意一个先进领域的市场经济，此现象无处不在——如电脑、汽车、无线电通讯、大型家用电器、音响系统、家居等等产业。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事实是，在20世纪前半叶，许多优秀的公司在全球化经济的最前线依然保持着它们的领先地位，比如福特、通用电气、壳牌石油、西门子、宝洁、奔驰、可口可乐、凯洛格、IBM、英国化学工业公司、柯达、飞利浦、大众汽车和菲亚特汽车公司等等。这说明公司在二战后（甚至是二战前）的历史都有着根本上的继承连续性（最多是变更了新鲜名字或者合并公司），那么还有人要说什么“后”之类的发展？所以，如果要给社会变化定论，不得不深思熟虑一番，不可信口雌黄。

而且，并没有证据说明各产业巨头的批量生产活动不能回应或者营造消费者的差异性。跨国公司采用新科技，加入全方位的市场销售，他们已经对“批量生产多样化驾轻就熟”了（Curry，1993，p. 110）。后福特主义理论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其认为跨国公司因为某种不确定的原因而无法迅速回应地方和个人的特别需求。但全球范围和本地反应在逻辑上是没有冲突的（Harrison，1994）。事实上，机灵的市场商人利用互联网上的信息武装自己，然后他们就能准确地针对全球消费者组织生产。也因如此，在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所说的“弹性的跨国公司（flexible transnational，p. 27）”中，全球性政策和本地反应都能很好地协调一致。还有一点，与小的机构不同，跨国公司拥有特别强大的灵活性，以雄厚的资源为支撑，跨国公司可以收购一些具有潜力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会代替跨国公司革新产品和管理细分的市场。

后福特主义的主旨在于否定福特主义，其认为福特主义不能准确描述当前资本主义企业，但事实并非如此。远东批量生产的兴旺

不断威胁着欧洲和美国的公司，这让那些批判福特主义不再可靠的人更加迷惑了。此外，资本主义企业垂直解体的例子证明——主流的跨国公司倾向以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来追求企业最大化的控制力。

弹性专殊化

有关后福特主义论点的批判，颇有分量，但后福特主义理论家却据理力争，至少那些受调节学派影响的理论家会坚持，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整个新的系统，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体制的转型。他们的分析确实有含糊不清的部分——什么是连贯性？什么是变化？连贯性与变化间的平衡点是什么？但多数持此论点的学者开始从广阔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思考问题，他们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他们往往能够辩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然存在，他们需要确认另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企业模式。

不过，还另有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学派思想，它从更集中的方向开始研究，展示了后福特主义的变体，确认了过去与现在的断裂。迈克尔·皮奥雷和查尔斯·萨贝尔(1984)集中于研究工作(用学术术语来说，是劳动过程)，他们开创性地提出了弹性专殊化/生产能够普遍地改善生活方式。此外，因为这种理论特别重视信息/知识在后工业主义中的地位，因此我们要把这种理论与一般的调节学派理论相区别。

在福特主义的时代，当批量生产支配生产领域时，制造批量的标准化产品需要专业化的机器和低技能的专门化劳动力。只要想象大工厂的生产装配线，任何人都能轻易地描绘出这幅图景。在那时，泰勒技术(准确的时间和动作、分等级的监督、由管理阶级严格控制运作和精细设计每日例行工作)、半熟练和毫无技术的劳动力成为典型的必备条件。

因此，下文将回顾皮奥雷和萨贝尔的观点。他们主张在19世纪末爆发的批量生产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

业革命”。与福特主义的重复而低技能的劳动力相比，职工技能的提高和多样化的商品生产需求是“弹性专殊化”最根本的变化。弹性是新时代的基调，它已经在意大利的艾米力亚—罗马涅地区引起共鸣(Sabel，1982)，它预示着蠢笨的劳动力将会回归到精巧的制作方式。皮奥雷和萨贝尔(1984)甚至梦想“自耕农民主”(yeoman democracy)的复兴，一间小型的合作企业就能对市场机会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回应。

他们提出三个主要原因推导出弹性专殊化的诞生。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初，劳动力不稳定的状态鼓励公司分散它们的生产活动，比如，增加它们的转包合同并从公司内部生产脱离出来，此一转变刺激了那些技术成熟的小型公司发展。这些小型的公司通常是由大公司重建，被置换出来的人力另行计划而创建的，它们渴求工作、先进技术和适应性。其次，市场需求明显地变化了，消费者的口味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这为那些小众的高质量的细分市场提供了机会，在那些细分市场中，弹性专殊化有更好的适应性。最后，新技术让小型公司更具竞争力，因为经济规模的优势削弱了，而由于现代电脑的灵活性，技术型的机构开始最大化它们的多功能性。除此以外，新技术通过合适的程序会变得更具延展性，它能马上为那些发展迅速的小型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和固有技术升级，因为这些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恢复了人力操控”(Piore and Sabel，1984，p. 261)。

这是对弹性专殊化理论的简要概括，在某些版本中，弹性专殊化与日本的看板(kanban)系统(准时制，just-in-time)和全面质量检验相一致。本书就弹性专殊化的两个主要层面来论述。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关弹性专殊化的各种不同观点。布雷弗曼·哈里(Harry Braverman，1974)曾经提出，资本主义的进步导致了劳动力技能的逐步丧失。虽然哈里的论点在过去很流行，但相当多的学者也驳斥他的观点，现在许多思想家反其道而论称弹性专殊化已经来临，这是一个以提升职员技能为重点的时代。在英国，支持弹性专业主义的思想家，包括经济学家约翰·艾金森(John Atkinson，1984)，他早期的研究显示政治和商业领导者急需弹性的劳动力

以应对竞争压力和经济衰退，“弹性公司”正好适应了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Atkinson and Meager，1986）；还有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和乔纳森·莱特林（Jonathan Zeitlin）等人，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指出，只要人们接受“互相合作”与“互相协调”的生产模式，并且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存在着必要的“最小限度信任”（p. 447），弹性专殊化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在大西洋以外的地方也有许多相应的代表人物，如激进的批评家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1990），他发现“后工业机会”会带来“更高的技术水平”（p. 103）；还有哈佛商学院的肖沙娜·朱伯夫（Soshana Zuboff），他提出“意义深远的再技能化（reskilling）”（p. 57）会得到不断地发展。

接着，我们要阐释信息在弹性专殊化中的关键作用。信息作用的一个面向是生产工作，正如许多论著集中论述的一样，信息传播科技是弹性的表达形式和促进者。新科技是“智能的”，因为它们聚合了大量复杂的信息。操纵程序是它们的基本构成而不是它们执行的任何特殊功能。因此，输入的信息决定了新科技的弹性和工作能力。比如，具有成本效益的小批量生产运转、专用化生产和制造程序的迅速变化。此外，信息元素也为劳动过程提供了弹性，为了操纵信息，劳动力必须掌握多种技能和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因此，劳动也变得更具弹性了（劳动本身也促进了信息的作用）。在以前，雇主只需要掌握一整套生活管理方案，而在信息科技时代，当新科技出现时（甚至程序改编），雇主必须尽快地更新自己的技能。这种“信息广度”（Block，1990，p. 96）意味着，按照信息作业的要求，雇员必须定期地进行训练和再训练。

信息的另一个关键作用源于对编程技术的深度依赖。为了应付操作中不可避免的短暂中断，机器生产需要工人全面掌握系统的信息/知识。因而，信息科技不仅激发了例行的工人再培训，而且它还需要工人了解内部的工作原理。正是如此，生产工人成为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工作者。如果用拉里·赫希霍恩（Larry Hirschhorn，1984）的术语表示，生产工人是“后工业工人”，他们“必须调查和理解完整的生产过程以处理那些不可预知的错误”（p. 2）。在车间中的信息科

技就是“后工业科技”(p. 15),它减少了大量的体力劳动需求和枯燥的装配工作,但同时它需要“更高的流动性和警惕性以应付不完善和不连续的控制科技”。因此,“教育训练必须创建起来,使工人更好地应对不可预知的系统错误”,这需要一个对系统整体的全面理解和“准备与学习”的持续过程。此种境遇里,我们可以预见“工人性质的转变,从生产过程的被控制元件,变成操作控制元件,进而执行操纵整个组织系统”(pp. 72—73)。因此,工人成为“受教育劳动力”的一部分(Block and Hirschhorn,1979,p. 369),由信息科技驱使走上一条“流动、弹性的生活道路”(p. 379)。

比这更鼓舞人心的是弹性专殊化还激励职员参与到工作设计当中。计算机化生产提供了“反馈线路”和“自动化控制的回馈”(Hirshhorn,1984,p. 40),这使他(她)只要用恰当步骤改编程序就能运行程序。在此,工人对信息十分敏感,通过先进科技的帮助,他们清楚整个生产流程且能够快捷地改进整个系统,这就是肖沙娜·朱伯夫所说的自反性(reflexivity),其源于工人在工作中运用信息传播科技,而她相信,信息化(informating)过程将激发“智力技能”(intellective skill)。

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尔里(1994)对自反性能力推崇备至,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他们对信息传播科技的重视转移到信息本身,并对工作领域作了更广阔的思考而不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在他们看来,我们生活在“自反性积累(reflexive accumulation)”的时代,经济活动以雇员(和雇主)日渐提高的自我监控意识为前提。经济活动不仅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功效顺应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还能迅速地开展技术革新。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占据着中心地位,因为至关紧要的反思进程,其构成元件就是信息,反思本身实际上是以连续监控程序、产品和销量为基础,持续地进行决策和改进。

另外,现在的物品生产中注入了琳琅满目的符号,以至于设计(design)元素成为制造过程的核心;同时,以符号为基础的工作得到了爆炸性的扩张(比如文化产业)。拉什和厄里(1994)表示,上述变化同样出现在汽车制造业(在汽车业中,大量的革新主要针对设计进

行而不是追求狭义的技术改进），但设计元素渗透最深的还是在音乐产业、电视节目制作、出版等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信息浸透在这些工作的每一层面。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时髦”的服装和家居制造业，还是在旅游和娱乐领域，各种职业渐渐以“设计强度（design intensity）”作为其信息层面的标志。为了反对工作是程序化生产的观点，拉什和厄里强调即使是商品生产也受到了其他事物的影响。比如，产品生产中融合了文化的主题（经过“唯美化”的文化主题），甚至在生产关系中也进入了新的元素，大学里的风气和道德精神不断被灌输到IT产业等前沿领域。

斯科特·拉什（2002）把这种趋势定位于从“制造逻辑”转变到“信息逻辑”的广阔背景之中，“信息逻辑”提高了不可预知性，围绕着知识密集改革而转动的不稳定经济周期和不安全的文化环境迫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组织”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提供假情报的信息社会”中，它以剧变和短暂为特征。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缺乏固定性，一切瞬息万变，马上会受到信息刺激或者破坏。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工作可以有两种形式：新科技可以进入车间，那么熟练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Hirschhorn的方式），或者新技术绕过车间发展，那么它的功能就会被“专业管理人员”所取得（p. 122），比如发明经常在高科技和先进的生产者或者消费者服务业中出现。拉什设想在这个环境中会出现的两种社会选择，传统文化是“平淡地带（tame zones）”，因为它一直保持着合理的秩序，在生活方式上一直保持着传统的观点。但是当我们紧抓着传统文化，工业生产能力的衰减让我们进入“死亡地带（dead zones）”，导致社会不能适应信息经济的需要，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在另一个极端，拉什察觉到了“活跃地带（live zones）”，在那里，知识密集型经济和创意性工作兴旺发达，而且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文化“平淡地带”的建立（例如，保守的律师、会计师从郡迁移到伦敦市）。拉什还看到，“活跃地带”在商业上是活跃的，其沉浸在各种信息活动中，比如流行、音乐和媒体，并采用激进的文化观点，因此人们

可以生活在充满创新和挑战的“疯狂地带(wild zone)”(它们作为主要城市伦敦的一部分而建立起来,比如卡姆登和伊思林顿)。但是,有人会以一些分裂而好斗的“疯狂地带”为反例推翻此观点。这些“疯狂地带”的经济并不发达,随着公共价值和行为规范体制的崩溃,这里的工作不仅收入低而且不稳定。在当今新兴的世界中,无论将要出现的文化形式如何,最好的前景必然是出现在拥有“弹性专殊化”的高技能信息行业中。

网络关系

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1991)的著作曾经提出,“符号分析者(symbolic analysts)”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者、把改革与弹性专殊化相联系的组织者。赖克认为,那些在信息时代思考、分析和计划的“符号分析者”依赖于工作方式的改进,工作方式不能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合作层级,而是要立足于“地球网络”之中。该观点受益于其他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比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本书在下一章节介绍他。

学者们论战的焦点集中于工作日渐是一种横向关系而不是纵向关系。在福特主义时代中,大多数人几年来一直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并为挤进更高的阶级而努力,而对他们忠诚的回报就是每年一度的年终奖和工作生涯结束后的养老保险金。然而,在今天,为了节俭开支(信息传播科技允许他们这样做)和提高竞争力,公司已经削减了许多组织等级。但公司这样做之前,必须先授权给一个人,让他带领和发动改革(同时也能提高市场竞争优势),而此人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高级技能,但通常与他的官僚政治才能并不相关。他们的忠诚并不是指向公司(为了追求效率和竞争力,对忠诚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而是对他们进行的项目负责。他们的身份显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他们最大的驱动力是奖金,而不是年终薪水奖或者离开公司后的补贴。

此外,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们十分依赖于可能远隔千山万水

的同事网络，只要他们有“网络”相互联系，他们共事也就游刃有余。在现在的世界，弹性已经成为竞争优势的必备条件。虽然公司不能为信息专家提供一个长期的基地，但他们不仅能够迅速地行动而且拥有辉煌的成就，而且这一系列成功的项目换来了比钱更珍贵的骄人记录。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一个高级软件工程师、学术研究员和记者的工作实践，那么我们对此就能一目了然。这些人最先考虑的不是效忠于某个公司、大学或者报社，而是对同行的尊重，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某款软件的运行，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或者故事报道，他们会定期吸收个人网络中的专家意见。此类雇员定期地对自己进行再培训，从同行中学习并渴望寻求新的项目，他们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简直易如反掌。简而言之，他们是最超群的弹性专家。

弹性专殊化的理念，以及所谓未来工作将会倾向于信息密集型，并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的说法，往往引人入胜。坚持不懈、勤奋学习的工人开创了有卓越信誉的“弹性”形象，更吸引人的是，我们可以从文化产业中识别出专业化的职员，这些专业人士热切地留意着新的“想法”和“潮流”，以便随时充电，他们一直用自反性的方式处理信息，同时依赖持续的创新寻找细分的市场。自助书籍的作者、旅行导游、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 4）的合约制作商、管理部门的咨询者都属于这种类型，此类从业者让我们回想起清教徒运动的道德规范，金钱奖励或许并不能激励他们（Himanen，2001）。

然而，“弹性专殊化”的理论也遭遇若干抨击。主要集中于下述几个方面：第一，有一部分“弹性专殊化”的提倡者，不顾外界的强烈反对，明显带有科技决定论的烙印。比如赫希霍恩之类的学者，他对电脑自动化的强调，令人觉得此说有传统可循，他的假定在于先进的科技带来高级的技能需求。在赫希霍恩的观点中，“工业科技”是“跨文化的”，它不可避免地“以雷同的模式无处不在地塑造社会生活”，而这一切都会被“后工业科技”破坏（和解放），“后工业科技”让生活变得更富弹性。

第二，“弹性专殊化”作为批量生产的对立面，在某些方面与占支配地位的大型公司组织背道而驰。因此，出于多重原因，令我们对

“弹性专殊化”产生质疑。首先,本书之前也提到,“弹性专殊化”低估了大型公司的弹性,它们能够成功地引入新的工作模式和新科技,这些新元素同时促进着生产多样化和产品模块化,一方面允许重要产品的分化生产,而另一方面则继续批量生产。如迈克尔·萨贝尔(Michael Sabel,1982)也承认:“现存的福特主义企业只要不牺牲根本的运行原则,仍能够适应变化着的需求”(p. 194)。大型汽车制造公司的案例证实了这种可能性;例如日产(Nissan),它在新德里建立了新的弹性生产计划,可是它的生产关系依旧保持不变,对下属劳工依然实施严密的监控(Garrahan and Stewart,1992)。此外,耐克的研究表明,耐克70%的运动鞋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制造,其生产依旧是彻底的福特主义形式,但它的组织和销售,也就是鞋子生产过程中核心的信息工作和“增值”方式,则集中在美国。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1991)认为,将变化概念化为如此彻底的区别是不明智的作为,其糊涂之处犹如把弹性与批量生产对立起来一样。而事实可能是,“我们现在……不是用另一种生产方式代替一种生产方式,而是平行而并列的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市场同时发展起来”(p. 298)。

第三种反对观点是,不管我们是否能找到证实弹性专殊化的确切证据,批量生产依旧在先进的经济模式中保持支配性地位。因此,所有有关市场变革的意见在经验观察上都不能立足。不过仍有学者坚持,弹性的说法,了无新意,因为在资本主义公司成立之初,弹性就已经成为其特征了(Pollert,1988,pp. 45—46)。在19世纪,许多专门的公司针对市场某部分的需求而建立,但没有人觉得这种状态是被迫形成的,直到晚近,也没有人非说服装业和玩具制造商(cf. Mayhew,1971)就是证明弹性专殊化的最好例子。

与上述批判弹性专殊化相关的说法——当支持者们积极推崇弹性专殊化时,它可以被解释为“劳动区隔”(segmented labour)的再现。也就是说,弹性专殊化不仅对于那些自信、熟练且具有才华的工人来说是十分关键的元素,对于那些脆弱(因此更弹性)的“边陲(peripheral)”人员,也就是兼职工人或者短期合约的临时工来说,弹性专殊化也同样重要(Gordon et al.,1982)。在近几年,“边陲”人群

不断增长，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此趋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他们早已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之一。

第四种反对意见是，后福特主义显示出自发性、强适应性和劳动力的易处理性等特征，但是在现今社会，工作的任期并没有减少。虽然有相当多的道听途说证明“临时”员工和短期合约的存在，但是更多的系统数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人的实际工作任期都在增加(Bowers and Martin，2000)。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某段时期习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也可能他们正在某个特定组织内晋升。公平地说，弹性专殊化的理论夸大了事实，记者(似乎很少工作保障)和学术企业家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扩大到广阔的社会去理解。

最后，安娜·波勒特（Anna Pollert)对弹性专殊化理论给予了猛烈回击，她批评“弹性”理论的含糊不清与包罗万象的特征。当弹性专殊化被拆解为不同成分(如工作、技能、时间和生产的弹性)，以便易于验证时，弹性专殊化就会失去力量和创新，黯然失色了。

结论

本章以冗长的篇幅回顾了从福特主义转型到后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的理论和有关批量生产让位于弹性专殊化的相关论点。笔者难以对此论争作一总结，若干论点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论点并不直接慷慨陈词，开门见山地明确表明我们究竟是经历着一个系统的变更，或是既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延伸。

非常清晰的是我们应该质疑那些鼓吹我们的社会关系已经历了突变的观点。资本主义连续性的特征明确地揭示了此一言论的错误——市场标准的优先性、商品生产、劳动力工资、私人所有权和企业组织依然流行，甚至与过去的形式仍有着联系。不过，从资本主义是经济构成和社会安排的动力前提出发，毋庸置疑，二战以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如工作组织的新形式、职业模式的变化等等。但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这些变化就代表着系统的断裂，如奴隶制被封建主义所取代，显然后面这些转变都比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

型意义深远得多。

先把这个限制条件放一边，笔者以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组合的几个主要变化应该记录在案：

一、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遭遇严重的经济衰退，促使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建构，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剧变和动荡。

二、全球化的进程在各种层面上持续和加速进行，让公司不能以过去的方式继续发展。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全球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三、在这个时期，跨国公司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扩展着自己的规模、范围和影响，它们成为全球经济的最主要参与者。

这些发展的融合促成了资本主义活动的关键变革，不仅是自身变化的速度加快，它还鼓励更弹性的生产、销售和一定程度上的消费战略。而信息是掌控这些发展以及自身变化的轴心，无论是在工厂和办公室，还是在跨国公司的运行中，信息都占据着绝对核心的地位。

信息可能不会引发这些变化，但毫无疑问，信息在维持资本主义利益和资本主义活动适应性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信息的核心贡献如下所述：

一、信息流通是全球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是在那些金融和服务网络中，信息流通就更为重要了，因为这些网络联系紧密，而且支持着散布全球的活动。

二、信息在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控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无论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外部都是重中之重。

三、信息对“全球化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或者可以称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sation)的出现中尤为紧要，这就是国际和地方事务与利益得以紧密联系和管理的原因所在。

四、计算机化的普遍深入和信息密集型公司的显著增加，使得信息在工作实践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组织、计划、活动的实施都需要专门的信息专家，赖克的“符号分析者”的活动对社会活动的其他方面影响卓越。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从1996年到1998年，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论著——《信息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作为卡斯特长达25年研究的集大成者，《信息时代》对当代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影响卓越，该书堪称巨著。《信息时代》三部曲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原书刚出版后不久，就出现了修订本，并重印了多次。就在世的对当代社会特质进行思考的思想家而言，卡斯特无疑是一位学术旗手。他经常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报纸上也有他的高见。卡斯特这部一千多页的三部曲，对信息在当代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最全面深入的分析。实际上，《信息时代》的出版，使得一些评论家把卡斯特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等人相提并论。笔者认同这种评价，因为在所有关于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动力的论述中，卡斯特的作品的确最富有启发性和想象力，且相当严谨。如果我们尝试去了解信息的角色和特性(这必然涉及努力去理解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力)及其如何介入变化和正在加速的变化本身，那么曼纽尔·卡斯特的作品非读不可。

卡斯特1942年出生于巴塞罗那的一个佛朗科(Francoist)家庭。作为一名左翼激进分子，他在20岁的时候逃离了佛朗科的独裁统治，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去了巴黎，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巴

黎大学那充满动乱的南特尔校区(Nanterre Campus)任教,期间,涉足了1968年的学生运动。1972年,他出版了一本富有革新精神和影响力的教科书——《城市问题:一种马克思主义路径》(*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此书受到了当时盛行的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结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 Marxism)的熏陶。1979年,卡斯特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城市和地区规划与社会学教授,他在此教书育人20年。近来,他搬回了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担任教授,与此同时他在美国西海岸的南加州大学和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兼职。他尤其热衷旅行,从俄罗斯到新加坡,从台湾地区到智利,他在世界上将近20所大学中荣获访问教授之职。

作为一名城市化分析专家,曼纽尔·卡斯特的学术名望在很久以前就已声名鹊起了(他在伯克利的头衔就是其学术旨趣之所在)。他的著作《城市问题》在城市规划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日后的一系列著作再次令其地位更上层楼,《信息化城市》(*The Informational City*)乃是他研究论著的巅峰之作。他从来都没有摒弃自己对城市问题的兴趣,实际上,他依旧继续探索城市的重建和区隔问题,贡献卓越。

不过,通过整合和扩展他早期对于城市的研究,《信息时代》展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对当代文明的整体特征的描述。同时,它也体现了作者从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到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a post-Marxist social science)取向的漫长转型。曼纽尔·卡斯特秉持执著与坚持不懈的精神,达成其斐然的智力成就,这是他能与其他许多社会分析家如C. 赖特·米尔斯(C. Wight Mills)、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比肩的资质。

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思想深处刻下了印痕,这不仅体现为他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也体现为他坚持着墨强调资本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同样也可以从他对《信息时代》这部三卷本著作的组织中发现作者深受马克思主义浸染的丝丝踪迹。第一卷(1996)强调了社会结构性物质,比如构成了"信息时代"基础的技术、经济和劳

动过程。第二卷(1997a)的核心论述要点是“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社会学，并特别关注了对根本变革做出响应而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在场的新型环境的利用。第三卷(1998)最显明地与政治相关，关键主题包括社会接纳和社会排斥，本书视野开阔，其广泛的主题还包括已成为历史的苏联、欧洲的未来、环太平洋地带的兴起，以及全球犯罪网络的重要影响。作者的此类分析程序以及对优先秩序的区分源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洗礼，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样，此分析程序从对结构性特征的分析转向对社会动力的分析，最后转向了对政治问题的分析。在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信息时代》提供了一个组织框架。但这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它同样使卡斯特论述造成变革的核心原因充满了深刻的洞见。作者优先考虑的问题着眼于经济和技术问题之后，意识和政治上的问题才得到关注。

在卡斯特对当今世界所进行的整体诠释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印痕清晰可见。他的分析路径强调——如果想对当今世界的运作进行足够充分的解释，那就需要把一些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作为相互关联的要素联系起来考察。如果说卡斯特是对各个部分如何支撑一个整体的运行做了一个功能主义的描述，仅仅以此判断卡斯特便有失偏颇了。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分析路径着墨于强调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虽然各个部分通常是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之中，但它们之间相互摩擦的那些特性是造成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卡斯特把女性主义与全球化进程、经济和技术改革、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社会分层的改变联系了起来。当然，这种总体性(totality)的观念并不为马克思主义所独有，但它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当中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卡斯特的持续影响。在“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s)遭受质疑，且后现代研究风行之际，总体观念并不受青睐。卡斯特并不随波逐流，其根深蒂固的马克思主义血统，令他义无反顾地抵制当今社会对总体性解释的普遍怀疑。

下文将铺陈卡斯特的思想，尤其是他在《信息时代》中所表达的

主要思想元素(关于城市维度的讨论,参见 Webster, 1995,ch. 9,)。在此,笔者可能会对卡斯特的作品存在些许的误读,因为概括叙述难免把他的作品简化成了一系列抽象的和理论的观察。我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卡斯特令人记忆犹新的特征——在于他是一位实证的(empirical)社会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是在描述各色情境、堆砌数据和铺陈叙述。卡斯特的理论素养上乘且洞见深刻,不过,他的研究工作不是空谈理论取向。举凡言论以证据为优先判准,他绝不会恪守被经验证据所推翻的理论不放。曼纽尔·卡斯特(2000a)推崇"可抛弃的理论"(disposable theory),多半原因是他实在不忍目睹学界自后结构主义转向(post-structuralist turn)后,对标志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抽象理论化 (abstract theorizing)强调过度,他便以"可抛弃的理论"反击时弊。为此,来自世界各地包罗万象的实证材料都成为卡斯特的研究素材。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连贯分析框架展示了若干丰富的经验材料,无论其是关于 1989 年之后在俄罗斯出现的"狂热的资本主义"(wild capitalism),还是北美市中心的犹太人居住区,或是欧盟错综复杂的状况,卡斯特持之以恒地努力探究并回应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和发生的重大事件。

延续还是改变?

卡斯特的核心论旨是,"信息时代"宣告因网络发展(信息传播技术使网络的发展成为可能)而塑造了"一个新型社会"(Castells, 2000c,p. 693)的来临。在这个社会中,信息的流动被置于优先的位置。就这一点,笔者不惜冗赘几句。但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卡斯特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信息社会"的来临。他认为每个社会都会使用信息,因此"信息社会"这个术语对分析当今时代的独特性罕有价值(Castells, 2000d,p. 21)。

卡斯特采用了"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的概念来描摹当今的时代。在此,"信息化"这个形容词和"资本主义"这个名词都甚为重要。一方面,形容词让作者可以关注一些标志着一

种全新关系诞生的发展。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对于卡斯特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术语，它表示“知识活动于知识本身是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源泉”(Castells，1996，p. 17)，其预示着一种“新型经济”(new economy)和一个“新型社会”(new society)的翩然来临。另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一词的警觉，造就他注意到经济关系的常规形式(利润获取、私有制、市场规则以及其他问题)。实际上，他深察“信息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甚至是一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因为得力于网络安排，融合了充分的弹性和全球性影响(这两者在以前的资本主义时代都不存在，Castells，1998，p. 338)。

借助“信息社会”的概念，《信息社会理论》对强调系统性变革的思想家和认为延续过去才是当代最显著特征的思想家有所鉴别。那么，有人会问——卡斯特在此图景中立场如何？他似乎强调了变革的深刻性，而同时他也强调资本主义会继续存在，其冒险扩张和稳固性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卡斯特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当今时代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以他之见，造成这种十分重要的转变原因在于“网络社会”的形成，而且他认为这种网络对于未来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可或缺。卡斯特的全部作品都贯穿了两种论点的冲突：其一是强调社会发展的延续性，认为资本主义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另一种观点认为信息主义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社会变化显著。上述问题也是本章所要涉猎的议题。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2004a)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因此他驳斥了那些“把我们的社会贴上信息或知识社会标签”的人，认为他们“有一点自命不凡”，因为“谁都知道信息和知识作为绝对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任何社会都有相当功用”。有鉴于此，他毫不犹豫地摒弃了“信息社会”这个概念。他与那种动辄就把信息摆在优先位置的论调格格不入，所以甚至连“信息资本主义”之流的术语在他的写作中也淡化了。尽管如此，卡斯特并没有在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中，他清晰地阐明正是“网络社会”的出现真正标志着一个新型社会的来临。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信息社会……我们是在一个网络社会”，这是“社会的基本的、形态上的转变”(ibid)。

网络社会

卡斯特认为我们正在经历迈向“信息时代”的转型，该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连接人、机构和国家的网络扩展，其影响深远，最显著的莫过于网络社会在促进世界性事务的融合的同时，也强化了它们之间的区隔。卡斯特关注全球化整合人以及各种过程的方式，并且对分裂(fragmentation)和瓦解(disintegration)进行了评估，上述内容构成了他三部曲的统一主题。

卡斯特把信息时代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标志着所谓的“战后安定”(post-war settlement)(完全雇佣、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国家福利制度等等)的终结。因为深陷衰退的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的企业需要寻找新的利润来源，70年代之后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重组。这种重组正好与卡斯特论述的“发展的信息化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的出现相伴随，此种趋势和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紧密关联。

在很大意义上，资本主义的重组意味着通过采用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去寻求实现成功的商业活动的新手段。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卡斯特称之为“信息资本主义”——便利用信息网络来开展活动，从工厂内的活动(工作的新方式)到世界范围内进行销售，资本主义迅猛扩张。而且，信息资本主义与长期以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连，彼此唇齿相依，以至于“网络社会”是一种在全球环境中实时开展的资本主义活动，这一切完全仰赖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否则，不可想象。

许多学者认为全球信息网络的扩展预示着民族国家的衰亡，因为民族国家的边界与电子信息的流动无关，因此，营销、生产和分配越来越在同一个世界舞台上开展，打破了国家之间的边界。卡斯特察觉并承认此动态格局，但他并不认为网络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尤其不认同政治的重要性将日渐削弱。尽管民族国家的若干作用渐趋式微，但民族国家仍然介入世界事务中，他坚持认为民族国家的作

用依旧重要，并且不可低估。原因在于虽然全球融合乃必然之趋势，但与此相关，时势要求参与者具备最大限度的适应性。市场情境和市场机会的急剧频繁的变化是当今世界的秩序，在此世界“创造性的混乱……构成了新经济的特征”。为了适应这种“急剧改变的几何学”(Castells，1996，p.147)，政府需要因势利导来抓住机遇(和承担过失)。因此，政府明智地鼓励一些战略性的重要研究项目，及时涉猎一些重要的合同性谈判，尤其关键的是善治，这些都是当代民族国家所应扮演的核心角色。所以，虽然被迫接受信息流的全球大漩涡的挑战，但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依然如故。

卡斯特提供了全球性整合世界中最近的赢家和输家的风云旅程，他强调了拉丁美洲和苏联的不同结局，以及后种族隔离时代(post-apartheid)的南非潜力。他阐述的主题围绕当今变动的世界图景，指出一些传统的术语如北方(North)和南方(South)更容易带来困惑而非一目了然，不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变动世界图景中的各色差异。因为其表明在当今新世界中，一些适当的政府策略能够导致迥异的结果。励精图治的有效政府行为使日本和新加坡之类的国家迈向了成功，而非洲的大部分“掠夺性政府”(predatory states)把扎伊尔和乌干达之流的国家推向了全球性网络社会的边缘，迫使这些国家只得依靠“乞讨的政治经济学”(Castells，1998，p.114)来勉强维持生存。

通过对世界面貌的深刻体察，卡斯特对网络的形成所造成的直接影响了然于心。最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化变化不定，但大致的方向却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可以用四种形式描述那些地区(Castells，1996，p.147)：

- 高价值生产国(producers of high value)(基于信息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
- 高产量生产国(producers of high volume)(基于廉价劳动力)，中国占有重要地位。
- 原材料生产国(producers of raw materials)(基于自然资源)，在这种国家中，石油和煤气供应非常重要。

● 过剩生产国(redundant producers)(只剩下贬值的劳动力),这种国家严重缺乏资本和资源,政府不稳定,基础设施薄弱。

网络企业

我们已经步入了伴随着资本主义和"信息革命"联袂产生的"网络社会"的新型时代。卡斯特相信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尽管我们难以忽视其重要性。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组织的形式,因为伴随着全球整合而来,网络迅速成长,从而导致事务处理的"去官僚化"(debureaucratisation),意思是说即使是在一个巨型的跨国公司中,等级制度也正在被摧毁,权力也正在转移到那些真正的推动者(movers)和鼓动者(shakers)手中,以及在网络中工作,操纵生意于四海之内,做有利可图的市场项目的信息劳动力(information worker)手中,他们的忠诚体现出往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色,而非忠诚于在当下雇用了他们的特定公司。

在此,卡斯特从更正统的原则转向了商学院中的流行观念。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信息网络的扩展体现了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的趋势。彼得·狄金(Peter Dicken,2003)、理查德·巴内特(Richard Barnet)、罗纳德·穆勒(Ronald Muller,1994)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1984b)对此趋势都有闻名遐迩的高论,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在战后引人注目的、势不可挡的上升与信息网络的扩散紧密一致,而信息网络就是为一些主要的公司客户而设计,它们把这些主要公司客户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Dan Schiller, 1982)。许多数据显示,当部分国家和公司的财富发生大规模增长时,一些主要跨国公司的收入占据了前 50 名,或者说,一些电信公司的主要订单迄今都来自于国际性的与跨国公司有内在联系的顾客,或者说,世界工农业 20%的产量都来自于大约 600 家大公司。这些数据都支持了上述学者的论断。

卡斯特认为整合导致世界激烈变动,物是人非,但他对上述论断没有深究原由。当然,对跨国公司在"网络社会"中的存在,他并非视

而不见，不过，他以为跨国公司受到了“网络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并深陷其威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至于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另寻出路，否则就有面临崩溃的风险。所以，卡斯特声称，跨国公司正在从纵向整合转向解体，以至于它们转变为“横向兼并的公司”(Castells，1996，p. 166)。他争辩道，在“网络社会”中，一切都与在世界市场中的反应速度和适应速度有关，所以，网络比其他东西都要重要。反过来说，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公司似乎是中央集权制和等级制的组织，但由公司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创造的和不断再造的网络，能以一个有利的价格及时传送产品和服务，简言之，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公司向网络的转变”(p. 115)。战略联盟的缔结与中止取决于特定的环境和参与者，本田公司的管理者提出的“五个无”原则(无过失、无故障[如无技术错误]、无耽搁、无纸化工作和无存货)是成功的诀窍。

卡斯特认为，即使跨国公司会继续存在，剧烈变革仍然不可避免。那个由位于大都市中心的由中央权力来计划和运作一个全球帝国的时代已经逝去。在信息经济中，“大公司……不是，也不再是自给自足”(p. 163)。它们需要把权力转移给那些能够接近“建立在去中心化、参与和协调基础之上的自我规划的、自我导向的”(p. 166)网络组织。有鉴于此，“竞争的全球化把大公司消解在由多维度的网络形成的网站之中。”(p. 193)。

所有上述讨论都深深地回应了后福特主义理论(见第四章)，后福特主义的咒语“弹性”(flexibility)反复贯穿于卡斯特的著作。虽然卡斯特极少显明地引用福特主义的文献，但他提出(2000b)当今典型的公司是思科(Cisco)。思科公司的网站就是它进行商务活动的地点，其80%的生意都依赖网络操作。卡斯特认为(2000e)，福特公司巨大的制造工厂、标准化的生产，以及自上而下的管理结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缩影，而思科公司正是信息时代“网络企业”的典型(pp. 180—184)。

我们可以经常在《金融时报》或者是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的专栏中浏览这一耳熟能详的管理学理论。毋庸置疑，世界经济日新月异且不稳定，对所有人来说都风

险重重，根究这一原由，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难辞其咎。全球化使得一些从前相对来说不受影响的（由于它们属于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也陷入了激烈的竞争。不过，卡斯特在此的假定乃以浅显明了却蕴藏深邃的洞见著称。他坦言“网络的逻辑力量远胜于网络的权力”（Castells，1996，p. 193），这一箴言的言下之意就是信息传播技术降低了全球公司的有效性，它们授予了那些在网络方面具备更高明的企业家眼光和更有效率的人和组织引人注目的权力。实际上，这些人可能被公司所雇用，但是新技术却使权力从他们的雇主转移到了网络玩家。

卡斯特（1996）继续高度赞扬了“信息主义精神”（p. 195）。在此，他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名论断中得到了借鉴。韦伯认为在加尔文教神学（Calvinist theology）中存在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亲和关系”，即“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与“资本主义精神”（spirit of capitalism）相互凝结。卡斯特借用这个论断提出了在当今社会起作用的可比较要素。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但却是“以一种新型的且深刻改变了的形式”（p. 198）存在，该论断的核心是“信息主义精神”（spirit of informationalism）。卡斯特关于“信息主义精神”的描述可以激发出“网络空间”（cyberspace）的玩家画面：他们可以非常方便地交换信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凭借把持的网络彼此有效连接。他好像敬畏网络决策的作用：在“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利用熊彼特的术语）的浪潮中，网络决策急剧地改变了世事。他断定决策者是一种新类型的人，他们甚至不对他们的雇主负责，而对那些在网络方面有天才的人开放。所以，卡斯特把这种新的状况描述成“在网络企业的网络空间中，熊彼特遇见了韦伯”（p. 199），这是激烈变化、创造力和个人驱动的迅猛混合。他以此作为结语，一点都不使人感到惊奇。卡斯特的合著者——派卡·海曼（Pekka Himanen，2001）——扩展了这个论断，他认为当今社会，冒险和非法的“黑客伦理”（hacker ethic）方兴未艾，有此嗜好者趋之若狂。

卡斯特同样对工作实践和雇用模式的改变深切关注。他认为，当代社会的信息劳动（information work）急剧增多，总体而言，他们

比过去的劳动力更让人满意，更个性化；被“网络社会”改变了的环境意味着如果人们要在信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动荡”(systemic volatility)中生存，他们必须习惯行动与筹划都充满“弹性”。

信息资本主义的文化影响

在三部曲的中篇，《网络社会的崛起》转向了考察技术变革导致的文化影响。卡斯特一点都不担心诸如网络色情和宣传新法西斯主义的公告板，那些内容并没有阻止他的思考。他觉察到信息传播技术更深远的影响，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论述精髓得以发扬光大。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宣告了印刷业的终结(《古登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1962)，并且它将会被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所取代，卡斯特(1996)对此洞见致以“敬意”。他认为电视在当今政治中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具体的内容，而是如果一个人希望成为政治的参与者，他必须利用电视画面；与此相同，如今“网络社会”最迫切的事情不是关于人们说了些什么，而是人们可以接触到网络的事实本身。卡斯特声称，如果你不置身于网络之中，你就无法在“网络社会”中扮演一个完整的角色。而且，在大众传播体制中，电视是典型的媒介(把集中式生产的产品传送给一个同质化的受众)，而计算机网络预示着大众传播体制的终结，因为它允许互动，并且使互动个性化。所以，最重要的文化影响是“进入网络”(being networked)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置身网络，他就能够接触到信息，但凡他需要，他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发生互动。

卡斯特担心一些比因特网的扩散更领先的技术发展，因为他认为其加强了社会碎片化(social fragmentation)的趋势，社会分裂贯穿于作者全书。如今的趋势是，有线和卫星电视使得目标受众接收到的是一个预先选定的节目单，把那些(比如说)收看天空体育电视台(Sky Sports)的受众与那些被 MTV 的摇滚乐频道所吸引的受众分离开。这是卡斯特的观点与麦克卢汉的论述相去甚远之原因，麦氏认为“讯息即媒介”(message is the medium)，因为它们的传递依赖

于分割的受众(segmented audience)需求。这一切都是伴随着电视资源的全球整合而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默多克(Murdoch)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它为那些具备市场吸引力的、不同的受众提供量身定做的和多样化的节目。卡斯特尤其担忧伴随着先进技术而来的由娱乐兴趣所驱动的家庭中心化(home-centredness)现象,其预示着建立在国家广播电视基础之上的共同文化的丧失,意味着"当媒介变得……全球性互相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之中,而是生活在地区分散的小村舍之中"(p. 341)。

不过,技术导致的结果并非没有益处,也存在反上述趋势的现象。对卡斯特来说,因特网拥有"技术和文化方面根深蒂固的属性:互动性(interactivity)和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p. 358)。所以,它可能能够促使电子社区(electronic communities)的产生,而电子社区可以使人们联系起来,而不是使他们分离,由此,我们想到了霍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1993)热衷于可以在网络上创造出来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同样,卡斯特宣称"因特网会膨胀成一个电子广场(electronic agora)"(p. 357),一个"互动的社会"(p. 358)即将来临。

卡斯特好像对"虚拟社区"的潜力持乐观态度(cf. Robins and Webster, 1999, Part 4),虽然在《网络社会的崛起》的第二版中,他压制了早期的乐观主义,承认了会抵制新技术的一些"高尚的目标"、"平庸的物质主义"(mediocre materialism)的存在(P. 358)。任何个人都会例行公事地使用电子邮件和因特网,它在个体与志同道合者的联系上对我非常有帮助,但它并非是比写信更舒适的交流形式。社区的真正意义不是被限制的交流,因为它涉及连接"整个的"人,而不是连接一些具体的"位元"(bits),这些"位元"构成了电子关系(Van Morrison)、电子公告板、一个职业清单、一种商业传播、一桩电子交易,但当因特网衰退的时候,它们也就寿终正寝了(Talbott, 1995)。实际上,与他人的在线关系之所以令人困扰,就是在于在线关系很容易因为按一次转换键而终结。这种表面的、非干扰的(non-disturbing)、自我中心的联系还不值得以"社区"一词来讨论。如果

就人类活动而言，“社区”应牵涉到在现实的时间和现实的地点与人们相遇。现实社区当然可以加强一个人的观点或促进偏见，但它同样可以挑战没有电子逃避的行为和信念(Gray，1997)。

如前所述，卡斯特相信进入网络(inclusion on the network)对于全面参与当代社会生活势在必然。扩大接触信息传播技术，尤其是接触因特网的途径，是信息时代的一项公民权(Brown，2003)。虽然他对连接性(connectivity)充满热情，但却深深忧虑，如果这种连接是娱乐导向(entertainment-led)的，就会产生一些迫于中心权力而进行互动的人，而不是真正在互动的人。卡斯特还提出“加入这个系统所要付出的代价是适应它的逻辑、它的语言、它的切入点，以及它的编码和解码”(Castells，1996，p. 374)。他的这种坚决主张使我们想到他对麦克卢汉的继承，因为他相信信息传播技术的文化影响甚至要比那些更民主的传播形式的影响更激进。卡斯特利用“真实的虚拟性”(real virtuality)来指代多媒体所牵涉的文本、音频和视频形式的融合，以及“网络社会”中的生活含义。他提出，即使我们与网络保持距离，或在不同的地方与他人以不同的交流方式进行互动，媒介都是我们所经历的全部现实。因此，在此体系中，“现实本身……被完全捕获，完全陷入一种虚拟的形象环境之中，陷入一个制造信任的世界之中，在其间，表象(appearances)不仅仅是显示在交流经验的屏幕上，而是成为经验本身”(Castells，1996，p. 373)。

就此我们陷入一种后现代的想象，但笔者认为这有点过度延伸了话题，并在第九章以相当篇幅考察了该问题。卡斯特就一个电视肥皂剧和有关丹·奎尔(Dan Quayle)所经历的政治问题的混杂性讨论，阐述了此类新颖的文化现象。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彼时的美国副总统利用一部肥皂剧中的人物形象来阐述他关于“家庭价值”的观点。在奎尔发表演说之后，该肥皂剧在下一集中穿插了他对该剧进行介入的内容来讽刺他。在此，现实和虚幻似乎变得模糊不清，卡斯特以此作为新媒体的产物——“真实的虚拟性”的例子。笔者以为如果要说服我们去相信一种新颖的现象已经来临，这个例子罕有说服力。一百多年前，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

他的连载小说如《奥列佛·特维斯特》(*Oliver Twist*)和《匹克威克·佩帕斯》(*Pickwick Papers*)中早已做过同样的事情。而大部分日常经历都涉及利用虚构的人物形象去探索何为真实(如:"他有点斯克鲁奇[Scrooge,吝啬鬼]","这里没有尖酸刻薄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偏执狂")。虚构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讨论社会现实的方式,因此它可能会使事实和寓言之间的鲜明区别变得模糊不清。此现象由来已久,当然远在多媒体甚至是在电视的广泛传播之前就是如此。这些新的文化形式提供了那些可能被采用,也可能不被采用的相似再现(representation),但我们充满信心:大部分人在区分"真实的"(literal)和"文学的"(literary)的时候不会存在很大的问题(Slouka, 1995)。把这种发展描述成"真实的虚拟性",过快地陷入了后现代思维方式的窠臼。

流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

卡斯特的早期作品《信息城市》(*The Information City*)的读者应该会熟悉卡斯特关于"流动的空间"的观点。在此论著中,他重申了"位置的空间"(space of places)和"流动的空间"的区别,他对后者的论述重点强调了"网络社会"。因信息的流动(information flows)成为当今社会组织的中心,世界各地能够"整合在连接了它们最有活力部分的国际网络之中"(Castells, 1996, p. 381)。卡斯特的论述强调了区域(region)和地点(localities)乃是中枢环节,不过,他提出我们正在经历既有关系失常的"地理上的非连续性"(p. 393)。具体地区的繁荣昌盛或是衰落凋敝取决于新的"革新环境",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整合到"网络社会"之中。

城市,尤其是担当覆盖范围广泛的网络"轴心"的城市,意义重大,各领风骚,卡斯特坚持认为"全球化的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进程"(p. 386),信息在此进程中流动。他认为一些大城市(如东京和孟买)犹如"发展的引擎"(p. 409),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连接,但是在地区范围内它们各自分离,无论从自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都是如此(p. 104)",除了那些最偶然的参观者之外,上述特征一视同

仁。卡斯特还对在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占支配地位的管理层精英”(p. 415)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讨论，精英们分布于世界各地，但他们需要保持地区性的联系以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一致性，这也是导致他们产生严重心理压力的力量所在。管理精英存在着全球性的联系和共同的生活方式(入住相似的宾馆，进行雷同的娱乐)，各居其所，频繁地使用先进的技术系统与那些居住在附近的“危险的阶级”截然区隔。虽然他们具备精英身份和全球性联系，卡斯特却没有把这群人描述成一个阶级。相反，他断定尽管存在一个“不露面的集体资本家”(faceless collective capitalist，p. 474)，但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资产阶级”(a global capitalist class)。下文对此有更多的讨论。

永恒的时间(Timeless time)

卡斯特引入“永恒的时间”这一概念，特别吸收了关于现代世界中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论述。时空压缩论强调“网络社会”致力于创造一个“永恒的宇宙”，在这个“永恒的宇宙”中，时间的有限性越来越成为一种远逝的过往。卡斯特展示了时间一直被“一个电子化管理的全球资本市场”(1996，p. 437)所操纵，并且与如何利用工作时间(“弹性时间”)达到效率最大化相关。

另外，“网络社会”引发了“生活方式的模糊不清”(p. 445)、“节奏感的丧失”(p. 446)，以及由此导致生命的不同生物学阶段如何被操纵。因此，我们可以见到在 50 岁时生小孩的女人，甚至可以见到要“把死亡从生命中抹去”(p. 454)的努力尝试(通过类似于低温学的技术)；我们还可以看到“性感的”8 岁小孩，也可以看到人们通过运动体制、药物和整形手术来抵制老龄化。所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想到基因工程上的重大突破，卡斯特把信息与传播问题与此联系了起来，这些突破都促进了一种关于无时间限制的永恒文化之发扬。

卡斯特用“即时战争”(instant wars)来指代由那些掌握了最先进技术的权力集团突如其来地决定发动起来的战争，这些战争通过全球媒介粉墨登场。经过这些战争——1991 年至 2003 年的伊拉克

战争、1999 年北约摧毁塞尔维亚的战争，以及 2001 年下半年阿富汗的塔利班神权政治被迅速入侵和摧毁的战争——之后，大部分人都注意到了“信息战”的发展(Tumber and Webster，2006)。卡斯特不仅仅指出了传统战争的终结，他还给予我们难以忘怀的提醒：从历史上讲，对战争的参与，至少对欧洲人来说，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可以使人意识到自身会死亡的宿命，同时为幸存的生者献上一份苦口的良药。但现在这一切全成为过往云烟了，对“永恒的时间”的膜拜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另外，卡斯特还看到了“网络社会”对即时传播(instant communication)的重视，即时传播是指我们可以即时地从全球搜集到以超媒体(hypermedia)形式再现的信息。信息不向我们提供历史背景而撕裂了历史，撕裂的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被放置于一个“没有时间的精神景观”(p. 463)之中，一切都融合于“网络社会”的文化之中，此文化引发了一种“系统性混乱”，一种永恒的即时性、一种连续性和自发性的缺乏。

身份的力量

《信息时代》的第二卷把重点从“网络社会”的构建和与之伴随而来的整合与区隔的趋势转向了对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ies)的关注，中心主题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卡斯特(1997a)认为社会运动是指“改变一个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有目的的集体行动”(p. 3)，社会运动给人们提供关于他们身份的中心元素。换言之，本书聚焦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政治学和社会学。

当传统被撕裂时，身份是如何建立的？这一论述乃《信息时代》一书的核心旨意所在。比如，卡斯特认为民族国家以及与它有关的一个公民社会中常规存在的合法制度(提供福利、主权国家的权利、阶级基础之上的政治、民主的过程，以及各种压力集团比如工会)都面临着“网络社会”的全球性趋势的挑战。例如：福利国家面临着对最廉价的劳动力供应的全球性竞争压力；在这个日元、美元和欧元可以进行实时的和持续的交易年代，极难对国家经济进行控制；政治民

主被“信息政治学”(informational politics)的发展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而全球性的、不严肃的、被丑闻焦点所吸引的信息传播媒体是“信息政治学”的中介。传统上与国家问题相关的工人运动力量在一个充满全球竞争和迅速流动的资本的世界中被削弱了。

卡斯特认为民族国家甚至不能够利用新技术对其人口实施有效的监控，因为一些半自治地区(甚至是城市)的出现正在慢慢推翻国家本身，民众可以很方便地与千里之外的人们联系，一个全球性的、高度分化的媒体一直都在探查和揭露政客们的图谋(想象一下 20 世纪 90 年代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的沉浮，以及他在 2001 年令人惊讶的回归，当然他依旧面临着未来针对他的法律制裁的威胁。另外再思考一下媒体对政客们的腐败和不端的性行为的持续曝光)。那些忧患奥维尔式的(Orwellian)、任何事情都会被“老大哥”(Big Brother)监视的人们，可能会对卡斯特的预言产生更多的担忧：“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秩序森严的监狱，而是一个杂乱无序的丛林(p. 300)。”凡事都无根据且不确定，传统被消解了，曾经的信心不留踪影。

为了抵制这个梦魇，卡斯特推论说，行动造就了身份，所以“网络社会”激发了“抵制”(resistance)运动，甚至“规划”(project)身份的运动。然后，作者积极投入对形形色色的抵制运动进行分析。卡斯特并没有对这些反对运动发表赞同或者反对的意见，但他把一系列抵制运动视为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的、显著的压制力量所形成的集体身份的铁证。

卡斯特详细阐述了曾经影响卓越且持续作用的环境保护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种项目导向型(project-oriented)的运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运动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对“信息时代”的各种压力的反应，因为它们都利用了“网络社会”的设施(facilities)来协助组织传输他们的观念。而且，尽管是地区性的活动，但其能够娴熟地利用信息传播技术。社会运动在视野、趋向和联系上无不跨越国界。

卡斯特对女性主义的分析表明，人类社会在几个世纪以来通行的规则——父权制，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造成这种状况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妇女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大军，这与信息

工作的扩散以及“网络社会”对“弹性”的强调紧密相关；第二个原因来自于生物学的控制，最显明的例子是基因工程使女性避免了生育的约束；第三个原因当然是不同形式的女性主义运动；第四个原因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使构建“地球妇女声音的超级编录(hyperquilt)”(Castells，1996，p.137)成为可能。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富有挑战性的性规范(sexual norms)力量与上述情况相结合，这些性规范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因此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它们都“正在破坏……异性恋形式”。卡斯特提及了“实践的女性主义者”(practical feminists)，以他的见解——“实践的女性主义者”就是那些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致力于改变她们的生活，为争取新的身份而抗争，使“社会制度去性别化”(p.202)的勇士妇女。

分层的新形式

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颠覆了以前的各种分层形式，使一种新的不平等类型迅速粉墨登场。笔者已经觉察到他就横向兼并公司的发展论断，这对于官僚主义者来说并非好事，但是那些边缘化的人却重新获得了权力。他的观点是，从全球范围上讲，信息时代带来了一种系统的资本主义，但缺乏一个领导性的资产阶级。信息资本主义之下的分层表现与结果不同凡响，值得着墨。伴随着新的分层形式出现的是权力关系、资源分配以及未来远景的变化。最重要的是，直到20世纪末依然在支持各种政治效忠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界轴心，显然遭到了破坏。

由某个统治阶级所领导的资本主义已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如今拥有的资本主义缺乏一个资产阶级。那些以网络为导向的熟练的“信息劳动力”负责运作如今的资本主义，该群体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他们几乎对一切事情负责，从设计技术、操纵公司的变革，到鼓动立法改革。反过来，体力劳动者(卡斯特称为“普通劳动力”[generic labour])越来越多余，他们在信息资本主义中忐忑不安，一直都被他们自身无法应付变迁的僵化所威胁。而信息劳动力作为革新的和创造

财富的力量，敏锐而机警于社会变迁与动态，他们能够在时代洪流中应对自如。社会学家（还有其他人）曾经描述这些普通劳动力（一般来说是男性）就是“工人阶级”。此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断裂关系到那些被推到信息资本主义边缘、缺乏技能的人和缺乏教育的民众。他们的最佳状态，是能够找到低层次的无保障的工作；最糟糕的状况是他们会进行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随着这些新的分化的不断发展，既有的动员形式随即被侵蚀。伴随旧的阶级体系发生转型，阶级政治就变得过时，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更好地与被网络社会改变了的环境和作为当今时代重要特征的生活方式和身份政治更好地衔接的社会运动。这些新运动的领导者掌握了与媒体打交道的技能和组织能力，这些技能对于信息时代的有效动员必不可少。

虽然卡斯特不愿意把他的分析与当代其他一些社会思想（如在他的著作中只被粗略地提到的安东尼·吉登斯、阿兰·杜连[Alain Touraine]和丹尼尔·贝尔等等）直接联系起来，但是很显然，他的观点与最近的大部分著作相得益彰。更具体地讲，卡斯特对于一个被深刻改变的分层制度的重视，尤其是他对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信息劳动力的中心地位的关注，以及他对超越了旧的阶级分化的政治动员新形式的强调，无不浓缩了“新型时代”（new times）正在来临的信念光谱。

工人阶级的终结

卡斯特从两个方面预言传统的工人阶级将会走向终结。首先，工人阶级曾经是各种激进政治运动的舵手，但其数量日趋减少，并且正在被一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日益增多的女性劳动力所取代。其次，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已江河日下，信息（或知识）价值论乃当今时代之宠儿，劳动价值论已是明日黄花。卡斯特（1997a）写道：“信息和知识是新生产过程的核心原料，教育是劳动力的关键品质，（所以）信息资本主义的新生产者是知识生产者和信息程序师，他们的贡献对……整个经济是最有价值的”（p. 345）。

虽然在过去，工人阶级从属于资本所有者，但公认工人阶级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毕竟，如果要开采矿场、运作生产线和生产食物，还需要矿工、工厂工人和农民。工人阶级的核心贡献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继承人”政治（“inheritor” politics）的重要主题。“继承人”政治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工人阶级创造了财富，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将会收获他们应得的奖赏”。但如今，工人阶级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一个新的阶级——信息劳动力——正在形成，迫使过时的工人阶级挥之即去。信息劳动力对普通劳动力的影响，就在于什么信息劳动力决定社会权重的问题一目了然，信息劳动力实施影响存在多种路径：如他们可能会使普通劳动力自动消失（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他们可能会使生产转移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采用高新技术的计划制定者达成此目标易如反掌）；普通劳动力由于固守旧业且僵化而被淘汰，信息劳动力则可能因其适应变迁而会生产出新产品。

在这个新的世界，信息劳动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工人阶级因落伍于日新月异的时代而注定走向衰落，按照现在的说法，他们缺少“弹性”。结果，政治正在从阶级转向社会运动，诸如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这些运动远远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忠诚（class allegiances），它们诉诸支持者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份，且很显然地被不同类型的信息劳动力所渗透。例如，想象一下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协会：它们都拥有全球性影响和电子化的成员名单，以及由许多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科学训练的、有媒体意识的工作人员和支持者所组成的广泛网络。

此外，当卡斯特强调信息资本主义的特别强大和特别渗透性（尤其是抑制市场实践的有害行为）时，他也坚称一个可辩的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单个国家的策略选择急剧减少，这在国家经济战略方面最为显而易见。并不是说政府的行动变得不重要，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政府行动对世界经济造成了特别迅速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存在一个控制世界体系的资产阶级，那就离谱了。卡斯特声称，存在“不露面的集体资本

家”(1996，p.474)，但集体资本家并非一个特定的阶级。例如，在此可以想象，世界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持续交易意味着不存在脱离主流资本主义企业的空间。但是，这个体系的掌权者却不是有产资本家，信息劳动力才是其最主要的参与者。该图景表明如今运作资本主义的是会计师、系统分析师、金融家、开户投资者、广告商等等。他坚称，“总设计师”(grand designers)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系统有其内在的动力，其网络比任何一个甚至是有组织的群体都要庞大。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人之所以身就其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财产拥有者，而是因为他们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也就是说，他们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信息劳动力，他们的粉墨登场宣告了有产者阶级的过时和工人阶级的终结。

最后，还存在缺乏技能的人和(或者)与信息资本主义无关的人，卡斯特把这些人称为“第四世界”(fourth world)，他们因缺乏可以吸引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或者)技术资源，几乎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在此，他着墨美国被隔离的穷人，即那些与处于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信息劳动力并肩生活，但却沦为底层阶级的人们，他们通常在一个不让人羡慕的环境中为信息劳动力这个新的阶层担任服务员、保姆、看门人和仆人的工作。卡斯特对此忧心忡忡——从长远看，如果他们不能对新经济的弹性需求做出应对，普通劳动力可能会沦为底层阶级。

总之，卡斯特认为信息资本主义已经根本改变了分层制度。事实如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s)成员国中，30%的职业结构被信息劳动力所占据。在一个与当今的许多思潮——从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1991)对“符号分析者”(symbolic analysts)的狂热到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1993)关于“知识专家”(knowledge experts)乃当今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的信念，到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90)的“知产阶级(cognitariat，有知识产权者)”在“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中起到中心性作用的观点——相呼应的论断中，卡斯特声称信息劳动包括激发变化的、与新经济紧密结合的、一

般来说从事新经济所要求的思考、构想、计划和运作等之类的工作。

信息劳动力于是成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黏合剂。前文已述及，信息劳动力已篡夺了过时的资产阶级的位置，因为后者对资本的所有权已经不再足以在当今世界领衔潮流。那些拥有公司的人需要运用信息技术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使他们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永恒的变化时可以依旧保持活力。如今，仅仅拥有大量的股票已经不够了，因为如果没有紧跟时代变迁的信息劳动力，股票转瞬即失。因此，那些信息性职业成为了优先职业，而且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核心，它们体现了分析、谋略、有效沟通和机会识别的能力。

对于那些信息劳动力来说，具体的技能与最重要的适应技能相比，就没那么重要了。也就是说，他们是“自我制订的”(self-programmable)，只要有必要，他们可以接受培训和重新培训，从而保证信息劳动力尤其适合在节奏极快、“弹性”极强的信息资本主义世界中生存。工作于庞大的官僚机构，稳定且旱涝保收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履行项目负责制的合同性工作。因工作失去确定性而令若干人诚惶诚恐，但信息劳动力感觉并非如此。因为他们特别适合这种“组合履历式”的职业生涯，其间，他们的能力体现为自身在不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记录 (Brown and Scase, 1994)。往昔对某个特定公司忠诚效劳的价值观，已经越来越过时了。信息劳动力那类游牧人群很愉快地在不同的项目之间迁徙，他们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关系网络而不是公司的等级来寻求下一项生意。他们寻求的不是终身制的保障，而是他们各自领域的最新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和挑战。公司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不可或缺，但他们并不特别地附属于某个公司。这些信息劳动力为了一个“项目”而签订工作合同，然后很愉快地自行其道。想象一个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任何报道的自由记者；一个全神贯注于他/她正在开发的程序的软件工程师，他/她会与全球大约几百名与他们具有相同目标的人们联系；或者一个只对他/她的同行而不是对某个特定的机构忠诚的教授。

这里会不可避免地把信息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进行比较。普通劳动力是固定的、僵化的，他们渴望待遇得到终身保障，每天进行着

他们在早期训练中学习到的重复性工作；而信息劳动力属于适者生存，他们甚至热切地盼望着变化的发生。信息劳动力是当今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无论他们是从事交易服务的会计师工作，还是从事“知识密集型”行业，比如软件工程、生物科技、时装设计、制作吸引人的广告，或者仅仅是构想出一种更节省成本的派送产品的方式。

英才管理(Meritocracy)

信息劳动力的职业晋升很容易使我们想到英才管理(meritocracy)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成功不是依靠继承得到的有利条件，而是仰赖一个人在教育系统之内获得的能力和付出的努力。信息劳动力，即使不具体到某个学科，好像的确需要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在各大学中存在着一种向学生们灌输“可转移的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的极大热情，以使它们的毕业生具备雇主们所看重的素质：沟通能力、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弹性，致力于“终身学习”等等。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受到过高等教育的民众比率现在已经达到30%，大学就学的数字还在不断上升，这绝非偶然现象。卡斯特就信息劳动力主题的探讨令我们联想到了英才管理，因为英才管理认为一个人在职业结构中的成功需要的不是(继承的)经济资本，而是信息能力，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生们在他们的大学教育中获得的。至于那些进入信息劳动的精英竞技场的雇员，他们必须拥有大学学位的证明(尽管为了持续成功，他们当然需要有一份成功的历史记录)。当卡斯特强调当代资本主义是由那些掌握了信息资本的人所主导，拥有经济资本不再足以控制权力杠杆时，他其实采用了一种英才管理的原则。于是，不可避免地，大门便向那些获得了大学文凭的人敞开，然后他们就可以继续建造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履历。与之相反，不能够达到成为一个信息劳动力资格的人，肯定走投无路，不管他们的出身是多么地得天独厚。

与此关联的观点认为，信息资本主义的分层制度固若金汤，因为这样的分层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思考一下与资本主义的传统图景

之间的区别吧：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创造了财富，然后这些财富被富人们所剥夺；仅仅因为这些富人们控制了资本而居于支配地位，由此通过经济难关驯服工人阶级处于从属地位，而不是因为富人具备更好的禀赋。

批评

无论它具备什么样的英才管理，卡斯特的论断都体现出多种困难。最引人注目者是其寻常性，涉及对其论断赖以为基础的实际现象新奇性的怀疑。卡斯特对信息劳动力所拥有的变革能力及特征的强调，令人联想到一些早期他认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专家”的出现使世界发生了改变的论断。当提及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人群的特征时(Taylor 1976)，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1976)、塞尔日·马莱(Serge Mallet，1975)、肯尼斯·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1972)、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3)，以及再早一些的亨利·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都有他们各自强调的重点。有人强调该人群的技术才能，有人强调他们的认知能力，还有人强调他们所受的正式教育。但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提出了同一个论断：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同类型的精英是社会的关键参与者，上述立场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属于技术统治论(technocratic)，且都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劳动和(或)技术的分化必然伴随着一种权力等级的出现，由此导致一种“自然”形式的不平等的产生；这种不平等是超社会的，虽然它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同寻常(Webster and Robins，1986，pp. 49—73)。此论或许有点道理，但大量的证据表明，持续性的不平等，即最显赫出身的人依旧支配着最好的职业或事业前途，这种形势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任何对英才管理论断的无条件接受都必须受到质疑(Heath et al，2005)。

还有学者对卡斯特不认同，其异议就是批评卡氏提出的信息劳动力的概念维度过于宽泛，他依次强调了教育、沟通技巧、组织能力和科学知识，以信息劳动力之名笼统地混杂了范围广泛的不同活动

和能力。卡斯特的观点似乎以为分散的活动需要由具备组织能力和管理训练的人来协调；或组织倾向于由那些具有沟通能力的人来领导。此论并不新鲜，许多思想家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同样的观点，如罗伯特·迈克尔(Robert Michel，1915)的经典著作《政党》(*Political Parties*，1959)就描述过寡头政治的领袖所具备的特征——对组织的知识了解、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演说技能等等，这与卡斯特的信息劳动力的特征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

卡斯特对信息劳动力的宽泛定义，弱化了该术语的分析力。他不妨从另外的角度界定信息劳动力：如掌握了充足的技术知识，可以熟练地运用信息传播技术的人；或是掌握了科学知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熟知理论原理的人。管理可以作为一般分类的范畴，它体现了对组织能力、写作能力和策划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一位在城市中工作的股票经纪人和一位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维护水库的水利工程师之间当然迥然有别，但在卡斯特看来，他们都是信息劳动力。同样，在日报工作的记者与在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一样，他们都属于信息劳动力。所有这些人所具备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标准，他们都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实际上，按照与卡斯特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振振有词——做零活的木匠(可能是自己经营的)与一个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理属于同样的信息劳动力范畴，因为他们都需要进行有效沟通，需要分析、计划和协调他们的行动。卡斯特界定信息劳动力的观点如此富有弹性，甚至囊括了仅仅担任微不足道的领导的工作者，以及那些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组织，比如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有关的人。

信息劳动力的历史发展

如果我们暂时承认在整个劳动力中信息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多，必然垂问信息劳动力的新奇程度、数量以及重要性等问题。于此议题，历史学家哈罗德·帕金(Harold Perkin)的论著《专业社会的兴起》(*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颇有价值，因为它描绘了过

去的一个世纪，专门职业是如何上升至突出地位的整体图景，而卡斯特只描述了近期的情况。帕金认为，至少从1880年以来，英格兰的历史可以理解成“专业社会”诞生的历史，专业社会的支配地位主要来源于“由教育所创造的人力资本”(p.2)。专业人士无疑是“信息工人”，不过根据帕金的观点，他们的人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持续不断地增长。信息劳动力超过一个世纪的递增，不由得令人对信息劳动力的新奇程度及其强调范畴扩大的论断难以置信，疑云顿生。

此外，我们还可以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新奇程度提出质疑。许多评论家振奋于生物科技和软件工程，但过去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知识性行业，案例不胜枚举，如石化产品、医药品、航空航天技术、电子工程甚至银行业等产业都兴起于20世纪早期，它们对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无不贡献卓越。我们需要记住——凝固态物理、原子能、雷达、喷气发动机、塑料和电视，从产业上讲都举重若轻(当然，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且拥有重要的知识投入，都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

帕金还声称高等教育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享有特权的地位。一个人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个职业影响市场的能力，至少具备与教育同等的重要性。看一看如今的涡轮式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或译为超级资本主义)就会发现：大部分信息劳动力都从属于市场，这与卡斯特所想象出来的强有力的经纪人形象相去甚远。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攻击某些职业(例如大学教师、建筑师、研究员、图书管理员和医生)、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以及拥有高等教育文凭所获得的回报明显下降，其中的关键问题不是“信息劳动力”的权力导致这一结果，而是市场制度的权力使然。不管雇员们的智力水平有多高，市场制度乃重中之重。除了对资本在工作领域的决定性权力稍有限制之外，信息劳动力的兴起似乎没有产生别的什么影响。

许多评论家都迫不及待地声称高等教育的更大参与本身就体现了信息劳动力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在此值得对此草率结论的行为作一评论，仅就考虑一个规模扩大了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标准已经被改

变，以及不同职业与教育成就的契合度便可以提出棘手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参与率的迅速上升，一些质疑高等教育标准的系列严重问题层出不穷，这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广泛争议的问题（Phillips，1996）。无疑，雇主对雇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使职业本身并不一定需要雇员们具备更多的技能。例如，有迹象表明，学位正在显示一个地位利益的典型特征：如果获得这个学位的学生越多，那么这个学位在帮助学生获得一份有名望的工作方面越加贬值；而如果授予这个学位的机构相对来说具有排他性，那么这个学位的价值就会越大。

应运而生的问题——特别是鉴于卡斯特对信息劳动力被创造出来的价值强调——进入一些最有名望的大学，通常为进入高层次的信息产业开通了道路，而这些信息产业位于信息资本主义的中心。在英国，种种迹象显示，英国最具有排他性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限定报考者的社会出身。所以，在英国，一个年龄层中只有 7%的人从私立教育中受益，但牛津和剑桥的一半学生都来自于这些私立学校（Adonis and Pollard，1997），而这些数据显示的还是 10 年前的情况。名校与学生的特权等级出身之间不相称的关联不容忽视。在英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中，受过私立教育的学生占据着 25%—50%的比例，而他们只是同年龄层学生的极小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大学对学生的家庭出身存在着偏见，该现象显示的是私立大学具备确保其学生在公共考试中表现得非常好的能力，而学生在公共考试中的表现是影响大学录取的最重要的因素。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卡斯特未曾讨论过的，但却至关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显明的英才管理社会系统是不是仍旧偏袒某些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

有产阶级的持续存在

无可否认的是，对于所有相关者（包括资本主义企业本身）来说，全球化资本主义是一种混乱的、不确定的现象，但许多证据显示，最主要的股东乃是由那些对公司股票享有集中所有权的有产阶级组成。在这方面，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1982，1986，1991，1996）

的著作至关重要，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考察信息劳动力的重要性，但却利用一些证据反驳了卡斯特的核心论述。例如，斯科特提醒我们说，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控制从个人形式转向了非个人形式。也就是说，对公司的完全个人所有制正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共享所有制。所以，如今许多机构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大多都拥有公司，个人股东通常只拥有全部股份的一小部分。

卡斯特对此并不否认，但他随后就声称，根据管理社会学的传统，“管理阶层”负责公司的运转，并且因为它的管理能力，它“构成了处于信息主义之下的资本主义的中心”(1997a，p. 342)。但是，斯科特论证说，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失去了控制权，因为建立在互相缠绕的股权基础上的关系网络把他们联系了起来，并且通过一个“利益群”确保了他们的地位。

与卡斯特的观点相反，似乎仍然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制度掌舵(Sklair，2001)。这个有产阶级并不是像卡斯特所坚信的那样隐姓埋名，虽然从任何直截了当的意义上讲，这个阶级可能并不能掌控资本主义。毋庸置疑，卡斯特对资本主义一直以来(但可能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料性的关注相当正确。只要阅读来自远东、拉丁美洲的新闻和思考当代俄罗斯的困境，就会察觉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反复无常，乃至难以控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产者群体丧失了对上层等级的垄断。

在“资本再生产的机制”和“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局部分裂 (Scott，1997，p. 310)。也就是说，资本家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传给其继承人，但他们不能够保证把相关的最高管理职位传给他们，这个主要由对教育成就的要求而导致的分裂，并不离谱。实际上，斯科特认为有产阶级同样“形成了一个人才库，而公司的最高经理人都是从这个人才库中招募的”。而且，这个有产阶级在教育系统中尤其享有一种优势地位，以至于他们趋向于掌握了卡斯特所强调的高水平的信息技能，这无疑是上文提到的牛津和剑桥在招生时具有排他性的主要原因。斯科特指出，有产的资产阶级在整个企业系统中都拥有利益，并且他们可以通过对教育系统和财富的垄断

维护其既得利益，有产阶级位于整个分层制度的顶峰；与那些出身于一个从属的服务阶级的，位于企业等级制度各个阶梯上的人相比，他们享有更好的生活机会(ibid，p. 20)。

所有的企业高层管理者无疑都是不同类型的信息劳动力，但是如果把他们和与符号打交道的软件工程师、会计师以及新闻记者之流归为一类，那就大错特错了。位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心的的确是信息劳动力，但他们之所以位居中心且持续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特定的出身和教育，以及因他们所继承的财富所造就的难以估计的有利条件。随着资本主义越来越全球化，资产阶级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即便如此，也还有种种迹象显示出有产者群体的强大影响力，那就是他们进行自我再生产的惊人强度(Useem，1984)。

信息资本主义的起源

现在来讨论《信息时代》的更概念化的内容。卡斯特区分了他所谓的“信息化发展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后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论述以市场经济、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和私有制等等为核心。但是，一种发展模式是指生产出特定水平的财富的手段。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是一种发展模式，而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技术范式”(socio-technical paradigm)——信息化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新的创造财富的方式。卡斯特认为，在信息化发展模式中，“知识作用于知识本身的活动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如同上文所提到的，他认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与“信息革命”的历史性巧合促使了“信息资本主义”的产生。

但让我们想一想卡斯特使用的概念工具，其主张我们可以根据两条轴线去对变化进行考察。一条轴线是生产方式，另一条轴线是发展模式。生产方式涉及财富的供给，而发展模式涉及对财富进行管理和组织。这引发我们想起了丹尼尔·贝尔的开拓性工作，众所周知，是贝尔创造了“后工业社会”(他后来把它称为“信息社会”)的

概念，尽管他完全是在韦伯的框架下发展他的论断。曼纽尔·卡斯特(1996)虽然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比贝尔更激进的知识传统之中，也意识到他的许多观点受到了前辈的许多启发，他称贝尔是“信息主义的鼻祖”(p. 26)。但这句话远远不能够概括出他们之间深刻的一脉相承，但梳理其渊源关系可以激发我们提出一些标志着超越卡斯特研究路径的重要问题。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丹尼尔·贝尔的理论前提，受益匪浅是因为其与卡斯特的假设是如此接近。贝尔的论断和卡斯特一致，都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关于正在兴起的“信息时代”的主题如生产技术变得比以此为基础的特定社会制度更重要的论述，是贝尔论著的中心意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们可能会认为根本变革就是推翻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而贝尔却坚称社会最显著的变革是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而最后一个阶段被描述为信息社会。用贝尔(一位准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技术)取代社会关系(所有权)成为社会的主要轴心”(Bell，1973，p. 80)。

无论贝尔是多么地不愿意承认，他就社会变革的论述必然是建立在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技术支撑着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贝尔有着韦伯传统影响之下的美国社会学的烙印，他认为主要的历史性变迁包括三个标志性事件——从前工业主义(pre-industrialism)到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再到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每一次裂变都以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的技术进步为标志。

贝尔的观点与卡斯特如出一辙。虽然他在分析中对生产方式和信息化发展模式做了区分，确认我们实际上正处在一个“信息资本主义”阶段，但很显然变革的真正驱动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这种技术革命正在以加速的步伐重构社会的物质基础”(1996，p. 1)。卡斯特自始至终都采用了这样一个原则：“信息技术革命”是“网络社会”的奠基力量。可见，虽然卡斯特立足激进主义，但他却不折不扣地坚持发展的技术论，在这点上，他与丹尼尔·贝尔(实际上，与对“信息时代”进行探讨的所有其他理论家)毫无二致(Kumar，

2005)。如果只是假定“网络社会”是通过“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产生，但却不对此做具体的说明，那么不管他采用如何别致的术语，他都将会面临质疑，因为他把变化视为发展，而所有阅读后工业理论的人都很熟悉一系列等级式的向上递升的阶段：不管是从工业主义到后工业主义(贝尔的概念)，还是从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卡斯特的首选术语)，我们很难看到这两者的实质性区别。由此可以断定(也必须如此)：卡斯特坚持认为一个特定的技术基础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前提和决定性因素。

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选择得以减少的问题(虽然实际上它的暗示如此)，因为这种立场公然否定了对技术变革所做的众多社会学分析。在这些社会学分析中，有一种分析非常引人注目，即把技术想象成一种独立的、反社会的现象，但却认为技术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论，非也。

划时代的变革

卡斯特假定信息资本主义标志着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在此，深入思考他的假设正是时候。虽然资本主义在大范围内仍然存在，但很明显卡斯特相信——如同他的三部曲的标题所显示的——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信息时代”。现在，笔者希望以一些问题来考量卡氏的论述——如人们怎样识别出划时代的转变？此时，质疑卡斯特的信息概念本身很有必要，笔者认为他所提出的信息概念充斥着折中主义的色彩，令人迷惑，虽然他描述的中心是划时代变革。

只要稍想片刻，我们便可明了划时代转变实在笼统模糊，甚至难以通过那些极为重大的发展来识别。例如，战争和瘟疫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饥荒和宗教危机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但是，若把这些事件提升至一种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它们能够成为划时代变革的信号，这是需要一个解释框架的。这里并不是要否认特定事件和过程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阐释依旧是必然要求。旁观者并不能完全看到划时代变革：充分的证据以及论据的品质才可以阐明标志性事件

(marker)比其他事件更具说服力。扼要地说,我赞同那些描绘划时代历史的作品,并且相信它的可能性。而同时我也承认那种划时代转变的存在并非不言自明,不管它是通过政治趋势、经济发展,还是通过技术革新的形式体现出来。

马丁·阿波罗(Martin Albrow,1996)在他情趣盎然的《全球时代》(*The Global Age*)一书中强调——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识别历史上发生的变革的方式。他区分了三个历史时代——中世纪(the medieval)、现代(the modern)和全球时代(the Global),他声称我们最近刚刚步入最后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源于多种因素的积累所造就,但却以各种经济、政治、教育和环境事务的变迁为标志。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们强调了其他标志性的历史变革,即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另一套不同的指标——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虽然曼纽尔·卡斯特并没有明确地对此进行详细讨论,但毫无疑问他认同信息时代体现了一种对过往时代的划时代断裂。

显然,卡斯特特别强调了标志这场变革的信息发展(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但我们必然发问卡斯特,在他对信息新时代的描述中,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他的三部曲中,他采用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从对"网络社会"的强调(在此这个概念是指信息的流动,也是"网络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到由电子设备所带来的工作过程的自动化,到对信息劳动力(具有许多核心特征比如沟通和分析技能)的中心性强调,到把信息主义定义为"知识作用于知识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1996, p. 17),再到声称"信息化"(informationalised)社会是"信息的生产、处理和传递成为生产力和权力的基本来源"。我们很容易认识到上述言论中,信息的概念各不相同。例如,"知识作用于知识"(knowledge upon knowledge)的行为不能归结为一种信息流动,因为,例如,一个工业设计师可以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投入而使产品增值,但这种活动对信息网络几乎没有需求。同样,信息劳动力(至少是它的一些要素)在非日常使用一个信息网络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转得非常有效率。此外,问题重重之处在于——

到底网络是由什么构成的？因为这可能是指两个人讲电话，也可能是指存在于计算机终端之间的海量的电子信息交换。

完全有充分理由询问卡斯特——到底哪一种信息的定义能够最贴切地标记这个新的时代？笔者已经说过，他常常回去讨论那些常见的技术，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ICTs），这看起来似乎是在定义“发展的信息模式”，虽然这与他在别处对信息劳动力的中心性的集中讨论有些不协调。当然，实际上，卡斯特汇合了许多关于信息的不同观念，他捕捉到了一幅宏伟蓝图，大概立场如此：信息增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行动者（actors）和场域（sites）之间的信息活动增强的重要性，就是卡氏声称的“网络社会”这个新时代与过往时代的区分。

尽管如此，这个同质化的进程并不充分，因为还存在一个关键问题——那种能够识别出这个新时代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卡斯特著作暗示——几乎任何事物都与信息有关。此论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必须去探究如何区分更重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事物。如果我们去思考另一种信息概念（如果仅仅是为了探索的目的），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对立立场。稍微关注一下戴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54）的著作，以及更近的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1994）的著作，人们或许就会根据理论知识所扮演的角色来划分历史时代，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论知识定义为一种抽象的、概括性的，并且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被系统化的信息。

贝尔纳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使用理论知识的时期。所以，被称为科学革命时期的16、17世纪，是以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知识的发展为特征的（这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了关于行星运动、重力等等知识的时代，这种知识的发展是启蒙性的，但却不实用）。贝尔纳提出的第二个时期是工业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从18世纪中期延伸至19世纪，以深刻的实践变革为特征，虽然那些开创了工业革命的人们总体上都缺乏理论知识；像乔治·史蒂芬逊之辈为了回应现实需求，而去发明诸如火车和蒸汽机车的技术。第三个时代，也是最后一个时代，被贝尔纳称为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的20世纪，此时，理论知识开始与实际活动结合起来。这方面的

例子不胜枚举，从航天技术到雷达的发展，从纺织品到塑料。在此过程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在技术的生产中，理论知识扮演着中心角色。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94)证实了这一主题，他认为在19世纪，“理论家们已经处于驾驶座上……告诉实践者们他们所要寻找的是什么，并且应该在他们的理论的指导下去寻找”(pp. 534—535)。

在此，笔者的观点并不是要说服读者们认同理论知识区分了不同的时代(虽然我的确认为理论知识作为一种视角，值得赘述)。还不如说在考虑到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方式时，我们或许会对卡斯特的“信息时代”的信号提出质疑。理论知识并没有出现在卡斯特的方案中，但就其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也该有例可寻。而且，这种另类概念化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卡斯特对信息定义的模糊性。

结论

不幸的是，我们要在一种不和谐的基调中结束对曼纽尔·卡斯特的讨论。卡氏的三部曲独具匠心，使得他能够跻身信息时代引领潮流的评论家行列。就卡斯特对其当代世界的趋势和动力的分析而言，后辈难以超越他的丰碑。他如此渊博的研究，经验性证据充分且概念丰富、业绩卓越。《信息时代》乃学术巨著，饱含激情，对世界时事洞明了然。最重要的是，该书展示了信息的流动以及它们所使用的网络怎样在我们如今的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是概念化当今时代最 一语中的的路径，我们很难不认同他的命名。不过，卡斯特的论述还是存在着一些异议和一些实质性问题——比如低估阶级不平等的显著性，挥之不去的技术决定论始终制约他对持续性和变化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以及他对信息理解的模糊性。现在，任何信息研究的分析家无不从曼纽尔·卡斯特的著作开始讨论，但我们对信息的论述却不能止于《信息时代》。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位分析家都必须承认信息和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例如，对于任何人，甚至是对于那些浮光掠影的人来说，都可以证明——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如今的图像铺天盖地，并且有若干新媒体技术可用来传递这些图像。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信息网络如今无处不在，覆盖全球，运行及时，并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处理海量的信息，令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电报和电话逊色而过时。互联网的崛起尤其引人注目，1995年，欧洲能连上互联网的电脑几乎为零，而十年之内，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能够连上互联网(Eurostat，2005)。习惯对社会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但是在一些国家比如英国，超过一半的家庭都连上了互联网(Oxford Internet Survey，2005)。数据显示美国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比比皆是(Cole，2005)。我们岂能忽视办公室无处不在的计算机化工作站(computerised workstations)；滚动新闻和数字化电视频道；迅速普及和日趋复杂的电子游戏；广告的急速扩张及其衍生出来的比如体育赞助、直邮，以及公司形象推广等形式。我们岂能视而不见？总之，“信息爆炸”是当代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特征，任何忽视这点的社会分析家都要承担被社会嘲弄的风险。

如前所述，许多思想家都相信这预示着一个新的“信息社会”的

来临，这些思想家中最著名的是丹尼尔·贝尔。对于他们来说，新奇和变化乃是过去与现在的决定性突变的关键所在。以这种分析作为背景，在此，我将重点讨论对于“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arxist）（或许称为“马克思主义者”[Marxian]更为合适）分析，赫伯特·席勒将是我讨论的中心。赫伯特·席勒承认信息在当今时代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它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他认为信息和传播是现存的为我们所熟悉的既有资本主义进取的基本元素。

他在30多年以前就承认甚至强调，我们生活的时代，不管以何种尺度来衡量（by any measure），“‘信息’的生产与传输在整个系统中成为主要的不可或缺的活动”（Herbert Schiller，1976，p. 3）。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思想家们彼此共鸣，执著于社会分析中的常见议题的讨论，而且他们中也有很大一批人深深意识到了信息领域的动态。在赫伯特·席勒的引领之下，思想者们比如英国的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以及尼古拉斯·伽汉姆（Nicholas Garnham），荷兰的哈姆林克（Cees Hamelink），法国的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芬兰的卡尔·诺顿斯壮（Kaarle Nordenstreng），以及北美的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格罗德·苏斯曼（Gerald Sussman）和斯图亚特·伊文（Stuart Ewen）等，都着眼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如何依赖和推广信息和信息技术进行了系统而一致的分析。就此而论，这些饱含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成就卓越，具有极高的公信力，值得认真关注。

有许多批判理论家着墨评论20世纪后期信息领域中的动态趋势，赫伯特·I.席勒（1919—2000）乃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同丹尼尔·贝尔一样，席勒是成长于纽约的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但与许多同样来自于纽约和纽约市政府为工人阶级家庭提供免费教育的（educational forcing house）城市大学（City College，CCNY）的同时代人不同，席勒在其成年的时候，政治上还没有显露其锋芒（Bloom，1986）。在战争年代，他父亲失业日久，战争年代的经济萧条，以及他于1943年到1948年在北美和欧洲军队中服役的阅历使他趋于激进。虽然他自己家境贫寒，可是当他看到摩洛哥和阿尔及

利亚的极度贫穷时，深受震惊。而在德国，他看到美国和英国官员在反共情绪上升时重新恢复了纳粹分子的重要职位，席勒惊骇不已。在他的成年生活中，赫伯特·席勒始终持左翼的政治观点。他一直都敏锐地关注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的状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朝不保夕，且基本上生活在或者接近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他在柏林的经历，使他怀疑美国政府反复宣称其在国内外的行动都至尊无上的断言(Maxwell, 2003)。

虽然他进入学术界很晚——1969 年，他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而他在信息/传播领域任教也只是在这两年以前的事情，但是他对人们理解“信息时代”有着显著影响。这不仅来自于他勤勉地出席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各种会议，在其广阔的舞台上，他所展现的演说和论辩技巧令人难忘。他高大而瘦削，带着清晰的纽约口音，许多见过他或是听过他演说的人都被他那充满嘲讽的智慧和雄辩所折服了　而且因他每年定期出版的论著，声誉非凡，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思想的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谁知道呢?》(*Who Knows?* 1981)、《信息与危机经济》(*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1984)、《文化产业》(*Culture Inc.* 1989)。另外，他著作中所强调的穷人、弱势群体以及欧洲和北美以外的非核心国家的问题也成就了席勒的盛名，“信息社会”的狂热者们对此恰恰忽略不论。

政治经济学

赫伯特·席勒受训于经济学专业，1970 年，他担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传播学教授，教书育人三十年，直到去世。经济学的专业背景与旨趣，以及他个人激进的政治倾向，促成他以“政治经济学”路径在研究传播与信息议题中担当旗手，引领学术发展。这种以政治经济学为取向的传播研究要义繁多(cf.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笔者列举其中的三个重点加以讨论。

首先，政治经济学路径坚持认为要辨明隐藏于媒介信息——比如，以新闻报道和电视剧本的形式存在背后的结构性特征，典型的是经济方面的特征，比如所有制形式（广告收入的来源，以及受众的购买力）。比如，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这些结构性因素深深限制了电视新闻的内容以及计算机程序的类型。其次，“政治经济学”路径主张对信息/传播进行制度性分析（systemic analysis）。他们尽量把一个特殊的现象，如一个有线电视台或者一家软件公司——置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环境之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环境始终都是资本主义的环境，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出发，以及不时地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本身，去评估信息领域可能发展的轨迹与重要性。另一种说法是“政治经济学”路径强调了整体分析（holistic analysis）的重要性。但是，批评者们认为该路径实乃一种封闭的取向，因为既然任何事物的运行都从属于一个整体的“系统”，则没什么大的变化会发生。为了应对这些批评，第三个重要特征开始浮出水面。这就是对历史的强调，即划分出资本主义趋势和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以，政治经济学家们关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些不同的时期中，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特定限制和机会。

对后者的关注体现在席勒的著作中，席勒尤其关注当今信息传播领域的动态趋势。他的立论起点是，信息与传播对于当今的资本主义时代至关重要，是建构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经济制度之关键。实际上，呼应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重要论文观点，席勒和其他持有同样观点的思想家们都认为“精神产业（the mind industry）”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二十世纪的核心产业”（Enzensberger，1976，p. 10）。赫伯特·席勒往往首肯此观点，例如：

> 毋庸置疑，这个时代信息空前繁多，生产、储存、搜索、处理以及传播这些信息的机器的质量和特征是绝无仅有。现实的信息创造、储存和传播的基础设施引人注目。
>
> （Schiller，1983a，p. 18）

当然，这也是其他评论家的出发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其体现了一种新社会类型的信号。但是，席勒却并不这样认为。虽然出现了许多额外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资本主义所占有的优势和所面临的压力却依然如故。所以，“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被超越的观念相反，一如既往，长期以来在市场经济中盛行的规则依然在技术和信息领域发生的变革具有决定性作用”(Schiller，1981，p. xii)。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对上述问题的强调相当关键。不错，很多变化发生了，有许多变化甚至令人感到恐惧，但是，资本主义及其追求的目标依然持续如故。例如道格拉斯·凯纳(Douglas Kellner，1989b)承认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一些根本的、引人注目的变化已经发生”(p. 171)。他喜欢用“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个时期，因为在该时段“新技术、电子工业和计算机化开始取代机器和机械化，而信息和知识开始在生产过程中，以及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组织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p. 180)。但是，这些新的发展并没有使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过时，也没有取代既有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实际上，凯纳继续论述这个制度基本上保持得完整无缺，同样地，早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使用的术语(如“阶级”、“资本”、“商品化”和“利润”)依然发挥功用(Kellner，1999)。实际上，有人认为它们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在当今时代，信息与传播发展被如此频繁地解释为其体现了与先前社会的断裂。有些学者主要关注“后现代”、“后工业”或者“后福特主义”社会的形成，凯纳辩驳了这些学者的主张，他发现那些长期被我们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尤其有助于成为“所有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替代”(p. 177)。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了信息领域的资本主义规则的重要性，对这些关注进行整合的要素是权力、控制和利益所扮演的角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赫伯特·席勒坚持不懈、矢志不渝，认为“关于新信息技术的特征和前景的中心问题是我们熟悉的标准：新信息技术将在谁的控制下为了谁的利益得以实现?”(Schiller，1973，p. 175)，这依然是那些与席勒列于同一战壕的学者们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他们各陈己见，突出论题。这些议题会常促使我们回到现存的

环境中去解释新现象。再如后文所示，由此议题去强调新技术所支持的社会关系的连续性。例如，典型的席勒式问题就在于谁发起、发展和应用具有创新性的新信息技术？特定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和应用它们？这些变化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和为了谁的利益而获得了提倡？信息领域的膨胀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膨胀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表面上看来，这些问题并非是特别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但当我们将其与批判理论的其他要素联系起来，我们会更欣赏它们的力量。

关键论点

赫伯特·席勒的著作至少特别强调了四种论断。在此先提及，本章后面的部分再进行阐述。第一种论断关注信息发展中的市场标准的相关性。由此观点看来，购买、销售以及通过贸易获取利润的市场压力对信息和通讯革新具有决定性影响，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席勒（同样对于陪伴了他五十年的妻子安妮塔[Anita]，一个研究信息趋势的图书馆馆员）来说，市场原则的中心性是引发第二种主要论断——信息商品化的强劲推动力。信息的商品化意味着信息愈发只有在能够出售的条件下才能够成为可能。从这个方面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信息与许多其他东西并无区别："如今信息雷同商品，就像牙膏、早餐荞麦食品以及汽车一样，被越来越多地购买和出售"（Schiller and Schiller, 1982, p. 461）。

第三种论断坚持认为阶级不平等是影响传播信息、是否能接触到信息以及具备何种能力生产信息的主要因素。阶级直接决定了谁会得到什么样的信息以及未来可能会得到何种类型的信息。所以，依据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的等级中所处的位置，就可以判断出他可能在这场"信息革命"中是受益者还是失败者。

赫伯特·席勒的第四个关键论断是，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领域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社会是企业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是被具有某些特定特征

的企业机构所支配的。如今，这些高度集中的、绝大多数为寡头垄断式的（极少是垄断式的）组织都具备全国性影响，一般来说也贯穿国际。如果要描绘这种景象，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垄断了我们的能源供应的若干石油公司：壳牌（Shell）、英国石油公司（BP）、埃克森（Exxxon）、德士古（Texaco），以及其他一些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巨无霸、高度集中的企业。虽然它们覆盖了非常广阔的地理区域，连接了各大洲，但它们也同样渗透到发达国家的每一个小镇和每一个大的村庄。

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当代资本主义属于这样一种类型：无论在哪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企业集团，仅仅数百家（Trachtenberg，1982；Barnet and Müller，1975）。所以，在席勒看来，企业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在信息领域尤为明显。其中，首要原则就是信息和信息传播技术是为了私人目的而不是为了公共目的而发展。同样地，企业资本主义对此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当代社会中任何其他潜在的支持性力量对此造成的影响。

无疑，这些显然都是资本主义的一些既存特征。自从资本主义露出端倪开始，市场标准和阶级不平等就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元素。至于企业资本主义，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cf. Chandler，1977），尽管其许多最独特的形式在20世纪晚期才出现。但对于赫伯特·席勒来说，这正切中问题的要害：资本主义制度长久以来确定的特征、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原则，构成了所谓的“信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由此看来，那些认为信息趋势意味着一种与过去断裂的观点，简直难以置信。席勒肯定会质疑，一个人怎么能够认为那些造就信息与信息传播技术的推动力反而要被它们所创造的东西所取代？相比较而言，更有理由相信“信息革命”实现了它的设计者们所期望其实现的——巩固和扩展资本主义关系。

我们在此持有的观点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信息社会”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律令，即企业和阶级关注以及市场的优先目标对新的计算机通讯设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信息发展同时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席勒由此来解释信息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重要性，

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如何影响到信息领域，同时他也说明了信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一种核心基础。

跨国帝国

如果我们略微考察席勒关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的观点，我们会更了解席勒是如何审视问题的。他对企业资本主义在规模和范围上的扩张，以及它建立了可被称为“跨国帝国”(transnational empire)的事实尤为警觉。“跨国帝国”这个术语可能言之过重，因为其隐藏着一种“帝国的”含义，但无可争议的是，在20世纪，我们都目睹了一个全球市场的建立以及美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当然，也包括欧洲公司和日本公司)。稍稍思考一下，我们就会觉得以下事实不言自明：汽车产业如今是个全球性的活动，其中像福特、通用汽车和日产之类的公司占据主导地位；提到计算机，人们就会想到IBM，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但实际上仍是大的)公司如数码设备公司、戴尔公司和苹果电脑公司；通讯产业就意味着AT&T、ITT，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等地位和同等特权的巨头。

这些发展推动信息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反之亦是维系跨国企业发展之必需。这一方面是因为，为了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那些全球性公司需要使用先进的计算机通讯基础设施以支持它们的日常运作。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一个可靠而先进的信息网络，一个总部在纽约的公司如何能够协调和控制在其他五十或者六十个国家的分部的活动(还包括在美国本土的许多分部)？实际上，跨国公司在其日常营运中，每天都会发送成千上万的通讯数据和文本信息。更进一步，信息网络不仅对于特定公司的内部运作非常重要，它对于连接各种商业服务也至关重要，而后者对于全球市场的运作相当关键。无怪乎国际金融网络在信息领域中处于十分显赫的地位(cf. Hamelink, 1982)。

对于赫伯特·席勒来说，这表明信息如何服从于企业的需要。但是，一个不那么尽责的观察者会认为，虽然多年以来，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依赖信息网络，但“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只是碰巧符合企业的利益而已。对于这种推理，存在着两种反对意见。如后所述，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是一种特定的类型，这种类型势不可挡地体现了把企业利益作为优先目标考虑。第二种反对意见与第一种反对意见一脉相承，它来自于赫伯特·席勒的大儿子丹·席勒(Dan Schiller，1982，1999)。丹·席勒认为计算机通讯网络的孕育——定位、技术标准、定价策略、网络连接访问政策——都显著地把商业利益标准置于公共利益标准之上。换句话说，丹·席勒对于信息网络历史的描述显示，企业利益形塑了信息网络的发展，并且使之成为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于是，信息便是为了符合企业利益的需要而发展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的流动。

在此，丹·席勒的研究尤值提及，因为其论述强调了信息和企业活动的相互关系。他描绘了信息通讯业(telematics)(计算机和通讯设备)在三个领域内的扩张：美国国内市场、跨国传播领域，以及由美国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领域。丹发现信息通讯业的发展乃以美国企业的扩张和分布为样板。他声称无法想象信息网络不会被创造出来，因为企业的扩张对它们有如此迫切的需求。当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当它们在美国境内或美国以外成立越来越多的附属子公司，“只有信息传播业能够控制和统一这种复杂中央集权式公司的需求下产生的工业和商业活动”(Dan Schiller，1982，p. 4)。从初创伊始，传播设施就被引导着朝有利于企业利益的方向发展，这些公司坚持不懈地进行游说以确保这些服务能够以最有利于它们的方式发展。所以，丹认为，“商业用户对发达的信息通讯业服务的高需求已经有效地获得了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从而不仅仅加强了他们对信息技术的私人控制，也加强了对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控制”(1982，p. xv)。例如，丹论证打破美国国内通讯业“自然垄断”，以及终止通讯行业的“全面服务”理念所面临的最强烈的压力，来自于那些对这些发达的通讯服务(尤其是处理数据和文本)存在着很高需求，但又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这些服务的公司用户。美国国内通讯业世世

代代都是由 AT&T(贝尔系统[the Bell system])所掌控,而"全面服务"理念是伴随着政府给予它们垄断特权而来的,政府给予各项服务的混合津贴(cross-subsidisation)也是为了"全面服务"。这样,认识到美国国内通讯业是以有利于私人公司的形式进行重组的,这些公司"为了获得国家通讯业基础设施的控制权的努力"(p. 61)几乎排斥了一些关于公共需要的考量。

国际上,相似的进程比比皆是。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信息网络,它们坚称这些信息网络是基于公司的特定需求而设计和运行的。所以,那些为美国利益所主导的私有公司便不断地在欧洲进行游说,以期欧洲能够提供给它们所需要的高级服务的通讯网络。跨国企业在此面临的阻碍是欧洲长期以来确定的惯例,即通讯系统是公有的和垄断的。在这个背景下,没有哪个集团不为了通讯业的"自由化"、"解除管制"和"私有化"而不向欧洲政府施加强烈的压力(Dan Schiller, 1982),大的跨国公司亦然。跨国企业都获益于日益开放和日益商业导向的服务(pp. 139—143)。

虽然信息竞技场(information arena)反过来成了支撑资本主义的健康的核心力量,但它是为了促进跨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和利益而得以发展,它发展的另一种方式是作为一种出售机制。赫伯特·席勒证明那些浩如烟海的媒介影像(imagery)只有在市场意义上才能够被制造出来,同时,它们主要也是为了辅助美国产品的销售而被制造出来。所以,电视节目、好莱坞电影、卫星广播——简单地说美国在其中担任领导角色的娱乐产业(cf. Tunstall, 1977, 2006)——是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是为了促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一方面,这体现为电视频道只建立在那些存在着可实现的商业机会的地方,电视节目也是基于商业标准(最常见的商业标准是充足的广告收入)来供应。这对于电视节目的内容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那些煽情的和充满情节的冒险剧、肥皂剧和连续剧、体育节目、智力程度低以及没有政治威胁的节目已经主导视频,琳琅满目,但最好多多益善。最大可能的受众收视率是所有这些节目受众的目标所在,而这最能够吸引广告商和公司赞助商。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大众媒介的信息支持，难以想象一些产品——比如李维斯牛仔裤、可口可乐饮料、福特汽车或万宝路香烟能够参与全球营销会（Janus，1984）。在赫伯特·席勒看来，这是最深刻的影响（cf. Mattelart，1991）。实际上，这是所有严肃理解资本主义的起点：作为企业资本主义扩张的一部分，美国媒介理所当然会赞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众多电视节目所描绘的美丽家园、名流汇集、诱人的服装和饮料、休闲生活，以及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和机遇。需要承认的是，一些通俗节目的确涉猎了当代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位于都会内城的底层阶级生活。但诸如此类的节目依旧以某种魅力和刺激深深吸引首尔、马尼拉以及圣保罗的受众为之喝彩。美国媒体的主要目标不是在《达拉斯》（*Dallas*）、*ER*、《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牧野风云》（*Bonanza*）或者《老友记》（*Friends*）所创造的幻象中教育印度尼西亚人、意大利人或者印度人。反之，美国媒介的目标是“开创市场并获得一个尽可能大的世界市场”（Herbert Schiller，1992，p. 1）。

由此看来，悲叹无济于事，“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可以达到关于越南战争或者奴隶制遗产的辉煌纪录片那样高的标准？”真正的中心问题却是，既然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所预定的规则是销售以及辅助销售，我们只能期望娱乐信息支配大众媒体。实际上，既然大众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扩张和延续市场制度，那么为什么那些关注少数人利益，关注苦难或者充斥着批评的节目被制作了出来？这才是关键问题之所在。

信息趋势反映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以及支持其延续的合谋路径在于它们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供了意识形态表达。当然，此论与前述的销售功能的关系源远流长。媒体创造的影响刺激人们去购买公司生产的产品，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也会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提供支持。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礼赞同样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

不过，赫伯特·席勒既没有忽视大众媒介对美国意识形态统治做出的贡献，而且他还开门见山地阐明了所向披靡的源自美国的大

众媒介向跨国帝国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关键原因在于美国可以凭借其在全球所享有的生产和流通新闻方面的绝对重要地位达成其夙愿。毋庸惊讶，作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来源，美国媒体（英国或其他一两个国家的媒体紧随其后，屈指可数的一两个国家在经济组织模式和政治态度上志趣相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属国的利益。而结果呢，“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以及“私有制”等辞令与这种经济和社会状况也被新闻媒体频繁鼓吹。同样地，“经济健康”（economic health）和“产业成就”（industrial success）也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中盛行的术语和条件来定义——因此，“竞争”、“市场”和“商业信心”等辞令被不假思索地使用，用来描绘那些假定为正常的和欲望可及的境况。

更重要的或许是，世界大事以及发展趋势都来源于都会（通常是美国的）视野。新闻中关于其他国家的报道通常仅至于此程度，即发生在这些国家的事件对美国有显著的或者潜在的影响——除非一个灾难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即它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足以使它成为新闻。例如，1993 年末，索马里（一个位于非洲最东端的国家，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够在地图上指出这个国家的位置）被美国媒体广泛地报道，因为一群美国士兵在那里被当地民兵所杀害。像海地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当其发生的一些事件将可能会对美国的移民问题产生重大影响时，才会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同样，中东事务也主要是当那里发生的危机会牵连到美国及其盟国时，才会受到美国媒体的报道。像印度、非洲和中国（几乎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一半）等国家和地区，也大多是因为那里发生了带来成千上万的人员伤亡的悲惨事件，比如地震、洪水和饥荒，才获得了媒体的关注。此类框架只有当地发生了会对美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时才得以改变，比如 2001 年年初，中国截获了美国的一架侦察机，于是在四月的若干日子里，中国成了美国媒体的头条新闻。美国媒体关于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随后占据伊拉克的报道特点与此雷同。虽然在全球的许多媒体上出现了排山倒海的反战言论，但美国的新闻报道显然支持这场由美国发起的战争，且不给予任何批评（Tumber and Webster，2006，ch. 4），

美国媒体亦很少为那些明显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对这场战争的普遍异议提供报道空间。

与此相关，那些由世界新闻业发布的国际新闻有90%来自于四个西方通讯社，其中有两个来自美国（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一个来自英国（路透社），另一个来自法国（法新社）。这些国际新闻体现了它们的基本关切：例如，合众国际社2/3的报道都关乎美国，只有不到2%的报道关于非洲。报道如此失衡，美国（普遍地说，指西方国家）不需假借比如"西方是最好的"、"美国方式"（the American Way）或者"支持资本主义企业"等直白讯息，就可以发挥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西方通讯社以势不可挡的西方视角进行事件报道，各项议程聚焦都会，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仅作为如"战争"、"政变"、"灾害"、"旱灾"等等诸如此类的"动乱"（主要是这些动乱影响到那些支配国家时）发生时的点缀进行报道。在新闻报道中，非西方世界"问题重重"，于是两种媒介再现油然而生，非西方国家要不是很容易被描绘成令人沮丧、不可信任、易于发生激烈的暴力行动；或者就是生活在非西方的人们受到了另一场飓风、火山爆发或者是庄稼歉收的打击，变得楚楚可怜。借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的话说（他的观点与赫伯特·席勒的观点一致），在绝大多数时候，非西方世界的人都"仅仅是作为被粘贴在电视屏幕上的失语者、无能者"（Pilger，1991b，p.10）而出现。总之，他们看起来不像是"真实的人"，至少不是"如同西方世界一样的人"。他们（非西方）的表现利于维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只拥有世界上25%的人口，却拥有80%的世界财富）乃非常"天经地义"的信念。

此外，虽然这里提到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闻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地位，我们也不应忘记它们同时享有的技术优势（卫星、通讯、计算机等等），这些技术优势为支持其观点提供了难以超越的有利条件。这又与美国在娱乐领域的首要地位联系了起来：电影是美国的，电视是美国的，还有，大部分音乐产业也是美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资金，聚集资源进行全球性的市场推广，也只有它们才有这个能力去生产、存储和流通肥皂剧。易于

承认的是，在这些领域中，意识形态讯息经常是不清晰的，偶尔存在着细微的差别，甚至还时常与私有资本所支持的目标背道而驰。但是，难以怀疑的是，总体来说，美国娱乐业中的讯息，不管是《大草原上的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我爱露茜》(*I Love Lucy*)，还是《老友记》，都是支持美国的自我感知的。在美国的自我感知里，美国社会值得向往和憧憬，非常令人倾慕，堪称非美国世界的垂范样本。

当然这只是赫伯特·席勒的观点，他是“新世界信息秩序”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席勒的立场是基于这个逻辑前提的：在媒介再现的表象之下，存在着划分世界人口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1992 年 5 月，他在法国的演讲极力呼吁大家对“富国和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的关注。席勒认为“全球性不平等”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的支配，同时他还深信西方媒体通过提供支持的观点和影像促进了这种支配(Schiller, 1992, p. 2)。

在席勒看来，贫穷国家为了改善自身的命运而付出的发声努力，其必要条件就是挑战“信息帝国主义”(information imperialism)。当今世界的信息环境完全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笼罩(McPhail, 1987)。新闻、电影、音乐、教育以及图书出版被批评为是一条“单行道”(Varis, 1986; Nordenstreng and Varis, 1974)。甚至一些非激进的分析家也同样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对西方世界的“媒介依附”(Smith, 1990)。还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这种状况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深表关切。例如，在法国，对占优势地位的美国媒介产品危及法国文化的完整性提出抗议的悠久传统由来已久(cf. Servan-Schreiber, 1968)。这并不是特例，迪森(Dyson)和亨弗里斯(Humphries, 1990)同样观察到，“许多西欧的广播公司和政策制定者都担心铺天盖地的《达拉斯》会造成西欧文化认同的丧失”(p. 19)。

对于赫伯特·席勒来说，这些都构成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一种支持西方的支配地位，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支配地位的信息手段(Tomlinson, 1991)。他在每一个前沿倡导挑战“帝国主义”，因此，席勒呼吁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

(NWIO)，其倡议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生了显著影响，(Nordenstreng，1984)。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这项倡议时，导致美国退出了该组织(Preston et al.，1989)。席勒从对1989年发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争论进行回顾开始，他梳理了那些为了争取一个新世界信息秩序的运动的发展历史。由此，他更清晰地阐明了他关于当今信息环境的独到观点。他说，新世界信息秩序是：

> 一种努力……为了获得对流向第三世界国家的信息的些许控制权，为了夺回对其民族文化的控制权。第三世界国家希望能够定义它们自身的问题并展现关于它们生活的不同影像。在西方国家，所有这些都已经完全被扭曲。在西方国家，如此再现了新的国际信息秩序的呼吁，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为了奴役他们的人民，而压制所有自由流动的西方"启蒙"。显然，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确存在着一些独裁主义者，但把寻求新世界信息秩序的整个活动都笼统而言，显然是一种公开扭曲事实。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寻求新信息秩序的呼声已江河日下。但我们仍拥有一种新的秩序——跨国的信息秩序。
>
> (Schiller，1989b)

无疑，这种马克思主义论述特别强调了企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对信息环境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其对国内信息环境产生的影响，还是其对国际信息环境产生的无情影响。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此并不仅仅简单地识别对信息领域施加影响的压力，恰恰相反，信息产业在企业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活跃部分。所以，企业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也同样是媒体公司扩张的历史。与整个企业资本主义一样，媒体公司已经大规模地扩展，集中化为数个媒体大公司，频繁多样化其利益，并且决然粉墨登场于国际舞台。

市场标准

赫伯特·席勒认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当代信息环境体现了企

业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优先目标，并且是维持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路径的信息研究，值得我们去讨论的远远不止于此。倘若我们要阐释和举例说明资本主义的关切如何对社会的“信息化”产生影响，我们大概会更欣赏批判理论家所做出的贡献。

以市场这一资本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为探索的开端，受益匪浅。席勒主张——市场原则（最为强调的是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贯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信息领域也的确如此。所以，信息生产的律令就是唯有拥有出售信息能够获取某种利润的前景，才可能有信息生产并为人所利用；而且如果拥有最有利可图的机会，信息生产就异常充裕且品质上乘。可见，市场压力决定了何种类型的信息在什么情况下为谁生产。

市场压力与新技术的初始阶段同在。为了充分理解席勒洞见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警觉：研究“信息社会”的理论家如此司空见惯地认为技术领域的革新预示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这种观点意味着技术刚刚“诞生”，以一种无法调查和无法质疑的方式被“发明了”，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它们就被积极地或者消极地使用。由此看来，新技术在促使“信息社会”的到来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技术是公正的，不受任何人类价值以及地区利益的驱使。与这种观点相反，那些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决定性力量的人坚持认为，市场产品铭刻了市场价值的烙印。Thorn-EMI 当时的主席提供了令人惊叹的案例，Thorn-EMI 是英国主要的信息传播技术供应商和信息供应商。该公司主席宣布他的公司“退出医学电子工业，理由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没有获利的可能”（Thorn-EMI，1980）。在这个例子中，起到有效作用的价值是，Thorm-EMI 认为其利润最大化应遵循集中在娱乐性产品的策略。医学电子工业不能支持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电视、视频以及其他一些休闲产品却能够财源滚滚，于是，Thron-EMI 当然采取实现市场成功的目标。

支配着信息产业的企业恬不知耻地以市场原则来运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企业都使它们的生产转向利润可观的前景领域。此论

在当今而言，罕有异议，但它却令确信在“信息时代”的信息技术乃硬件，且远离社会影响的人困惑（毕竟信息技术不受抑制，一台个人电脑可用于写作布道文，也可以展示春宫色情。个人电脑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它高于社会价值），并且/或者更多的信息本质上是好事（也就是说，信息多多益善，此乃根深蒂固的成见）。

追随这种批判理论的座右铭的人，例如，从市场上已经生产好了的产品背后去询问：“公司厂商在研发阶段优先目标是什么？”因为他们想想这样的问题，肯定忐忑不安。如今，像 IBM、AT&T 和西门子之流的公司，每年都承诺会投入数十亿的预算用于研发，这些预算都致力于创造下一代技术，但企业是否如期履行计划，并未见财主们公开实施职责。例如，英国电信每年都花费成千万英镑用于研发，但这是一项精心考量后设定的目标投资。两个《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记者观察了英国电信的审慎投资，并说明其来由，因为，“为了研究而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商业赢利取向的、竞争性的英国电信公司而言，为研究而研究纯粹是难以支付的奢侈品”（Bradshaw and Taylor，1993）。

《电脑工作》（*Computing*）杂志的前任编辑理查德·夏普（Richard Sharpe）注意到这种市场优先所产生的自相矛盾的后果。他认为最“新”的技术，实际上是典型的“旧”技术，因为它们是对已经被证明有市场能力的既有产品的补充。由此看来，夏普认为计算机产业表面“戴着一副进步的公共面具，内囊却是一副保守主义的利己面孔”（Sharpe，n. d.，p. 111）。例如，引人注目的是，大部分为了家庭使用而生产的信息产品实际上是对电视机的改进。视频设备、有线电视、计算机游戏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部都建立在一种取得了显著成功的商业技术——电视的基础之上。清晰的迹象显示，一些以家庭使用为目的的新技术和新服务正聚集成一种“家庭娱乐中心”，这是一种数字化的控制台，包括了围绕着娱乐而创立的电子邮件、游戏、计算以及互联网设备。几乎所有这些“家庭信息系统”的形式（“墙角的盒子”）和内容（娱乐）都让人无须惊讶，司空见惯而已。当电视已经显示它自己是公众最喜欢的休闲技术时，那么企业主为什么还要提供

另一种与电视不同的技术呢?

有些人认为这种结果是由技术改革的内在逻辑所推动,而不可避免。在此,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需要发挥一下想象力。为什么家庭信息传播技术需要围绕着电视机来发展(正如并不存在任何技术性要求促使电视技术的创造适合起居室,Williams,1974,p.26)?为什么在程序设计中,娱乐导向被如此着重地强调?非常有说服力的技术性原因并不能够解释上述问题。最为显著的压力无疑是,在何处通过何种方式会获得最能盈利的销售;因此,家用信息传播技术(ICT)/信息便被推向或者拉向市场所主导的方向。于是,可以预料市场取向带来的熟悉的产品和节目的产生,正如夏普的评论:

> 亦有另类(alternative)群体试图获得技术的另类(alternative)使用方式,但这些人是极少数。他们大多失败了,因为技术不是以另类使用作为目标,它不是为了引发真正的变化而发展的:不论好坏,它是为了维持现状而发展。
>
> (Sharpe, n. d., p. 4)

与此关联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到近年来信息数量的突飞猛进,就会很容易忽视市场标准的影响。因为认为信息本身多多益善就是件好事这种假定很流行,人们便很少质疑市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审视市场压力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不过,批判式反思对那种认为举凡信息都能给人启蒙,在某些方面,它能够改善以前的信息贫乏因而更显愚昧的状况,实在受益匪浅。在此,很容易让人质疑那些越来越多的逃避现实型的电视节目,人们会猜想许多受众大概对此持有同样的观点。人们可能同样怀疑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当然,网络信息形形色色,其中也不乏品质上乘者,尤其是那些来自于一些公共机构比如大学和政府部门的信息。我将会在第七章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谁会怀疑互联网上出现的大量信息的价值?谁会怀疑那些信息只不过是销售过程的延伸,无论是一个公司竭力去展示一幅吸引人的图像,还是试图去说服人们购买它的产品?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境:"你看得越多,你知道的便越少。"在这种

情境之中，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例如，2003 年 11 月末，英国的一项针对 16 岁至 24 岁人群的民意调查显示，42%的人连一名内阁大臣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是一半的人可以列举出电视肥皂剧《东区居民》(*East Enders*)中的五个角色。人们拥有的关于名流和他们出现于其中的电视节目以及杂志的知识极其丰富，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人们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要推动力上普遍都很无知(Ezard, 2003)。市场上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以及强制推销行动肯定要对此负一定的责任。

现在，从任何终端都可以实时连接上的数据库正迅猛增长，许多新闻评论员对此深表敬畏。与新闻评论员不同，有人会问些棘手的问题：它们是依照什么标准得以建立的？它们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一旦质疑上述问题，人们就会很容易意识到大部分在线信息服务的设计者们都会努力去吸引公司客户，因为它们对于即时商业信息存在着迫切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们有能力去支付保险费率，正是这些保险费率激发了一些“信息工厂”(如 TRW、Telerate、Quotron 和 Datastream)的急剧增多。由此看来，赫伯特·席勒的评论切中要义：

> 在市场经济中，成本和价格的问题必然会在决定什么类型的数据库会被创建出来、如何为筹划的服务而使用(以及它怎样被支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选择什么样的资料放进数据库与市场对信息服务的需求紧密相关。
>
> (Schiller, 1981, p. 35)

正是这点促使席勒教授愤然质问：

> 如今，什么类型的信息正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复杂水平被生产出来？股市价格、商品价格、货币信息。你拥有相当多的私人数据制造企业，各种类型的经纪人……谁拥有视频监视器，监视器被接入信息系统，从而可以向他们提供难以置信的大量高度具体的信息，但这些都与你怎样在股市上赚更多的钱相关……

> 与你怎样把你的资金转入或者转出一个国家相关。这能说明信息流向的地方以及谁获得了这些信息。
>
> (Schiller, 1990b, p. 3)

大卫·迪克森(David Dickson,1984)在他对二战以来的科学和技术(核心知识领域)的历史分析中扩展了席勒的论断。在此,他认为企业和军方两个要素是革新的决定性因素。在赫伯特·席勒那里,这两个要素简化成了一个要素,因为他坚信军方的责任是保护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市场精神。所以,他写道:

> 军方对于通讯、计算机以及卫星的关注……并不是对先进技术的一般兴趣。美国陆海空三军的使命是服务于和保护一种经济组织的世界体系,该世界体系是由资本强有力的隐秘入侵所主导的,并有利于这种入侵。
>
> (Schiller, 1984b, p. 382)

或许军方对信息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既然这都是为了巩固一个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帝国,那么形塑信息领域的最基本的力量便是军方亦为之效劳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精髓——市场律令了。如此,我们更加领悟席勒对"信息社会"的总体判断。"信息社会"并非十全十美的利好发展,而是体现了资本对商业伦理的效忠。所以,

> 实际上,所谓的"信息社会"是指所有类型的关于个体与国家、社会与商业、经济与军事的海量数据生产、处理和传播。这些数据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一些巨无霸公司、全国性的政府机构以及发达工业国家的军事组织的某些特定需求而生产。
>
> (Schiller, 1981, p. 25)

通过指出美国科学政策的三个主要阶段,迪克森(Dickson)扩展了上述主题。第一个阶段是战后的几年,此时,军事需要和原子能研究在科研活动中被置于优先地位。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出现了一个清晰的转变,社会标准扮演了一个更中心的角色,对健康和环境

问题的关注对科学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正在继续——开始于70年代晚期，其科学政策体现了对满足经济和军事需要的重视。到80年代初期，科学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无疑是“科学要对美国工业的竞争力和军事技术做出贡献”(Dickson，1984，p. 17)。这使科学日益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性商品”(1984，p. 33)，董事会的会议室中所使用的修辞和企业规划也侵入了科学活动的核心。迪克森证实，如今，革新听命于唯利润律令。所以，“知识资本”被频繁引用，该词意味着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被当作投资对象，资本期望从他们身上获得相应的回报。从这个角度说，甚至那些在学术界中任职的科学家也被视为“企业家”，他们被鼓励去与商业人士紧密合作，去创造有商业前景的产品。

迪克森坚称此种强调仅以市场利润唯命是从的目标令科学和技术知识偏离了如公共健康、地方社区服务、改善工作质量，或者保护环境等公共关怀。这一流风所及，自然导致那些一度致力于或至少部分致力于服务于更广阔的社区需求，并且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大学和机构日益改变了它们的方向，转向致力于以提高产业的商业竞争力为目标的研究，因此，他们就断定市场是技术变革的最佳裁决者 (cf. Slaughter and Leslie，1997)。

那些为了使曾经公有的设备私有化，以及对一度由国家控制的组织解除管制的政治规划都对信息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拥护者们鼓吹这些政治规划是市场实践的应用，是促进效率和效力的最有效的方式(私有制对于资源的个人利益的承诺，消费者的回应来自于此，当然也来自于顾客的首要地位)，也是把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服务改良)引入一个垄断性领域的手段。欧洲、美国以及远东地区虽然在地区环境和历史上具备多样性，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都采用了如下策略：使信息领域对市场标准作出反应，并且依赖于市场标准(Nguyen，1985)，市场派的鼓吹者所仰赖的基础就是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这对孪生元素。文森特·莫斯可认为这“体现了政策让位于市场”，就其强调了市场的优先权而言，一语中的，虽然把市场置于优先地位并不意味着对政策的拒绝。相反，私

有化和解除管制都是自觉的、被积极寻求的政策，以确保信息传播技术(ICTs)和信息可以以一种特定且权宜之计的方式发展。

尤其是对“信息社会”的中心支撑产业——电信产业，这些政策产生的主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Garnham，1990，pp. 136—153)。1981 年，英国电信从国有的英国邮政业(the Post Office)中分离了出来，从此，英国电信便沿着一条非常独特的商业路线来运作，锁定并优先效劳那些财源滚滚的目标客户(如企业和各大政府部门)，以发展新的或现存的服务，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自身成为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

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虽然英国电信业几乎从未清晰地阐明它的政策，但它却是依照一种大概可被称为“公共服务”的精神来运作，其所提供的服务致力于覆盖一个广阔的地理区域、非歧视性使用、以“合理的成本或者可支付性”(OECD，1991，p. 26)为目标的定价政策。为达此目标，运用了复杂的交叉补贴(cross-subsidy)制度，从能够赢利的城市网络和国际网络中抽取利润补足边远地区。电信产业的垄断同样在支持英国电子工业中扮演了角色，电信产业中 80%的设备都是从这些国内生产商那里购买，通过这种方式，电信产业成了政府经济战略的利器。

但是，撒切尔时期(1979—1990)实行的市场导向政策促进了解除管制的实行，并立即打破了英国电信的“自然垄断”的局面，而此时，英国电信才刚刚从英国邮政业中分离出来，并甩掉了运送邮件的包袱。对此做出回应，一家由私人投资的公司 Mercury 应运而生，Mercury 的宗旨不是提供另一类可选择的电话服务，其目的是赢得商业买卖(business traffic)，轻松地赢得电信业的主要市场。因为 Mercury 只占有很小的市场份额(少于 10%)，其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英国电信的竞争者，而在于它显示了在电信业中盛行的许多新的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Mercury 的母公司合并了 Mercury 和其他一些运营商，随后不久 Mercury 采用了“有线和无线”[Cable and Wireless]的名字)。

英国电信随后的私有化宣告了该企业已迈入新的强调商业竞争

的境界，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型，即转向商业市场。这种转向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出来：首先，为了回应 Mercury 企图抢走其最好的公司客户的行动，英国电信在其竞争领域实行了降价策略。英国电信公司很快就抱怨它正在“失去地区市场”，过去这些地方市场虽然不盈利，从前却并不是一个问题，其完全可以仰赖商业用户的收益来维持。但是，截止到 1990 年，Mercury 都一直在争夺企业客户，而 Mercury 没有提供全面服务的压力，它从拥有 100 条或者更多条线路的商业客户那里占据全国电话收入 30%的市场份额。现在，英国电信一直在悲叹“通话数量多的客户（如公司）的电话服务费用过高”，但自己却“没有从它 80%的客户（也就是国内家庭用户）那里获得足够的回报”（British Telecom，1990）。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不难设想：虽然私有化带来的影响依然存在，并为限制英国电信的价格上涨设立了一个框架，但这仅仅说明向用户收取的费用必须不能高于平均数。实际上，一般用户的开销幅度超过了商业用户的支出。

其次，作为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企业，英国电信也迈向了国际电信市场。它从北美购买生产设备，开始不太乐意从英国供应商那里购买设备。此外，在 90 年代早期，英国电信持有 MCI（微波通讯公司，美国第二大长途通讯公司）20%的股份，并在随后与北美巨头 AT&T 达成了一项协议，以集中跨国资产。这些行动背后隐藏的动机就是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策略：首先，市场上成长最迅速的领域正在日益国际化；其次，最为重要的国际市场由企业之间的贸易构成。Concert，这个 2000 年成立的公司由英国电信和 AT&T 共同投资，其目标是“在多国有分支的商业客户”。英国电信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最大的客户……是那些跨国公司，其在世界各地已开发的国家都设有分公司”（British Telecom，1990，p. 6）。因此，英国电信拥有一项“高度聚焦的策略，为这些跨国公司提供网络以及基于网络的服务”（British Telecom，1993，p. 25）。拥有 MCI 的股份，与 AT&T 的联盟，以及与许多欧洲公司的合作都是英国电信的策略，其目的是使自己在公司网络服务供应领域成为全球霸主。这些雄心勃勃的冒险都已黯然失色（Concert 于 2001 年倒闭，与 MCI 的合并

亦中止),这对于主要问题的解决没起到任何作用,对普通的国内用户所提供的服务罕有推动与改进。这项投资的目标是为 25 000 多家跨国公司提供一个全球性网络,这个全球性网络可向他们提供公司有效运行的至关重要的增强声音和数据服务。英国电信大概被多次失败所灼伤了,其最近强调与思科、微软和英特尔之流的公司进行"战略性合作",期盼找寻到最好的定位以期在乱世中东山再起。

英国电信并不因其把商业市场置于优先目标的行为感到汗颜窘迫,还津津乐道于自己"将成为改进服务和技术的源泉,而服务和技术上的改进将会满足地区市场的需要"(British Telecom, 1990, p. 6)。当然,这只是经济学的"涓滴效应"理论(the "trickle down" theory)在"信息革命"中的应用。

第三,英国电信在减少了雇员的同时增加了收入:1989 年,英国电信雇用职员达到巅峰,拥有大约 250 000 名职工;截至 1993 年末,人数下降到 150 000 人;而在 2005 年,英国电信仅有 910 00 名职工。

上述言论并不是要对英国电信抱怨不休,而是一个说明了市场原则和优先权在信息领域的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经典案例。最初,作为一个公有的垄断企业,英国电信受到重重束缚,摆脱层层限制之后,英国电信的巨无霸经营方略与其他人私有企业如出一辙。各项服务和业务都是服务于市场赢利的终极目标。如果要达成此愿景,必须增加一般用户的费用。这意味着裁减雇员,或意味着提供新的信息服务来追逐财源滚滚的客户,这就是无可厚非的市场逻辑,也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经营管理所应有的合理回应。

最后,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市场环境对市场参与者如英国电信所施加的约束。人们很容易相信,对于像英国电信这样的公司来说,采用市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选择的问题,但是事实决非如此。实际上,多重压力驱使其采用某些政策。其中一个不可抗拒的压力是,虽然信息网络服务的提供对于许多公司的日常运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同样是一个充满着强烈竞争的市场,迫使参与者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市场中就范。如同英国电信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察觉的,虽然一个"可预期的世界范围的电信业产业结构"正在形成,

它终将会被“站在这个产业前沿的，正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四个或五个供应商”(p. 6)所创立和操纵。英国电信有置身于此巨无霸精英行列的野心，但在其间，英国电信也会面临争霸全球网络市场的群雄。基于同样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英国电信(以及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主要电信业组织)：不难设想，市场机会青睐那些拥有最大的预算和对先进的电信服务有着最大需求的国际商业客户。唯市场成功以取得潜在收益的呼吁已咄咄逼人，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主要供应商在全球电信市场中失败了，它们甚至根本无法进入全球电信市场，世界市场的弄潮儿简直难以想象会有如此不妙的结局。由此看来，他们是被迫参与角逐，但却几乎没有任何控制能力把握结果。不出料想，企业发生了一系列令人迷惑的，以仅有的几个巨型公司获得市场战略性优势为目标的复杂联盟、合并和重组。

市场标准在信息领域的首要地位还产生了其他影响。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市场的推广使得一些关键的长期以来都依赖于公共财政的信息机构所获得的支持下滑。我将会在第七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在此，我仅简单地涉猎电报业的情况。面临“信息爆炸”，一些像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政府统计服务机构、英国广播公司以及教育系统本身获得的资助都已缩水，罪魁祸首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优先的举措。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就采取这样的政策：促进“信息革命”的最行之有效的路径就是使之成为一种商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 Panel[ITAP], 1983)。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便削减公共津贴，而若干信息机构仅以商业价值为马首是瞻。对于在美国目睹了同一情形的赫伯特·席勒来说，这体现了“把信息的商业化扩展至社会任何一个空间的努力”(Schiller, 1987, p. 25)。那些关于缩短图书馆开放时间、缺乏购买书籍的资金、从前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开始实行收费、政府信息的价格正以高于通胀水平的速度飞涨、在大学里那些不具备经济价值的课程被迫停顿的故事，都体现了唯市场优先律令对迄今为止一直都备受保护的一些领域产生的影响。

席勒认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社会和公共空间的逐步蚕食”(Schiller, 1989b),致使信息的生产和运用遭受重创。在他看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静战,一方企图利用国家的信息资源以获得私人利益;另一方则试图尽最大可能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在这场战争中,“后者已节节败退”(Schiller, 1985c, p. 708)。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公共津贴逐渐被一些为了市场而去发展信息的私人利益所取代(或者是完全被其取代),或者,有些机构所获得的公共资金无形当中被大幅削减,以至于这些机构被迫寻找私人资金以求生存。这对于什么样的信息会被创造出来,以及人们会以何种方式获得信息会产生重大影响。由此至少导致信息涨价,同时,信息供应商会致力于打造要么能够吸引大众眼球(达到足够能引诱公众去支付入场费的程度),要么能够吸引赞助商(一般来说来自于公司)的展览和节目。它们期望人们相信,这不会影响到人们对信息的获取,也不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信息被优先生产出来。如果人们需要向博物馆和美术馆支付入场费,这就造成有一部分公众被阻止进入。而反过来,这些机构本身会努力使它们的展品去迎合那些能够支付入场费的人们的口味。当然,有人会争论说这并不是坏事,仅仅是各得其所,参观者能够更好地欣赏他们花钱来参观的东西,而展品能够对公众做出回应。但不可否定的事实是:信息的获取和供应遵照特定的需求。此外,虽然市场实践也可以促进想象力和革新,但对于吸引人的咖啡馆、博物馆的商店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展品的强调,几乎不能改进或者提升人们可得到的信息品质。在那些赞助商进入的地方——他们越来越多地进入大学、图书馆、剧院和电视台,结果显而易见,再清楚不过的是赞助商的介入并非致力于慈善目的,而是为了推进他们自己的议程和利益。所以,他们不可能去支持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引人深思的作品或活动。例如,在艺术领域,阿加莎·克里斯蒂不乏资助,达里奥·福(Dario Fo)却门庭冷落、囊中羞涩;在教育领域,商业管理备受青睐,种族关系却无人问津。

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 1990)认可席勒的解释,他指出因考虑到大部分大众媒体都掌握在一些大公司手中,这种以

市场为导向的潮流所带来的影响雪上加霜。他认为一些“公共的文化机构”如英国广播公司和免费图书馆拥有一种“对抗性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平衡商业小报和被收视率所支配的商业电视的负面作用。无疑，“在它们的最佳状态下”，这些机构“体现了一种真正致力于多样化和公开争论的使命感，至少，它们弥补了商业化组织供应的一些重要缺失”(Murdock，1990，pp. 6—7)。笔者会在第七章详细讨论该议题。但在此，只要阐明如下观点就足够了：“文化性机构”的组织和资金方面利于市场的变化，却对发展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有严重制约。

商品化

信息的快速商品化是赫伯特·席勒以及同一阵营的思想家们辗转反思的论题。因为信息是在一个市场社会中生产出来以供人使用，所以其命运也就雷同于这个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任何商品。于是，信息就是可以随便贩卖且服从于价格机制的商品。把信息看成是一种商品，又有什么好谴责的呢？因为没有人(当然不是赫伯特·席勒)认为信息的生产(更不用说信息传播技术了)是不需要成本的。

许多对商品化的异议，都会涉及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那诙谐狡黠的格言——“知道所有事物的价钱而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对价格机制的缺陷进行探究已源远流长，讨论的观点并非激进。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个保守党内阁大臣大卫·梅勒(David Mellor)警告商业原则严重侵蚀艺术，他警示大家：“长远来说，一个社会并非如此沉重地仰赖经济成功，而是依据其文化成功来获得评价的”。听君一言，收益良多：我们对19世纪的追忆，更多源自艺术家和建筑师，而不是棉花和石油巨头，虽然后者在那个时代占据主导地位。梅勒发表演讲的时段，正是资本主义原则所向披靡的时代，那个时期的企业家和私有企业获得了高度赞颂，不过，依然不乏内阁成员对市场原则的缺陷提出警告。

尽管如此，近几十年来，我们目睹了在信息领域发生的日益加速

的商业化趋势。在随后一章中，我们会对此有更多讨论，包括对电视领域的讨论。在该行当，日益加速的商业化趋势尤为引人注目。但在此，我们仅以围绕“品牌”的价格估价而呼声甚高为例(de Chernatony and McDonald, 2003)。产品当然依旧重要，但品牌的价值(从耐克[Nike]到维珍[the Virgin])在近年来却尤其重要。所以在当今，甚至英国的大学纷纷不遗余力地推广其品牌，渴望招收来自国外的学生，因为它们可以向这些外国学生征收远高于国内学生的费用，这是笔不菲的交易。这个过程波及了名字，即名字也可以商品化。例如，球星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能够从曼联转会到皇家马德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名字在远东地区具有销售力，可以带来无限商机。如今，举世皆知，除了球员的真实技术水平之外，其“名字”也具商业价值。

与此如影随形的是对“知识产权”和通过版权和专利来保护“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劳伦斯·勒辛格(Lawrence Lessig, 2000)认为这个过程是一种圈地形式(Boyle, 2002)——进入曾经被排斥的市场关系安排。知识产权捍卫其产品的真实身份和信息的最大化价格。约翰·萨勒兰德(John Sutherland, 1999)对他多年以来在《泰晤士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所写的评论和文章被数字化的抱怨，就是一个实际案例。从前，这些文章都是印刷出版，萨勒兰德以此获取报酬，但是，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读者希望查阅他的作品，他们要么购买、要么借阅原本期刊，或者，如果这个期刊有老的版本，他们会去一些学术图书馆查阅，那里储藏了成堆的复印本(如果可能，还会有缩影胶片)。但是，数字化方便那些订阅了相关服务并且拥有通讯设备的人随时随地信手拈来信息。通过词汇搜索系统(word-search systems)，可以易如反掌地查阅萨勒兰德的全部作品。同样，这也是出版商的收入来源，对此，出版商已经志在必得。但萨勒兰德反对这种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他也没有获得任何酬金，虽然他是作者。压力主要来源于出版商，他们不懈地利用数字化来最大化他们的投资回报。

出版商的利益驱动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问题源于科学知识的范畴、科研成果的发表以及商业化的压力等（多重权力关系的交织）。某些人主张科学知识应该是可以自由获取的，此论引发了存在于一些科学家之间的鼓励他们为了公共福利而使他们的科学发现向公众开放的“共产主义”精神。只要他们的同侪承认他们，许多科学家似乎都致力于使他们的研究发现向任何希望查阅者公开。该立场放弃了对科学成果的所有权，并且赞同“开源”出版（“open source” publication），这确保了研究成果在网络上免费登载。但是，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应有产权归属，所以查阅者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为此付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爱因斯坦要求拥有对他的热力学定律的所有权，要求在他的等式每次被引用时都收取一定的费用。科学研究的出版商的存在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其经营科学出版由来已久，出版复印版定期刊物乃其商业赢利的天然举措。但是，互联网的迅速扩张潜在地令其破产，因为现在科学家在原则上至少可以跳开出版商而把他们的科学发现直接登载于网络。出版商现在正在迅速地数字化期刊以及旧刊（这会很大地方便用户获取这些期刊，只要他们拥有订阅权），他们誓死捍卫出版业的商业传统。这些期刊通常都非常昂贵，这正是出版商盈利源泉之所在。而另一方面，许多大学——它们通常雇用了许多科学家——同样在采取政策鼓励研究者们建立起他们作品的自我档案，把他们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放在大学网站上，以使这些作品能够被人免费查阅。这些大学所持有的观点是，这些科学家是大学的工作人员，研究工作是他们的职责，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被放置到大学的网站上。显然，出版商肯定抵制大学的免费行为，因为此举令其生意岌岌可危。很明显，情形在这里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和不确定，但是没有人认为传统的行为方式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人们已经感觉到了科学知识的商品化导致了获取知识的障碍，而与此同时，一些科学家们正在推进开源出版，这对现存的商业利益造成了威胁。

对于信息社会来说，需要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多么地重要和富有争议。毋庸惊讶，版权的兴起，其初衷是为了平衡作者和发明者的权

利和更广大的公共福利。在18世纪晚期，版权的有效期是作者死后的14年，而在1998年，它的有效期变成了作者死后的70年，对于公司来说，是作品被出版后的95年。如今，版权包含的内容已经无所不包，乍一听似乎有些婆婆妈妈，但就围绕人类基因密码的发现而发生的斗争所涉猎的纷杂利益，不就是案例吗？本世纪初，许多新科学因DNA结构终于被鉴定为大约二十亿个字母（基因组学[geneomics]和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而得以诞生，这从根本上迅速地改变了医学，因为基因密码的知识宣告了通过反复试验去开发药物这一做法的结束。华大基因研究院（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的开发者们使人们能够免费获取这项研究。但是，在解释密码的竞赛中，交织着打算对每一项咨询实行收费的商业机构的利益。当考虑来自全球135个国家的专业人士每周至少会查阅由华大基因研究院提供的数据至少一百万次时（《卫报》，2003年11月3日，p. 1），人们就会充分认识到知识商业化的意义。围绕互联网经营运行而发生的斗争几乎一样激烈，微软是拥有所有权的超级玩主，但是开放源代码——由Linux和Apache这样的公司开发的一项免费服务——向比尔·盖茨的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Weber，2004）。

由信息传播技术所推动的信息商品化使我们迈向一个“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活动的社会……在公共图书馆中阅读一本百科全书，卖给朋友一本几何教科书，为兄弟姐妹复制一首歌——都将会被置放于一个为了获得回报的微观付费系统中，其间，我们在我们文化的细微处所享有的权利都将面临被施舍的命运”（Boynton，2004）。席勒谴责了这种趋势，他坚持认为信息应该是一种公共财产，而不应是在市场上被卖来卖去的商品（Rokowski，2005）。

阶级不平等

市场律令在信息领域扮演着中枢角色，这意味着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创新与使用完全仰赖于购买能力。当然，这并非说信息和信息技术完全被某些人所独占。显然，几乎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接触到

某些信息产品和服务，电视、广播和报纸就是明显的例子。实际上，因为市场对消费者开放，从原则上讲，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并无销售限制——至少满足拥有足够资金的购买者之需求。但是，事实上市场是一种配置性机制，这意味着其对社会的回应，是按照收入和财富所区隔的等级为标准。换句话说，阶级不平等，或如广义上讲的社会的阶级分化乃是信息时代的中心拉动力。

"数字鸿沟"已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展示阶级不平等在信息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范例（Webster，2004，part 5）。近几年来，数字鸿沟，尤其是网络的数字鸿沟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大量证据显示，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网络乃绝佳境界（见 Eurostat，2005）。虽然席勒可能已经认识到这种分化的实际存在，但并不能以此确信他就会支持那些渗透进大部分与数字鸿沟有关的思考的技术导向型思维。我们常假定数字鸿沟令人遗憾，甚至应受谴责，因为技术把那些不幸者排斥在完整的社会参与之外。一个致力于使人们访问互联网的途径最大化的政策应运而生了，可能是尝试使互联网终端能够出现在学校或者图书馆，其为弱势群体带来了福音。技术因素阻碍了人们获得机会是这些政策的前提，此论在共和党成员纽特·金瑞奇（Newt Gingrich）1995 年的提议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其提议认为，给予穷人一台笔记本电脑胜过给予他们福利，前者使穷人生活更上一层楼。像赫伯特·席勒这样的思想者会对混淆了原因和结果的提议秉持异议，它的实际影响颇为可笑。

文森特·莫斯可（1989）在对"按次计费的社会"（"pay-per society"）的描述中突出了"支付能力"（ability-to-pay factor），他把支付能力看成是生产和获取信息的决定性力量。坦率地说，更重要的因素是阶级制度。一个人越富有，他所能够获取的信息就越丰富；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等级地位衰落，他所获得的信息品质也会日益变得劣等。

赫伯特·席勒同意这种立场，并且指出了"信息革命"的"主要发动者"是军事/国防机构、大型私有公司以及全国性政府等三个机构，因为它们拥有支付信息传播技术（ICT）/信息产业中最昂贵的和最领先产品的能力。席勒从许多商业咨询人士那里获得了支持，估计

超过四分之三的欧洲 ICT 市场是公司市场和政府市场，“一般公众”（除去这两种享有特权的群体之外的任何人）构成了剩余市场。简言之，那些最先进的技术流向了福特和美国空军之流的机构；大部分人只获得了剩余物——多数为电视机型的玩具。

支付能力标准（ability-to-pay criteria）的中心性，以及它与阶级不平等的紧密联系，使赫伯特·席勒强调信息分层的现象。例如，他区分了存在于一个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的“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所以，

> 对信息的获取成为财富和收入的一个要素。公众和国家本身被日益排斥在外……一个社会之内信息“拥有者”（haves）和信息“缺乏者”（have nots）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在信息时代，国家之间的情形与此类似，那些欠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依旧更依赖于少数几个信息生产者（generators）、处理者（processors）以及传递者（transmitters）。
>
> （Schiller，1983b，p. 88）

上述情况不言而喻。例如，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对于“一般公众”（the “general public”）来说，“信息革命”意味着更多的电视频道。如前所述，那些主要的发展，在最本质上，并不仅仅意味着电视屏幕的改进（有线、家用计算机、视频、互联网），也意味着电视节目的变化，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产品——娱乐节目的增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难找寻，主要在于电视在多年以来所取得的惊人成功（电视机在家庭市场达到饱和、一个巨型的广告媒介、娱乐节目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却非常吸引人）。由此，毋庸惊讶，信息提供商们当然支持已被证实了的成功行为。而且，需要记住的是，在这个竞技场上，因为对于信息产业来说，每一个家庭相对而言都是一个较低水平的收入来源，所以大规模销售至关重要。那些期望从国内市场上获取利润的厂商必须以追逐巨无霸式的市场提供产品为目标，只有在每一个家庭聚集成为“一般公众”时，它们才会拥有任何实际的市场吸引力。但是，一旦他们聚集起来，信

息提供商就必须向这些“一般公众”提供相对同质化的信息产品——熟悉的电视屏幕、海量的游戏节目和脱口秀、电视肥皂剧、电影和体育节目。此外，“一般公众”也被证实他们并不愿意直接为电视节目支付任何费用——这已经从广告商和/或者赞助商那里获得了补偿。同样，虽然有极少的例外，那些利用电视发布广告的广告商们的兴趣在于到达一个大规模的受众，这反过来又促使电视节目趋向于“更加同一”，因为只有这样电视台才能够确保拥有数百万的受众。于是，任何认为家庭的信息需求大概是多样而复杂的观点都被束之高阁，信息供应的主要管道致力于生产娱乐节目和“最小公分母式”节目。

在有线服务和卫星服务领域所发生的情形与此非常类似。虽然有很多文章呼吁电视需要对公众的不同需求做出有效回应，提供30个或者更多的电视频道，让受众各取所需，提供戏剧节目满足对戏剧感兴趣的受众，芭蕾舞节目服务对舞蹈感兴趣的受众，新闻节目则针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者，再为那些期望改善自身的人提供教育性节目。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正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所描述的，“57个频道，却空无一物”。有线电视频道提供了大量的娱乐节目，体育、软色情、情节探险剧、摇滚乐录像带和电影占主要优势。那些被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未来派信徒们所梦想的先进专业化频道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的制作成本太昂贵，而罕见其受众规模，这些人全部聚集起来都不足以资助那些专业电视台。那些生存下来的频道都开发了最丰富的矿脉——大众娱乐，大众娱乐可以通过廉价的收视费吸引大规模的受众，或者电视台可以通过售卖大量的受众给广告商来获取广告收入。有人能够严肃地声称在鲁伯特·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Sky TV)被引入欧洲之后，欧洲的信息环境得到改善了吗？

虽然这些例子很容易说明，“一般公众”构成了“信息穷人”，但只有在这些“信息穷人”聚集成大规模的受众时，向他们提供节目才物有所值。但是，在此还需要提及的是，那些应用于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商业原则对公共广播服务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我将会在第七章深入地讨论该问题，但在这里我们观察到，有线电视服务致力于寻

求大规模的受众的行为显然对 BBC 这样的电视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当重要的是，那些拥有几百万受众的，在公共服务频道上向受众免费提供的节目，正在迅速获得有线供应商们的注意，这些供应商们不懈地希望在基于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提供这些节目。在英国的体育节目领域，这种情形尤为严重。自从 1990 年以来，所有足球甲级联赛（基本上是有英国参与的国际性比赛），以及大部分欧洲冠军联赛（当像皇家马德里、米兰和切尔西这样的球队相互间进行较量时）的转播权都被天空电视台购买了，同样被购买的还有其他主要的体育赛事，比如莱德杯高尔夫球赛（Ryder Cup golf）以及世界级拳击比赛。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是，从前可以免费观看体育赛事的人，如今被排除在外了，除非他们准备好每月付一定的收视费（偶尔为了某个特殊节目他们还需付额外的费用）。

当然，在此并不是主张说这种转变使某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信息穷人”。主张订阅既有有线电视频道大大地加深了或者扩展了一个人的信息资源，此论不切实际。但是，这种转变的确使那些已经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的人们所拥有的信息环境更加贫瘠，通过减轻现在由公共电视服务所提供的节目的多样性产生此一后果达到目的。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它并没有增加人们在有线网络上可获得的选择，这一方面是因为接通有线网络服务的前提条件是有能力去支付相关费用（于是，一些潜在的受众就在经济意义上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是因为有线频道和卫星频道上的节目是如此雷同（体育、电影或者其他娱乐性节目），削减多样性已成为英国公共广播服务的特征。

在国家之间，也出现了数字鸿沟不断加深的情形，收入差距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平等。那些集中了世界财富的发达国家是“信息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同时，那些聚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较贫困的国家，被限于获取那些第一世界的残留品（例如，重新放映好莱坞系列的电影），依靠那些由富国愿意向它们提供的信息（如来自新闻通讯社的信息）。同时，富国对一些领先信息技术比如人造卫星的垄断会使穷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些人造卫星会在高空中对那些较穷的国家实施监控（例如，农作物发展、矿产资源、鱼群，甚至是纯

粹的侦察），或者是向这些国家传送那些能够侵蚀它们本土文化和信仰模式的节目。

我们在此的观点是，发生于一个阶级社会之中的“信息革命”，被打上了既有阶级不平等的标记，而且阶级不平等还会雪上加霜。所以，“信息鸿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些在经济上和教育上享有特权的人可以通过获取先进的信息资源如在线数据库和先进的计算机通讯设施独占鳌头，而那些趋向于阶级系统底层的人会日益被席勒所谓的“垃圾信息”所淹没，这些“垃圾信息”大多为消遣性的娱乐信息和八卦信息，其中罕有具有真正价值的信息。

席勒观察到，信息并非多多益善。恰恰相反，在信息的获取和供应中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是支付能力，这意味着为大多数人所提供的信息都是那些生产成本低廉的、浅薄的、充满着肤浅的吸引力的大众化信息。这是因为，只有在国内受众都聚集起来时，他们才能体现有利可图的商机。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在凌晨两点钟播放的节目很少是为了寻求大规模的受众。但是，商业原则依旧在此运作，那些节目永远都是制作成本低的节目——远远便宜于那些在黄金时段播放的节目——以及/或者是已经播放了的节目的重播。

杰出的新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1992）调查了近十几年来提供给“一般公众”的信息的过量供应，如现在甚至能从一些食品店中获得的低俗小说，到免费传送到每个家庭的“报纸”，到“垃圾邮件”的爆炸性增长，到一天 24 小时的电视服务，再到扩展至每一条商业街的录像出租店，无不如此。他的结论是“垃圾（信息）笼罩普通美国人”。赫伯特·席勒（1987）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看得越多，听得越多，具备重要性的信息却越来越少。一个半小时的早间电视‘新闻’，聒噪、空洞而不切题，此乃现今状况之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革命”向“信息穷人”提供了让他们感到快感的一些刺激，比如皇室婚姻的失败、在 2005 年末对酗酒的足球天才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行将结束的职业生涯的伤感描述、每天都能呆看的电视肥皂剧、对足球明星性感魅力的生动讨论、对《老大哥》（*Big Brother*）比赛的全天候转播等等，但是，信息革命极少令民众觉

察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其他文化的构建、他们自身境况的特征以及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

企业资本主义

在赫伯特·席勒看来,“信息革命”的主要获益者,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企业,因为企业是最吸引人的市场。贯穿整个20世纪,市场经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一种以无数小规模企业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转向了一种由少数企业支配主要经济活动的市场经济。这些企业都是巨无霸式的、参与横向与纵向兼并、整合的、覆盖着一个广阔的地理区域的大公司。

企业资本主义对信息环境产生了一些决定性影响,每种影响都来自于它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以及它在现代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其中一种影响体现为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无不以企业市场所形成的市场为律令。主要的计算机设备、尖端的电信服务以及电子信息处理的最领先的形式,都能够在那些拥有相关购买力、同时又对这些极其尖端的信息设备存在着需求的企业中找到。例如,随着企业的规模以及空间的扩大(公司都普遍地越来越大,与以往相比,涉猎更多的事务,拥有一个更宽泛的边界),很明显现代企业对于发达的信息网络以及先进的管理控制系统存在着内在需求。世界各地都有分散的地方工作组织,为配合全球企业的协调、整合和管理,必然运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

虽然话是如此,但面对如今新科技的讴歌者,将科技超人般的迷思赞颂,我们务必在此赘述——能够支付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机构,反过来又在寻求能增进其自身利益的技术。既然企业资本的首要兴趣在于收益,我们一般认为那些可以支付相关费用的机构绝对深远地影响了技术革新的历史。戴维·诺贝尔(David Noble)(1977)对此进行了深思,证实了美国的工程技术的发展与日益扩张的公司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诺贝尔(1984)对新技术进行了开门见山的思考,也展示了机械工具的计算机化如何为公司经理们所操纵,

这些公司经理们坚持认为工场车间应该被排除在新系统设计之外。计算机的普遍使用，避开雇用员工的视野，电子技术高效地监督控制各子公司和员工的劳动收益，从而成为加强经营管理的工具。于是，把持工厂运作大权者的控制权力更上层楼，控制能力更强了。

信息传播技术（ICT）很好地满足了“世界商业体系的要求”（Schiller，1981，p.16），其结果是支持了企业资本主义在任何特定社会之内和之外的权力，企业资本主义有多种达成此目的的路径。例如，各企业可以克服空间限制，雇用世界各地的劳动力远距离运作，对不同的地区环境（政治、区域和经济环境等等）做出回应，其即时先进的传播科技发挥难以想象的操作效率。十年前，“海外外包”活动使一些把生产加工转移至国外的公司降低了生产成本；如今，海外外包活动同样很容易使人想到一家银行的“内勤”或者零售装配是在远离英国的地方，比如班加罗尔（Bangalore）或者巴哈马群岛（Bahamas）。企业通过信息传播技术采用外包实践的机会永远不变。紧随其后，企业推动了一些与“去中心化”行动有关的企业策略（压缩企业总部，命令从属企业如子公司，责成其像“独立的”盈利性中心一样运作），而同时，电子传播科技设施也促进了中心总部对子公司的监控（如精确的销售记录、每一个雇员的生产能力记录），追踪子公司的运作，这又是集中化的手段。

此外，信息传播技术为企业在全球开展业务插上双翼，最大程度规避民族国家设立的诸种限制。通过电信网络，企业可以开展即时的商业交易，拥有基于私人线路的计算机连接，企业甚至能够逃离主权国家的审查。例如，如福特和IBM的信息是以数字形式通过由西方公司拥有的人造卫星在底特律和拉各斯之间或者纽约和孟买之间传递时，一个非洲政府或者印度政府怎么能够基于本国的数据库来了解那些跨国公司的活动？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对一些公司策略比如“转移价格”（公司内部会计算账，为保证公司能够获得最大利润，不管职工工资或者投资承诺是否与特定地区实际成本匹配）的质疑；在一个信息传播技术和与之相连的电子信息流的时代，就别想对这些问题获得准确的答案（Murray，1981）。

在这些观察之中，企业对信息网络施加的权力，如日中天，这种权力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信息爆炸”的趣味我们必须在“产权”基础上才能分享。前文已详细讨论了企业在当代经济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如何打造其各种优先权并排斥其他的思维方式，这对信息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讨论支付能力标准和基于市场原则的运作带来的影响时，我们已经触及了一些问题。在此，我希望强调的是，企业以确立私有产权原则为处理信息的主要举措。如前所见，核心影响体现为主要的信息服务都效劳于财大气粗的企业部门。而另一重要影响则是大量的信息一旦被购买，也就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或者更可能发生的是，公众根本无权触及信息。原因很简单，信息属于私有产权。赫伯特·席勒认为在当代美国，此类情景比比皆是，美国的“若干信息都对公众隔离，因为信息是企业把持的私有财产”(Schiller, 1991a, p. 44)。不言而喻，信息的产权所有者对其产权可以任意处置，最明显的例子如市场研究公司和公司的研发项目所收集的信息。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专利和版权是蓬勃发展的法律领域：它们验证了所有权原则在当今时代的权重分量。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资本并不仅仅是信息传播技术/信息被引入其中的外在环境。“信息革命”并不仅仅作用于企业，它本身由企业资本管理和发展。实际上，信息产业囊括了具有寡头垄断性质的、最巨型的和最全球性的公司。引领信息潮流的国际性企业巨无霸如 IBM、数字设备公司、微软、飞利浦、日立、西门子和通用电器。这是一个非常动乱的商业领域，合并和兼并是当今的商业秩序，虽然这富有特色地涉及了一些大型企业期望更好地进入快速变化的市场。这个市场中的各个领域正日益融合——计算机和通讯融合，办公设备和个人电脑融合，出版和教育融合。信息产业是一些大型企业资本的竞技场，企业资本正日益把连接手段和内容组织衔接为一体。随着信息业沿着一条集中和整合(技术和服务、硬件和软件)的路径开拓前景，一切可能的联盟与兼并都在热火朝天地展开。此类企业统治必然能从常来常往的公司优先权中得利：没错！收益性、商业标准和以支付能力为判断标准的供应乃当代企业资本主义唯命

是从的律令。

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

前文主要关注的是席勒及其批判阵营如何阐述——“信息社会”的塑造者与“信息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和其市场结构与不平等结构及其公司组织。但不止于此，批评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1993)详细阐述了第一种批评，他着力于监控的主题，强调了阶级维度和资本主义维度，主张社会关系的信息化实现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对民众则实施越来越多的监控。就此而言，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由国家所指令的监控渗透是强化从属阶级服从的举措，例如为那些积极的工会分子、政治危险分子以及一些激进的思想者们建立档案，同时更有效地限制异议分子的言论。与此类似，为了经济目的的监控渗透致力于维持资本主义关系(Mosco，1989，pp. 119—124)。第二种与此相连的观点认为，“信息革命”通过更深入地延伸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推进了消费者资本主义的创立和巩固。

消费者资本主义是个模糊的术语，在此它是指一种个体化(与集体化相对)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人们需要“付费生活”(Lynd and Hanson，1933)。此种生活方式以家庭为中心，不利于公民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只能消极被动地做一个消费资本主义给什么就买什么的消费者，享乐主义和自我膨胀的意识大行其道，备受推崇。所以，消费者资本主义是一种极端私人化的生活方式，个人利己之流风替代了公共美德比如睦邻、责任以及社会关怀，唯商场购物能满足个人需要至上(在此，在以为购买，我们就能够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的幻想中，真正的自我崩溃了。Lasch，1984)。

信息发展在消费主义的扩张中处于中心地位，企业资本主义以此为途径说服人们宠信消费主义值得憧憬且势在必行。席勒证实持续不断的信息弹火的围攻使“商业价值侵蚀了人类生存的所有空间……不言而喻，消费乃当中最重要的价值”(Schiller，1992，p. 3)。

在此，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说明“信息革命”如何促进了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

首先，电视日益成为一种更彻底的向个体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并支持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手段。电视已对促进消费主义的“居家”风潮发挥了推波助澜之功效，批评家们预计纯平电视、家用娱乐系统、互联网、视频以及有线电视会加深这种趋势。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2000)在他那本描述美国“社会资本”衰落的富有影响力的著作中，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其证实了“电视看得越多，意味着公民参与和社会介入越稀少”(p. 229)，电视窃取了人们的时间，而人们生活却“萎靡不振、怠惰不堪”(p. 238)，这导致了“公民对社会、政治的冷漠状态”(p. 246)。现在若干伴随着数字化而来的“互动性”讨论，淘汰“现实电视”(reality TV)中某个参赛者的“互动”，对受众们摆脱“沙发土豆”(couch potato)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死气沉沉无济于事，无论你对此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参赛者的互动性。而且，随着信息技术更进一步地渗透入家庭，电视节目无疑被打上了希望利用节目刺激更多消费的人的烙印。尤其是广告商和赞助商们创造了越来越密集的方式，将其讯息能够传达给受众：在此，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为了能够适应收费电视，精心制作的目标影像是否就可以为受众所用？广告化节目的扩增带来什么后果？在电视剧和电影之间插播产品广告，又是怎样的明智之举？

其次，节目本身鼓励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那些经常在日常电视节目中向公众展示的一些符号，比如成功、美丽、时尚、流行、赞许和娱乐，令公众为之倾倒且满怀渴望，并在市场上寻求此类满足(Ewen，1976，1988；Ewen and Ewen，1982)。对“名流”(Rojek，2001)的膜拜加剧了这种趋势，当然，我们往往看到谴责媒介是“劝服手段”的说法，媒介为大众们洗脑，激励受众去追求一些“虚假的需求”，其宗旨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永存，而不是为了回应普通人的愿望与真正需要。但此论罕有人提及。该论点认为信息传播技术正在加剧这种趋势：市场正日益取代自我和公共组织。例如，曾几何时，人们在自家菜园里种植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或者可能

是编织他们自己的衣裳，而如今，几乎我们的所有需要都在超级市场上或者连锁店中得到了满足(Seabrook，1982b)。与此类似，电视和电视型技术解除了人们组织自身娱乐活动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机器的新型依赖，这些机器上呈现的主要是让人呆看的使人产生愉悦感的娱乐节目。

第四，新技术可以允许公司对广大公众实施更强的监控，在对公众传输劝服性信息时更加如鱼得水。多年以前，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1981)创造了“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的术语，意在警示我们——电视的一种重要功能，就是把受众贩卖给广告商。电视节目是否成功，其检验标准并不是节目内容是否上乘，而是考量节目能够贩卖给广告商的受众数量。当今的媒介情势依然如故，而且变本加厉。例如，那些传送至某个地区每个家庭的免费“报纸”，其目的并不是向居民们提供地区新闻(若有怀疑，可去查阅所在镇的免费“报纸”来检验这个论断)；其核心兴趣在于将特定的目标社区的每个家庭贩卖给广告商。当然这只是一种非常粗糙的监控形式(虽然与电视或广播相比，此类监控还是精确得多)。不过，更高明的监控形式来自于对某些专业协会、俱乐部所拥有的数据库的销售，和电子销售记录，通过电子数据资料的交叉比照，再进行针对性的劝说，新技术可以促使公司迅速确定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轮廓。由此看来，收费电视潜力非凡，因为它可以通过电视频道、节目偏好，甚至是通过音量和收视规律来区分受众类型。于是，凯文·威尔森(Kevin Wilson)(1988)创造了一个术语“控制化营销”(cybernetic marketing)来讨论通过在家看电视或者个人电脑购物的互动技术的前景。而约瑟夫·图罗(Joseph Turow)及其同事(2005)提供的证据更是一目了然，为了商业目的，零售商们使用互联网对计算机化数据进行“数据挖掘”(datamine)，公众对此问题还未加以重视和警觉，而数据挖掘已大行其道。网上商店可以紧密跟踪访问者们的行动，从而收集到许多有用信息，消费者的个人资料唾手可得，目标受众的发掘易如反掌。诱使消费者使用一个密码“登录”的网站，形式更加私人化和隐秘，“商店可以获取到信息金矿”(p. 6)，再加上数据挖掘者

们的分析，信息金矿价值连城。由此路径，可以导致受众更加私人化的生活，而同时，供应商们却将可以电子化地构建每一项交易的详细记录。所以，每一项交易都受到监控，每一个被观看的节目都会被记录，媒介公司据此带来的反馈循环提升节目品质制作、更加精美的广告及其同类产品，从而将受众牢牢锁定于消费主义之中。

对批判理论的批评

本章主要关注批判理论家们是如何考量信息社会。在此，不妨回顾学界对批判理论家的观点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批判式评估。

针对各种批判理论家立场的异议言论也不在少数。当今最普遍的异议事关政策问题。许多人认为很难从批判理论家们的论著中寻觅出切实的方案，例如许多人都会问："然后，你会怎么做呢?"在席勒的著作中，至少暗示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例如，他反复指出"公共信息"优于"私有的"信息形式，而那些集体主义试验都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因此，批判理论家们义不容辞应该对各种针对批判理论的异议做出回应。

但不能仅仅因为批判理论家们并没有提出一个替代性政策，就盲目回避批判理论家们的洞见，也不能仅仅因为个别非资本主义政权的失效而认定批判理论家的见识过时失效。席勒著作的主要价值在于其理解和解释"信息时代"的穿透力，这依旧重要，关键原由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任何替代性的社会形式，如果可信，都必须始于对此时此地现实的充分了解。许多未来场景（常见的是对于正在到来的"信息社会"的描述）实际上都充满理想化的前提色彩，比如，凭借"技术的力量和潜力"或者是"仅仅想象一下，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可以逐渐获得的所有信息做些什么"的立论来分析信息社会，这有些不切实际。席勒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提醒我们从事物本身的格局与动态开始去理解它们，而不是从想象一些替代物开始去理解它们。

此外，通过解释"信息时代"的起源，席勒的著作展现出了一种以激进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的可能性。当看到"信息社会"拥有一种真正

的人类历史，即它是被各种社会力量所形塑时，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另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

但是，上述言论能足够充分地回应那些批评席勒的学者吗？相当有意思的是，把对“信息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那些右翼观点进行比较，因由在于右翼人士绝对不相信存在一种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组织的方式，除此之外，这两派观点之间居然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也就是说，两派观点都认定“信息革命”是一种特定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的创造物，因此，可以想象许多其他社会形式，只不过右翼观点觉得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比资本主义制度劣等（无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瑕）。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在他一出版便获得盛名的著作中，发表了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样激进的论述。当然，他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标准当然是决定在什么环境下生产什么的关键因素。但重要的区别在于，福山坚信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任何其他经济制度要优越（并且它有利于传播自由主义民主），因为它可以最有效地生产财富。而且，虽然福山承认集体主义可能在一些重工业领域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在“信息时代”集体主义就不可能相提并论了，因为在“信息时代”，适应性价值连城，市场和企业家需要自行运作。

另一种反对批判理论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此种态势展示了企业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市场关系的扩张以及消费主义的所向披靡，批判理论家很容易得出事态已经变得更糟的结论。例如，某些批判学者认为“垃圾信息”的泛滥淹没了可靠的知识，或者说，计算机网络设备的普及带来了更多的监控，从而加强了对劳动力、公民以及个体消费者的严密控制。

但我们需要对这种认定当代信息社会并非历史的进步而是江河日下的观念表示质疑，至少我们还缺乏可靠的历史性的知识，也就无从比较。不错，当今的信息并非完美无瑕，但我们必须非常审慎，不必冒失地以厚古薄今的言论判断今不如昔。另外，正如安东尼·吉登斯（1990，1991）所主张的，那些为了控制目的或者甚至是为了使

公司资本的销售膨胀而使人强迫接受的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并非一无是处。例如，监控系统固然加强了管理控制，但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选择。另外一个例子是信用卡系统，其不可否认地体现了企业资本对个体实施了更强的监控；但与此同时，此类资本主义也与人方便，促进了经济交易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内发生。

与之类似的异议是反对社会关系的单向商品化。市场关系对大部分生活领域（从电视服务到儿童照料）的深广侵蚀已是有目共睹，当讨论到音乐和电影生产时，劳伦斯·勒辛格（2002）对“公平使用”协议（“fair use” protocols）（允许对基于文本来源的合理引用，而不侵害版权）的缺失提出了适时的警告。图像和声音因新技术的推进而在评论或是拙劣的模仿作品的生产过程中普遍运用，但同样的数字化过程以及“公平使用”的缺失意味着图像和声音的创造者可以限制其使用——或者以收费的方式制约使用声音的权限。如果不遵守他们坚持的知识产权（能够想象为对莎士比亚或者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诗句的每一次引用收费吗？），便会承担触犯“数字盗版”（digital piracy）的风险。

但也存在着非商品化的趋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趋势更加具有可见性。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博客、聊天室、电子社区以及网页（大部分网页都是非商业性的），还可以免费下载资料（绝大部分是音乐下载，但也可以下载一些不受版权限制的文学作品和诗歌），所有这些都是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例子。信息的非商品化可能仅仅昙花一现，商业化可能很快席卷、侵蚀所有网络空间，但现在信息领域非商品化的事实至少是对那些认为信息事务领域市场大行其道的马克思主义论断的部分否决。

需要指出关于信息不平等的议题，那些激进派的批评虽然有助于集中讨论获取信息资源方面的阶级差异，但它只是一种关于社会分层制度的粗糙观念，其仅就“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区分回避了问题的精深研究，并没有考虑到一个阶级分化社会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复杂性。简言之，这个模型缺乏充分的社会学的练达和深邃的分析来考量如性别和种族等权力关系范畴的差异；而且，信息鸿

沟的讨论根本就没有提到非体力劳动者群体的迅猛增加及其在社会阶级层级中所占据的地位。同理，席勒关于企业是“信息革命”的核心既得利益者的论述，从阶级体系看，其意义显然深远，但此论也未必全然不可挑剔，因为机构的财富不能等同于个人财富。也就是说，作为人的“信息富人”与企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任何信息不平等的分析都必须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否则难以被认同。此外，席勒未充分铺陈讨论阶级观点，也就没有阐释透彻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相对立）的影响，而在信息/知识领域中，文化资本如高等教育、享用图书馆以及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mand）的影响可能具决定性作用（例如，比较一下那些富裕但却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与那些并非富裕却非常有文化的人的不同）。在此，笔者并不认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水火不容，但本文想强调一种对分层的更加精深的阐释需求，以对信息资源的不同获取和使用做出评价。

反对批判理论的另一种异议根据是倾向以“全有全无”的标准审视信息。这些异议认为，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垃圾信息”，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指向公众的信息都是垃圾。实际上，虽然电视节目可能急剧增多了，大部分节目充斥着闲聊、情节冒险剧和肥皂剧，但从绝对意义上说，也有品质上乘的信息产生。例如在英国，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第四频道的引入可能带来了更多的美国电视剧，但也丰富了电视节目的广度和深度。但令人惋惜的是第四频道只拥有少量的受众，这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的问题：受众是否具备鉴别信息的能力（或者，至少具备这种意愿）？如果说这不仅仅是文化资本的问题，但却与文化资本紧密相关。

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涉及视频录像带、数字视频录像机（VCR 和 DVR）的快速流通，至少在英国，新技术产品已对电视收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推测，录像带与录像机的主要用途在于随时录制节目，以在一些更便利的场合观看（时间转换），这种技术至少可以为某些受众提供一些弹性，增加他们对高质量信息的收看机会（那些为晚间的少数受众提供的节目，对于需要在早上 8 点之前起床的受众来说，那些节目播放的时间太晚）。低俗小说与此雷同。如果走

进 W. H. 史密斯(W. H. Smith)店,浏览其售卖的小说标题,很难不产生沮丧的感觉,空洞而陈腐的犯罪主题以及软色情主题,意在扩大销路且相互竞争,这很容易使那些渴望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 T. S. 艾略特(T. S. Elliot)的人在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和杰弗瑞·阿奇尔 Jeffrey Archer 这样的作家中迷失。但是,如果说低俗小说拥有最大的销路,至少从绝对意义上说,由于"平装书革命",相较于从前,那些经典作品变得更容易购买和普及。

至于信息在消费主义的扩张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仅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洞察到这一问题。过度个人主义、集体关系的削弱以及市场原则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等议题也曾经为许多思想家们所关注,如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T. S. 艾略特、F. R. 利维斯(F. R. Leavis)和杰若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等立场各异的思想家。他们反复指陈,至今还不断出现的论断是,需要操纵信息以引发人们的"虚假需求",可以通过购买特定的商品比如洗发香波或者香水减缓或是释然受众的脆弱和隐藏的焦虑。

但攻击该立场的原因,彼此相互关联。最初,此论根本就认为从前人们拥有许多真正的需求,这些需求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东西得到满足,不知何故,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更加真实的,尽管人们在物质上比较贫乏。似乎人们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却胸怀"高尚的思想",好像一个刚刚从矿场或者工厂换班回来的工人,回到家就开始阅读科伯特(Cobbett)或者哈代(Hardy)的作品。当然,持反对观点者认为从来生活并非如此,例如,在 19 世纪,提供给工人阶级的小说——如果他阅读的话——需要他们花费一笔不菲的钱来购买小说,其内容不外乎耸人听闻的琐事,比如杀人、强奸、酗酒以及妓女色情(James, 1963; cf. Rose, 2001)。

另一种遭到驳斥的言论是海量的广告以及相关影像愚弄了受众。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流派)的拥护者们(我们会在第九章讨论他们)相信,普通人足够聪明,以至于他们能够看清消费主义影像的虚伪性(他们知道假日指南并不总是在说实话,喝酒并不能保证朋友

之间的友情)；他们真的足够聪明以至于他们会欣赏一些模仿滑稽作品、他们会欣赏影像中的反话以及从影像中学习怎样使用摄像机、怎样运用色彩以及其他任何东西(Schudson，1984)。

此外，把生活方式看成或者是私人化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社区导向的生活方式，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可能是个错误。那些静居于家中的人们并不必然孤芳自赏，两耳不闻窗外事(Bellah *et al.*，1985)。实际上，正如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1990)所主张的，"对于家庭重要性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疏阔于集体生活，人们在这两个生活领域中都充分参与，仍然是可能的"(p. 283)。

最后，退一步说，认为生活消费品只有在人们的"虚假需求"被诱发出来时才能卖出去的观点问题重重，此论以为影像优先于广告商们致力推广的产品。但是，人们并不是因为广告、而是因为巧克力饼干的味道诱人而前往购买。与此相类似，大量的新信息技术比之原来的信息技术，实际功能更显优良，对于家用电器市场，只要想想光盘播放机、绚丽方便的 iPod、最新的音响系统以及纯平电视，这些信息技术产品如今拥有更好的品质，比以往的任何产品都要可靠，怎不招人青睐？而且，可以确信，如今人们购买生活消费品(从香水到娱乐)，并不是因为他们轻信了广告商们的宣传，而是因为他们从产品本身的享用中获得了真正的愉悦和日益增强的自尊。

结论

对批判理论的确存在上述异议，但以此论其是非，并不客观，批判理论依然拥有珍贵的价值，而且其价值不是本章的篇幅就可以囊括的。就笔者个人而言，批判理论的几个着重点对于充分理解信息的意义不可或缺。赫伯特·席勒的著作举足轻重，理论起点以鲜活的世界为端倪，而不是空中楼阁般设想"技术的可能性"或分析"想象中的未来"，尤其有益于我们理解信息和与之相关的技术角色和其重要的面向。

席勒可能偶尔也会夸张着墨(cf. Tunstall，2006)，但是他对市

场标准以及企业资本主义的关注不能不使我们确信它们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且，他敏锐地观察到“信息时代”的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本土还是全球，社会不平等因素都绝对主导什么类型的信息——会在什么环境下，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而生产。最后，无论我们如何试图修饰或是赋予其特定条件，“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相当有助于警示我们意识到——信息领域在多大程度上不遗余力地向看起来进一步退隐至私人生活方式的人们出售商品。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信息社会”的许多评论家们虽然承认当今时代流通的信息越来越丰富，但他们并不热衷于宣布“信息时代”的来临，秉持这一见解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信息蒙受了污染，或者是遭遇了一些团体的干预，这些团体要么“控制”信息再现，要么为了特定的立场而“包装”信息以对人们进行劝服，要么“操纵”信息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要么把信息生产成一种娱乐性的可销售的商品。这些思想家们勾画了“信息社会”的图景——各类广告活动的宣传站、国防部的“误导情报策略”(“dis-information” strategies)、各种公共关系的“专家”、议会的“说客”、高明政府政策的“陈述者”(presenter)、靠近首相 的“来源可靠”的“官方透露的信息”(official leak)，它们在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中，全程扮演着各取所需的角色。

这一流派最极端的观点认为——如果公众获得的信息有所缺失，民主进程本身将会遭受破坏。因为，如果公众被拒绝于可靠的信息之门外，或者说他们自愿拒绝接受可靠的信息，那么又如何能够培养出选民的深刻洞察力、协商能力与远见卓识呢？选民没有这些素养，民主社会又何以为继？马里兰大学在 2004 年总统选举中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几乎 70%的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的支持者深信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为基地组织(Al

Qaeda)工作,30%的支持者坚信入侵伊拉克的军队发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有30%的支持者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拥护"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http://www.pipa.org/)。如此庞大的民众深陷无知,令人遗憾长叹,我们不得不考问民众的信息来源的品质何在?(Ackerman and Fishkin, 2004)

在19世纪初,美国第四任总统和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之一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对此境况深表忧虑,他观察到:

> 一个缺乏平民信息(popular information)的平民政府(popular government)……是闹剧或悲剧的序幕,或者同时就是闹剧和悲剧。知识将会永远统治愚昧,那些希望成为自身统治者的人们必须利用知识给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
>
> (Madison, 1953, p. 337)

对于担忧、怀疑当代社会海量般的信息是否就能够造就健全的民主社会的人来说,麦迪逊的名言依旧是一种动人的感召,令人回肠荡气。也有学者甚至认为互联网、电视以及其他媒介的扩张实际上导致民众参与的衰落,因为人们越来越沉溺于充斥着娱乐信息的私人圈子,而不是去参与民主进程(Boggs, 2000)。我们的祖先可能除了阅读《圣经》、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偶尔获得的一些小册子之外,阅读的其他东西很少,当代人们能够享用丰富的信息,但我们就能够信誓旦旦地自认为比祖先们高明吗(Rose, 2001)?

众所周知,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就是善事。虽然,历史记录显示民主相对来说只是一种新现象(Potter *et al.*, 1997),但历经几十年的沧桑发展,我们可以信心百倍地说,民主的政治秩序现在处于支配地位。在欧洲,一些曾经的专制国家和军人独裁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希腊,如今都已被公认为是稳定的民主国家。

民主这一术语的意义因时因地持续扩充,所以,民主的确切意涵变动多样,并非一成不变(Eley, 2002)。近年来,与民主权利关联的呼吁如山似海,比如旅行的权利、残疾人呐喊民主包容的活动,以及

承认个体差异的呼声等等。不难理解，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民主概念的含义扩展了，但这并不意味其含义反复无常、随意多变。全民选举、无记名投票、对议员的日常选举、多党制、集会的权利和正当法律程序构成民主的核心要素。

不过，可靠的信息来源无疑是任何民主社会的关键要素。如果选民们无法获取那些关于生活标准、移民水平、人口构成或结婚率的数据，他们如何能够对经济政策、民族认同、老年人照料或者家庭关系等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呢？

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此，笔者的讨论隐含着对信息的怀疑，尤其是对那些传播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深怀疑虑。为股票市场上的交易而提供的金融数据库中的信息，或者是为了维持企业网络的信息，其信息的品质空前绝后，不过，本章我们要讨论的评论家们却另有看法。尽管不可否认现在传播提供给广大公众的信息丰富了许多，但这并不必然说明当今的信息就比过往时代上乘，因为许多信息可能是为了娱乐、掩饰，甚至是欺骗而生产。简言之，大量的信息属于误导的信息，至少可以怀疑许多部门利益（尤其是一些政治力量和在经济上占据优势的一些力量）和限制性的财政安排（特别是仰赖公共基金的资源向私人资助转移的安排），不是其中之一，就是两者同时影响了信息的生产，并且左右着信息再现。

与赫伯特·席勒及其同一阵营的论点的确承认信息在当今世界的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但并不认同当代新型的“信息社会”说法。笔者从德国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论著来洞察这一批判的路径，因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批判研究看待问题的方式。多年以来，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也为学界所诟病，不过，其论著仍然价值连城。它既批判了海量般信息必然造就信息透明度高的社会的盲目假设，又讨论了公民就信息问题如何朝夕相处的核心议题。他激励我们扪心自问——是不是更多信息就一定意味着更好（或者意味着更坏），而且引导我们深入探究——什么类型的信息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必要的？所以，本章将会考察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

评估它对于我们理解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电视和政府统计方面的信息发展(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的价值,然后,我们不禁深思——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信息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以往对于此类问题的讨论都假设信息和民主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如今该假设正在经受挑战。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他最早期的著作(1962)中发展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尽管27年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资本主义社会类型的考察》(*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才被译成英文,但丝毫不影响公共领域论说的锋芒跨越知识的国界。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扩张发展,主要在18和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公共领域,但公共领域随后便在20世纪中期至晚期衰落。作者以为公共领域是独立于政府(尽管会得到政府资助)和党派经济势力的竞技场,可以自主,致力于理性辩论(辩论和讨论不为"利害关系"、"欺骗"、"操纵"所控),民众可以自由进出检验公共领域,参与开放式的对话,在此等公共领域的空间,公众舆论得以形成(Holub, 1991, pp. 2—8)。

信息是公共领域的核心,也就是假设在信息领域之中,行动者们开门见山、一目了然、无所隐瞒地阐明自身的立场,广大公众能够获知行动者的观点,从而充分进入讨论的程序。可能公共领域最基本的形式——国会辩论,以及公开发布的辩论的逐字记录,都表述了公共领域的核心面向,虽然很明显传播媒介以及其他信息机构比如图书馆和政府统计,都可以被视为公共领域中有效运作的重要构成要素。

公共领域的理念召唤着读者,可以想象那些坦率而诚实的国会议员在下议院中的辩论;热诚的文职人员们不带任何偏见地搜集与论辩主题相关的信息;公众可以通过一些尽责的新闻出版机构来调查时事,后者责无旁贷、尽心竭力地对正在发生的事态进行报道,从

而保障公众洞察事实、顺畅地获知信息。于是，选举之时，公众便可以考量政治人物是否对选民负责（实际上，经过这个过程，政府部门如何处理公共事务可能会变得透明化）。

民主主义者和深受启蒙思潮影响的人热切追随公共领域的理想，在他们看来，公共领域就是信息在民主社会中的担当模式（model）——其如此开放的过程，引人入胜，所有人可无条件地获取可靠信息。不同凡响的理性辩论（pre-eminence of reasoned debate）的启蒙理想同样光芒万丈，令民众百倍憧憬。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可以获知事实、洞明世事、宁静致远、深思考问，于是能够理性应对时局，避免冒失非礼的行动。

如果事先追溯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历史描述，对我们深刻理解公共领域的动力和态势甚有助益。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更准确地说，他指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其诞生归功于发生于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张，而此领域的来临，是资本主义的若干特征之一。至关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们财源滚滚、势力蒸蒸日上，羽翼日渐丰满，以至于他们可以和教会、法庭国家分庭抗礼，脱离于后者权力的控制。此前，浓缩了闻名遐迩的封建社会关系的僧侣和法庭支配了公共生活，他们权势显赫，呼风唤雨；但资本家们日益增加的财富削弱了僧侣与法庭的权力。之所以出现转机，一方面，企业家们给予“文学”（letters）圈子——剧院、艺术、咖啡馆、小说以及文学批评（criticism）等越来越多的支持，于是减轻了文化人对贵族的依赖，促进了与传统权力分离且致力于批评领域的建立。哈贝马斯（1962）洞察到在此等公共领域——“对话即成批判，箴言即成论点”（p. 31）。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深入人心，市场力量的增长也带动了议会改革。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拓展和地位的稳固，议会开始越来越独立于国家，并且对国家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要求增加议会代表，从而相关政策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市场经济的持续扩张。资本主义力量茁壮成长，企业家信心百倍，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资本家跃跃欲试，渴望引领风骚，进入权力场。这一争取议会改革的

斗争同样是争取更多的出版自由的斗争，因为对于呼吁改革的资本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关切政治生活理应接受更多的公众监督。不同凡响之处在于18世纪中期，创建了《英国议会议事录》准确记录议院活动的传统。从此以后，议会中讨论和决定的内容的逐字记录产生了，且成为议会商议的一项公开记录。

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与争取报纸独立于国家宰制的长期斗争相伴而生，政府百般阻碍，但因报纸生产成本相对低廉，最终还是推进了报纸的自主。18世纪和19世纪的新闻业不但报道视野广泛，而且引人注目地致力于对议会事务进行全面的报道，充分体现了新闻改革运动和议会改革运动的合流。各路改革运动的力量聚合中心当然是政治异议(political opposition)的成熟，论争和辩论因之激扬，政治异议与其他压力相交织，推动了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性的可接受政策”(rational-acceptable policies)的发展。

改革运动积累的结果是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它的特征包括开放的辩论、批评地验证报道内容、报道透明度强、民众有充分的媒介近用权，以及独立于经济利益和政府控制的行动者。哈贝马斯强调，寻求从国家获得独立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早期资本主义被迫反抗既存国家——所以，新闻自由(a free press)、政治改革以及更广泛的代表权(greater representation)也就是资本家当务之急的斗争。

但是，随着历史分析的继续进行，哈贝马斯指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特征，最终在一些领域导致了他所谓的“再封建化”(refeudalisation)的负面因素。首先，“再封建化”源自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强盛(aggrandisement of capitalism)。哈贝马斯觉察在私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之间，尽管长期以来存在着“相互渗透”(mutual infiltration，p. 141)，不过，他认为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不稳定的天平向私有财产倾斜。随着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力如日中天，狂热的资本家开始从呼吁对既存国家改革转向推翻国家机器，并且利用国家来增进自身利益。简言之，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应运而生——于是，往昔的追随者们日益抛弃论战与辩论之风，掌管国家机

器之后，国家改由资本宰制。之后，国会议员的私人理事、对政党和智囊团的财政支持，以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议会和公共舆论的系统性游说不断增多，削弱了公共领域的自主权。毋庸置疑，有人会认为这场游戏中还应有许多其他参与者，比如“地球之友”、各种工会，以及出类拔萃的英国工党，但当中的大多数都随波逐流，所以他们丧失了分庭抗礼的抵制力量。

哈贝马斯并不认为该趋势暗示历史的倒退，尤其是在 20 世纪，公共关系和游说文化的蔓延实际上验证了公共领域在当代的重要性，公共领域已经是一个被公开承认的领域，至少政治辩论必须在此领域进行，才能获得合法性。当今的问题是公共关系加入公共辩论，掩饰了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用诸如“公共福利”和“国家利益”之类的诉求掩盖图谋的利益），从而使得现有的辩论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的“冒牌版本”（faked version，Habermas，1962，p. 195）。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采用了“再封建化”的术语，以展示公共事务如何为权力“作秀”（与中世纪的法庭模式类似），而不再是不同的政策和观点发生论争的场域。

其次，与“再封建化”相关的表现来自于大众传播系统内发生的变化。我们不能忘记传播系统的该变化对于公共领域的有效运行举重若轻，因为媒体可以对公共事务执行舆论监督，并由此带来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广泛了解。但是在 20 世纪，随着大众媒体发展成为垄断的资本主义组织，它们作为传播公共领域信息的可靠传播者的重要核心的贡献江河日下。当媒体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利益的左膀右臂时，其功能今非昔比，从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转变为公共舆论塑造者的角色。

该转变存在着许多维度，第六章的讨论已涉猎了几个维度。但此转型的最终结果是随着新闻界承担了广告的功能，甚至在报道中日益表达出宣传性立场时，公共领域开始有些衰落了。基于同样的原因，伴随日益增强的商业化趋势和企业扩张，“文学”领域堕落到推销“流行佳作”和“畅销”娱乐的境界，主要目的是鼓励“文化消费”而不是为了促进批判性辩论。如今在出版业，或者更重要的是，在电视

业和报业，无论是对“明星”的献媚，或者党派性的和有偏见的新闻报道，还是追逐最大量受众的广告商指令的内容，其主要意旨都是为“封建的”目的效劳，讴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虽然上述两个特征体现为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控制的扩张和增强，但从 18 和 19 世纪早期开始，也存在着一些为了利用政府支持公共领域而战斗的力量，此类力量澎湃汹涌，冲击了资本主义经济大潮席卷世界的狂浪，公共领域不至于在此风浪中覆没。在此，人们想到了曾经为公共服务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建立和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群体。哈贝马斯以为从公共领域呱呱坠地伊始，“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就提供了空间，足以让人们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游走，也就是在政体与经济之间立足。在此，笔者尤其要着墨学者、律师、医生和一些文职人员。有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加强了其对社会和国家本身的控制，上述(和其他)职业中相当数量的人们会鼓动国家支持以确保公共领域不被资本支配的力量过分地毁坏，他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哈贝马斯(1962)尤其考虑了广播业的情况而有此言论，他认为公共广播企业的建立“如果不如此规划，面对资本主义的侵蚀，则难以捍卫它们所担当的公共功能”(p. 188)。不过，有观点认为在此存在资本主义利益取代一切的趋势，因此，需要国家的干预以确保那些可向公众开放的信息基础设施持续递增。此论解释了一些重要机构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政府统计服务、博物馆和美术馆，甚至包括高等教育的特征。实际上，至少在信息领域，公共服务精神应体现为为最广大的公众提供无私、无偏见的信息，不管人们是否有支付能力，其与对公共领域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的倾向紧密一致。因此，公共服务精神与如今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应该经得起检验。

通过阅读尤尔根·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历史陈述，我们不得不信服这一论述——公共领域的未来，岌岌可危；甚至在其全盛时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都不能尽善尽美于德国哲学家“非扭曲传播”(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的理想境界。他对公共领域近期发

展的描述更令人沮丧，就其诠释的论调，他已置身最悲观的法兰克福理论家之列。哈贝马斯过往的老师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观点尤为鲜明——资本主义胜利了，个人的自主权从根本上被剥夺殆尽，批判思考的能力极度萎缩，在一个跨国媒介巨头和广告文化盛行的时代，公共领域已荡然无存。就信息而言，传播企业唯市场马首是瞻，其传播产品竭力追逐最大化的广告收入，全力支持资本主义企业为目标，导致传播内容主要唯娱乐为尚，冒险情节、琐事、耸人听闻的报道或文字、个人私生活以及对当代生活方式的赞颂充斥于媒介。所有这些都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appropriately hyped)，的确引人入胜且有卖点，但信息品质却无人问津。娱乐信息作用如何？不过是(或者正是)陶冶受众屈从于"永恒的消费训练，为之辗转反侧、欲罢不能"(Habermas，1962，p. 192)。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不仅被广告伦理的侵蚀所削弱，而且遭受公共关系渗透的重创。在这点上，哈贝马斯对美国"舆论管理"的老前辈爱德华·伯纳斯(Edward Bernays，1891—1995)的事业尤为愤怒——因为伯纳斯的公共关系事业象征了公共领域的终结，伯纳斯及其追随者们所代表的正是理性辩论的终结，而理性辩论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特征，但公共领域已逐渐被狡猾的政治操纵者所摧毁(Robins and Webster，1999)。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公共关系遭遇侵蚀标志着对曾经塑造公共争论的"理性标准"(criteria of rationality)的弃绝，由复杂的舆论塑造(opinion-molding)而创造出来的共识(consensus)完全缺乏理性的标准，该舆论塑造的情势把政治生活降格为"虚饰的浮夸"(showy pomp)，以愚弄那些"随时准备追随的消费者"(p. 195)。

抚今思昔，哈贝马斯忧虑重重。全民选举可能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进政治领域，但它同时也把舆论的重要性置于理性辩论的品质之上。更糟糕的是，这种重视投票而不对问题的正确性做出评估的行为，以及每个人都可参与选举的现象带来了"现代宣传"(modern propaganda，p. 203)，以及凭借"打造的公共领域"(manufactured public sphere，p. 217)来控制舆论的能力的诞生。在此，启蒙运动的

阴暗面浮现于眼帘，如果人们享有投票权，但却缺乏评价他们为之投票的事物的手段，那么形式上的投票意义何在？如果信息意在愚弄民众，那么更多的信息又有何意义呢？实际上，当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处境已经不堪，正如“启蒙与控制、信息与广告、宣传与操纵的杰纳斯（古罗马门神，有两个截然相反的面孔）之双面”（p. 203）。

公共领域和信息变革

上文简要追溯了哈贝马斯的论著，特别洞察了作者对公共领域力量消长的阐述。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承认哈贝马斯也受到了批评（Johnson，2001）。部分学者对其诠释保持强烈的反对意见，质疑哈贝马斯为了阐明公共理念而采用的史料编纂法（historiography）的适当性：有些学者反对他研究中所隐含的“大衰落”（grand fall）；另一些学者则质问公共领域是不是真正存在过（Schudson，1992）。另外，还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把妇女排斥于历史的公共领域之外（Lander，1995），且对号召工人阶级群体为了争取它们的代表权而进行斗争的“平民的公共领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Keane，1991）只字不提。此外，也有学者指责他在阐述维持公共领域的专业人士群体的私人利益时，似乎避重就轻，但哈氏对此谴责避而不谈（Callhoun，1992）。另外，作者强调理性对于公共领域的运行非常重要，许多学者也质疑理性的地位，下文将涉猎此争论。

尽管存在种种局限性，公共领域的理念还是阐明了信息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强劲有力的功能与醒目之图景（Curran，1991，p. 33）。公共舆论形成于公开辩论的竞技场，若是从此前提看问题，那么是否可以达成公共舆论真正在透明的辩论中提炼而成，则关键要仰赖信息的质量、可获得性和传播途径等因素。开门见山地说，可靠而充分的信息会促进健全的讨论的发生，而有所保留、误导的信息，甚至于污染过的信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决定有失公正、辩论无力。正因为如此，一些评论家们，最引人注目的是尼古拉斯·伽汉姆，都把公共领域理念作为探究信息领域发生变化的途径之一。他们利用哈贝马

斯的概念评估以往存在什么类型的信息，如何发生转型，其间交织何种权力关系达成转型。

更具体地说，对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的探索来自于公共领域概念的引入。第一个问题围绕公共服务机构如 BBC 和图书馆网络。相关学者认为，上述机构的信息职能正在遭到剥夺，或者说尚不彻底的剥蚀，尤其是（国家）的市场导向和组织化运作力图改变它们的公共属性。第二个问题涉及人们对信息商品化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深度关切，这也是第六章所讨论的批判理论家们所挂怀的重要主题。一旦信息成为交易商品且可牟利，评论家们便预料到了公共领域将深受信息商业化的侵蚀，政治讨论质量和参与水平必然下滑（Boggs，2000）。第三个问题论及当代的传播环境。许多评论家们认为，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当代传播环境中，信息生产和传播日渐离谱，误导与扭曲的信息铺天盖地。在此，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强调市场原则的新传播系统，唯市场利益优先，逃避现实的娱乐信息充斥媒介，罕有其他信息的流通；其次，符合赞助商、广告和公共关系的利害关系的信息得到传播；最后，政党、商业企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广泛使用信息管理，宣传之风的熏陶并制约当今的信息环境。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几种情形。

公共服务机构

广播和电视

毋庸置疑，公共服务广播机构是英国最重要的信息机构之一，实际上它们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如此。例如，英国广播公司是庞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传播的神经中枢，它的信息能够到达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

公共服务广播在其日常运作中，应免受外在的政治和商业压力，甚至是观众需求而造成的压力；脱离商业运作的原则驱使；服务于普遍公众的利益，而非服务于能够支付收视费的人的利益，或者满足能够吸引广告商和赞助者的利益需要；广播电视节目理应竭力为由众

多少数群体组成的公众提供品质上乘、报道全面的服务，不但满足各类群体之所需，而且不危及整个受众群体的节目生产与播放，无论是新闻、时事、戏剧或者纪录片等类型的节目。在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从业者们努力为公共服务尽力，对生产节目的动机毫不隐瞒，从政治事务到居家日常生活都能发挥作用，以引导公众为宗旨。当然，这不过是公共服务广播的理想定义。虽然 BBC 多年以来执著于强调公共服务，但距离理想的定义仍然任重道远。笔者以为一目了然的是如此公共广播的服务特征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描述相呼应，彼此共鸣。最值得赘笔的，或许是所谓公共媒介服务的组织要同时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操控；强调非扭曲传播的信息公共服务精神；不论收入和财富多寡，其服务应一视同仁。

BBC 创建于 20 世纪初，其运作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与商界保持距离，原因是当年在营运问题上，激进分子与保守分子罕见地联袂行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了共识——BBC 理应属于国家性机构，脱离私人资本利益。观察家们已经目睹了美国推行自由市场，就广播电视业而言，不仅强制性售卖推销节目，而且市场混乱，如此糟糕的局势，在英国国内却产生了诡异的联手打造 BBC。正如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1965)所指出的，“保守党(Conservatives)崇尚权威，而工党(Labour)憎恶私有企业”(p. 233)。此一联合致使双方两相情愿维护“广播电视服务应该由一家公共企业来提供，该企业作为国家利益的受托者(Trustee)，其地位和职责应该与一个公共服务部门的地位和职责相一致”(Smith，1974，p. 53)。

这样，BBC“从在英国创建之初，就是议会的产物，是在国家之内的民族文化使馆”(Smith，1973，p. 54)。BBC 获得了垄断广播电视业的授权，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对收音机听众(后来是电视观众)征收的税金(执照费)(the licence fee)，不论听众是否愿意 BBC 由议会建立以及它与商界保持距离。此一举措意义深远，该机构的操作尊重了立法委员们的呼吁，即广播电视既是娱乐的工具，也必须强调其教育功能。多年以来，这种“资讯、教育和娱乐”的精神融会贯通于 BBC 生产的新闻节目和为少数群体提供的音乐、文学、戏剧以及兴趣类节

目，此一理念在 BBC 逐步得到巩固。

上述情况并非等同于哈贝马斯的术语公共领域，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哈贝马斯论述的公共领域着重于推进“理性辩论”，BBC 还未到达此一理性辩论之境界。但毫无疑问，BBC 扩大了公众对超出其个人体验之外的某些议题和事件的关注。从此程度上说，不管是国外报道，还是描述英国社会中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生活报道，BBC 都履行了重要的民主功能。帕迪·斯堪纳尔（Paddy Scannell）和大卫·卡迪夫（David Cardiff，1991）认为，因民众视野得到拓展，导致“合理性”（reasonableness）深入人心，人们从而能够对他们所做的是何事、他们怎样生活以及他们拥有何种信仰的原因了然于胸。即使上述原因并非决然代表“理性”（因为理性暗示着“正确”的描述），但他们却丰富了公共生活，民众的视野得以扩展，BBC 还同时促进了多种群体的英国共同文化的形成。

作为议会的创造物，BBC 在它的运作和理念上都受到了议会模式的深刻影响。在政治事务的再现上可见一斑，BBC 对政治事务的报道整体上不逾越既有政党政治的格局（在工党和保守党之间调整的“平衡”）——偶尔在戏剧和纪录片方面稍微冒险——但至少 BBC 对待政治的态度严肃而审慎。也就是说，英国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始终以公共事务的告知者（informer）身份秉持自己的职责，为了达成此愿，其克服低俗廉价节目诱惑，仍然以公共事务的报道为趋向。新闻和时事类节目占据了 BBC 所生产的节目总量的 25%，与英国的商业竞争对手相比，后者所生产的同类节目总量不足其 1/2，与美国的电视网络相比，后者的新闻时事节目就更屈指可数了（Annan，1977）。而且，BBC 的信息服务因党派内部和党派之间存在的分歧而开辟出广阔空间，游刃有余，不用担当某些政党路线的代言人，反而能提供大量的分析和广泛的政治辩论（Smith，1979，pp. 1—40）。

公共服务精神之所以落地英国并扎根结果，其重要因素在于 BBC 创立之初的总裁瑞斯勋爵（Lord Reith）赋予 BBC 以公信力的决定性影响。此一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报道中声名鹊起，并且 30 年以来它都无可争议地作为支配性理念没有经受挑战（Briggs，

1985)。公共服务扎根 BBC 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尽管政府一直尝试着干涉 BBC 的运作,但 BBC 却始终名副其实地与政治命令保持了距离,使自身成为一个与政府相关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由政府支配的机构,如果在政府统治的机构中,广播电视媒介普遍沦落为政府政策的工具。BBC 的执著追求在 1926 年的大罢工中发挥得淋漓尽致(Tracy, 1978, pp. 142—156)。无疑,公共服务的理念是广播企业在坚持政治上不偏不倚并尽可能地致力于一种准确客观的报道企业的生命之光。

克里夏·库马(Krishan Kumar,1977)认为,BBC 独立于商业和政府控制乃是"秉持中间立场"以维护自主,正因此,"BBC 在英国具有非常不同寻常的文化重要性"(p. 234),并且吸引了一批才俊之辈投入广播电视业,从业者普遍认同公共服务的价值观,为之鞠躬尽瘁,不屑于美国之流的在彻底商业广播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移动墙纸"(moving wallpaper)模式。"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广播系统不是被政府管制,就是被商业垄断",但"从某些重要的方面,BBC 成功地抵制了政府与商业的侵蚀"(Kumar, 1977, p. 234),创造了独领风骚、与众不同的自主、组织气氛和行为模式(Burns, 1977)。

此外,BBC 的公共服务精神对英国的商业广播电视也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一些密集的游说而开播的独立电视,从一开始就浸润着公共服务理念。正如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和吉恩·瑟顿(Jean Seaton)(1988)的洞察,"BBC 以身作则成为公共服务精神的典范,公共服务的传统被新的权威机构继承"(p. 179)。此精神彰显于独立电视的宪章,独立电视应竭尽全力公正无私;新闻服务部门应该正式独立于商业活动之外。独立电视所签署的合同包含如下条款:每周在黄金时段至少要放映两次 30 分钟的时事节目;对第四频道进行财政资助,使第四频道幸免于广告商的侵蚀而能捍卫自主的使命(第四频道服务于以往频道不曾针对的观众)。美国历史学家伯顿·保罗(Burton Paulu)(1981)的诠释显得入木三分,从一开始,"(独立电视)权威机构的职责就是'作为一个传播信息、教育和娱乐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电视和健全的地

区性广播电视服务'"(p. 66)。

如果说广播的公共服务角色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商业原则(由于"账本底线"的原因，廉价与通俗娱乐节目往往诱惑商业原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避开了外界压力，能够如从前那样作为公正无私、自由的信息提供者来运作，这绝对不可能做到，因为公共机构也处于商业利益支配的社会环境之中。同时，BBC(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电视也是如此)是政府创立的机构，因此容易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或者政府遭遇的压力的影响。此外，BBC 的员工招募也主要来自于狭隘的社会类型(牛津剑桥的文科毕业生)，他们持有先进的价值观和时代感，但难以代表多样化的英国民众。此等压力与员工结构及其职志追求的优势地位必然地制约了广播电视业的发展。

尽管来自某些左翼和右翼的批评家们讨伐广播电视是权力集团(对于左翼人士来说，权力集团指"统治阶级"；对于右翼人士来说，权力集团指半贵族化的"当权者")的某种支配渠道，但我们不能人云亦云、信口雌黄。虽然广播电视独立的特征已转型，但其拥有独立于商业和政治的自主权，此自主权是多年奋斗之成果。在瑞斯早期的领导下，BBC 远离政府官员，对商界不屑一顾，但该机构精英当道，运营相当专制化。当时的公共服务就是播放管理者们认为有价值的节目，如今看来已相当过时。从本质上说，这些管理者们所持有的哲学不过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信条"在世最好的知识和思想"[①]。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环境中，公共服务的空间包容胆识过人或是偶尔的激进冒险与嘲讽，而组织的独立性依然得到维护。在修·格林(Hugh Greene)爵士的管理任期(Tracey, 1983)，伴随英国经济繁荣、电视机数量增加，BBC 每年都可以通过收取额外的许可费来充实财力，政治氛围相对包容、宽松，公共服务得到充分发挥，BBC

① 考虑到雷斯为老公司"强辩到底"，我们意识到管理工作赋予我们持续贡献与累积智识、增加社群道德幸福的职责。我们已经广播体系化的、日渐增加的善的音乐；我们已发展为孩子与成人的教育课程；我们也广播基督教且尝试反映我们信仰的必要的公民与文化成分的、取得共识的基督伦理精神；我们也致力排除那些可能直接或间接有害的事情……我们试图建立公共服务的传统，且力图以最大努力来奉献服务人文的广播电视节目。

不时播放富有挑战性和革新精神的节目，令受众的体验耳目一新，但又倍感忐忑不安。

时光流转，我们现在有可能去追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概念变迁（Briggs，1985）。强调家长制责任作为早期瑞斯执政的模式（Reithian mode）已经被专业主义精神（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理应生产充满智慧的思考、品质上乘的公正无私、情趣盎然并富有挑战性的节目）逐渐取代了。正如我们所见，虽然专业伦理对当今的节目制作者们来说非常重要，但其并没有为从业者提供一种公共广播电视的哲学，以至于 BBC 笃守专业志向的业界人士难以对外界的强烈抨击应对自如。此外，以一种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依赖（至少是部分依赖）如此假设：并非多样，但至少潜在地统一受众。自 20 世纪年代末以来，不论好坏，受众的分化相当清晰、很难定论什么是“一般社会大众”，广播电视从业者们对此也心存悬疑、举棋不定（到底谁是公共服务广播与之打交道的受众？谁不是？）。由此，批评家们对广播电视的抨击易如反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更为深远。例如，BBC2 的前任总经理以及第四频道即将离职的负责人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2001）竟然认为，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公共服务性电视犹如“一种多余的伏都教（voodoo）……丧失了所有的目的和意义”。原因在于现在的观众今非昔比，不容易教化了，他们在当今的“多样化的文化”（versatile culture）中变得更加善于讽刺（ironic）和更加互动。最重要的是，杰克逊觉察后现代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派节目如今成为主流，从而粉碎了公共服务广播“家长式作风的”的设想，即存在着所有观众都应该拥有的电视节目类型。

笔者会在下文中深入回顾上述变化的各个方面，但在此我想强调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尽管对此概念的解释并非一成不变——但至少其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念有一点融合。首先，广播电视机构担当独立于政府和商业以及采取公正无私立场的责任，并且受众能够无限制地观看和收听节目。这个原则的核心是信息应该充分地向公众公开，从而有助于公众对纷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了然于

胸，世事洞明。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们在英国（同时世界其他地方也不乏公共服务精神的其他版本）经历了一种所谓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危机”（稍微有些过分和夸大）。许多人认为此一危机可以通过削弱广播电视的公共领域功能而得以解决。对抗这个危机需要从政治和经济两个阵线开战。一方面，广播电视从业者们遭受猛烈抨击，被认为是新的特权阶级，享受政府支持的自鸣得意的精英分子，一群“左派分子”，动辄叫嚷保护大众（以一种反市场的意识形态、居高临下的方式来训斥公众），然而，他们对谁都不负责任，无论政府，还是私有资本，甚至是缴纳执照费支持了BBC的运作的受众。另一方面，一些经济上的批评声称BBC恣意挥霍了公共资金，从来不对贡献资金的纳税人公开财务支出。此类批评主张“消费者”有主权，即他们应该可以“自由选择”想要观看的节目（Barnett and Curry，1994）。

各路对BBC的批评和攻击合流，导致其预算减少。还有许多外来力量（他们抱怨BBC的“偏见”和不称职）干预其运营，市场原则逐步渗透进机构内部。当然，隐藏于深处的市场狂热席卷广播电视行业，而市场在近一段时期是一个如此重要的特征。所以，伴随司空见惯的“竞争”和“选择”（自由化和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停止政府资助，赞同私人股权）等市场挂帅的辞令呼啸而至，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已经遭遇市场利润优先的旋风而江河日下。

虽然BBC处于时代风云变化的前沿焦点，但英国商业电视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英国的独立电视履行了公共服务的要求，尤其体现为新闻和时事节目的类型、质量和播放时间的结构安排。传统上，这些节目在黄金时段播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晚间新闻节目《10点新闻》（*News at Ten*）。为了不妨碍吸引眼球的大众化的电视节目，比如电影、肥皂剧以及游戏秀等节目的播放，《10点新闻》只好让路，移到后一个时段播放了，不过，后因竞争激烈，该节目又回到黄金时段播放。

另一个损害公共广播电视的措施来自于公共服务广播机构被新的节目传输方式，尤其人造卫星以及有线电视服务所侵蚀。鲁伯

特·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以及它所提供的“娱乐”(体育、电影和“家庭”节目)大餐,风头正足,完全掩盖了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机构水深火热的处境。我们无不忧虑重重,如果公共服务性频道的受众份额持续减少,那么以服务于“一般社会大众”的辞令为由去征收非自愿纳税的执照费也就是沽名钓誉了。毕竟,如果 BBC 的频道受众规模严重缩水,怎么能使每一个电视机拥有者都交纳非自愿性的税收去支持 BBC 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处境的显著恶化。其他媒体的志向似乎不是告知公众,而是销售娱乐,而且他们支持市场原则的决定性转型已回天乏力。实际上,此一趋势意味着由广告或赞助支付的,或者由个人收视所支付的节目才有播放的市场。如果选择政府管制广播电视,那么意识形态的限制不言而喻;如果选择商业化运营,那么商业赞助者青睐的以娱乐为导向的产品必然泛滥荧屏,没有能力支付收视费的人则被排除在节目受众之外,毋庸置疑,政府管制或是商业化运营都会造成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衰落。

如果想辨明广播电视业发展的方向,那么一定要看看美国的情况(Barnouw, 1978),因为从一些核心的方面来说,美国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引导政府信息政策的模型。在此环境中,收视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媒体的内容,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必定难以生存。迈克尔·萃西(Michael Tracy,1998)竟然把 20 世纪 80 年代描述为“公共广播电视企业的巴雪戴尔(Passchendaele)战役”(p. 192),因为公共广播电视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清扫出局。不言而喻,最终结果(Bourdieu, 1998)——肥皂剧、情节冒险剧、聊天秀、杂志新闻以及竞猜节目空前绝后地泛滥荧屏。与此同时,新闻和时事节目严重缩水(在市场化压力之下转向了“快报”和耸人听闻的题材),提供信息娱乐、电影以及最重要的体育节目(尤其是足球)的有线电视服务迅猛扩展。

另一可展望的现实情境是广播电视业将更多地获得来自私人资金(不管是广告、赞助还是收视费或收听费)的支持,而公共资金囊中羞涩,不断压缩支持力度。此一转型导致商业标准在节目制作中的长驱直入,于是,受众规模和/或购买力(偶尔一些赞助商会支持一些

有声望的项目以寻求更好的社会地位）成为首要的考量要素。节目内容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上述市场化力量的强调，往往带来娱乐导向的节目增多。与此相反，是那些“严肃的”和/或少数人关注的节目比如新闻和时事类节目（但这些节目也可能被制作得更具“娱乐性”）以及发人深省的戏剧节目的减少。

从英国广播电视的历史可见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每况愈下，其公共领域角色日渐式微。虽然，未来的广播电视节目会纷纷跟风效仿美国电视那种“文化荒漠”（cultural wasteland），但或许通过一些新的传输形式，甚至是实行订阅制，也许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节目。鼓吹商业化的变革者们津津乐道于如《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绝望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和《六英尺下》（*Six Feet Under*）等富有革新性的节目，以此强词夺理，执意认为商业化运营可以传输高质量的节目内容。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肯定有附带条件，商业利益驱动的电视节目难免流于低俗浅薄、婆婆妈妈，那几个革新性的节目不过是特例。但是，事实上，广播电视产业可能会有小众市场，打造竭力逃避现实的冒险系列剧以及体育和电影节目为那些极少数的受众服务，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类体育和电影节目并不能有效地告知受众知识（Schudson，1991）；或者广播电视服务就局限在有支付能力的群体之中，无论是效劳于小众市场，还是服务于有钱支付的受众，这两种运营都有损公共领域的原则——无论人们收入多寡，信息服务应该一视同仁。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既然媒体要仰赖政府的财政资助，那么必然得听命于政府的发号施令，如此一来，公共财政资助的机构很容易被看作是政府的工具。正是该假设促使批评家们对公共领域理论持怀疑态度。对于许多人，尤其是那些高度警惕广播电视遭遇政治干预的批评人士来说，广播电视既能够分享政府的资助，但同时却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这等黄粱美梦简直匪夷所思。因此，反对政府资助媒体的人士于是很容易地转向支持私人资助的媒体，他们为此争辩——在当今时代，政府理应接受敏锐警觉的媒体的舆论监督，只有独立的新闻机构（不受制于政府的管制）才能够有此担当。

在对上述言论做出回应时，詹姆斯·卡伦认为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比私有新闻业更好地扮演了“看门狗”的监督角色。卡伦承认，由于来自政府的反复攻击，英国广播电视业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但实证分析显示“与那些右翼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全国新闻业相比，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依然在对政府实施严格且持续的舆论监督更上层楼(p. 89)”。他以一部电视纪录片《岩间死亡》(*Death on the Rock*)为例，该片播放于 1988 年，声称英国军队在直布罗陀非法杀害了三名爱尔兰共和军(IRA)成员。虽然政府恼羞成怒，大部分新闻机构也都试图令此节目信誉扫地，但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无所畏惧，矢志不渝、立场坚定，这充分证明了“与政府关联的看门狗责任挂怀，而私人看门狗却沉睡一方”(p. 90)。

可见英国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依然生存了下来，新闻、时事和纪录片节目的制作者们尤其为之鞠躬尽瘁、效忠职志。从公共服务精神依旧持续的意义上讲，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广播电视业保持了公共领域的特征。不过，同样显明的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前提条件已遭罢黜——政府经常干预节目内容；新的传输形式通过摧毁公共津贴的传统观念，正在广播电视业中引入一场动荡的竞争；另外最重要的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使广播电视业从公共资助转向私人资助。虽然我们不能说电视并非对被弃入市场的命运束手无策，但似乎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先前形式已难以为继(Curran，2002)。

当今时代变化不定，置身如此环境，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广电业所提供的信息品质是否下降，而且是否会持续下降。对于市场化的狂热者们来说，“窄播”承诺向分化的多元消费者提供各取所需的信息。而对于浸润于哈贝马斯学说的思想者们来说，虽然不可否认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所生产的信息数量与日俱增(有线、卫星、全天候的节目、更多的频道、视频等等)，但信息品质的提升，或者增加受众选择节目等问题却仍然付诸东流，无人问津。究其原由，不难发现市场化运作导致低俗节目的膨胀，不是媒体巨头垄断播放权，就是媒体根据银行账户来区分受众，于是品质上乘的信息仅仅局限于收入丰厚的社会阶层享用。显然，BBC 不会就此消亡，至少不会在可预见的未

来寿终正寝。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根深蒂固，这一传统令人敬畏。不过，我们也目睹到双重压力——既有来自外界的持续不断的市场化压力，也有来自内部要求与时俱进的内部压力，毫无疑问，两者的聚合将对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公共服务的理念带来显著的影响。

公共图书馆

在英国，公共图书馆网络最能体现公共领域精神。5 000 多所公共图书馆完善地覆盖了各具规模的居民区。[①] 公共图书馆网络具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某些特征。首先，公共图书馆网络的信息履行一视同仁的理念进行开放且免费的服务；每个在此地区生活、工作或者学习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成员资格；公共图书馆必须免费提供可以借出的书籍以及参考资料，还必须制定能够促进人们访问图书馆的合理开放时间。

其次，图书馆服务资金依赖公共资助，其取自中央或者地方的税收，但图书馆运作却独立于任何政治利益之外，按照《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 1964 年法案》(*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 1964)的要求，“向所有希望使用图书馆的人提供全面而有效的图书馆服务”。如果在当地图书馆难以寻求到所需信息，那么全国图书馆的馆际互借系统的则可以相互协助，从而满足申请者的需求。馆际互借获得指定版权的图书馆[②]和波士顿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 at Boston spa)(每年会借出超过 300 万册的图书)的支持，互通有无。

再次，从事图书馆网络工作的图书管理员都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善于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充分发挥公共服务的精神。他们一视同仁，毫无保留地急读者之所急，需读者之所需。如此资质与服务

---

① 在此的讨论，我排除了 800 图书馆，或者说英国学术图书馆，其服务于学生、研究者，完全不同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目的。但是，存在重要的交叉部分(如图书馆跨领域服务，当地民众也可进入学术图书馆)，且从全局着眼，我认为学术图书馆是英国图书馆基础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

② 也就是说，博德莱安(Bodleian) 图书馆(牛津)、剑桥大学图书馆、苏格兰与威尔士的国家图书馆，还有三一学院图书馆和都柏林图书馆。

品质鲜明地体现于英国图书馆协会(LA)在1983年第100届会员大会上采用的《专业行为守则》(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中。就用户负有主要责任的传统职业宣言来说,LA宣布其"成员有义务促进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保护和促进每个个体享有的自由的、平等的、不受任何歧视地获取信息的权利"(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2e),该职业理念由其继承者CILIP(CILIP是图书馆和信息从业人员特许机构,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www.cilip.org.uk/)所发扬。

公共图书馆深受大众欢迎,并且被广泛使用。超过总人口一半的英国人都是本地图书馆的注册用户,三分之一的注册用户定期地从图书馆中借书,每人每年会借阅10本书,每年图书馆都会有超过30亿的访问量(是职业足球比赛全体参与人数的十倍)。从儿童到靠补助金生活的普通公民,都可以访问当地的图书馆,并有信心获得某种公共服务,不管他们是为了查询一些与一项学校项目相关的参考资料,或者获取某项方案的应用建议,还是仅仅为了阅读一部小说。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的公民都礼赞公共图书馆网络乃镶嵌于大不列颠王国信息基础设施皇冠上的一颗璀璨宝石。

公共图书馆肇始于19世纪中期,自此之后,多种力量促进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例如上层阶级的慈善资助、家长主义式的同情、忧患大众未受教养的恐慌、期盼增强民众识字率,以及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学习资源以开放教育机会的愿望等等因素(Allred, 1972)。不管这些动机和热望有何不同,但其深处对于信息的认识却秉持同等重要的理念。也就是说,公共图书馆因执著于追求信息的开放及其平等使用而非属于所有权商品,因此得到持续发展。英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建立和运行的核心理念也就是信息和知识不能为人所独享,但凡希望获取它们的人都可以自由获取。公共图书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于如果人们需要信息,那么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他们应该在获取它们的过程中获得帮助,在此需求搜索的过程中,他们应该不受到惩罚(Usherwood, 1989; Kranich, 2004)。但如此公共图书馆系统却同时在哲学立场和操作方面遭受挑战,其潜在假设——信息

应该向所有的图书馆用户开放的原则遭到强烈的抨击，政府的某些政策已向图书馆施加压力，逼迫图书馆对使用者根据服务多寡收费。

攻击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三个论点。首先，公众对图书馆的资助持续减少，导致图书馆购买的书籍、雇佣的人员以及现刊减少；图书馆几乎不订阅日报；在许多地方，图书馆压缩了开放时间；图书馆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寒碜和混乱(West，1992)。商业化服务可以弥补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损失，此一商业化诉求过程主要发生于边缘地带，因为图书管理员们的职业伦理以及政府立法禁止商业化的发生。因此，如今预定一些特定的书籍、馆际互借以及一些查询服务都要收费，而对于过期书籍的罚款制度日益被标准化为一种获得资金的机制，而非鼓励借出资料的迅速归还。丝毫不必惊讶，从1986年到1996年，图书馆借出的书籍减少了20%；更糟糕的是自从1996年以来，书籍借出量又垂直下跌了30%。

其次，还有人士抨击公共服务的政治正确性(此一抨击以对“市场”的普遍狂热而武装自己)——公共图书管理员不用对任何人做出解释，自己心知肚明即可，于是，他们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图书馆用户之上，因为是由他们来决定购买何种馆藏图书；同时，此举也允许他们把大部分图书馆预算划为自己的工资。此外，亚当·斯密学院(the Adam Smith Institute，1986)的研究发现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花钱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比如“平装本革命”能使每个人获得廉价的书籍，消费者们似乎也乐意享用蓬勃发展的视频租赁链(video rental chains)。图书馆渴望恢复以订阅为基础的服务，并且十分羡慕Blockbuster视频企业(Blockbuster Video Company)所取得的成功。当今时代，市场意识形态——日益被阐释为是“真实世界”的声音，代表了大众的选择，但市场化对普通人的影响并非如意识形态的宣传，图书馆系统因商业化侵蚀已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他们面临财政支持的锐减，图书馆系统开始屈从于市场意识形态的操控。

再次，有人指责公共图书馆没能够与时俱进，因其注意力仅仅集中于书籍，而非囊括各类电子信息传输，那么，谴责公共图书馆是过

时的管理者也不为过。此类批评大部分都来自于后撒切尔主义(post-Thatcherite)群体,他们着重指责的要义就是公共图书馆陈旧且不变通、恪守老规矩的系统完全不能满足文化诉求,后撒切尔主义群体并不强调图书馆经济上的短缺和市场机会问题。有人认为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多媒体传输以及最重要的互联网是图书馆唯一的未来,要分享这类新技术的恩惠,首先要求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们转变思想、更新观念、预期展望以及组织原则,正因为对此类理念的憧憬,激勉后撒切尔主义的信仰者抱怨、批评当代公共图书馆的陈腐(Greenhalgh and Worpole, 1995)。从中说明人们渴望图书馆应该投资新年信息传播技术,翻新设施,安装个人电脑,淘汰旧书和失灵的防护装置。管理图书馆的馆员,思想保守落伍,缺乏新技术操作训练与敏感性,仅仅沉浸于书籍和"图书馆的宁静"氛围,完全不适应技术时代的要求,图书馆必须更换新鲜血液,唯如此,图书馆的"现代化"方可落实。

此一论调充斥于《新型图书馆:民众的网络》(*New Library: The People's Network*)论著中,该书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推崇后撒切尔主义式的图书馆服务方式(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 1997)。另有"新时代"言论的权威,如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2003)就"如何建立一种现代的图书馆服务"的建议也赞同上述立场。利德比特认为"虚拟图书馆"近在咫尺,而大部分图书管理员们却不识时务,因此他们落伍于时代也是必然趋势。图书馆的访问量与书籍的借出量日渐萎缩,但 1997 年以来,闹市商业街的书籍销售量却飙升了 20%,像 Borders 和 Waterstone 之类的连锁书店既售卖醇香的卡布其诺(Cappuccino)咖啡,还不时推出"买三送二"式的促销活动以及华丽的皮沙发;相形之下,公共图书馆的逊色不言而喻——俗气不堪且乏味,不过是老年人和缺乏社会能力者的避难所,或者是缺乏冒险精神的失败者们的雇主(虽然书店本身也受到了在线书籍购买的威胁)。其实,图书馆已淹没在一片谴责的声浪之中——如缺乏"管理才能"、"振奋人心的目标"以及"输送能力"(capacity to deliver)等等。相应地,利德比特认为图书馆应该立

即采取行动，走上正轨，终止动辄就把失败归结为资金缺乏的言论。不言而喻，图书馆迫在眉睫的要务是停止哀鸣，必须现代化，否则其将面临覆亡的命运。

另一种针对公共图书馆的抨击是批评他们屈服于市场化的压力，这类批评来自于政治上的右翼人士，但左翼人士也意见一致。他们都认为免费的图书馆服务，便宜了非常有能力为自身购买书籍的人，而非受益于普通民众。例如，尽管大部分公众都是图书馆会员，但有人估计会员中的一半属于仅占人口20%的中产阶级。用户调查的确显示，中产阶级在活跃的图书馆用户中占主导地位，而且位于富裕地区的图书馆获得了更多的公众支持（因为与图书馆有关的问题通常是资源配置的基础问题）。

此外，批评人士不仅指责图书馆效劳于富裕阶层，而且因其本身的精英倾向，履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轻视如工人阶级或者地方性的文化（Dawes，1978）。此种偏见不仅体现为图书馆对文献的日常选择（基本上默认了“中产阶级”价值观与品味），而且也表现在图书管理员们对资料的偶尔审查中。实际案例，如一些图书管理员们以某些图书具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倾向为理由，就将像埃尼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诺迪（Noddy）之类的图书撤换下架。另有观点认为在公共服务的花言巧语背后隐藏着令人不快的事实：图书管理员们从不亏待自己，工资总额是三倍于购买图书的经费（Adam Smith Institute，1986，p. 2）。2004年，超过一半的图书馆支出属于员工薪水。支持公共图书馆的所谓热心人士，最引人注目的是Waterstone连锁书店的创始人——蒂姆·寇兹（Tim Coats，www.libr.org.uk），他怨声载道，呼应了威尔·哈顿（Will Hutton，2004）的主张——图书馆“应对现存的大量冗员进行重新安置”。按照此种推理，如果要求这个自我服务和持精英立场的职业对付费消费者负责，后者自会精明地评估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而且责问雇用馆员的信息服务是否物有所值？如此设想，图书馆服务的情况是否就会好转呢？

对图书馆的指责绝不止于此。另有若干谴责，其中之一针对既然大部分读者都从图书馆借阅通俗小说和传记（这些占借出图书的

60%，借阅的小说类书籍的总量是借阅非小说类书籍总量的两倍），而且此类读者大多腰缠万贯，那为什么要用一般民众的税收来补贴有钱人的闲暇活动呢？尤其是“平装本革命”早就便宜了通俗图书的售价，已经异常廉价了。直言不讳地说，图书馆系统主要满足了用户的娱乐需求，如“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借阅率”绝对居高不下。我们不禁联想起2004年被借阅的成年作家排行榜，位列前五位的约翰·格里斯夏姆（John Grisham）和约瑟芬妮·考克斯（Josephine Cox）（四次单独的调查）。我们或许会欣赏亚当·斯密协会（1986）的观察：“虽然图书管理员们可能自视其工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产业的一部分，但大量的消费者却把这项服务当作公共投资的免费爱情小说享用”（p. 21）。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图书馆服务与电影产业和职业足球在原则上又有何不同？这一切不都是娱乐吗？不都是令人愉悦的消遣吗？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图书馆乃免费服务，而其他活动都要求支付一定的费用才可大饱眼福。

第二种批评针对图书馆的矛盾现象。图书馆是提供免费服务的机构，矛盾体现于为一些商业原因而使用信息的机构服务。例如，在技术革新的预备阶段，一个企业希望去调查一项法律或金融事件，或者是查阅化学方面的文献，此举为企业带来经济价值，但企业却不用为使用图书馆的资源付费（此类费用不在少数，因为它在查询信息中需要专业协助，并且需要引用一些昂贵的资料）。批评家们认为图书馆为此类企业的信息服务存在矛盾，他们建议应对企业酌情实行收费。这类批评意见不无道理。

第三种谴责涉及图书馆所提供的参考著作，很可能最接近公共服务和公共领域理念的方面。图书馆的理想蓝图是——图书馆犹如“知识”的大宝库，专业图书管理员们（日益被称为“信息学家”）帮助人们获得知识；相关公民、热情的中小学生、自修者、自我提高者或者仅仅是有着求知欲的外行都“强烈要求获得知识”。但与此蓝图相反，我们必须正视现实：不仅是图书馆的查询服务无法与社会大众的整体构成比例匹配（富人再次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参考资料只占图书馆馆藏的12%至15%，只占每年购买书籍数量的5%。既然大

部分用户都有足够的金钱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服务或书籍，既然参考书只占图书馆馆藏的很小一部分，那么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的所主张的图书馆每日收取入场费，为长期用户则提供“季票”的建议也不是一无是处。

相对于针对公共图书馆的抨击者，另有一些人士特别狂热于探索信息商业化的可能性，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信息技术咨询专家委员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 Panel，1983)公布了一份日后证明影响力非凡的报告，直言不讳地以“经营信息商业”(*Making a Business of Information*)作为标题。报告从时代发展趋势中洞察出“一个扩展中的‘贸易信息部门’，它包括对金融和商业信息的供应、印刷和出版、在线技术信息、咨询等等”(p. 7)。报告还力劝“私人和公共部门应对作为一种商品的信息投以更多的关注”(p. 8)，报告建议先前阻止商业化的领域应对企业家们网开一面，允许企业家进入角逐(相关的公共部门)，而已经跃身企业家位置的人们则应发扬广大企业家精神，公共图书馆理应是开放的前台。

越来越显而易见，下述因素推波助澜，接近信息(access to information)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例如额外的公共需求、资源的减少、技术的革新，以及对支撑公共图书馆哲学的前所未有的批评。从前，信息理所应当作为共享和开放的公共资源，而现在却日益成为贸易商品，因私人消费而被购买和出售，以支付能力决定信息使用的权力。“收费还是免费?”的论争也快告终，结果日益有利于鼓吹收费者的一边。企业化的图书管理员所引入的“额外收费”(premium)服务主要针对与图书馆业务相关的信息商业用户，这是市场警报理念(market-alert ethos)造就变迁的征兆之一。同样开创性的活动是一种双重图书馆系统(a two-tier library system)的引入，此系统与信息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理念势不两立。

如果仅此就认定公共图书馆的运作已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很荒谬。新的措施正在涌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正在形成(Bailey，1989)，但政府仍然禁止对基本的图书借阅、期刊阅读和使用参考资料收费(Office of Arts and Libraries，1988)。尽管如此，“征收

费用正日益被更广泛地接受"(Lewis and Martyn, 1986),因为公共图书馆已经开始向馆际互借的请求、非书籍性资料、预约服务、本地区以外的用户、影印以及基于计算机的信息收取一定的费用。鲍勃·阿夏伍德(Bob Usherwood)(1989)相信,对服务进行收费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企业用户优先于个体民众,因为前者无疑是有利可图的利润市场。此类情况尤其反映在私人生产的信息中,其对个人来说,简直昂贵无比(如商业咨询报告、许多环境影响评估,甚至包括大量的涉及时下热门话题的参考资料)。此一趋势导致普通公众疏离于"硬"信息,"公众较缺少信息且难以质疑现状"(Usherwood, 1989, pp. 18—19),而企业用户却享受着一种质优价高的信息服务。

上述观点的批评者们认为公共图书馆正在转向越来越多的商业实践,这的确对信息及其可获取性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但任何对此趋势的负面评价也不可忽略——由于信息的实际成本下降,人们实际支付信息需求的成本不在话下。现实生活中,获得一本书的最流行途径是购买,而非从图书馆借阅。在英国,书店的数量几乎和公共图书馆的数量一样多,现在每年出版的书籍数量看涨,而平装本书籍价格低廉,民众购买毫无问题。Waterstone 连锁书店在 20 世纪 90 年代雨后春笋般成长扩张,就是此现象的确证。由此来看,公共图书馆乃过时了的机构,其曾经致力于向公众提供信息,但随着信息传播新科技的更新,现在的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多余之物。毫无疑问,维基(Wikipedia)的狂热者们肯定觉得现在公共图书馆已经没有必要去储存百科全书了,因为替代性的信息来源可以从网上免费获取。

这种推理方式问题也不少。首先,书籍购买者们非常集中,超过 80%的交易只来源于 25%的人口,而后者主要来自于较高的社会阶层,获得了良好的教育的阶层。其次,往往购买书籍是一回事,而使用图书馆又是另一回事,两者并不相互排斥。与此相反,图书馆的频繁使用者,同时最可能是购买图书者。再次,人们购买的书籍类型与图书馆所提供的书籍类型相比,不一定雷同。人们购买的大部分书籍是平装本小说(占整个销售总量的 30%),主要包括通俗小说、恐怖故事、科幻小说以及惊险读物。而销售的非小说类书籍主要包括谜

语书、运动手册以及 DIY 出版物如烹调和维修类书籍。现在，图书馆的确因提供太多的免费低俗小说而遭遇批评，不过，图书馆也决非限于低俗小说的内容，尤其是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reference works）。参考文献不能外借，只能室内阅读，难以量化其使用频率。但是，我们确实了解那些标准的参考文献——从百科全书到地名辞典，从统计原始资料到商业指南——通常都极其昂贵，并且版本会频繁更新，普通个人用户难以支付购买费用。如果没有公共图书馆，我们很难想象到人们能够便利地查阅如《名人录》（*Who's who*）或者涉及了非常多样化的主题比如教育机构、慈善组织和公共事务的大量年鉴（Ignatieff，1991）。如果没有公共图书馆，公民们的信息环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枯竭。

英国的公共图书馆正在萎缩，图书的借阅量持续下滑，而人们购买书籍的数量则在增长。可见具有公共领域基本要素的公共图书馆网络正在走向衰落。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自由进入和一个全面的服务——正在受到挑战，并受到市场化的、新技术网络获取的新信息定义的威胁。伴随市场化与新技术的深入，我们可以预见影响图书馆衰落的公共服务精神必然江河日下（用户们即将转型为服务付费的消费者），与此同时，图书馆免费为公众提供满足他们广泛的信息需求服务的公共领域功能势必一蹶不振，从长远观点来看，公共图书馆的前景黯淡。

博物馆和美术馆

罗伯特·休森（Robert Hewison，1987）对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变迁，提出备受争议的评论：

> 在 19 世纪，博物馆乃人生教育和进步的泉源，因此免费。而现在则是商业机构，自负盈亏，从而必然收取入场费。艺术再也不是作为灵感、思想、想象力和价值观的源泉而被欣赏，它成为了“休闲商业”的一部分。我们不再是艺术的热爱者，而是某个产品的消费者。
>
> （Hewison，1987，p. 129）

休森对博物馆和美术馆长期以来所持有的原则演变为“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的论述,与笔者追溯公共领域在广播业和图书馆领域的衰落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我们就此可能参照公共领域的概念来理解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变化吗?虽然我并不认为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述这些机构是一个完整形式的公共领域(如此之多的此类机构具有排斥性、精英主义的趋向,令人望而生畏),但在某些重要方面,我们也觉得此类机构接近公共领域理想。近来发生的一些趋势,就它们挑战公共领域的基础的程度而言,必定对在国家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中的信息获取以及能获取到的信息类型产生重要影响。

现存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包含了公共领域的关键特征:

首先,免费进馆以接受“启蒙的宫殿”熏陶(正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创立时的宣言)长期以来都是英国博物馆和美术馆运行的轴心原则。启蒙的宫殿秉持一视同仁的理念——这些机构必须履行一些重要的文化和教育功能,因此它们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不论贵贱贫富。

可以确定的是,许多批评者们会争论什么算是“文化”和“教育”(英国过去的皇权统治、帝国的庆典、大量的战争史、一流的肖像),但我们不应忘记,所有这些都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深刻启蒙运动根源(deep Enlightenment roots),如此根基不可随便抛弃。它们强调对知识进行搜集和展示,民众从而能够通过知识洞察自身和所处情境,转而作用于生活世界。当时的大英博物馆馆长大卫·M. 威尔森(David M. Wilson)(1989)指出,在大英博物馆根据《1753 年议会法案》(Act of Parliament in 1753)创立之时,他渴望囊括“所有的人类知识”(p. 13)的收藏品。现在看来,他当年的抱负与热望非常荒唐愚昧,但我们不应忘记,与此热望相一致的是收藏品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的原则,从而人们浏览藏品而启蒙受益。威尔森继续说:“我们的收藏品会同时向学者和外行完全开放……只有举止轻佻的访问者,才会遭到婉言拒绝”(p. 69)。

其次,如果说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初期经费来源于名门贵胄,那么

现在的经费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公共预算。正因为如此，收藏品才会独立于党派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之外。

最后，博物馆和美术馆洋溢着公共服务的精神，馆长和其他工作人员秉持崇高的职业理念——为了普遍公众的利益提供和保护收藏品。需要承认此刻所说的“普遍公众”可能与日常实践中的意义有些差别，它可能作为实现雄心抱负的托词，也就是希望收集一切对“人类境况”和民族历史有价值物品的壮志宏愿。但不论此一解释是否行得通，我们不可否认不以金钱利益作为馆藏取舍的高风亮节是他们崇高的理想志向，既竭力服务于公正无私的学术研究，也陶冶大众而捍卫馆藏品质。

虽然从原则上讲，博物馆可以成为批评论辩的竞技场，但在实践中，博物馆却难以成就辩论的发生(Walsh，1992)。博物馆反而经常反映创立者们和赞助者们的阶级偏见。例如，就英国历史的图像展览而言，充斥偏见，甚至歪曲事实。此外，许多美术馆总是展示一些属于排外的“高级文化”的艺术和展品，此类展品曲高和寡，难以为一般素养者“欣赏”。正因如此，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参观者不可能是公众的代表，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中有60%拥有大学学位或与此相当的学位，在四名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者中，有三名来自于最上端的三个社会阶层(A、B和C1)。

我们对上述问题也不否认，但肯定也不能做如此推断——博物馆和美术馆中除了阶级偏见之外，一无是处。阶级偏见的确存在，但博物馆的贡献远非于此。博物馆乃展示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特别重要(很可能是核心的)方式；其通过展示我们的过去而使我们更了解自身，甚至只有通过“我们曾经如何”的暗示，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在将来的可能性。另外，马修·阿诺德所关注的“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并不完全是特权阶级的自负。我们对什么具有“最好的”藏品资格，也许意见纷呈，难以达成共识，但对理想的追求可以确保值得普遍尊敬的高品质艺术作品得以馆藏。而且，那些大型博物馆，尽管它们刻记着特定社会背景的收藏品及其捐赠人的烙印，但展品也令参观者耳目一新，震撼心灵。总之，大型博物馆和美术馆是意义深远的

教育机构，疏阔于“意识形态宣传”，许多成年人对他们童年时期的访问经历记忆犹新，甚至个人觉得如此参观体验是自己人生转折的关键。著名作家 H. G. 威尔斯(H. G. Wells)出身贫寒，他在他的自传中就描述了年轻时代访问肯星顿(Kensington)及其附近的博物馆的阅历与感悟。我们只要回想 2003 年有 550 万人访问了位于南肯星顿的国家历史科学博物馆，必然会确信无数人通过访问博物馆或美术馆，既开阔了视野、探索了问题，也增进了知识。

如果说从我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可以发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某些特征，那么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来，博物馆和美术馆也遭遇威胁。最古怪的攻击来自于那些顽固的反对者们，一些激进分子和“企业”狂热者们联袂指责这些机构贵族气味浓厚，曲高和寡，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流行用语上体现出来——参观者被称为“消费者”，“企业商业计划”被日常地制定，可测量的“业绩指标”成为重中之重。另外，对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的经济不景气的责难促使有些人反对公共补助的理念，这意味着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预算每况愈下、捉襟见肘。

对此情况，通常的回应都包括两个方面——收取入场费以及寻求赞助。前者对于参观者有着直接影响(对展品有间接影响)，而后者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博物馆和美术馆馆长的自主权。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末期，一些国家级博物馆和美术馆开始收取入场费，比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科学博物馆(the Science Museum)、帝国战争博物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以及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自从它们开始收取入场费之后，参观这些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人数显著下降，与 1980 年的数据相比(当时是免费开放的)，参观者人数下降了 50%。与此相反，访问依旧保持免费开放原则的主要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人数却稳步上升。截至 1996 年，参观者总数达到 670 万，大英博物馆无疑依旧是大不列颠王国被访问最多的博物馆。一个人无需是社会学家，都明白访问量的下滑主要来自于穷人或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顺便提一句，他们最迫切需要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因为贫寒处境与边缘气氛让他们感到

不快)。幸运的是，经过唇枪舌剑，以及一些富有同情心的政府部长们的关键性支持，在 2001 年，博物馆和美术馆收取的入场费降低了。在随后的几年，英国这些重新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访问量增长了 75%(Kennedy, 2004)。

赞助商们是另一个受欢迎的资金来源，以弥补来自政府资金的不足。但不幸的是，与那些现场艺术(live arts)(现场艺术获得的赞助与流向体育运动的赞助经费相比，后者数额庞大)相比，博物馆和美术馆对赞助商们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与赞助牛津艾希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一场展览相比，支持格林德博恩(Glyndebourne)剧院才是声望显赫。更为严重的是——赞助商们的介入从来都不是出于利他的目的，而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做出支持某项展览和/或某个机构的决定。直言不讳地说，赞助是广告的翻版，“一种商业工具……赞助商希望从他们的支持中获得某种回报”(Turner, 1987, p. 11)。现在，企业赞助商们(最受到追捧的)的确有非常多的原因去推进它们的商业策略，而当涉及博物馆或美术馆展览的内容时，不过是“轻描淡写”，酌情应付而已。尽管如此，无论心意轻重，如此轻描淡写的应付显然地依赖于赞助商的意愿——在接受资助之后，如果赞助商们希望在展览中能够出现一些诱惑消费者的展品，那些寻求资助的人必须要精心筹划展览，以达成双方的默契 (Shaw, 1990)。

略微思考，就会发现此等状况相当危险，虽然渴求资金的机构往往忽略了此情此境的危险。作为一名艺术批评家，雅努茨扎克(Januszczak)对 20 世纪 80 年代赞助之风的盛行，感到义愤填膺，他直接抨击“伦敦的公共美术馆……变成了武器生产商和金融推销员们的橱窗和豪华的广告商场”(Januszczak, 1986)，他观察到：

> 赞助商们把美术馆看成是一个相对便宜的、高级的广告牌，它们可以去美术馆漂白自己的名声。他们一般都会支持粉饰他们声望的艺术；于是，他们美名远扬，同时他们的监督审查力量也会增强。
>
> (Januszczak, 1985)

笔者在前文提到了入场费的引入所带来的非直接影响。本文想说明的是，对商业原则的效忠非常容易导致博物馆和美术馆与彻底商业化的企业，比如杜莎夫人蜡像馆(Madame Tussaud's)争夺消费者。如果要赢得顾客的青睐，需要不断地寻找具有异国情调的、非凡的、能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展品；于是大势所趋，“娱乐秀”挺进到主要放置艺术珍品和历史遗迹的场所。当然，还存在一个区分开放展品和使艺术和文化作品琐细化的灰色地带，但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他们已看出矛盾的景观——商业博物馆的繁荣昌盛与政府资助的博物馆江河日下形成鲜明对比。

当把商业化的博物馆视作是“休闲产业”的表现时，这种矛盾便容易理解。“博物馆”洋溢着迪斯尼风格和不假思索、不具挑战性的怀旧情调(nostalgia)——精心设计的音响效果、吸引眼球的风景、吸引物(attraction)的快速改变、视频游戏、机器人、再创造的气味和符号，还有最重要的是“参与”其间的消费者，他们付费“享受”、从中找乐。罗伯特·休森(1987)认为所有这些——从蓬勃发展的商业化的向公众开放的宏伟房屋建筑到各类主题公园，比如诺丁汉(Nottingham)的“罗宾汉的传说”(Tales of Robin Hood)——都显示出了“遗产工业”的优势地位。“遗产工业”扬言要支配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领域(并且极大地延伸该领域)，向观众展示一个安逸舒适且神秘的“昔日英格兰的浓情蜜意”。

政府信息服务

我们往往误解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知识大部分都来自于那些在大学各系科中工作的学术研究者们，他们开展实地调查，并且公布调查结果。实际上，我们获得作为一个社会的我们自身的知识——关于家庭、学校教育、工作和闲暇的知识——绝大多数来自于政府信息服务(Bulmer，1980)。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是通过一些二手来源，比如报纸和电视(甚至偶尔通过那些依赖于官方统计数据的学术著作)来获得大部分信息，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些信息来自政府机构。

这是因为政府是能够系统地和日常地搜集和处理任何信息的唯

一机构，从离婚模式到婴儿发病率，从职业转换到犯罪趋势；因为这令人生畏的任务需要大量的金钱，同样重要的是还需要一个合乎宪法的政府合法性。例如，只要想想通过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所获得的详尽而个人化的信息，你不得不叹服这个说法。此外，政府还是能够收集与一些敏感问题关联的信息的唯一机构，比如移民模式、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等，所以它作为一个重要信息来源的重要性是尤为显著的。

如果把政府视为向我们提供信息的主要机构，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特别的需求，即此类信息必须可靠。政府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自身——我们如何发生变化、健康模式如何分布、家庭如何组织、房屋是如何装备的等等。如果政府政策要达到有效，更重要的是，如果公民们要具备评价能力并且有意义地参与社会生活，那么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要相信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如果我们不能相信那些告诉我们预期寿命、出生率以及出生率的地区差异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如果我们不能相信教育趋势的数据，这些教育趋势包括识字水平、普通初级中学毕业文凭(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在不同学校、地区、课堂规模上的不同通过率；如果我们不能相信失业率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想象一下，会是什么结果呢？

由此而论，政府信息服务与公共领域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缺乏可靠的知识基础[①]，合乎逻辑的讨论，更不用说理性辩论，简直匪夷所思。实际上，如果缺乏充分的统计信息，很难去想象一种有意义的政治，一种超出了交换各种口号的政治。正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贯穿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已达成一致的理念——无论怎样复杂的政治商议(political deliberation)，必要前提是政府应该生产准确的、系统搜集的信息。正如前任保守党内阁大臣艾恩·吉尔默(Ian Gilmour)爵士所说，长期以来所持有的理念和实践是“统计的精准应该超越于政治的权术”(cited in Lawson，1989)。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那些搜集和发布这些信息的政府统计学家们

---

① 英国关键的组织是国际统计办公室，作为中央统计办公室与人口办公室的巨无霸，1996年其进行了人口普查。

所持有的公共服务伦理，即强调应该谨慎而无偏见地搜集和分析信息。也就是说，统计学家们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并且衷心地效忠此专业价值：精确性、谨慎的方法论实践、客观性以及坚决拒绝扭曲或者隐瞒证据(Phillips，1991)。尤为重要的是“事实的管理者们”(Phillips，1988)必须让他们的守护职责超越政治党派性、政治压力以及对利润的追逐。他们还要以身作则，迅速而无条件地向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发布他们所负责的信息。克劳斯·莫瑟(Claus Moser)爵士(1980)曾担任过政府统计服务方面的负责人，他在皇家统计学会(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发表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经典的公共服务哲学：

> 政府统计学家掌握了大量的国家信息，他有责任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发布此类信息……由政府搜集的信息必须为人所用，并且提供必要的信息来源指南，这些信息不应因为一些秘密约束而被阻止向公众开放……这些不是一些边缘职责，而应被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同用户群不仅对这些受到公共资助而收集和提供的信息拥有“权利”；而且，一个民主社会和开放政府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信息必须广泛地流通并如人们所愿，且为人所用。
>
> (Moser，1980，p. 4)

最后，信息的传播因作为一项核心的公共服务，长期以来都获得了大量的补助——实际上它通常是完全独立于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以保证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公众都能够支付信息公开出版物的费用。英国著名的出版署(the Stationery Office，TSO，从前是皇家出版署[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HMSO])作为显著范例，就直接受到议会资助，它会出版一份简报以广泛发布政府信息。皇家出版署成立于 1786 年，在公开发布关于议会辩论、报告和立法的信息方面，闻名遐迩。直到最近，如果 TSO 认为“一份文件‘符合公共利益’，那么这就是出版它的充分理由”(Butcher，1983，p. 17)。虽然大家对由什么构成“公共利益”尚存争议，但在此重要的是，如

果一项信息被同意向公众发布，那么就应假定它值得获得支持，需此信息者就可以不受到严重的经济限制地使用信息。

在此，并不是说政府统计服务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公共领域，而是如此服务具有任何有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比如统计上的公正、公共服务以及公众对政府信息的方便使用等原则都巩固了政府统计服务的支持性角色。但目前有两种趋势削弱了政府信息服务的上述功能，其延伸影响剥夺了公共领域本身。首先是信息的商品化趋势；另外就是政府——更一般地说是政客们——干预统计数据的倾向，从而危及服务的诚实性，由此导致"知识的政治化"(politicisation of knowledge, Phillips, 1989)。本来统计数据长期以来都不曾作为政治论战的对象，不过，今非昔比，过去被各种政治(和其他)观点所信赖的信息数据，如今因"知识的政治化"流风所及而不可避免地令人怀疑信息的可靠性和公正性。

转变的踪迹，首先可追溯至 1980 年，德雷克·雷纳(Derek Rayner)爵士(1981)向首相提出政府统计服务的报告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雷纳支持削减政府信息的成本(使服务和人员成本降低了25%)，并且通过信息服务来收取商业费用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从而转嫁了公共服务的负担。雷纳的建议是："支持统计发布的津贴必须迅速削减"，对商业机构信息服务需要"商业性地收费"，并且，"应该开发出能使公众……获取政府数据的弹性便利的方式……提供这些设施所需的成本必须通过享用服务的个人收取适当的费用来支付"(Privy Council Office, 1981, Annex 2)。与此相一致，英国决定皇家出版署成为一个"贸易基金"(trading fund)，而不再专门为议会服务的决定，此一改变促使皇家出版署的宗旨更加以市场为导向(Levitas, 1996)。

上述以市场原则考量信息的举措，其造成的结果是政府资助的削减以及向公众信息服务成本的迅速增加。正如伯纳德·本雅明(Bernard Benjamin, 1988)简明指出的，"一个普遍的指责是……政府希望出版品尽可能少，但售价尽可能贵"(p. 2)。或许，最著名的一次政府削减案例，即政府在运作了 26 年之后，于 1997 年终止了每年一

次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虽然该调查访问 10 000 个住户,涉及从避孕到儿童照料的非常广泛的问题,提供了许多关于英国社会生活的资料,但因费用问题不得不把调查束之高阁。在那些持续公开发布统计数据的部门,政府资料的成本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趋势,即内阁部门开始向以前免费传播的信息收费。对于许多公民来说,不言而喻,获取信息的难度增大。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统计数据的市场化趋势并非千篇一律,它会随着政治决定的变化而改变。倘若一个人拥有一台能够接上互联网的个人电脑,那么对于他来说,通过电子途径获取政府信息便捷快速,例如 www. statistics. gov. uk 就是一个获取官方信息的非常方便的入口。近期,许多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促进统计数据的电子可获取性,从而免费开放了大量的数据。所以《社会趋势 35 周年》(*Social Trends 35*, March 2005)在网上免费发表,虽然它的一份硬拷贝本需要 41 英镑。同样,这份摘要包括大量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统计数据,其过期刊物也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社会趋势 35 周年》提供关键信息的服务,信息领域宽泛,从老龄化的人口,到普通从业者的家庭访问、同居率、度假者们的目的地。上述信息服务是民众辩论的无价辅助,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说,这些出版物的硬拷贝本价格昂贵无比,令人望而却步,但电子化途径方便民众稍微点击就可以索取——这是自 1992 以来一些跨越了党派界限的政治家们支持"电子政府"政策的直接结果。可以确定的是,用户需要一个网络连接以获取信息,不容否认,一些较穷的社会成员没有电脑。但是,公共图书馆为那些缺乏技术的人提供了终端,并且如果公民们希望寻找更多的生活信息,他们可以在图书馆中获得专业帮助。硬拷贝本的价格高涨,但政府统计(和更多)信息的电子可获取性是近几年来一个未被赞颂的成功故事。

虽然政府信息服务的商业化备受谴责,但第二个趋势——政府以一种危及信息诚实性的方式干预信息——却在近年来造成了许多令人沮丧的结果。我们可以说这是对公共领域的攻击,因为一些图

谋不轨的部门操纵甚至是生产扭曲的信息以实现其自身目的。所以，如今统计数据已丧失公正性，堕落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对公共领域的重创，没有比这更深远的了。

《编造事实》(Lawson，1989)的作者断言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干涉政府信息服务，波及整个信息服务系统的腐败。该书阐述第四频道的纪录片掌握了政府统计数据生产的三个阶段——委托、编撰和出版，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政治操纵的介入。新闻记者梅兰妮·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揭露弊案，用功甚勤，她推论说"敏感性统计信息如今已经被操纵和滥用，这几乎是例行公事"(Phillips，1990)。就政府对官方信息干预的批评超出了撒切尔时代，一直持续，并包括1997年以来的布莱尔时代。因此，在2004年至2005年间，涌现出了许多对移民数据准确性的怀疑、关于未被检查的"避难者们"的流言、对英国的非法移民数量的胡乱猜测以及对波兰加入欧盟时波兰移民的预计数量的困惑等等。毋庸赘言，就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而掩盖真相的批评声浪，此起彼伏。

一些非正式的证据显示了公众对于官方统计数据可靠性的怀疑，由此，但凡政府信息，民众几乎不予信任。一些小报和民粹主义媒体以政治干预的例子为由，培养了质疑政府信息的风气，伪装深入洞察力的陈词滥调充斥报纸媒介——如"你不能相信他们所说的任何话"，"存在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上述司空见惯的辞令拒绝接受任何试图展示量化证据的尝试，更不用说要与收集紧要问题比如收入分布、就业以及移民模式的信息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真正困难作斗争了。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造成了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的衰竭，并严重地威胁到了公共辩论的品质(Levitas and Guy，1996)。如果把国家统计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ONS)看作对英国的统计数据负责的机构，担当政府臂膀的关键部门，那么民主本身的核心环节已经遭受破坏。

信息管理

讨论到此，我们已经涉猎了更加广泛的信息管理领域。对公共

领域的公共服务功能的攻击，不仅侵蚀了公共领域的核心，而且信息“包装”的遍地开花也损害了公共领域。在此，我们需要开始考虑“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媒体顾问”、“图像管理”以及当代政治事务中一些相关活动的粉墨登场。与此相关的是“劝服”人们的手段的爆炸性增长，这在政治活动中非常明显，不过也深入地扩展至消费领域。此外，“娱乐”产业大规模蒸蒸日上，不仅是提供娱乐的方式增多，而且“娱乐”精神扩散到一些以前排斥它的领域，如赫伯特·席勒的不屑之语——“垃圾信息”过度饱和了。在此，我们讨论的主题不外乎现代社会信息海量般增长，但其价值令人怀疑。让我们稍微深入论述此看法的几个维度。

20世纪的非凡特征(尤其是战后)乃劝服手段以及劝服的目的意识如雨后春笋般充分扩展，所谓的“信息管理”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特征。如同霍华德·裘伯(Howard Tumber,1993b)所观察到的：

> 信息管理……对于现代政府的行政黏合性十分重要。在政府试图操纵公共舆论以及维持社会控制的尝试中，对传播以及信息的依赖对它来说至关重要。
>
> (Tumber, 1993b, p. 37)

劝服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已深深扎根，那个时候，一大批思想家——其中最杰出的有政治学家如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1934)、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以及最重要的现代公共关系的创始人爱德华·伯纳斯(Edward Bernays,1955)认识到民主的发展加上向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决定性转变促使了“缔造共识”(Bernays, 1952)的产生和发展。

“宣传”(propaganda)发展的文献浩如烟海，其随后低调处理为“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之后又被软化为“劝服”(persuasion)。在此，我们无需详细阐述(Robins and Webster, 1999)。只要勾勒20世纪的几件大事就可以一斑窥全豹。显然，对于那些20世纪早期的思想家们来说，控制机制对于协调一个多样化的、拥有选举权的人口

相当必要。李普曼认为这意味着“在个体公民与他所处的广大环境之间放置某种形式的专家需求”(Lippmann, 1922, p. 378)。这些专家就是现代的宣传家和信息专家，在他们手中“劝服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以及平民政府的日常机构”(1922, p. 248)。需要指出——在拉斯维尔、李普曼和伯纳斯眼中，信息管理是一种必要的和积极的力量：“宣传是一定要坚持的；在危机时期以及为了采取一些大规模的‘常规’运作(‘normal’ operations)，现代世界尤其依赖宣传去协调那些原子化的组成部分”(Lasswell, 1934, p. 234)。

在此，宣传无疑是一种系统化的和自觉的信息管理，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先决条件，其涉及传播一些特殊的讯息以及对信息进行限制，并包括了对信息进行审查。在此，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促使我对历史环境进行了粗略的勾画——哈贝马斯认为“信息管理”的发展显示了公共领域的衰落(虽然民主进程依旧证实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一个开放的舞台上为他们的行动争取合法性的需求，这有助于维持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宣传、劝服以及公共舆论管理的推广的确证实了从一种受到告知的理性公众的理想，转型到接受公共关系技术员们所制造的信息以及所操纵的公共舆论。就此而言，哈贝马斯简直明察秋毫。现在，我们往往认为宣传和劝服是理性辩论的敌人以及阻碍公共推理的力量。但是，早期的一些评论家们却坚信如果缺乏“了解事实的专家”、“思路明晰的专家”以及“了解各种利益的专家”，社会将“不能明智地运作”(Lasswell, 1941, p. 63)。如同爱德华·伯纳斯(1952)所声称的，“公共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个体、团体和机构对生活的调整对所有人的福利而言都意义重大”(p. 3)。

现今尤为反讽的是信息管理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其密度与复杂性令人咋舌，但是却有许多人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如今公共专家和广告人多如牛毛，指导政治家们或商业领袖们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开办广告学的学位性课程以及相关项目，但他们却佯装崇高，堂而皇之宣称其重心是“改善传播”、“确保他们的客户们的讯息被理解”以及“教授对任何发达经济都至关重要的传播技能”。大家往往忽略了上述活动的潜在假设，或者至少是没有充分陈述他们的用意，其实，

他们竭力生产一种能够说服受众产生某种行动(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不产生行动)的信息,以推进那些为了此项服务而向他们支付费用者的利益,即通过更好地控制人们的信息环境而操控民众。

虽然信息管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形,但在近几十年来,其发展和扩张的速度令人刮目相看。例如,想想广告业,从 1945 年以来迅猛扩张,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其触角延伸到从企业形象、赞助、公共关系,到直邮推广等若干新领域。与此相一致的,是"垃圾邮件"(标志海量般额外信息品质的强烈信号)和模糊广告和报道边界的免费地方性"报纸"的茁壮增长。与此同时,这种增长为从业者们酝酿了一种新的专业主义,熏陶了他们对"商业活动"的精准把握,从精细的市场研究,到计算机化的分析,再到"目标"受众的计算,样样如此。

同时,还有游说力量的崛起证明日益增强的操纵意见趋势,已深深地渗透进政治领域。游说力量的影响已经穿透了 Whitehall 宾馆而扩大到它的支付者们身上,在此,我指的并不是新闻界的游说,即把它们的名字放置到某个位置,与此记者们可以在那个位置捕捉到那些正在离开众议院的议员们;我指的是以影响政治进程本身为目标的一些群体——通常是企业。该项策略的核心要素是那些利益相关者们雇用一些老谋深算的议员(Raphael, 1990)。

笔者会回到对政治事务的讨论,但在此,我希望能引起大家关注商业利益对信息环境造成的影响。尤其需要提到两个方面:首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政治学家们意识到了通过精细的信息操纵去控制民主过程的需要;与此相应的是,此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的企业也意识到公共舆论将可能会日益影响商业事务。尤其是在美国,"当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他们开始意识到控制那些它们无可避免地生产出来的信息的重要性"(Tedlow, 1979, p. 15)。流风所及,企业宣传部门应运而生,其任务是确保公众获悉企业在劳工关系、经济事务甚至是国际政治问题上的观点。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爱德华·伯纳斯企业的良苦用心——"除了销售产品之外,企业还需要首先向公众销售它们自身,向公众解释企业对整个经济制度所做

出的贡献”(Bernays，1952，p.101)。

任何商业组织的成功，“最终都依赖于公众支持，因此，必然面临操纵公众的共识问题，令民众支持计划项目”(Bernays，1952，p.159)，由此就会产生一整套企业传播策略。在现代商业化企业中，对舆论进行操纵是整个营销策略不可或缺的要素。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像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罗杰·B. 史密斯(Roger B. Smith)就澄清了他们的公共关系员工们的职责——“确保公众对企业的了解反映了企业政策”(Smith，1989，p.19)。这是企业对赞助、标识设计、企业形象投影、社论式广告、公共关系、对政治(以及其他)利益的逢迎，甚至包括对教育项目(可以使企业接触年轻人的领域，可能与一些关爱照料活动相联系)的介入等活动的前提。对企业的此类基本关注同样在一些联合性的商业机构中体现了出来。在英国，最突出者，如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其成立于1965年，如今号称商业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声音，在任何一个与“工业”状况有关的公共论坛中都有代表性话语权的一席之地。

与此相关的现象，如培训企业的高级员工，以便的熏陶他们的媒介素养，从而与媒体默契合作，并优化媒介再现的形象，如此之类的活动频繁增多。对于一些大型企业来说，雇用一些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作为培训人员来对演讲者进行培训，提出关于上镜的适当着装建议、使用内部(或基于咨询)的视频设备来练习采访等活动已是家常便饭。

此外，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1984)证实了企业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强调企业及其领导者们的信息能力是管理企业的重中之重。尤西姆论证资本主义在本世纪经历了从“家庭的”到“管理的”，再到“组织的”资本主义转变，他指的是如今不仅发达经济被一些大型的非个人化企业所支配，而且这些企业的紧密合作空前绝后。结果导致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在各大紧密联系的董事会之间，出现了一个“内部圈子”(inner circle)，共享的“普遍化的企业观念意识”弥漫于他们的内部密室(Useem，1984，p.5)。此类意识取代了个体企业的利益，尤西姆估计这是造成两种特别显著发展的原因。

首先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从未停止过的“商业的政治动员”(p. 150)。各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其以一种更广泛的共识、更有效地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例如,什么才是极高的税收水平,劳工运动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阻碍了企业及其事业的立法等问题必然得到企业回应。全面地说,“商业的政治动员”是现代商业的某种需要的证明:他们不只是需要控制它们的内部事务,他们还需要控制对它们自身造成影响的外部环境。商业游说——及其意见领袖、重要接触、商业圆桌、持续的新闻发布以及简报的增长,对支持商业的政党的频频示好,免费的企业智囊团以及对英国工业联合会的倾力襄助,无不说明了企业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有增无减。

另一种发展与上述情况相关的,那就是商业领袖的个人资质——传播技能日益成为选择商业领袖的标准。迈克尔·尤西姆(1985)称之为“政治管理者”的上升特别强调了商业领袖们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详细制定他们的路线以及从战略上思考企业环境的能力,其中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是传播能力,即能够说服外部人士(同时也经常包括内部人士)相信企业的政策和实践相当公正。尤西姆认为此现象是“企业立场发生了一种普遍变化的最明显信号,在这场变化中,公共事务功能走到了前台”(1985, p. 24)。受益于能干的传播者们领衔时代潮流,上述特性茁壮成长、相互交织、利益挂帅,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利益不可避免地对当代信息环境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商业对信息领域的介入的第二个特征,令我们重新关注它们更主流的活动。另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发展深刻影响到现今的信息环境。简言之,企业的发展使得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进入到工厂内部)日益强调怎样更好地管理消费。正如《广告和销售》(*Advertising and Selling*)的某位投稿人所观察到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的工厂的增长速度是我们人口增长速度的十倍……将来的趋势……依赖于一种极大地增长的大众购买力”(Goode, 1926)。对此做出回应,企业资本主义试图通过调整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将自由市场上存在着的不确定性降至最小。企业开始稳步转向大量生产的生活

消费品比如服装、香烟、家具、加工过的事物、肥皂和——不久的——汽车，显然，企业必须告诉和说服民众相信他们可得到的商品和他们的需求(Pope，1983)。这种创造消费者的迫切需求玉成广告成为营销的一个尤为重要的要素(Ewen，1976)。把广告看成是"商业信息和劝服的一种有组织的系统"(Williams，1980，p.179)，有助于我们理解"训练人们作为消费者去行动……从而促进他们适应充裕富足的社会"(Potter，1954，p.175)。

就此而断言广告投资产生了直接的回报，似乎有些自以为是。人们当然会解释他们所获得的信息(Schudson，1984)。另外，无论如何，广告都只是一种广阔的营销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营销策略可能会包括信贷措施、折价交易以及对商品的包装和设计(Sloan，1963)。不过，广告的活力和原创性的确使商业活动对当代的符号环境做出了贡献。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广告业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等级上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以至于不可能忽视它对几乎所有商业领域的入侵(Mattelart，1991；Fox，1984)。如今，广告业已经是一种全球性产业，被一些寡头垄断型企业所支配，比如WPP集团(包括那些曾经独立的巨头奥美[Ogilvy & Mather]、J. Walther Thompson和Cordiant)和扬罗必凯广告企业(Young & Rubicam)，它已经深深地渗透进消费文化。从广告牌、汗衫上的标识、电视连续剧插入广告、主流的消费广告、企业促销广告、体育赞助，到许多大学教职(菲亚特意大利语教授[the Fiat Professor of Italian]、阿斯达零售学教授[the Asda Chair of Retailing])，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现在身处一种促销文化(a promotional culture)之中(Wernick，1991)。在其中，我们很难辨明广告止于何处，而公正无私的信息起源于何处。而且，如前所述，这不仅仅是广告业本身的发展的问题，因为现代传播媒体都严重依赖于广告，把它作为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使得广告对当今大部分报纸和电视的信息内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Barnouw，1978；McAllister，1996)。

最后，我们同样可以洞察到管理企业活动的广泛需求，提醒了我

们思考广告理念如何从销售商品转变为销售整个企业。对品牌的日常关注如今成为企业知识的组成部分——从阿迪达斯运动服到汇丰银行使人放心的多文化形象——印证了这种趋势。老生常谈的信息，无论其是否引人注目，银行们会“倾听”；石油业者们会“关注环境”；国际性化学品企业是“英国最好的”；或者保险企业“满足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需要”。我们可能对劝服不是那么警觉，但是当企业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向残疾儿童、地方唱诗班或者巡回演出提供资助时，我们总能找到同样类型的形象。正如广告业的一位资深从业人员坦率而言，劝服的唯一目的就是“对公司任何劝服的怀疑，民众可以善意理解；而且在任何议题论争中，对公司都怀抱最好的假设”（Muirhead，1987，p.86）。当考虑广告的这一层次时，我们很容易理解企业不遗余力操纵消费与企业试图涉足政治事务等当代世界的雄心抱负一拍即合。

上面讨论的是企业在信息领域展示的一些主要维度。对于我来说，似乎不可能去测量，但是通过观察不同的广告形式的发展，以及公共关系和游说的扩张，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有各种利害关系的商业信息对整体的符号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视屏幕频频闪现的广告，媒体的广告软语；应新闻记者之邀请，英国工业联合会的领袖对“工业”的前景展，免费向小学提供的“企业教育”资料；电视台单刀直入采访人力资源主管；公关部做出某些“殷勤”的慈善行为等等举措无不打造利益宰制的信息环境。正因为信息交织着多重利益，所以，公共领域都面临被剥夺的风险。此一力量是广阔信息环境的腐蚀性力量，因为它所拥有的经济权力赋予了不相称的优势，可以凌驾于弱势群体之上。

有人认为理应限制企业打造信息以达成唯利是图的目的，因为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于大众媒体，企业必须与媒体从业者们合作，而媒体从业者们通常都有理由（职业新闻价值）去怀疑企业提供的宣传材料和新闻稿，吸引记者的商业报道只是作秀而已，对整个商业世界却毫无影响。

企业与媒体的渊源关系当然不容忽视，它造成了一些商业信息

的应运而生，而媒介却没有曝光商业机构炮制信息的过程。不过，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86)敏锐捕捉到另一造成高品质信息普遍衰落的趋势。波兹曼关注的焦点是电视的娱乐元素在整个当代文化中的扩散，随之而来的现场享受、动感音响、即时消遣、简单肤浅、戏剧化等娱乐氛围弥漫于电视媒介。波兹曼认为这些娱乐价值已经渗透进新闻报道、教育、政治，甚至是宗教领域，无处不在的"信息娱乐"取代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由此看来，电视令广阔的信息环境变得贫瘠，因为它强调耸人听闻和奇闻轶事，以快餐文化为核心的信息内容充斥频道，如此经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公正无私、严密而理性的分析已荡然无存。所以，我们对跨国企业的日常运作其实了解甚少，却可能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商人的风流韵事，或者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的怪僻了如指掌、知之甚多。

下一个章节将对信息管理在政治领域的发展做一个历史性回顾。人们对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态，紧要讨论的是说公共领域遭遇了"包装好的"信息的侵蚀，因为我们对耳闻目睹的信息疑虑重重时，政治辩论有效性将会大打折扣。但是，信息的日常经营管理却是在政治组织中高度发达(Franklin，1994)。

此一现象包含若干个重要的方面，其中之一是政治形象、议题和事件的再现。前文已述政府对新闻公告和统计数据的明智控制，但再现问题隐藏的权力运作之道却更加复杂、深刻。闻名遐迩的案例是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公关专家戈登·里斯(Gordon Reece)和萨奇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 Advertising)的熏陶指导下，形象焕然一新(Cockerell *et al.*，1984)：她的发式得以重新设计、她的声音得以重新塑造，而她的穿着也一改死板严厉的风格，趋向于柔和色调的搭配。但是，英国引进的美国式政治技巧却更加深谋远虑、技高一筹，如生产充满活力的"快报"式演讲以适合作为晚间电视新闻的头条；精心选择上镜场所，如果可能，标识、广告语也要派上用场，在景观的布置上要选择诱发同情好感的颜色(sympathy-inducing colour)。同样，举行政治演讲也特别考究(为了回避对立者的质疑，或者产生针锋相对的论战)，既要选取政治立场和谐的

受众，也要布置得体的演讲环境。所以，演讲是庆祝获得了同意的政治纲领的集会，而不是致力于争论和说服的公共会议。虽然抱怨布莱尔首相和布什总统控制媒体的人已忘却控制信息的历史，但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继承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贯的信息管理做派，他们对操控信息的驾轻就熟、运筹帷幄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更一般来说(尤其是政治领导人)，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往往被幕后操纵——细心构造的背景，加上吸引眼球的冲突(bunting)，当然，还有那"自动发声的"雷鸣般掌声响彻云霄。此外，政客们对极少数的电视进行直接转播的场合也都不遗余力地渲染其宣传效果，此类伎俩早已广为人知。也就是说，政客并不挂怀开放而诚实的辩论，仅仅利用"直播的"采访去"操纵"公共舆论。

当然，长期以来政客们都竭力优化自己的论点与形象。但是，

> 没有一位撒切尔夫人的前任……如此地重视且精心塑造自己的形象。她把广告商和公关从业者带入了英国政治，简直前所未有。在媒介表现和新闻管理的美国技巧方面，她成为了总统。
>
> (Cockerell et al., 1984, p. 11)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信息管理在政治组织中明显地变得更加系统化和持续化了(Harris, 1990, pp. 168—181)。托尼·布莱尔 1994 年对工党领袖职位的顺利继承以及他 1997 年、2001 年和 2005 年的选举胜利完全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脉相承——打造光辉形象始终都是优先考虑的问题(Rawnsley, 2000)。

信息管理的另一个方面是恫吓，尤其是但不仅仅是电视组织容易遭遇威胁。20 世纪 80 年代的问题相当突出，如公众对 BBC 存在着普遍敌意，因为它获得了政府的资助，还有一些保守党人认为 BBC 非我族类，不容信任；以及北爱尔兰的报道备受攻击等等(Bolton, 1990)。威胁之外，往往还伴随新闻检查，如此证据在过去几十年间并不缺乏。如 1988 年，英国电视业被禁止报道爱尔兰新芬党(Sinn

Fein)的活动；笨拙而可笑地尝试禁止出版军情五处(MI5，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之类的机构)从前的雇员彼得·赖特(Peter Wright)的回忆录；BBC 的所有新闻和时事人员的任命都需要经由一位 BBC 广播大楼中秘密员工的新闻检查，此事后来被曝光 (Leigh and Lashmar)。

信息管理的三个特征——信息包装、威胁和审查——再加上政府保密(这实际上是同一块硬币的反面)，在危机情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战争环境和恐怖主义活动就是说服力最强的案例，如英国自从 20 世纪 70 年早期以来的北爱尔兰问题，还包括 1982 年的马岛(Falklands)战争、1991 年和 2003 年的两次伊拉克战争、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等。以上每次事件都显示出信息已经成为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此类信息供给国内的民众消费，因为公共舆论对于战时努力的结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敌方”接触媒体相当有限(由于一些迫切的组织、伦理以及政治原因)且军事目标就是胜利(而不是寻找真相)的情形下，扭曲和伪装信息的机会不胜枚举，而且进行欺骗的原因也很容易为人所理解。所以，政客们和军方同时把媒体看成战斗的手段，因此媒体必然担当宣传的工具。此外，美国在越南战场失利，一些观点认为美国的战败是由于一个未受到控制的新闻界和一些电视公司所为(Elegant，1981；Hallin，1986)，从此以后，权力机构有了更强的“为战争做计划”的自觉性。所以，在马岛战争期间，军方开始限制记者深入前线，并且为每一位记者配备了一位军事“看守者”(military “minder”)以确保他们的行为不“越轨”；最近，这项制度已经落实到战时军事“特派”记者的任命(让记者们同意审查制度)。

对信息的日常操纵也体现在持续良久的北爱尔兰冲突问题(Curtis，1984；Schlesinger，1987)上，但只是在马岛战争之后，信息管理才更加显著地组织化了(Ministry of Defence，1983，1985)。1991 年的海湾战争吸取前车之鉴，一个高度有效的公共关系机器发挥了功用。媒体对海湾战争的报道规模空前绝后，但内容报道则经过消毒与过滤。媒体报道的框架完全围绕着盟军的意图和辞令创

建，所以我们听到了许多“外科手术式”的空袭和“定点”轰炸，但罕有人员伤亡的消息，媒介再现的海湾战争“几乎是一场没有死亡的战争”(Knightley，1991，p.5)。在此，还不可忘记1999年春季的科索沃战争中的“感知操纵”(perception management)，尽管那场战争并无战果。北约盟军内部过于分化，冲突持续时间甚长，许多记者根本不信任军方信息。或许最重要的是，在塞尔维亚内部另有信息来源，引人注目的是一些西方记者(有人估计在战区有2000名记者)，还有为了反对宣传机器而从当事国家内部发出的一些电子邮件报道。尽管如此，大部分报道依旧赞同西方价值观。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或是更为明显的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军方及其政治领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操控媒体。但要成功控制媒体也并非易事。许多其他的新闻来源以及大量的报道，再加上便携的传播工具以及互联网连接，令军方确保其过滤后的讯息传播困难重重(Tumber and Webster，2006)。不管军事计划如何严密精确，当今要在最充满冲突地区的信息环境推进扭曲的信息传播仍属不易。我们会在下一章中更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战争和叛乱的威胁并不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例外，反之这是它的日常特征。正因为如此，为这个环境做准备是此时代的当务之急，在做准备时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公共舆论，因为它对于任何冲突的成败都至关重要。尽管通过有组织的系统来传播扭曲的信息目标很难实现，但预谋导致的系统性扭曲的信息泛滥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样的信息传播不是为了提供知识，而是为了推进军方和政客们的利益。于是，组织化地传播扭曲信息也成为信息管理的一种模式，其与其他权力纠结作用，必然蚕食公共领域，从而窄化了公共讨论和辩论的领域。

前文讨论了由政客、政府以及各种商业利益推动的信息管理的必然扩张，再加诸于公共服务机构之上的多重压力，看起来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认同哈贝马斯的悲观主义——公共领域正在遭遇专业化的“意见操纵”和商业主义的党派力量侵蚀。但就此而对公共领域式微形成定论，恐怕也相当不妥，必然招惹若干批评。第一种异议反对

有些人通过比较而得出公共领域衰落了的结论。如果我们比较的起点是19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80年相比，我们肯定会认为两个时代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回顾从前的情境，但却只上溯至上一代或两代，并由此做出推论认为19世纪晚期的公共领域在某些方面要优胜于当代，显然此论站不住脚，甚至大家觉得这个结论实在稀奇古怪，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人都被剥夺了公民权，绝大多数人甚至都缺乏识字能力，以至于没有能力阅读《泰晤士报》(*The Times*)和《早报》(*the Morning Post*)上的报道。既然是这样，有人还会一本正经地秉持那种论断——认为人们在信息上要比他们19世纪的祖先们遭受到更多的剥夺吗？与此相反，我们无可争辩地说如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容易地进入公共领域——例如，想想一个人可以多么便利地通过广播热线参与辩论，或者是在电话会议中担任发起者角色，或者是如今人们可以多么便利地从互联网上获得专业化的信息协助。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趋势。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信息领域的急剧变化——知识的商品化、抨击公共服务机构、强调劝服、以广告为导向的媒体的增多及其地位的上升等等——总而言之，信息管理和操纵的潜在可能性和实践蒸蒸日上。或许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种荒谬的情形——如今打造假信息以及日常干涉信息的机会频繁增多了——以此而论，公共领域正在无可辩驳地走向衰落。但同时与此相反的趋势也不少见，人们获得了空前丰富的途径和热望去参与一个更加开放的公共领域——人们的教育水平迅速提升；人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来源的广度和深度使以往的任何时代都黯然失色；只要人们愿意，那么他们在今天参与公共事务要比在昨天参与要容易得多。布鲁斯·宾博(Bruce Bimber，2003)有力地指出互联网已经极大地降低了试图影响政治进程的竞选者们的进入成本。于是，现存的政党力量受到削弱，而政治也在向熟悉网站设计以及热衷于变革的人们开放。

另一种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以价值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理念。公共领域乃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观念，所以，经过比较之后，任何真实世界的情形都有缺失。那些反对公共领域规

范性基础的人会继续提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首先，历史上的真实情形与哈贝马斯的描述不是一回事。似乎那些哀叹公共服务机构衰落的人总觉得曾经存在公共服务的黄金时代，但实际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期！例如，许多人发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BBC 在财政上得到保障，而且众望所归，但别忘记，此时的 BBC 却依然是一个非常排外的机构，非牛津剑桥毕业的节目制作人难以在 BBC 工作，下层阶级的利益受到忽视，那些边缘地带和“普通”人根本无法接收到电波。谁会渴望在公共服务的名义下回到这个年代？其次，公共领域根本上就属于空中楼阁，因为它是一个乌托邦。该批判意见认为与其以一种无法实现以及从未实现过的标准来衡量事物，远不如让目光回到现实。这种立足于现实的立场同样有助于让我们知足常乐，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抱怨公共服务的缺陷，只因为用了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来衡量公共服务。

笔者试图以三种回应意见驳斥上述批评。第一种回应坚称捍卫公共服务的理想，并不是赞誉过往历史，甚或当代社会都是完美的黄金时代。例如，我们不难发现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 BBC 缺乏公共领域的要义——公正无私、可靠和理性。不过，我们是得公开承认 BBC 的缺陷，但不能因此而对那个时代或其他时代的公关服务业绩视而不见。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既看到现实公共领域的不足，又能欣赏公共领域利好的平衡意识，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BBC 成功地维持节目制作的质量，这些节目包括从一些叙事性作品到新闻和时事节目的广泛的节目类型。而那时商业电视的有限目标则是以最小的成本赢得最大量的受众，与 BBC 相比较而言，商业电视的节目显得贫乏无聊(Pilkington，1962)。

第二种回应同样反对那些谴责公共领域理念不过是倡议我们回到想象中的公共服务的黄金时代，目前必须敦促现今既存机构进行迫在眉睫的改革。所以，提倡公共领域并非维护那种假设，即在受到商业压力和冷漠政府的侵袭之前，社会安排一直都运行得很不错，于是我们对社会安排全然接受而不加任何更改。相反，公共领域主张对那些值得保留的机构进行改革，重申这些机构存在的原因。詹姆

斯·卡伦(2002)便坚持要在媒体民主化的环境之中，捍卫 BBC。卡伦认为以高的文化标准颂扬 BBC，如今往往缺乏公信力，但如果从日渐看涨的公民参与来赞誉 BBC 的公共服务却有相当说服力。这种维护要求 BBC 对广大公众担负重任，强调公民们在与公共福利有关的问题上享有被告知权，并且在组织内部扩大成员的代表性，此论从扩大民主立场出发，对公共领域做出的重新评价已有许多呼应。例如，约翰·基恩(John Keane，1991)就驳斥了任何主张回复到公共服务广播时代的观点，要那样，就等于是完全接受政府资助、如同"全国人民认为"、"英国的观点是"之类的同质化术语的媒体复活，这对如今全球化和差异化的世界而言，匪夷所思，因为早就有对由政府组织广播电视媒介信息的普遍怀疑声浪。基恩(1998)的光辉在于以公民社会的概念来强调对多元、复杂而充满活力的非政府性联袂协作的需求及其重要性。值得憧憬的是"公共领域网络"(networks of public spheres，Keane，1991，p. xii)，即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而聚集在一起进行辩论、争论以及相互告知，而与此同时人们保持了他们的自主权。无须惊讶，基恩或许看到了互联网、聊天室、电子公告板、数字电视等的潜力，它们可以通过扩大公共领域的开放程度从而扩展民主的领域。布拉姆勒(Blumler)和科尔曼(Coleman)(2001)的论述更加深入，他们主张建立一种"电子国会下院"(electronic commons)，以此满足高度多样化的公民们的信息需求。基恩并非反对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本身，但他的确主张对公共领域进行扩展和重新概念化，以便对变化中的环境应对自如。其实，集体主义的终结、重申市场的地位，以及新技术所带来的机会等等知识讨论的熏陶了基恩的立场，他是否在支持新媒体和市场上有些离谱有待讨论，但至少他的言论，促使我们意识到公共服务机构在不同的时空中各有千秋。

有人可能会扩展这种形式的推论，且涵盖力量崛起的"文化研究"流派的公共领域版本。就此而论，哈贝马斯过于严肃拘谨，以至于不能认识到人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新的方式，从而可以驾轻就熟地轻松谈论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情感、隐私以及感觉。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的确倾向于严肃而重大的议题——诸如政治问题、教育问题

以及类似的令人振奋的精英主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置于优先地位。这些都是与思想有关的问题，那么心灵将被置于何处呢？对于关心后者的人来说，那些戏剧性地表现日常人际关系的肥皂剧、拍摄对象未意识到拍摄者存在的纪录片、通俗节目比如《老大哥》、观众参与性节目比如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主持的节目、谈话式广播节目以及自制电视等等节目则可以倾听到普通民众的声音与关切。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新媒体以及传播的更具参与性的形式扩展了公共领域，甚至民主化了公共领域。吉姆·马奎根(Jim McGuigan)对威尔士王妃黛安娜的葬礼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就是此一言论的佐证，该葬礼是在1997年8月末黛安娜突然死亡之后举行，有意与哈贝马斯严肃正式且认识深刻的观念相反，为了把“感情”置于显要的地位，马奎根创造了“文化公共领域”(cultural public sphere)一词，并指出了人们可以在什么地方谈论“怎样生活”(话题如婚姻、孩子、身体形象以及个人弱点等等)。由此，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到“文化公共领域”的扩展。为了变革，我们应该越来越多地囊括生活中那些被忽视了的领域。彼得·朗特(Peter Lunt)和保罗·斯坦纳(Paul Stenner，2005)竟然赋予《杰瑞·斯普林格秀》(*Jerry Springer*)之流的治疗性的、参与性的以及以冲突为中心的脱口秀节目以“文化公共领域”的标志。

第三种回应驳斥那些认为公共领域乃乌托邦式的概念，因此应该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反对此时此刻提出一种理想化的抽象概念，结果肯定糟糕透顶，公共领域不是令人厌倦的非尘世的幻象。更严重的是，“乌托邦”这个词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去排斥其他思想。当然，如果我们欣然接受此论，也就意味着被迫接受现实，会以实用主义去接受生存环境，因为人们已意识到对更美好世界的梦想都会以噩梦而告终。

但是，笔者并不全然信服批评意见。多年以前，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就已体认——任何具体的花朵都不能够呈现出所有的“红”色，但在现实中不能找到所有红色，并不意味着“红”色应当被抛弃(Whitehead，1925)。“红”

色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造成了影响，正如民主这个概念一样（虽然民主在任何地方也不能找到完美的运行秩序）。怀特海创造了“抗拒”一词来强调我们应当如何积极调适现状，而不是坐以待毙。公共领域观念可能是个乌托邦，但它却如同红色的概念和民主的理想一样真实。赞同这种乌托邦并不是要牢牢地锁定一成不变的被迫施行之理想，而是要支持一种具有反抗性的、拒绝消极地接受事物现状的乌托邦主义（Jacoby，2005）。公共领域不应被抛弃，因为它从未在任何地方完美地实现过。坚持公共领域的理想是“抗拒”信息社会（弊端）的要义。

第八章

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b. 1938)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向世界贡献的最望重士林的社会学家(Anderson, 1990)。长期以来，他的学术抱负不仅包括重塑社会理论，而且引领我们重新洞察“现代性”(modernity)轨迹的诠释。社会理论的诸多问题令当代多少饱学之士望而生畏，但吉登斯高屋建瓴，迎刃而解那些社会学错综复杂的理论思辨，论述惊世骇俗、想象丰富，以令人称羡的概念化和解释社会变迁的非凡能力游刃有余地应对各方针对自己的理论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吉登斯通过对社会理论家们的详尽批评而构筑形成吉氏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之后，他转向了对“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ation)进行了更广泛的分析。从80年代末期以来，吉登斯强调我们生存的世界充满“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他还以“反思性现代化”概念直接阐释社会世界的变迁。正因为如此，作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理论(“Third Way” Politics)的创始者，他的影响力开始跨越学术圈而享誉全球。“第三条道路”政治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非常流行，虽然必须强调他对新工党(New Labour)的智囊辅助基础扎根于他长期的学术工作(Giddens and Pearson, 1998)，但其影响力已不限于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范畴。在本章中，笔者期望引

入吉登斯的高见和探索路径，有助于我们豁然洞开地探究信息的要义。下文非吉登斯思想的全面阐述，而是笔者在理解吉登斯著作的基础之上，对信息趋势的阐释(Craib，1992；Kaspersen，2000)。

吉登斯并没有(至少是没有直接地)对“信息社会”进行深入讨论，他没有考虑过要讨论这个概念，主因是他怀疑信息社会的命题。他认为当今我们生活在“激进化现代性”(radicalised modernity)的时代，其以现代性本身长期拥有的属性的加速发展为标志。实际上，他断言“虽然往往以为我们只是在现在……才步入了信息时代，但现代社会一开始就是‘信息社会’”(Giddens，1987，p.27)。所以，吉登斯的理论意在说明信息增强了的重要性是如此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虽然信息在现在具有尤为特殊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足以成为一种制度突变(system break)(丹尼尔·贝尔构想的“后工业主义”之类)的标志。换言之，在吉登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解释现代各种社会关系的信息化路径，虽然他并不认为我们正在步入一种新的“信息社会”。

理论遗产

吉登斯深受一些经典的社会理论家们的熏陶，最显著的是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形同上述三位卓越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目标也是去理解从17世纪中期以来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们称此变化为“现代性”(modernity)的出现。社会学的起源和目的就是为了解释以工厂生产的发展、官僚化、城市化、科学精神的发展以及考察自然的新方式为标志的“传统社会”的断裂(break)，我们称这种一整套的制度和态度上的变化为“现代性”。

但吉登斯并没有重蹈“现代性”创立之父们的老路，他发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解释(“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涂尔干式和韦伯式的万能钥匙(“工业主义”和“理性化”)不足以充分说明社会变迁。原因并非前人理论不适用，或者甚至过分简单化。我们需要承认是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形成，而伟大的传统没有被充分地阐述或者忽视了这些因素。吉登斯强调了被经典思想家们轻描淡写了的现

代性中两种互相联系的特征，即被强化的监控(heightened surveillance)和暴力、战争以及民族国家(the nation state)。

当然，吉登斯对前辈理论家们的观点也有所吸收，从而展开他的理论批评。所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就深刻影响了他对监控发展的关注。同样，他也间或受到马克斯·韦伯的熏陶，在后者的著作中，监控也是一个明显的主题(O'Neill, 1986)。此外，吉登斯(1985)确信"战争……对变化的整个模式造成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如果不系统地论述战争，就想寻求模式的诠释，简直荒唐可笑"(p. 244)，我们不禁回想起19世纪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军国主义社会"(militaristic societies)的讨论，以及一些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neo-Machiavellians)如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讨论的主题，他们关注权力、高压政治(coercion)和武力(force)。

不过，吉登斯洞察到——就现代世界诞生的所有解释之中，"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这主要相互竞争的解释令其他解释黯然失色，此一论点颇有根据。吉登斯把福柯和斯宾塞的论点与一些主要的经典理论遗产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赋予他的批评原创性奕奕生辉，正因吉登斯不遗余力地试图澄清现代性等多种社会变迁的议题，他才探索出了别有情致的视角去研究信息的起源、意义和发展。

组织、观察和控制

我们在讨论的开始需要先行一种观点，说来简单，但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即我们生活的世界，比之过往，组织化(organised)已空前绝后，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史无前例地被计划和安排。

我们不能够轻率地认为被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必然暗示个人自由的式微。毫无疑问，过去时代的人类也深受环境的限制——饥饿、大自然的不确定性、妇女被强迫多次怀孕、来自统治者们的直接压迫以及日常生存的压力与束缚。与这些沉重的钳制相比，大部分现代社会的压迫简直不值得赘言，显得很微不足道。所以，强调现代

生活的组织性特征并不是要让人想象某种卢梭式的(Rousseauesque)“面对锁链的世界”(world before chains)。

当今的生活被更加日常地和系统地管理，此前提并不意味着现在我们的生活形同监狱。实际上，随着文本的深入讨论，读者将会一目了然，我们自由度的增加，往往与组织化的扩展相关联，尽管并非完全如此。但笔者需要重申目前我们论述的起点——现在的生活比之过往，受到更加系统化的安排。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拥有了克服大自然加之于人类的种种钳制的现代能力。例如，当我们逐渐能很卫生地清除人类的垃圾以及能提供大量的食品供应时，我们的生活便开始脱离自然的支配，而转向由各种精细的社会机构来进行组织。这些就是例子，人们选择的增多(可靠的卫生设施和充足的食物)是伴随着组织结构的发展，实际上，前者以后者为前提。

只要稍想片刻，我们就能够想到庞大的现代组织的起源。例如，想想学校系统，其组织成就不同凡响，成千上万的教师、从事辅助工作的员工以及学生们在事先规定的时间里聚集起来，按部就班地完成课业活动，各地区的这些活动存在差异，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大同小异罢了，步调肯定一致，而且以保持数年不变的连续性来安排。再想想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活动——购买食品，其背后令人惊异的组织安排。当今的超级市场(典型地说，会储存几千种不同的产品，许多产品都很容易腐烂，因此使零售商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要求供应商、生产商、加工商、运输系统以及消费者之间的日常协调，与以往的时代相比，这种日常协调是一项引人注目的组织成就。

这个组织可能会极端复杂。例如，火车和汽车时刻表、供电产业、电视节目、信用卡系统、有着大的销售市场的衣服的生产，甚至是一些非常寻常的事物，比如我们大部分人会在早餐桌上吃的谷类食品等等，那都需要多少必需的计划才可以有条不紊啊。我们很少去思考操纵上述安排的抽象的、专门的系统(Giddens，1991)；在极大程度上，我们信任它们的可靠性。这两者都无关紧要，事实就是事实，现代生活被空前地社会组织化了。

现代生活的高度组织化导致人们为了组织生活，必须系统地搜

集人类及其活动的信息，这点很容易被忽视，本章正要以此为讨论的主题。如果我们要组织社会生活，我们必须了解人们：他们会买什么，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买；他们需要多少能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需要这些能量；某些特定群体的品位、生活方式和购买能力如何。坦率地说，日常监控(routine surveillance)是有效的社会组织的前提条件。所以，毋庸惊讶，我们很容易发现监视(observe)人们的方式的扩展(从人口普查到收款台；从医疗记录到电话账单；从银行账单到学校记录)。这种趋势与组织的增多齐头并进，而后者是现代生活如此鲜明的特征。组织和监视犹如紧密相连的孪生子，它们是伴随着现代世界的发展而共同成长的。

生活变得日益组织化的特征是吉登斯“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理论的核心要素，在讨论“反思现代性”时，他明显地吸收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思想。吉登斯论断的中心是生活日益变得非嵌入化(disembedded)，他的意思是生活越来越不受到某些固定的，或者说嵌入的社区(村庄、部落，宗教)，或者是自然(季节、地貌和土壤)的控制。在嵌入式环境中，人们做“他们必须做的事”，因为，例如，人们无从逃避也无法挑战他们所居住的那个邻近社区的信仰和风俗，或者因为自然具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必须为奶牛挤奶，必须播种庄稼)。与此相反，如今人们可以越来越多地选择怎样去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不管是选择具有亲密关系的伴侣还是采用基因改造过的农作物。

这种发展造成的一个重要的必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拒绝接受命运，也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论断：“事情应该这样做，因为一贯如此”。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置身其中，凡事都容易受到质疑并且确实受到了质疑。例如，想想人们如何选择朋友和娱乐，或者想想所有的道德原则如何遭遇挑战，或者想想人们如何战胜“自然”的限制(如改造沙漠、治疗不孕症、延缓衰老等)。这并非说人们无处不可以进行自由选择，而是人们从各种限制我们的环境中做出选择。但核心问题却是一种被日益广泛地接受的观点——我们的生活安排并非事先注定，而是社会建

构，因此全由我们选择，举凡抵制自由选择理念的人就成为“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他们诉诸不被信任且确实经常受到质疑的信条(如：“这是上帝的意志”，“孩子必须服从他们的父母”，“女人生来就是为了侍奉男人的”，“科学证实……”，“只存在一种正确的宗教”)。

现代性问题是关乎人们在每个层面上都可做出更多选择的议题，因此“强化的反思性”(heightened reflexivity)成为必需。吉登斯认为“强化的反思性”之意就是监控的增加(信息搜集)，于是我们可以仰赖信息增加，选择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类型。毕竟，如果宗教如今越来越只是一种个人信仰的问题，那么人们便需要关于其他宗教的信息，这是他们做出选择的必要条件。同样，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选择一种吸引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必要条件就是他们能获取到大量的关于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信息，相当重要的是，唯如此，他们才可能会拒绝其他人可能希望他们去选择的那些生活方式。人们只有在搜集到了关于实际情况和可能发生的情况的信息时，选择才能行得通，所以，必须对社会安排实行监控。出于同样的原因，“强化的自反性”要求具备向人们提供信息的手段，于是，各种媒体便在当今社会扮演着核心角色。

如果“非嵌入”需要“强化的反思性”，同样对我们掌控未来产生了重大影响。至关重要的是，对信息的搜集和分析允许我们以“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为基础来选择我们的未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观察环境，思考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然后评估某个特定的选择可能带来的影响。例如，每个人在结婚之前都会仔细考虑对方的品质，会了解离婚的风险。他们同样会意识到，如果他们从前离过婚，那么婚姻失败的可能性将会增大。这并不是一个精确无误的过程，但显然如此私人的决定牵涉到了风险评估。他们会仔细考虑迄今为止的关系，他们也会从一些别的地方搜集信息。当政府或公司采取某项环境、交通或者农业政策时，同样的原则会在此生效——监控和信息搜集、反思，基于风险评估做出决定。

按照此一方式去生活也会带来许多焦虑和不确定性，从而身处矛盾之中，与我们的祖先们相比，现在的我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和控

制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却更不确定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行动，而我们的祖先们只是“做他们所必须做的事”而已，以传统的方式抚养孩子；履行必须完成的任务；死亡是“自然发生的现象”。而现在，父母们往往会担心怎样去处理与子女们的关系，完成工作的其他途径也司空见惯，药物、食物疗法和运动疗法用以对抗死亡。“后传统社会”的生活矛盾忡忡，稍过片刻我们便会讨论这些问题，但现在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人类既质疑一切传统，又渴求控制现代生活从商业、政治到个人的各层面，所以，这个世界对信息有一种无法满足的需求。

现代性的矛盾

广为人知的是大部分评论家忧心忡忡，他们对监控的扩张并不乐观。例如，马克斯·韦伯(1930)对官僚制度之不可避免性的唾弃，并没有舒缓他对充满“专家而无灵魂，肉欲横流而无爱心(sensualists)”的世界前景的忧郁与挂怀；更没有淡化他对伴随着理性合法组织(rational-legal organisation)的“铁笼”(iron cage)而来的“机械式僵化”(mechanized petrification)的厌恶(pp. 181—182)。鉴于这种观点是如此盛行——奥维尔式的社会图景(“老大哥正在监视着你呢!”)，我们同样可以对现代性的矛盾做出评论。首先，区分“各化”(individuation)和“个性化”(individuality)这两个词甚有裨益。前者指每个人为人所了解的情况，因此就是每个人的独特记录——例如，名字、生日、住所、工作经历、教育程度以及偏爱的生活方式。许多评论家认为个性化遭受到了日益增多的社会组织的威胁。本来，个性化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做自己想做的事，对自己的生活具有控制能力，看起来个体与日益侵入个人生活的组织相抵触，而与机构信息搜集的冲动相冲突。

“各化”和“个性化”往往相提并论，“各化”的程度正在确定无疑地增强，这意味着“个性化”程度的削弱。无可否认的是，现在“各化”要求人们被监控，但是那些证明个人的工资、居住环境等诸如此类记录的发展实际上却是增强他们个性化的必要条件，因为这种发展依

赖于人们被当作独特的个体来看待，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权利，如果没有此类权利，他们将会因为他们的能力所限而安分守己。如果我们要尊重和维护社会成员们的个性化，那么一个必要条件便是我们要很好地了解他们。例如，如果我们每个人将作为一个个体去投票，那么至少我们首先应该通过名字、年龄和住址而得以被识别。同样，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认为社会成员们的住房供应以及物资供应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而实现他们的个性化，换句话说，如果人们感到寒冷、孤独，并生活在赤贫状态中，这肯定会妨碍他们的个性化，那么满足这些需求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识别每个个人并且详细精确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

与那种认为必须搜集信息以使人们获得权利的观点相比，这种观点更深入。例如，很明显，在许多领域对个人的监控是复杂组织得以运作的基础，这些组织通过它们所提供的服务能够增强消费者的个性化。例如，电话网络识别了每一位用户，并且收集了用户的详细信息（所有用户都有一个特定的电话号码，每次通话的目的地和时间都会被自动记录下来）。电信网络就是以此信息为基础而构建且渗透进了发达社会的大部分家庭，继而覆盖全球。对于拥有电话的人来说，这些组织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Mulgan，1991）。电话按钮帮助人们维持朋友、家庭以及职业关系，此类关系能够促使人们感受到自我和个性化的存在。银行网络的建立与此雷同。如今许多人都拥有各种类型的信用卡，人们所进行的每一项交易都会记录在案，由此可以描绘出个人的消费模式。但是，如果说复杂的银行网络是基于对个人的购买和支付行为实施日常监控来运作，那么这些过程将会增进参与者的个性化，由此导致的信贷和日常交易唾手可得。凭借信用卡，人们自如地预订宾馆、租赁车辆，甚至是去旅行，都不用担忧现金偷窃问题，或者担心携带很多外汇而不安全。所以，将心比心，任何有过如此经历的人都会同意上述观点。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信息收集的广泛增多等同于个性化的削弱，但我们需要论述另一个矛盾——就是说，我们已从过往互为芳邻的世界步入形同陌路的世界。在此，我们捕捉到了社会科学古

老的主题——从社区(community,往往体现为以人际互动和以村庄为中心的前工业主义生活形态,人们彼此熟悉)到联合群体(associations)的转变,此时,人们互不相识,而是通过特定的途径把人们联络在一起,比如汽车售票员、商店售货员、书报摊贩等等(城市导向的现代生活)。自从齐美尔(Simmel)的社会学分析问世,我们就已体认到从一个紧密的社区转型到陌生人的世界,多么令人无所适从,当然人们的身心也爽然解放。城市生活可能零碎化,而非各化,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幸免于村庄生活的约束。换一种方式说,在人们从村庄生活转向城镇生活之后,邻居对个人的监视就会减少,与之相伴随,社区对个人的控制力逐步削弱。一个人从乡村生活转向城市工业生活(urban-industrial life)之后,他便不会受到地方闲言碎语的困扰,或是在场碰面交流的打搅,可以逃离好事邻居的查户口式的盘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城市中,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选择自由,过一种他们所喜欢的私人生活,按照个人意愿与人交往,沉溺于一种富有异国情调的生活而不用担心受到谴责,个体可以随心保持匿名的生活方式。

这里存在的矛盾是,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社会比基于社区的生活模式要更社会性地组织化,不过,城市社会为了运行有序,必须搜集极为详尽的公众信息。并且从最核心的方面来说,当代机构搜集到的信息要比在前工业社会中搜集到的任何信息都要更详细、更富有内涵、更各化。在前工业社会中,谈话和记忆是搜集和储存信息的主要方式;而现在,搜集和储存信息的手段多种多样,诸如计算机化的记录和书面记录、兼容的数据库,甚至包括用电和银行服务行为的日常"测量"等等,并且信息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会累积。任何怀疑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价值的人,不妨想想几个月的银行或信用卡账目所记录的生活痕迹,例如他们在何时何地购买何物?或是他们去了哪儿,他们赚了多少,他们是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吃了什么以及他们饮食的规律如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Burnham, 1983, pp. 20—48)。

联合群体的非个人化生活甚至比邻里世界要搜集更多的个人信息。在城市中我们或许可以轻易地摆脱家庭和朋友们的过度控制,

但我们几乎不能逃避税收部门、医疗服务机构或者地方性权力机构的监视。当然如今发生的大部分监控行为都是匿名的，笔者之意就是说明那些机构搜集到了大量的关于人们生活的信息——包括购物偏好、性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忠诚等等，这些信息异常私密，绝对不会泄露提供资料者的情况，更不会指明资料代表的具体对象。如此生活境遇，不难想象，如今人们遭受最严密的监视，其程度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虽然他们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但他们的私人生活却比以往任何一代人的私人生活都要更为人所知，即使是与那些生活在一个修道院中的人们相比依然如此。例如，现在我们能大量地了解到人们的性事、渴求以及秘密的愿望以及他们在某个时间段的政治倾向。所有这些信息截然划分了当代社会与前工业主义，在前工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搜集此类信息的机制。搜集到的相关自身与他人的信息，会左右我们每个人的感知，甚至行为，但并没有人能够识别出原始数据就是从哪些个体搜集而来。

尽管如此，搜集到的各类信息对于现代组织（政党、零售公司、家庭计划者）的运作通常至关重要。而且，它反过来对其他个体来说通常也有所助益（尤其是通过媒体机构或者教育机构）。当人们更了解其他人及其愿望时，也就知己知彼，对他们生活中的行为做出有准备的选择（例如：关于某个特定时期在社会中存在着的多种生活方式、不同的性取向、不同的儿童抚养方式）。我们再次面临着一种矛盾的处境：如果越多地了解人们，那么每个个体便可获得更多的机会通过做出自由的“选择”而增强他们的“个性化”。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同样要谨记上述观察，因为在开始考察监控的发展时，很容易采取一种摩尼教（Manichean）的立场（Lyon，2001）。也就是说，更多的监视看起来会无可避免地侵犯个体的自由，正如更大的组织看起来必定会削弱个体的自主权一样。因此，如此听风就是雨的判断——多么可怕！这实在过度简单化了。着手本章考虑的中心问题——分析国家在组织和监视中扮演的角色之始，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也是另一个要谨防做出冲动判断的原因。

民族国家、暴力和监控

在帮助我们去理解监控和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迅猛扩张的所有分析中，或许最重要的是吉登斯对国家扮演的角色的特别关注。笔者会详细阐述吉氏的业绩，但是在这之前我希望特别陈述一种观点——在大部分情况下，当我们提到“社会”(society)时，我们实际上言说的是“民族国家”，英雄所见略同，吉登斯屡次涉猎此论点。所以，当我们在研究“现代社会”时，我们通常在研究“现代英国”(如果我们是英国人)；当我们在比较不同的“社会”时，我们一般都在比较不同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把“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也不为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个术语并非同义。民族国家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类型，它只是在最近才在世界历史中出现。

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诞生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虽然如我们所知，它处于建造世界的(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中心(Gellner, 1983)，但是它应只是作为一种人为产物来研究。民族国家不是“社会”，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它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在此我们扼要地介绍一下吉登斯论述的一个中心主题——他声称民族国家是一个有边界的区域——领土——政治权力正是施加于这片领土之上，而信息在民族国家中从一开始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从一开始，民族国家就是“信息社会”，因为它们至少必须了解它们的成员(并且必须知道哪些人不是它们的成员)。吉登斯相信民族国家必须同时持续拥有“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规划和管理)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权力和控制)，并且，虽然这两种资源在现代国家会趋向于集中，但两者的前提条件都是有效的监控。由此：

> 所以，现代社会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信息社会”。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所有的国家都是“信息社会”，因为国家权力的生产要求自发地搜集、存储和控制信息，以应用于管理的目的。

> 但是在民族国家中，因为它行政一体化的程度特别高，导致搜集、存储和控制信息的程度也达到空前高度。
>
> (Giddens，1985，p. 178)

我们在此提出的论点是，如果我们要寻觅信息对于社会运作举足轻重的“信息社会”，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民族国家，因为随着民族国家在某些疆界之内建立了领土和主权，其对日常和系统监控的需求就可以洞察到我们讨论的议题。

但是这种阐述太抽象了。我们需要更详细地阐述——民族国家对信息的搜集和存储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依赖。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最近发生的信息发展的一些特殊形式。为说清楚上述议题，我们非常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描述民族国家的某些主要特征。

首先，现代世界乃由民族国家构成。这并不是要低估如今已被广泛了解的全球化过程(吉登斯非常多地关注了这个过程)。我在第四章讨论了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但在此强调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我们捕捉到了现代生活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民族国家对于许多(或许是大部分)人的身份认同(identities)来说非常必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效忠于某民族 (national allegiance)(“我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是他们的存在(being)的核心要素。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问题复杂纷呈、令人焦虑——并且是大量现代政治运动的核心。一种说法是，不管一个人是否在电视上观看国家足球队的比赛，不管他/她是否希望他们赢，不管他/她是否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支持他们国家的代表队，我们都能找到某种类型的国家意识的证据。另一说法则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民族主义的表达是独裁的、种族主义的和好战的——在前南斯拉夫施行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提醒我们民族主义倾向是多么地致命。但是，在任何地方，程度或轻或重，民族国家都通过迷思的历史建构 (mythic pasts)来影响人们的身份认同，此一迷思的历史包括传奇和文学、传统和庆典、风俗和滑稽(caricatures)。对此“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ies，Schlesinger，1991)进行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所有文献都赞同“集体身份”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不

管它们是多么地多样和存在着细微差别。

无论有多少分析怀疑“民族认同”的真实性，事实仍然如此，在现代历史中“民族认同”的力量非同小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必须承认，大众更愿意用他们的国旗把自己包裹起来而不是追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而且，在定义谁属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时，一直都有必要有一个谁不属于这个国家的定义。虽然在提到国籍的法律概念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问题(谁持有护照，并拥有其他公民权)，但是在彰显感觉、意义和身份的文化领域，这会是最重要的问题。

当有人提到现代性诞生于(最初发生在工业化过程之中)正在发展和巩固的民族国家的环境，我们不会惊讶民族国家依旧对人们的身份认同很重要。社会理论家们的正统观点认为——面对“工业”和“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时，民族国家和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会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工业资本主义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族国家本身的驱使，这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感受到民族意识。

此外，民族国家对于大部分经济和社会生活来说依旧至关重要。一个人只要想想财政政策、教育战略或者是那些围绕着法律和秩序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就会赞同此论点，并且深入理解民族国家在人们生活中的持续重要性。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民族国家是个新鲜事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如此习惯国家的存在以至于会认为国家具备一种非凡的永恒性。但是，甚至“传统的”民族国家都只有两个世纪多一点的历史，我们需要强调——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着来自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尤其是北爱尔兰全体居民的反复挑战(对他们做出回应需要一个移交的政府)。一个人只要想想 1989 年发生在东欧剧变，就会理解民族国家的易变性——苏联的解体、德国的重新统一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只要再稍稍环视一下欧洲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没有受到来自内部民族主义的挑战；再细察中东的情况，我们就会观察到

一些民族国家(也门、科威特、约旦、以色列、阿曼、沙特阿拉伯)都是在近几十年来从部落社会创建而成，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无时不处于争取国家身份的冲突中心。

笔者强调了民族国家对社会经济组织以及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民族国家是种新鲜事物并存在重组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充分关注民族国家的第二个关键特征——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诞生于战争之中，都仰赖国防力量而得以维持。简言之，战争与战备是民族国家产生的要害所在。任何对英国历史的分析都会强有力地支持下述观点：凯尔特系外围人口(如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人)战败之后，《1707 年联合法案》(*The Act of Union in* 1707)诞生，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强大的君主们具有打败和控制以前是自治的贵族们的能力，并且与此同时能够防御外国入侵者的来犯。此外，英国较近期的历史，特别是帝国时代的历史，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民族国家是多么容易越过领土而发动战争，最紧要的是英国历史也向我们说明了战争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何等重要，在此，人们大概会想起 20 世纪 60 年代的景象，学童们学习“英国红”覆盖的世界地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警示殖民时代的信息资源对于国家历史进程多么重要，他论述了在构造民族认同和推进征服行动的过程中扮演着领导性角色的“权力机构”(institutions of power)。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地图和人口普查，两者紧密勾连，地图“深深地渗透进了(在殖民主义者们中)流行的想象”(p. 175)，它们同样是促进殖民主义运作的中枢。地图制作的精细化以及对经度和纬度的精确计算是征服的必要条件——军方需要知道行动的确切方位；而人口普查的数据，让征服者们对统辖的人口了如指掌，从而发号施令。如安德森所说，军事征服者们的野心是“完全的一目了然”，“一种在地图上完整分类的坐标方格以无止境的弹性覆盖了处于国家的实际控制和预期控制之中的民众、地区、宗教、语言、产品、标石(monuments)等等领域”(p. 184)。

我们或许可以委婉地陈述民族国家扎根于战争/防卫的观点，就民族国家是对某片特定的领土拥有主权的定义而言，国家政府至少

应具有守护国家边界完整性的职责。开门见山地说，为战争所做的准备（一种让人信任的国防能力）是所有民族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整个现代史反复证明了这条原则。

民族国家的第三个核心特征与第二个核心特征紧密相连。就是说在20世纪，现代战争/国家防御更明显地与广大的社会交织牵连。在某个层面上看，此论点仅仅是指比以往更大的人口比例卷入了现代战争，很明显地体现在征召和大规模动员方面。与此相关，战争所造成的战士伤亡和平民伤亡的数量也增加了。毫不掩饰地说，被战争杀害和残害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因为军事伤亡数据空前增大而往往就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战争决定性转折点的标志（Fussell，1975），但随着20世纪逐渐翻开新的篇章，战争导致的最惨重伤亡殃及平民，现代战争令平民没有任何隐匿之所可以避开空袭和其他形式的攻击，伤亡数量庞大。例如，在1939年到1945年的战争中，虽然实际的英军死亡人数比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少很多，但该战争却造成了4500万人的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Gilbert，1989，pp. 745—747），死亡人数大约是俄罗斯、波兰、南斯拉夫和德国的人口总数的10%。

从导致平民伤亡递增的意义上说，现代国家之间战争的猛烈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现代战争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结构，也是另一与此相关的因素，表现为工业活动和战备已经紧密相连。吉登斯（1985）指出体察国家的战争行动与各种工业比如化学、能源和工程之间的联系时，一战之间和之后评论家们开始认识到“大规模的科学和技术被整合为工业（和军事）发展的主要手段”（p. 237）。从那以后，工业界生产战事设备的能力对战争/国防行动影响深远，所谓的“战争的工业化”不失为20世纪的一个核心特征。实际上，我们可以把1914年至1970年这段时期描述为“工业战争”（industrial warfare）时期，其特征体现出大规模动员以及工业生产和军事能力之间密切勾连。

从工业战到信息战

不过，作为亲身经历过往的一代人，我们目睹了工业战争的逐渐解体，“信息战”逐渐取代工业战，与以往的战争相比，战争的信息维度乃是信息战着重强调的关键。在如今的战争中，不管是针对敌人（或者潜在敌人）的监视、资源的配置，还是针对国内外公共舆论的操纵，信息都扮演了一种至为强大的而且是迄今为止最为普遍深入的角色。此外，不管是通过人造卫星的形式对敌人实施监视、通过计算机在它们所能到达的任何地方记录和评估军队的需求，还是通过一些事先编好了程序的“智能”武器去“开火然后忘记”（fire and forget，军事术语，其含义是指某些武器[比如一些导弹]当被发射出去之后就能够自行攻击目标，发射者无需再提供控制），信息已经全方位渗透入现代战争。也就是说，信息已经不再仅仅是有关某个敌人和它所拥有的资源情报，而是融入了军备和决策系统本身的一项日常活动。

我们可以列举出信息战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Libicki，1995）：

- 随着军队在全球的广泛分散（主要是美国和北约[NATO]的部队），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异常复杂和耐用的命令和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系统，以协调、评估和监管信息资源。处理和保护信息流的计算机通讯基础设施是当代战争的前提条件，其在掌握和控制核武器的重要场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Bracken，1983）。这同时是优势和弱点的来源，因为命令和控制系统会在任何战争中成为首要攻击的目标。

- 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由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威胁的移除，可预料大部分未来的冲突会是曼纽尔·卡斯特（1996）所谓的“即时战争”（instant wars，pp. 454—501）。“即时战争”指相对来说比较短暂的对抗（非内战的情形，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内战是否短暂还疑问重重），积极的战争行动只会持续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在即时战争中，美国（或者北约和/或联合国特种部队）会获得胜

利，因为它在军事资源上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 这意味着战争再也无须对民众进行动员，至少主要军事力量内部无须如此，因为战争的重要目标是发动纯净战，他们本国的民众将会安然无恙(Shaw，2005)。战争的发动将会依赖相对来说数量较少的职业士兵、飞行员和援助队。这体现了在军队中发生的一种向“知识战士”(knowledge warriors)的转变(Toffler and Toffler，1993)，该术语强调了那些能够熟练操纵复杂而高度计算机化的工具如高级战斗机、监控系统和导引技术的人员的核心地位，赤手空拳的肉搏能力和射击能力不再受到强调。对本国民众和全世界民众的感知操纵成为战争的重中之重，其对民主国家来说尤为紧迫，因为公共舆论乃影响战争成果的核心因素，民众对战争领袖的担忧会促成国内的反战行动，这一切直接关联军队的战斗力发挥。此外，政府忧心忡忡于公众因误导类型的图片(例如，血泊中的尸体，而不是“对合理目标的精确打击”)的激烈情绪。不可避免地，由此促使军事领袖们小心谨慎地设计和操纵与战争有关的信息，虽然同时他们还必须努力地逃避审查，因为如此举措公然违抗了民主国家要拥有一种“自由的媒体”的理念，并且损害了报道内容的说服力。因此，感知操纵就是多种手段的结合——确保一种持续不断的媒体正面报道，但同时要遮人耳目，特别要让信息看起来是由独立的新闻通讯社自由搜集。对1991年海湾战争的报道就是一流的“感知操纵”的佐证，因为它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而在报道内容上却有所过滤。但对于感知操纵者们来说，第二次海湾战争却是个失败。一些并不期望出现的图像——嫌疑犯被处以电刑并遭到性虐待，人质们在被敌人拍摄时乞求活下去——反复出现在战争后方的电视荧屏上，并且反对声浪此起彼伏(Tumber and Webster，2006)。

● 信息战利用一些异常先进的技术实施。显然，资源丰厚的美国军队充分体现了先进技术的能量(单单美国的国防预算就占了整个世界军事支出的40%，大于任何一个潜在敌国的国防预算以及所有中立国的国防预算的总和)。有迹象显示，英国国防部的装备购买预算现在是每年15万亿，“命令和信息系统”(Command and Infor-

mation Systems)项目占据其中三分之一的预算，再加上“武器和电子系统”与“飞机”系统的支出，总计这些开支将会占用超过一半的预算。

● 信息战再也无需动员民众或工业界付出战争努力。信息战仅依赖最前沿的为了军事目的的工业革新——例如，电子工程、计算机、电信和航空航天。

● 信息战要求谨小慎微地制订计划，但这是为了弹性反应而制定的计划，与工业战争时期较为累赘的计划相比，信息战灵活而反应快速。如今，大量的信息流，再加上武器本身也采用了软件，为战争所制定的复杂计划把“灵活性、弹性和快速反应”(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1996, para. 171)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博弈论(game theory)、伪装(simulation)(通常采用先进的视频设备)和系统的生产(production of systems)是信息战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如以“对不确定性的确定”(certainty of uncertainty)为基础做计划的必要性一样。

● 信息战为了弹性而做出计划的过程如此复杂，以至于信息战的许多方面未雨绸缪，程序已编辑在先，进程不受参战者的控制。正如美国国防大学的一位主任的高见，在现在和将来，“许多决定都会完全自动化”(Alberts, 1996)。这部分是对现在战争对行动速度的强调所做出的回应——例如，一旦一个导弹被发射，为了拦截和摧毁此导弹而设计的反导弹需要在最可能短的决定时间内发射出去，计算机操纵该过程会比人快(Rochlin, 1997, pp. 188—209)。由此，技术取代了军事人员而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只持续了五个星期(1991 年 1 月到 2 月)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被称为“第一场信息战”(Campen, 1992)。“沙漠风暴”(Desert Storm)展示了上文提到的大部分特征，主要领导者(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平民伤亡；通过周密的组织使 500 000 名盟军战士烦累地转移了几千英里而到达战场，但与此同时却保持了反应的灵活性，例如军队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横穿科威特沙漠；以及对“媒体友好”(media-friendly)报道的操纵，令该战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获得了最‘广泛传播’(most ‘communicated’)的一次事件”(Zolo, 1997, pp. 25—26)。盟军拥有伊拉克军队无法超越的上等装备并且备战充分，从双方伤亡人数上

明显地体现了军事技术力量的悬殊：美英方面的伤亡人数大约是300人，而敌方的伤亡人数在30 000到60 000人之间，其中许多人都是在他们逃回伊拉克的过程中，在巴士拉(Rasra)公路上遭到“土耳其枪击”(Turkey Shoot)横扫。有人估计在海湾战争中释放的爆炸性能量比整个二战所释放的爆炸性能量还要多。

1999年巴尔干战争、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及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十一周。虽然媒体的战争报道在一开始以及在最初的几次冲突中表达了对战争的忧虑，但媒体的抵制很快被不可超越和掩耳不及迅雷之势的火箭攻击和空袭所粉碎了。1999年由北约主导的对塞尔维亚的攻击也遵照了信息战的模式，北约完全从空中发起攻击，且没有伤亡记录。经过造成了几千人死亡的密集轰炸，北约获得了胜利，塞尔维亚停止了抵抗。在2001年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之后，阿富汗遭遇强攻。美国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之后，这场入侵很快就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几乎没有发生短兵相接的战斗，阿富汗军队根本不敌美国的空袭。在2003年美国轰炸伊拉克的战争中(更恰当的说法是把这场战争命名为“震慑行动”[Shock and Awe])，由于伊拉克缺乏一支能组织抵抗的空军，这使得美军在四周之内便取得了胜利。在盟军这边，大概有20人伤亡(大部分来自于“友好开火”[friendly fire])；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并没有计算，这是因为在许多士兵能够对攻击有所回应之前，他们已经被炸得粉碎，尽管有人估计伊拉克军队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0 000人。①

在这些战役中，军方也不懈地采取各种战术(从特别简报到特派“嵌入式”记者[accredited “embeds”])来控制媒体报道。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军方为控制媒体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围绕着伊拉克战争的信息环境却是非常复杂而多样的——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各种关于入侵伊拉克合法性的观点；具有多种用途的技术，最

① 以入侵力量来说，安全占领已经相当困难(截至2005年，美国已有2000名士兵丧命)，因此，当占领方的军队不得不接近当地(入侵地)，且特别是自杀性攻击迫近时，信息战的优越性极度受挫。

突出的是具备卫星传送功能的视频电话，它可以使记者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很好地直接发送报道；更富有经验的记者们的职业伦理；半岛电视台的新闻网；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等等。这种信息环境是如此地复杂和多样以至于军方企图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去引导媒介的努力往往徒劳。再也没有什么能比照片更生动地展示军队操纵媒体的企图遭到了挫败，那就是 2004 年 4 月出现的来自于一些战俘们的数码相机的照片，这些战俘们在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中遭到了虐待甚至是酷刑。这些照片破坏了美军试图把这场战争呈现为一种解放运动的努力，并且对盟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因为相关照片在全球范围内被复制、放大以及被人评论（Tumber and Webster，2006）。

监控和国家防卫

或许有人会以冷战（使 1945 年后的世界笼罩了一片乌云）的终结，就判断驱使着国防部门的命令已经荡然无存。与此观点相反，意识到这点很重要，虽然冷战的确为监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在现代国家制度中，情报始终是一种持久的政府功能的前提条件”（Whitaker，1992，p. 121）。因为任何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守卫边界，所以政府会存在一种无法满足的对能影响国家利益的任何信息的欲求。“流氓”政府尤其是恐怖分子会使持续的监督合法化，但是，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抗议也能使之合法化。由此导致由相互连接的技术组成的大规模系统的建立，其目的就是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件以及军队和平民的活动实施日常地和持续不断地监控和调查（Richelson and Ball，1986）。例如，Echelon，一个由美国所主导的电子侦探网络，具有存储 5 万亿页文本的能力，这些文本都来自于受到监控的电子邮件和传真讯息（Barmford，2001）。

伴随着计算机和人造卫星而来的，是一些关键的监控活动。这些系统必须藏匿于公众的视线之外，保密对于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尤为必要。所以，一个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监控和在不同的国防机构

之间传递信息的网络建立起来了，该网络具有匿名性，并且无法测定(Burrow，1986)。安全部门会假定其自身会遭到来自敌方以及不满现状者们的持续不断的攻击。由于他们一直以来都很谨慎，所以很容易被一种怀疑和担心泄露的情绪所笼罩。这些特点强化了他们的深不可测，并使他们进一步远离了向公众做出解释的公共责任(Knightley，1986)。

监控机器并非仅仅针对外部敌人，鉴于民族国家很容易遭受到来自内部的攻击(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发电站都被第五纵队队员们所占领)，那么国家被毁灭，易如反掌，因此，总是跃跃欲试于找出民族国家的“颠覆分子”(Campbell and Connor，1986，p. 274)。在英国，一些偶然被泄露出来的信息显示若干群体遭遇国家监控，如工团主义者、工党国会议员、核裁军运动积极分子、教育学者、媒体从业人员、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积极分子以及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候选人等等(Leigh，1980；Massiter，1985；Hollingsworth and Norton-Taylor，1988)。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与警察部队的一个特殊部门合作，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国家的信息搜集网络。安全部门同样可以进入一些数据库，包括全国警察计算机数据库(Police National Computer)、国内税收记录(Inland Revenue records)、英国电信档案(British Telecom files)以及卫生部所掌握的数据。

恐怖主义分子对民主国家的侵犯，从2001年9月在纽约和华盛顿发动的攻击，随后到巴厘岛和马德里，再到2005年7月在伦敦发动的攻击，加速了此类搜索“内部敌人”的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Ball and Webster，2003)。如此种种因素促使了英国引进身份证的合理动机，国家部门采用包含生物统计数据的最新的计算机技术来识别身份证，如果有必要操作，那么，个体难以逃脱技术天网的检测与跟踪。

总之，我们目睹到推动监控系统发展的强悍力量，其源自于民族国家必须担负起守卫边境的责任。在一个被国家边界划分的世界里，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建立有效防卫机器的内在压力。而且，因为国家常常处于至少存在着潜在冲突的境况中，“有效的”意义会一直发生改变。但始终保持不变的冲动——去收集和适应最可能多的

关于国内国外的实际的和假想的敌人信息，以及遵照信息运筹帷幄。上述理由促使大卫·里昂(David Lyon，2001)认为精细的过滤审查一网打尽——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对现存秩序所造成的威胁，这都是作为监控主要形式的绝对怀疑(categorical suspicion)的弥漫及其导致的结果。

人权体制

信息战的发展，以及在信息战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感知操纵"，带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其产生了更先进的宣传技巧。但另一方面，因为媒体和各种传播手段增加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信息不能够容易地被引导着一直向一个有利的方向发展，结果极其难尽人意。职业伦理再加上一种对信息来源的极度怀疑的倾向，导致媒体对任何针对战争的权威描述持怀疑态度。这并不是说记者们是道德中立的，也不是否认他们可能为了一种更真实的报道而对信息进行过滤。但是，我们需要觉察到，如今那些被直接牵涉进战争的人对战争进行的报道并不可信任。国内的异议将会得到报道，很可能参战国一方的记者置身遭受炮火攻击的战场(毋庸惊讶，他们会亲身经历战事)，那些令人不安的战争进程的推测将会受到广泛的关注。

而且，信息的不稳定流动先于完全彻底的冲突，其重中之重的角色可以直接促成冲突的产生。我们似乎觉察到却难以测量与日俱增的对"人权"以及它在全世界的滥用的敏感和关注(Robertson，1999)。如此说法勾连着多重因素——新闻报道的传播、电视纪录片、现代旅行；以及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红十字会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Medecins Sans Frontiers)等组织关联。当然，上述机构并不是为了单一的目的而行动，它们也不会发布单一类型的信息，但是它们的确引发了人类应享有普遍的权利(universal rights)的理念，应该成为约翰·厄尔里(John Urry，2000)所谓的"地球公民"(global citizens)动议。人类应

获得的权利包括：摆脱迫害和折磨的权利、宗教宽容的权利、自我抉择的权利、民主的权利等等。无疑，有人会批评如此“人权”诉求显得定义模糊、缺乏一致性和欠缺成熟事实。的确如此，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弱人们的诉求，因为不管是帮助饥饿的孩子，还是解救灾难的受害者，甚至是解放受到军事侵略者压迫的人们，都是各类组织急切呼吁的“当务之急”。

此外，与此相联系的加速了的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鼓舞全球民众秉持普遍的权利诉求。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1999)把此一问题归纳为“人权体制”(human rights regime)的扩张，从而推动了众所周知的被尤金·哈贝马斯和乌尔利希·贝克等学者称为战争“世界性”案例(“cosmopolitan” case)的粉墨登场，比如反对塞尔维亚统治科索沃，在1998年和1999年之间追捕和关押智利的前任独裁者皮诺切特(Pinochet)，2000年英军对塞拉利昂共和国(Sierra Leone)的干涉。另如通常战争结束若干年后，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依旧对巴尔干战争的战犯进行持续的逮捕和审判，这也是此类“人权体制”的一种体现。

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冲突来源的减少，最显著的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的竞争减少了。吉登斯(1994)创造了一个词组“没有敌人的国家”(states without enemies)来描述如此发展格局，并提到如今的战争问题往往交织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找到的不同形式的原教旨主义，但这些原教旨主义却很少能够表达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信仰和利益。此类原教旨主义的例证，不胜枚举，其都以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坚持某种确定性为特征。例如，某些民族会很频繁地为种族要求和宗教要求而呐喊，他们要求追溯纯粹的血统以及居留权，这通常都是以剥夺其他人的权利为代价。如同我们可以生动地从20世纪90年代发生于巴尔干的种族清洗，以及自从1998年以来基地组织(al Qaeda)在各地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中明察秋毫，原教旨主义促使人权被严重滥用，而且由此种族要求和宗教要求的声势加大，反而激发势力磅礴的利益集团

(community)去干涉主权国家的事务。

上述情况严重违背既有的强调国家领土完整的秩序运作。对于某个民族国家的民众们来说，一些吸引他们的事情可能正在发生，但是迄今为止，如果他们自己的边界和/或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话，极其难以预测其他政府会不会不顾另一个主权国家中的受害者而发动干预。不过，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却是例外，干预的确发生了，而北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或者战略性的理由可以发动武装攻击，而一些“现实的”(realist)美国人商议的结果是反对武力干预，他们的理由是“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我们的狗”。

这种干预与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长达十多年的绝望处境相辉映，除非它们自身(或者它们的盟国)的边界遭到了威胁，否则，这是其他国家极不愿意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例证。我们还需要记住的是，尽管在那时，同盟国的战争是为了反抗德国的领土侵略而发动，并不是为了抵制正在轴心国内部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一个被完好地记录下来的证据显示同盟国并不愿意为战前甚至在战争期间大量的犹太难民提供避难所(一直到“水晶之夜”血腥大屠杀和“最后解决方案”大屠杀以及在这两次屠杀的过程中，只有 10%的犹太申请者被获准去英国避难。London，2000；Lacqueur，1980)。

哈维尔(Vaclav Havel，1999)阐述了 1999 年 4 月末发生的变化，并表达了对北约介入科索沃的支持，他的理由是“但凡认为在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人权在何国是不是被侵犯不关我们的事的观念……应该……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当然，我们不应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民族国家依然举足轻重，在涉及要不要从外部实施军事干预时，现实政治(realpolitic)的考虑依然是最终的裁决力量。

但是，似乎信息战涉及的远不止战略或领土利益，这恰恰是因为有组织的、暴力的信息要素如今是必需的要素，并且很难被遏制。这些要素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扩张，其否定了国家在处理边界之内发生的事务的权利。再次，哈维尔(1999)认为“似乎……一代又一代的民主主义者们的努力……和文明的发展终于让人类认识到人比国家更重要”。

公民权和监控

上文强调了民族国家对战争的关注、对监控的创建所做出的贡献，尽管也提到了全球化和信息战的扩张所带来的矛盾结果。但是，民族国家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促进了监控的扩张，这种方式同样与军事有关，但却产生了较少的令人心寒的结果。这就是公民对国家的参与，最显著的是人们怎样获得权利和承担责任以及这些权利和责任如何行使。对于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的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是民主政府在民族国家中的扩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如何建立。其通常是在一个两败俱伤而又持续很久的战争中锻造出来，期望去统治某片特定的领土的任何统治权力所优先考虑的产物，吉登斯称民族国家为“内部稳定”(internal pacification)。直接地说，一个国家必须要达到其边界之内的秩序和稳定，这是它守卫其外部边界的前提。无疑，在早期，“内部稳定”可以通过军队的强制力量达到，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希望长治久安，那么民族国家任重而道远，决非仅止于此。至少，政府必须了解它的人民——他们是谁，他们的年龄、性别和住所，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必须从他们中间征召一些人去抗击外国人的侵略。此外，每个民族国家都需要了解它的人民，这样它才能够有效地收取税收。这两种需求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人口普查对于所有的民族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从一开始监控就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我们不妨去追溯国家对内部人口实施监控的路径扩展。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存在着一种官方统计数据的剧增，其通过一些日益先进的技术而精细地搜集而成，囊括了例行的人口普查资料搜集到的关于任何问题(从教育成果到英国某些特定地区的就业模式)的广泛数据(Hacking，1990)。无可否认，这样搜集到的信息作为了解一个正在变化的社会特征的手段是令人着迷的，但它同样是(并且极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后者需要在这样一些事务比如税

收上承担责任，通常需要决定提供多少教育经费，甚至需要制定一个地区性的经济战略。如同吉登斯(1985)所说："如果缺乏信息基础(information base)，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难以存在，因为信息基础是它进行自反性自我管制(reflexive self-regulation)的手段"(p. 180)。

但是，这或许是缺乏论据的泛泛之论。如同我们所见，与民族国家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军事上守卫其疆界的需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人口普查，无论如何简便，都势在必行。因为国家必须有能力征税，并且征召男性公民去抵抗侵略者，甚至是参与一些扩张主义运动。但是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条件，为了促使年轻人代表国家参加战斗，需要向他们提供远不止关于他们的居所和职业的信息，民族国家必须向他们提供更加有形的东西。

更确定地说，就是必须激发那些潜在的战士们的国家主义情绪，同样需要记住的是以前军事征召的强迫性(强征入伍、贫困等等)。尽管如此，在吸收了 T. H. 马歇尔(T. H. Marshall)(1973)的思想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这还涉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可被看作是民族国家和其成员之间的某种"契约"。他认为，作为为国家而战斗的回报，多年以来公民们已经获得了各式各样的公民权(citizenship rights)。例如，作为公民，他们拥有保护国家免遭外国军队侵略的权利，拥有持有一本护照自由地进入本国的权利，拥有获得本国驻外大使馆支持的权利。

基于民族国家和其成员们之间的"契约"，产生了一系列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它们与监控之间的联系主要在于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怎样行使的。民族国家(公民权在它的保护伞之下才能够运作)必须发展出行政手段才能够承担这些额外的责任。从广义上讲，现代社会民主国家的发展是监控的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因为公民权利和责任的行使要求精细地识别国家成员。选举登记要求发展一种记录了全体人口的年龄和居所的数据库；社会服务要求详细记录人们的境况，从他们的住房条件、病史到他们的受赡养者的信息；英国税务局(the Inland Revenue)建立了庞大的详细记录每一个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档案；在一个人的学校生涯中，他的成绩、发展、连续性以及变

化都被记录了下来;那些为了减轻贫困而造成的最坏结果的项目,需要达到合格要求的处境悲惨者的信息。如同帕迪·希尔亚德(Paddy Hillyard)和杰尼·帕西·史密斯(Janie Percy-Smith,1988)所论述的:"提供福利救济和服务是一种大规模监控系统的核心,因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分类、信息搜集和记录正在持续不断地成倍增加"(p. 172),我们可把这种监控称为分类护理(categorical care)。

监控的危险

民族国家或者被安全需要,或者被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所激发的监控倾向已经问题丛生。最显著的是一些公民自由论者(civil libertarians)的担忧,他们目睹了由匿名官僚们所掌握公民的纪录累积,或者是了解到了人造卫星在不同国家之间实施侦察的能力,他们表达了对监控发展的强烈担忧。大量的文献强调了监控问题,比如警方建立的关于普通公民的档案,陪审团进行审查时可能会误用他们的档案,或者是会导致错误的逮捕(e. g. Rosen, 2000; Whittaker, 1999)。

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获得了特别而迫切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对某些机构另有目的而利用那些档案文件的担忧,比如,警方会得到其调查对象的就业、医疗和银行记录。另一个问题涉及合并不同的数据库的普遍问题。随着大部分国家(还有许多其他的)监控性档案的计算机化,把曾经相互分离的信息联系起来成为了可能。虽然存在着许多约束限制进行此类联系,但是显然有潜在的可能——设计出一种能够为具体个人建立一个"完整肖像"(total portrait)的"电子身份证"。如果某些机构能够获得一个人的医疗、教育、税收、就业、银行以及犯罪的记录,很明显它们可以为此人建立一个非常复杂而详尽的"个人剪影"。对于那些寻求效率和/或者更完善地控制的政府官员们来说,这种发展具有令他们无法逃避的吸引力,于是会极大地增强监控的程度(Ball and Webster, 2003)。

于是,人们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隐喻所吸引,以此去隐

喻现代性(Lyon，1994)，这种观念来自于福柯(Foucault)(1975)对边沁(Jeremy Bentham)关于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设计的富有原创性思想的引用。在边沁看来，圆形监狱的建筑设计把看守置于一个中心的(通常是黑暗的)位置，而每个囚犯或者病人住在处于圆周位置的、单独的、通常被照亮的单人牢房中。这个设计被福柯采用，以隐喻现代生活。福柯认为监控促使了一种没有墙壁的圆形监狱的建立，当今社会，拜现代电子技术所赐，人们受到了监视，但是他们却不能看到是谁在监视他们。

很容易过于夸大这种监控的程度(最主要是因为可获得的信息是如此之少)，而认为身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受到监视的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则又大谬。例如，很显然由中央搜集到的大量的关于民众的信息，如人口普查，的确反过来受益于民众，民众能够更具反思性地监视自己的地位、前途和生活方式。所以，例如，关于收入水平、犯罪率或者离婚模式的信息，不只是对政府官员有用，它们对于那些寻求弄清和(或许)建立新的生活方向的个人来说也有建树。

但是不摒弃圆形监狱的观念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们政府有一种监视所有事情的过分野心，也提醒了我们权力和信息搜集之间紧密联系的方式。例如，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1991)以"机器视野"(machine vision)的洞察对军事监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这种"机器视野"从一些事物上得以体现，比如对外国领土的远距离通讯拦截和卫星监视，这些监控是自动的。那些能够在一个定好的类别中捕捉到所有讯息的程序被建立了起来，卫星在监视那些落入其"轨迹"中的任何事物。德·兰达描述了那种为了使机器能够破译卫星照片而开发出来的先进软件，这些软件几乎可以从这些照片中获取一切信息，他还描述了那种为促进对窃听到的信息进行分析而设计的系统。在看到所有这些趋势之后，他倾向于把它描述成一种"泛监视系统"(Panspectron)，"可把它称为一种新的不可见的情报获取机器"(p. 205)。

这些展望可能会使人感到有些恐惧，但是它们当然不属于科幻

小说的胡乱想象，如此论述是对监控的迫切需求的逻辑延伸，而监控在民族国家中（Gandy，1993）和我们有组织的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监控是所有现代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尚无明白而简单的政治计划与之相抗衡”（Giddens，1985，p. 310）。同吉登斯一样，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还是对于“工业主义”来说，监控都不可或缺。我们也必须像吉登斯一样得出如下结论，在所有发达社会中，“极权主义规则的所有方面都是一种威胁”，这正是因为监控“在现代国家中被最大化了”（p. 310）。

公司监控

本章大部分内容关注的是国家所主导的监控的扩张。但是，虽然吉登斯的著作能够促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国家监控，我们不应忘记资本主义企业对如此趋势所做出的贡献。吉登斯自己并没有忽视资本主义力量所扮演的角色，他尖刻地写道：“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发生的监控是管理的关键”（1987，p. 175）。如下观点能充分说明这个论断，即管理这项 20 世纪的发明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工作（information work）的范畴，其核心目的是无一遗漏地监控公司的所有行为领域，于是可以更好地计划和实施那些能够确保公司获得最好的投资回报的战略（Robin and Webster，1989，pp. 34—52）。作为科学管理的关键人物，泰勒（F. W. Taylor，1947）认为，经理们存在的理由就是作为信息专家——理想情况是作为信息垄断者，作为严密的监视者、分析家和资本权益的计划者而行动。

泰勒认为管理的出发点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生产过程问题，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随着大规模的工厂和劳动力的发展，这个问题变得尤为棘手。非常大量的文献讨论了公司资本主义对监控问题所作的回应，它们关注的焦点是科学管理的发展（如 Braverman，1974；Noble，1977），强调经理们应该被分派去从事组织的“脑力劳动”，以更好地对他们的管理领域实施更有效的控制。

只要稍想片刻，我们就能清晰地了解到现代管理对生产实施的非常严格的监控是它施行其他大部分活动的前提条件。但是，如今管理的范围已经不可避免地大大超出了工作过程的领域（Fox，1989）。为了理解这种状况，很重要的是意识到，在本世纪，公司资本主义已经在三个关键方面获得了扩张。首先，公司在空间上获得了发展，如典型案例就是一些主要公司至少是全国性运营的公司，而且通常是跨国运作。第二，许多公司已经合并为一些较少但却更大型的公司，在这方面典型的是一些组织支配了主要的市场份额。第三个方面很容易被忽视，即公司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结构，通过在大部分城镇都很容易看到的销售网络而实现，另一方面是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取代大部分自我和邻里供应来进入社会结构。

这些趋势产生的一种主要影响是所谓的“社会的公司化”（incorporation of society），即如此潮流给经理们带来了许多挑战，如果他们想有效地应付此类挑战，他们需要依赖搜集到的可靠情报。简言之，如今有效的公司活动的必备要求是监控，这些监控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车间。监控的形式包括从对币值波动的监控到对政治环境的监控，但在此，我想集中讨论公司对消费者的监控的发展。

公司之内和公司之外的市场研究的发展，是一种能够反映管理层了解其客户需求的指标。市场研究评估公众的方法是多样的，包括通过调查和访谈而获得资料，委托的公共舆论获取（commissioned public opinion trawls），在推出新产品之前（事实上，在研发过程中）实行预测试等等。随着市场研究者们努力去发掘关于潜在的和实际的消费者的“生活方式”的信息，这些方法变得日益复杂精密（Martin，1992）。例如，沃尔玛“收集的最多的信息是关于它所销售的产品以及顾客们的购买行为的信息”，每周都有 1 亿名顾客访问沃尔玛，这可使沃尔玛“获得关于美国的广泛的信息”（Hays，2004）。这些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驾照号码以及关于顾客购买习惯的批量数据（这尤其能暴露个人的私人生活）。由此，沃尔玛作为一个零售商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同时也建立了包含关于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每隔多久购买了什么的庞大的信息数据库。

与这种监控非常类似的是一些征信机构(credit-checking agencies)对它们的顾客的财政状况的问询,这样做通常可以为它们的公司客户提供关于潜在顾客的地址的清单。它们操作这种行为的领域通常都处于灰色地带,但大部分读者都会收到公司主动提供的传单,而此类公司正是从另外一个组织那里购买到消费者的住址。这种推论很简单:如果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拥有一个成员名单,那么该信息就对于那些专门提供高尔夫度假,或者更广泛一些,对专门提供体育服饰的公司来说价值连城。购买此类数据库是获得那些受到监控的人们的信息的廉价途径。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随着多功能的电子技术的扩张,监控不断增强。大卫·伯汉姆(David Burnham,1983)在多年以前警告我们要注意到此类"交易信息"(transactional information)的现象,"交易信息"与当代监控尤其相关。这是"一类能够自动记录几乎任何人的日常生活的信息"(p.51),在他们拿起电话、兑现支票、使用一张信用卡、购买一些食品杂货、租一辆车甚至是打开一台有线电视机时,他们的信息被自动记录了下来。"交易信息"在人们的日常活动被例行地记录下来,这种信息几乎是不经思考地被记录下来的(经常是在按下一个开关或者是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时被自动记录下来的)。但是,当这些普通的、日常的信息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它们会为公司提供关于它们的客户的生活方式的非常详细的描绘——何人在何时打了多长时间的电话;或者他们在哪里购物,购买什么,购买某种特定商品的频率怎样,他们会花多少钱;或者他们在何时何地购买了何物。

当然,所有这些都有不好的方面,但在此我想强调这种监控对于现代公司的实际用处。那些当人们在商店的计算机化柜台前购买商品,而收集的交易信息能够准确地告诉公司——什么东西正在以何种速度在什么地方售出——这些对于组织的经理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如果一个消费者使用公司信用卡,那么搜集到的信息将会更加丰富,因为它们有助于对个人的消费习惯、着装和饮食品位,甚至是首选的购物地点做出个人化的描绘。由此,这种监控形式对公司增强其营销策略非常有帮助——例如,广告资料将会特别准

确地投向某种特定类型的消费者，附带一种诱惑他们的特惠。大卫·里昂(2001)恰当地称这种监控为直截了当的诱惑(categorical seduction)。

最后一种监控形式很容易被人忽视，因为它似乎只是针对一小部分人，但是这种监控却值得我们对它进行更严肃的分析。无条件曝光(categorical exposure)是通过媒体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它越来越富有侵略性的特征体现出来的。最常见的是对各种名流的报道，虽然我们会注意到"名流"是一个易变的术语，它包括任何公众人物，从二流政客到公务员，从球星到歌星，只要情况允许。而且，社会环境已经允许媒体对一个陷入非常严重的罪行或丑闻的人的父母进行大量的曝光，或者甚至当他们是某项事故或者攻击的受害者时，媒体当仁不让。富有特色的是，这些曝光大多是一些小报干的，尽管媒体的小报化更通常地意味着这个过程已经大大扩展，不止包括《太阳报》(*The Sun*)、《邮报》(*The Mail*)和《镜报》(*The Mirror*)这样的报纸。正如近来发生的一些案例所展示的那样，曝光过程富有侵略性，且喋喋不休(Mathieson，1997)。这种曝光所指向的任何对象(通常是一些名流和/或者也包括一些天真的人和不令人怀疑的人)的朋友和家人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严密的检查；他们的传记也遭到了严格的检查，检查者们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疑点或者故事；同样，他们的日常活动也受到了严密的检查。曝光的都是非常生动的事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晚期，美国媒体对比尔·克林顿的追逐似乎更关心他的性生活而不是他的总统职责。还存在更多的例子，从2005年晚秋媒体对球星乔治·贝斯特行将结束的职业生涯为主题的带有死亡色彩的报道；对英超队员的一些小过失的报道；媒体对托尼·布莱尔的妻子切瑞·布斯(Cherie Booth)的纠缠，并指责她在着装、外貌、朋友以及职业活动方面的不适当的举动。无条件曝光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政治领域和名流的生活，其间没有一条可被接受的存在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边界。但是它却大大扩展至其他领域(从《老大哥》电视连续剧的引人注目的流行上，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它的扩散。在《老大哥》中，观众可以如同窥淫癖者一样观看节目候选人的

隐私暴露和亲密关系，节目制作者精心挑选并周期性地操纵着节目候选人）。

结论

在本章中，我试图通过吸收吉登斯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来阐述反思现代性的一些主要维度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监控，试图以此来说明近年来信息日渐增强的重要性及其特殊形式。我们尤其可在民族国家及其对战争和安全的固有关注中，以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发展中，看到民族国家对监控的必然要求。工业战争的发展是与对战争的需求、工业主义和民族国家紧密联系的，这鼓励了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和国家防卫之间的胶合。在从工业战到信息战的转变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对军方采用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以促进监控的程度和使信息控制精细化的强调。但是，全球化意味着“感知操纵”如今已经很难维持，识别其他国家是否是敌人变得更加困难。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权体制”的出现，其甚至更能激发一些全球性（或者至少是超国家性）实体比如联合国和北约采取军事行动。公司对消费者的监控的发展，如果考察一下，同样具备自相矛盾的特征，因为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对公司责任的呼吁，反过来会导致公司本身受到更严密的监控。这就是自反性现代性的杰纳斯脸（the Janus face，杰纳斯是古罗马门神，被描绘为有分别朝向相反方向的两个面孔——译者注）。

本章对监控扩张的关注并不是要描绘出一幅奥维尔式的景象，虽然它的确包含了“老大哥”会出现的警示（Lyon，2006）。但是，监控扩张既是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元素，也是更组织化了的生活方式导致监视的必然要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自相矛盾的是，它同时加强了控制和责任，并且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去创造不同的生活方式。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本章讨论的主题之斗胆，令人毛骨悚然，其模糊性也颇费神烦扰，其胆识体现为其前缀“后”(post)所引发的重振乾坤的思想，“后”的观念引人注目，趣味盎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宣告契合了我们正步入新型的信息时代的论点。不过，在此讨论的主题并不清晰，令人忐忑，困扰我们的就是很难给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赋予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些术语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定义，而是一系列描述以及给人深刻印象的一些启发(总是喋喋不休地重复如下词汇：比如“差异”、“话语”、“讽刺”等等)。此外，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postmodernism/postmodernity)似乎同时存在于许多领域(建筑领域、不同的学科领域、对自我的态度方面)，因为差异、话语等词汇的使用是如此地不精确，以至于难以准确把握其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意义。

本章就两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强调了信息在“后”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我们需要探究大胆放言的，却令人困惑的后现代思想。首先，后现代思想家们在描绘这个新时代时强调了信息(和传播)。其次，一些最主要的“后”派学者，比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集中讨论信息的方式与其他讨论信息社会的作者们显然有别，此一差异趣味多多。他们既不是从经济

意义上，又不是从职业变迁的角度对信息进行集中讨论，他们也不关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信息流动问题。相反，他们是从象征和符号(symbols and signs)的扩散方面来强调信息的重要性。他们关注所有媒体形式的爆炸性增长和普遍的存在，从视频到有线，从广告到时尚，再到对体形塑造和文身的兴趣。所以，他们所关注的是当今生活能触摸到的一些特征和特性，我们被这种生活所萦绕，甚至是沉浸于此类符号和象征的海洋中。后现代主义对此问题的关注与大量的关于信息社会的思想相当一致，其同样值得我们深刻考察。

相应地，我希望在本章讨论的问题是信息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了深入探索而领悟其关系意旨，讨论特别聚焦于让·鲍德里亚、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和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等思想家，他们尤其着墨于后现代主义的信息方面。但是，在这之前，笔者尝试以开门见山、明辨道理的路径定义后现代主义。此非易事，因为我们很难去识别否定本质之存在的事物之本质。最后，本文再评论视后现代主义为社会和经济变革之结果的观点。在此，思想家们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更模糊一点还包括)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把后现代性视作一种情境(condition)，此一情境是社会分析家们考察社会经济变化的必然结果。

我们需要一目了然的是这些构想了一种后现代情境(或许这可被称为后现代性)的学者们，与那些后现代思想家们如鲍德里亚等迥然有别，后者拒斥那些努力利用已确立的社会科学传统来解释现实的学者们的整个研究路径。也就是说，我们会区分大卫·哈维(1989b)和后现代思想家们的不同立场，哈维认为我们能够构想出一种后现代的现实(reality)，而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我们的确身处于与过往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称为后现代，正因为其与过去不同，那么我们必然怀疑正统的社会解释是否还可以确切阐释当代社会的变化。笔者稍带有一点哲学意味的观点可能在此刻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当我们提及一些后现代学者们的分析时，此论点就举足轻重了：以正统的——或是现代的——社会科学视角去考察这些后

现代学者们对当代社会的描述，会影响人们支持他们世界观的意愿(Best and Kellner，1997)。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智识的运动(intellectual movement)，又是一种极为平常的活动，当我们看电视、穿好衣服准备外出或者是听音乐时，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后现代主义。无论是高深的智识运动，还是寻常的生活起居，两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抵制那种看问题的现代主义方式。当然，如此斗胆之言论，它宣告后现代主义与传统的决裂，要打破几个世纪以来都处于统治地位的思考范式和行为方式。

的确，如此放言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术语“后现代”和“现代”的含义。不幸的是，许多相关的思想家们要么在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没有很明确地阐述它们的含义，要么只集中讨论了他们所认为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在社会科学领域，“现代性”一般来说是指一系列科学、工业和思维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通常称之为启蒙运动的诞生，它使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在欧洲走向了终结，并对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现代性宣告了与现代性的断裂(fracture)。

与上述观点相比，有些评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应更多地被看成与文化有关，因为其主要染指艺术、美学、音乐、建筑、电影等(Lash，1990)。在这些领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要比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更包罗万象。而且，如果我们把自身限制在文化领域，我们会不太愿意去宣告与现代主义发生了断裂，因为现代主义——以首字母 M 为标识——指代的当然是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一些艺术运动，如印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无调性主义等等，此类艺术运动本身与古典文化就势不两立、分庭抗礼。现代主义乃指发生在绘画、文学和音乐领域的一系列运动，它们有别于古典形式，在于后者致力于生产再现现实的文化。例如，想想 19 世纪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们(狄更斯、艾略特和哈代)所开创的“伟大

传统”(great tradition),他们都致力于讲述来龙去脉清晰、感染力强、“像真实生活一样”的故事;或者想想肖像时代的那些油画,其中的大部分都以逼真地描绘客体为目标。现代主义作家如乔伊斯和现代主义画家如毕加索则与他们的先辈们分道扬镳。

在讨论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至少会遭遇到两种困难。第一种困难是如何勾勒出后现代的时间编年。现代性大约在17世纪中期就在欧洲出现了,现代主义却是更近期的事,而它反对的对象古典文化本身却产生于现代性时期。现代性早于现代主义,再加上现代性是一个包含了一些极其广泛的变化(从工厂生产到思维方式)的概念,这使得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至少这是造成严重的概念混乱的一种原因。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后现代性划分的附属要素(subsidiary element)吗?

第二个问题是后现代主义,我们将会看到,并没有宣告一种与现代主义文化原则的彻底决裂,因为处于后现代主义核心的,同样拒斥再现的文化(representational culture)。如果仅仅局限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念范畴讨论,很可能会认为“后”指涉的含义相对来说是比较次要的,只限于相对来说很窄的一些生活领域,从本质上说完全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前提之上。与那种完全拒绝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宣言相比,如此范畴讨论的概念的宏图大略和雄心壮志都逊色很多。

区分现代性/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看起来似乎有用武之地,因为对于分清辩论者的议题取向尤其帮助多多。但是,不幸的是,这样做收效甚微,因为虽然大部分讨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们,的确集中讨论了文化现象,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局限于此一领域。与此相反,由于他们认为文化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键,于是转而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性本身的决裂。于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开始迅速地从对时尚和建筑的讨论,转向对现代性的所有表现形式的批评,因为这些表现形式主张再现了存在于它们的象征形式之后的某种“现实”。例如,后现代思想家们坚决反对电视新闻声称要“告知事物本身的状态”、再现“真的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矫饰。他们同样坚决反对社会科学要逐渐累积关于人们行为方式的正确信

息的主张。从痛斥那种要以一些象征形式去再现现实主张的文化领域到思想家们关于去发现变化的主要维度的假设，后现代主义始终坚持现在与三百多年以来盛行的思想的彻底决裂。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需要过多地担忧后现代主义被限制在文化领域，因为许多后现代主义人士自身都没有显示出同样的不安。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智识运动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现象被宣告是一种全新的现象，是与现代性本身的决裂。

后现代主义的智识特征

作为一种智识现象(intellectual phenomenon)，后现代学术的主要特征是对启蒙运动思想传统的分庭抗礼，这种思想传统试图找出社会发展或个人行为潜在的理性。而后现代主义深受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影响，其深切质疑那种把世界的发展看成是一种进步的描述——例如，认为世界发展是“现代化”(modernisation)的基本过程；后现代主义也同样反对声称能够发现人类“动机”的基本原因，从而对个人行为有所解释。

后现代主义彻底反对任何试图按照上述逻辑或者类似的方式去解释世界的尝试，这些尝试都希望能够找出支配变化和行为的某种理性。启蒙思想家们假定他们可以找出行为和变化的潜在理性(经历了这种变化，或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的人可能察觉不到理性)，这种假定正是他们与后现代主义者们的不同之核心。

这种异议通常是通过后现代主义者对他们所谓“总体性解释”(totalising explanations)——或者，采用利奥塔的术语，“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的敌意得以表达。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论述现代世界形成的流派，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辉格党(Whig)的观点，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把发展的主要动力归纳为如下因素：比如“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进化的力量”的论述，这一切都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抵制。无可否认，这些或者类似的分析都坚持不懈地强调人类发展的主要趋势和主题——主要的理性(the

main rationalities)。后现代思想家们从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抨击了现代性的理性。

第一种也是被重复提到的拒斥论点认为论述只不过是理论家的构建,而不是对历史过程的准确研究。启蒙运动的假定认为可以通过一种可靠而无偏见的方式去了解世界,但凡接受此假定的学者们遭到了挑战。有人指责他们所发现的理性只不过是他们个人观点的表达,而不是对真实历史运行的描述。如此批判司空见惯,属于后现代思潮的公理。简言之,后现代主义者们指责所有对知识的正确性的外在主张(external claims)根本不成立,因为学者们必然会对他们所见所闻进行解释,而在解释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构建"知识的过程。

第二种和第三种拒斥论点显示,反对现代性并非微不足道的哲学意义上的势不两立。因为,宏大叙事自命不凡其能够揭示发展的"真理",但这恰恰暴露了它们自身的偏见,因为宏大叙事研究的逻辑结果是一些关于某种应该会发生(或者可能会发生)的社会变迁的方向的建议(如果常常是暗含的建议)。而且,不仅指责那些对社会变迁的"总体性描述"只不过是计划和组织现在和将来的序幕;他们还抨击这种"总体性描述"已经被历史发展的过程证明不具可信度。

上述讨论相当地抽象,不如以实际案例论证。例如,一些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显示,发展最有效的推动力是以最小的投资寻求最大的回报。很明显,这些研究试图找出支配此一变迁的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理性。这种理性在某些历史时期或者在某些社会中并不发挥作用并不要紧,因为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ity)常常被看作是对一种决定性的历史方向(historical directionality)的偏离。仔细思考一下,如此研究历史的路径非常明显地存在于许多"现代化"理论中,我们会发现其路径趋向于在对过去历史的描绘中寻求其对未来和现今政策的借鉴。它暗示那种"少劳多得"(more for less)的理性会继续盛行,规划者们应该经常(如果不是一直)承担责任—— 促进和操纵一些事件以保持一切都按照正常轨道运行。这的确是许多发展理论家们所考虑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在已经了解到支持西方经济增长的

成功理性的基础之上，他们试图去影响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后现代主义论者谴责那些声称他们能够突出变化的推动力的分析家们心存偏见。根据并不缺乏，如分析家们的学说以及吸收了如此学说的政策，早被频繁地证实不具说服力——例如，有人认为上述学说损害了那些"欠发达的"世界（想想沙漠化、酸雨、过度城市化、依赖于经济作物的经济）；由于存在反生态偏见（anti-ecological bias），"少劳多得"的理性危及了生活在"行星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物种的生存；对应用现代科学实施农业奖励的承诺导致了社会混乱、被取代的农场工人的失业以及对远方的市场的依赖。

马克思主义声称历史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是"阶级斗争"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在识别支配社会变化的理性时，显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认为这些理性最终会被一种更高级的理性所取代。他们主张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将会建立起来，它会很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这种观点从他们的历史研究中获得了支持。

对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比如利奥塔，最近的历史不只是致命地破坏了宏大叙事，也同样令所有的启蒙理想荡然无存。法西斯主义、纳粹实行的种族灭绝、超级发达的军事技术、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能事故、艾滋病、心脏病的流行、环境引发的癌症等等，所有这一切（还有更多）都是对启蒙的扭曲，也是过去坚称强调变化的某些理性是可能的，不管是通过"国家主义"、"阶级斗争"、"种族纯洁"来体现，还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来体现的一些"叙述"（narratives）造成的后果。考虑到这些后果，后现代主义者们发动了一场"针对总体性的战争"（a war on totality，Lyotard，1979，p. 81），彻底遗弃了认为自己能发现历史的"真实"推动力的世界的描述。所有自认为能够洞悉历史变迁的"真理"的主张"已经丧失了可信性……不管它是一种推测性的叙述还是一种关于解放的叙述"（p. 37）。

于是可以看出，后现代思潮特别怀疑那些认为自己能够从任何一个方面识别"真理"的主张。鉴于早期宏大叙事的显著失败，鉴于每一种叙事都确然是一种构建，所以不管学者们声称他们具备怎样

的客观性，后现代主义都迅速地超越了只是对总体性理论的怀疑。通过采取相对主义原则，通过支持对世界进行多元的描述，通过坚称“真实”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不同版本的“真实”，后现代主义有力地否决了总体性理论。如同福柯(1980)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关于真实的体制，它的关于真实的‘一般政治学’，即它接受并使之如同真实存在一样运行的话语(discourse)类型”(pp. 131—132)。在这样的环境中，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他们自己要脱掉追寻“真实”的启蒙紧身衣，反之要强调分析(analysis)、说明和解释的差异的解放性内涵。

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特征

在社会领域，后现代主义智识批评(intellectual critique)被吸收、重申和扩展。在此，我们所要讨论的不只是后现代思想家们，还包括那些描绘后现代生活的各种环境。要想理解后现代情境，我们并不需要接受那种对启蒙思想的后现代批评。显然，如果我们的确在步入一个后现代世界，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在社会领域中找到后现代智识观察(intellectual observation)的回应。而且，既然本书的所有读者都处于这样一种后现代文化之中，他们将会希望通过他们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来检验如下描绘。在我看来，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识别后现代特征并不十分困难——尽管要我们全盘接受后现代思潮并非易事。

在谈到智识攻击的视角时，对社会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进行分析的出发点是其对所谓的(并不精确)现代主义原则和实践的敌意(Kroker and Cook, 1986)。在此，现代主义是囊括一切(catch-all)的术语，但凡如计划、组织和功能性(functionality)等，都是现代主义的产物。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反对暗含着由某些群体——策划者、官僚和政客——进行的任何安排(arrangements ordered by groups)，这些群体声称他们拥有某种权威(拥有专业技能、更高级的知识或者“真理”)，因此可以把对他们有利的“理性”强加于别人之

上。例如，那些认为他们能够识别“真正的”时尚、能够为我们制定怎样穿衣和怎样呈现我们自己的标准的设计师们，发现他们的特权地位被后现代文化挑战。此外，功能性也在这个意义上遭到了抵制，“最有效率的”建造房子的方式并没有体现一些技术专家型建筑师或者城镇规划者的某种“理性”，而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专业人士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之上的尝试。

显而易见，后现代倾向嘲弄任何处于权威地位的个人的判断。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主式妄自尊大，具体表现为后现代随便就对为我们设定标准的人评头论足，横加指责。在此，尤其需要赘言，后现代主义对于美学中被普遍接受的“品位上乘”(good taste)和“伟大的传统”(great tradition)的反感和厌恶。例如，富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里维斯(F. R. Leavis，1895—1978)在他那本给人启迪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中，自信地选录了英国最好的小说家比如简·奥斯丁(Jane 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作品。对于里维斯来说，上述著作可称得上经典之作。后现代主义者们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声称“如果杰弗瑞·阿奇尔(Jeffrey Archer)是你的最爱，那些文学教授又算什么？哪里需要他们来告诉你谁又更为经典呢？”

那些在过去制定标准的人遭到了例行的公开谴责。所以或许里维斯会自信地坚称他的“正确判断”来自于对英国小说的非常仔细的阅读，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会迫不及待地论证说那些文学批评家们是通过他们的批评来谋生，他们的写作使他们获得了职业晋升和名望(所以他们几乎从来都不是无偏见的真理追寻者)。而且，这些批评家们的评价严重依赖于特定的假设、教育背景和阶级偏好(以里维斯为例子，通常都认为他是地方主义的，终生对剑桥效忠，他相信伟大的文学能够引导我们走向一种理想化的虚构的“朴真的社区”)。简言之，通过这种方式，批评家们的偏见被暴露了，于是他们试图把他们的判断强加于我们之上的主张也难以立足。

在撩开“正确的”思想家们的面具之后，后现代文化强烈主张一

种美学相对主义(aesthetic relativism)——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差异都受到了鼓励。这条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Twitchell，1992)：音乐("谁说莫扎特比冯·莫里森高级?")、服饰("Jaeger 看起来并不比 Next 好，只是比它更贵")和现场艺术("为什么莎士比亚应比安德鲁·洛伊德·韦伯更经典?")。在此，解放性的言论充斥后现代，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tyranny)，这些专制力量试图为人们的生活制定一种"正确"的标准；后现代文化反对此类"专制"，它是通过多样性、狂欢(carnivalesque)以及无限的差异性而繁荣昌盛。所以，例如在住房供应领域，Wimpey 房地产以及高度密集的塔式大楼(由那些认为他们了解什么才"是对人们最好的"以及/或者"什么才是人们需要的"设计师们所设计)遭到了抵制，另一种鼓励人们个性化家园的风潮取代了前者，通过在这儿增加一点，在那儿推倒一面墙，增添各式各样的令他们感到愉悦的东西，把那些批评他们品位差的人抛到脑后，从而颠覆建筑师的设计。

在这种冲动背后，当然是否定现代主义者对"真理"的寻求。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抵制对"真理"的寻求，因为这些"真理"的定义者们，比他们的动机还要复杂。而且，"专家"之间还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争执，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还存在可去发现的唯一的、不可否认的"真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抵制寻求真理，因为显然对"真理"的定义很容易转变成专制的诡计。在学校里，我们必须阅读狄更斯和哈代，因为"文学标准"的制定者们认为他们的作品有被包含进课程的价值(而大众化的科幻小说、爱情小说和西部小说却被排除在外)。另外，每一个英国人都应或多或少地看过 BBC 的电视，而文化监护者自认为 BBC 的电视节目属于上乘之作，值得生产，如许多新闻和时事节目、优质的系列剧、"优良的"叙事性作品、有限的体育节目，以及适当的儿童节目比如《蓝彼得》(*Blue Peter*)等。本书的大量读者都应当曾遭遇到规划者和建筑师对他们的房屋所施加的限制，或许我们这些在城市住房中长大的人尤其有此体验的共鸣。

后现代思潮反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存在的只是"真理"的不同版本，追寻"真理"了无意义。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者们拥护差异、多

元性以及“行无不可”。于是，导致了现代主义者们所狂热追求的流派和风格（曾几何时，它们被用来识别有价值的艺术和高尚的品位）遭到了后现代思潮的拒斥，他们的自负亦遭到了嘲弄。这与后现代热衷的滑稽模仿（parody）、对现存风格的吹毛求疵的反应、一种讽刺搞笑和随意拼凑的模仿模式相去不远。结果导致后现代建筑愉快地抨击了被普遍接受的风格，著名的是“向拉斯维加斯学习”（Venturi，1972；Jencks，1984），或是把西班牙式的木结构与哥特式外表结合起来，或是把平房式设计（ranch-style design）与威尼斯式的装饰（facings）结合起来；后现代着装会赏心悦目地把紧身裤、马汀博士（Dr Martens）长筒靴、印度项链、马甲和具有民族风格的短衫混穿。

最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文化放弃了对“真实性”（authenticity）的追求。我们列出一系列反复成为后现代文化拥护者攻击目标的词汇，便于理解“真实性”意义，如“真实”（the “genuine”）、“意义”（meaning）和“现实”（the “real”）。每一个术语都证实了现代主义要识别“真理”（true）的必然诉求。例如，正因为有此诉求的冲动，促使凑巧听到某种音乐的人去寻求音乐的“真实意义”；也促使人们寻求一种“地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够还原出“一个原汁原味的英格兰”（甚至是“真实的自己”）的“根源”（roots）；更促使人们去寻找一种“美好生活”的“真实的哲学”。后现代主义对上述追求嗤之以鼻，一开始接触到它会觉得它有些荒谬，但它的连贯性却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以拒斥所有现代性的事物为出发点，后现代主义赞颂非正宗的、表象的、转瞬即逝的、微不足道的以及声名狼藉的虚假的事物。

由于两种主要的原因，后现代主义绝对不渴求真实性。第一个原因我们已经以一定篇幅详细阐述了：对“真实的”意义的坚持是一个幻想，所以那些希望寻找到“真实性”和“真实”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只存在“真实”的不同版本。我们不能侥幸于发现一个真实的狄更斯，因为我们是作为21世纪的公民去阅读他的著作。再如，我们对潜意识和儿童性欲很敏感，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以一种不同于狄更斯及其同年代读者的方式去解读小内尔（Little Nell）的性格。此外，并不存在一种“真实的”解释，披头士（Beatles）歌曲的真

正意义，对于不同年龄和拥有不同生活经历的听众来说，其意义的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果这种对寻求真实性的反对是坚持一种解释的相对性，那么我相信第二种反对原因更加激进，甚至更是后现代情境所特有。抨击者声称不管人们在何处追寻真实情境，都会徒劳无获，因为它在那些渴望它的人的想象之外，根本不存在。人们会认为，在某个地方——朝思暮想处，或天涯海角，在某个时代——存在“现实”(the real)、“真实”(the authentic)。而且，当它被发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满足，因为我们发现了真实(the genuine)(自身的真实、这个时代的真实，或者某个国家的真实)，这种真实将与肤浅而虚伪的事物分庭抗礼，对抗洋溢着“时髦”、“作秀”和“都是为了钱”的当代世界，这些物欲横流的浅薄追求都是我们抗拒的对象。

以如今流行的人们通过追溯家族史来寻根的行为为例。现在许多人都付出极大的努力去详细考察他们的族谱，试图从中找到他们自身的起源。这种尝试建立真实性的通常表现是重新移居到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之前离乡背井的故乡。当他们到达清教徒们逃亡出来的村庄时，当他们到达那些饥民们逃出的爱尔兰村庄时，当他们到达犹太人们被驱赶进去的波兰犹太人区时，这些寻根者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的当然不是真实：更可能是一种对清教徒谷仓式教堂“一模一样”的重新建构，一种“真实的”土豆晚餐(potato dinner)(如果想要，还有冷却过的黑啤酒和优质葡萄酒)，一个新建立的带有中央供暖系统和计算机化的家族史记录的犹太教会堂。

你渴望找到“真正的”英格兰吗？那片精心护理过的“绿草如茵、赏心悦目”的旷野，田园牧歌般的牛群，未曾被改变的风景，石灰粉刷过的乡间农舍，有墙壁的花园和真挚的邻居？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高速公路的建造、房地产以及那些只在一个地方居住大约一年便搬走的人们的威胁。在那个地方人们可以找寻到“真实的自我”，发现他们的“根”，找到能让我们接触到我们的祖先们的真正英国式的生活吗？但是让我们仔细看看英国的乡村生活——欧洲最城市化的乡村——我们能找到什么？农业经济、高科技耕作、养鸡房中的母

鸡以及由一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经常往返的人们所带来的“被遗弃的村庄”。这些人在乡村留下了他们那些被完好地维修的地产(它们通常超出当地居民的预算)。在他们的房屋中装有预置的中央供暖系统,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供暖系统打开;同时,他们也从超级市场上购置了制冷器以在乡村和他们以城镇为中心的办公室之间来回驾驶他们的 4x4s/SUV 汽车(这是可靠性和乡村崎岖的工业标志)。这些新来者们已经处于重新建造“传统”乡村的前线:他们抵制工业的发展(这能使一些曾经的农场工人重新获得工作,他们已经被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园艺科学所取代);他们拥有必要的资金去重新建造从前的铁匠谷仓(通常这是第二个家——拥有所有现代化的生活设备);他们在支持一些历史协会上是最积极的(协会为乡村宅邸)拍摄了许多精彩的褐色照片,显示出“在我们如今如此珍爱的地方,生活曾经是如何美妙”;当然他们也重新复兴了一些像莫理斯舞(morris dancing)和乡村工艺(比如纺纱和编织)之类的“传统”(Newby, 1985, 1987)。

在此,关键要点并非要嘲讽对现代乡村生活的热望,而是要坚称对“真实的”英格兰的找寻大谬不然。我们只能够构建一种看起来能够再现另一个时空主题的生活方式(在没有绝对的饥饿、贫困和艰苦的情况下,大部分乡村居民都能够生存)。必然,这种对一个假定真实的生活方式的构建本身就是不真实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建构了什么。只要看看人们从什么地方去寻找真实性,就会明白这种找寻将会遭到挫败。许多人指望“传统”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提供一种居所(place)和确定(surety)的感觉。传统的确具有某些抚慰作用;它能在不确定的时候提供一条基本原则,一种潜在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可以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中成为精神支柱。但是英国传统——围绕着圣诞树的圣诞节,火鸡和装饰品,牛津和剑桥的划船比赛,温布里的决赛,“正宗的”麦酒和“地道的”酒馆,或许最重要的是拥有一种能够往回延伸至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血统的君主政体——很容易作为一些“发明”而被展现出来(Hobsbawm and Ranger, 1983),而这些发明大多都始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阿尔伯特王子

(Prince Albert)发明了"典型的"英国圣诞节,决赛是最近的发明,酒馆是为了激发一种对理想化时代的怀旧情绪而设计出来的,啤酒是通过现存的最现代的方式生产,而在英国盛衰交错的历史中,君主政体也遭到了急剧的变化和重组。

真实性并不存在;只存在对真实的建构(不真实)。以旅游者的体验为例(Urry, 2001),一些小册子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洁净无瑕的"海滩、"必须游览的"场所、"与众不同的"文化、"名副其实的"地方风情以及"地道品味"的广告。但是,旅游的体验却是不真实的,从开始到结束,它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在希腊:它是海滩上的咖啡馆——有着丰盛储存的冰箱内装满了大陆啤酒(Continental beers);传统的音乐和舞蹈——在CD机中播放着最近的乐曲,侍者们以一种简单化的步骤接受了培训,他们被教导着要"促使旅行者们参与";真正的希腊食品——其实这些食品都是在微波炉中烹饪,储存在冰箱中的,很多东西合在一起以去吸引客户们的味觉,而同时保持了一丁点"地方"(茄盒和薯片)风味;没有被大都市所腐蚀的乐于助人的当地居民——他们在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中受到过培训;那些特别的旅游景点——为了旅游消费而被开发且得到了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刻意打造的"旅游泡沫"(tourist bubble),确保旅行者们只会体会到一些令人愉悦的经历,避免接触到一些不好的事物,比如,当地人正在忍受的臭味和不卫生的环境。而且,甚至即使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真实的地点,旅行者们的出现侵入了这个环境,并且必然改变了它原初的状态(一种理想化的"原汁原味的"文化;存在了几百年的仪式,而只要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大部分仪式都只不过是一种"扮演的真实性"[staged authenticity]; MacCannell, 1976)。此外,旅游业是一个大产业,其运行有道——飞机必须客满,旅馆的房间必须被预订(旅馆的标准必须要符合那些来自富裕社会的游客们的期望,所以需要提供淋浴、干净的床单和空气调节装置),人们才会心旷神怡。所有这些都需要安排、人工修饰和不真实的环境打造(Boorstin, 1962, pp. 100—122)。

尽管意大利和法国之流的国家在旅游者心中永远保持着一种幻

象，游客对之有独特的兴趣，但并非只有他们会雕琢环境，这在英国也非常普遍。实际上，英国建造了一批博物馆和建筑物，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这不仅仅是为了支持一个庞大的旅游产业，也是为了表达它"真实的历史"(Hewison，1987)。在这种创造和发展英国历史的过程中，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处于核心的地位。在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名义下，"遗产工业"致力于建造、重建和刷新历史。想想这些例子，比如位于达翰姆(Durham)郡的碧迷西工业博物馆(Beamish Industrial Museum)、位于约克郡的约维克中心(Jorvik Centre)、艾恩布里奇(Ironbridge)和牛津故事(the Oxford Story)。后现代主义者们声称，如此之多的旅游景点在被布置的时候都声称是要使生活"如同它本来的样子"被呈现出来，鉴于这种构建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损害了真实性，反讽之极也。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在某些方面，上述例子并不比开放供参观的豪华古宅之类的古老遗产更加不真实。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帝国战争博物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和巨石阵(Stonehenge)同样不真实，因为我们从来都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过去。这不仅仅是因为所有这些是如此地依赖并且如此之深地影响了当代生活，以至于破坏了真实性(保存的现代方法、机动车、电、专业指南等等)；还因为一切再现历史的尝试本身就是对过去的解释，本身就是建构，所以无真实可言。例如，想想那些描绘历史学的争论，历史学是全男性化的表述(all-male account)吗？或它会包含女性的经历(她历史)吗？它是不是只是关于战争和征服的帝国史？它在视角上是盎格鲁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只包含一个短暂的时期或者只关心长时段吗？它强调的是社会还是政治，是关于国王和王后的历史还是关于普通人的历史？直率地说，历史的多样性否定了现代主义学者试图叙述一种"真实的"历史的雄心壮志，这颠覆了大部分遗产事业渴望达到的目标。

所以，后现代时代拒绝任何认为"真实"是存在的主张：没有什么是"正确的"和"真实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打造加工而成，并不存在"真实的英格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传统"。真实性只不过

是一种(不真实的)构建,一场骗局。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现代主义者们喋喋不休的迫切问题——"这是什么意思?"(what does this mean?)——了无意义。在每一个这样的问题之后隐藏着一种观念,即真实的意义(true meaning)是可被理解的: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圣经》真正意味着什么,建筑师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设计一幢大楼的含义,生活在拿破仑战争年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一个女孩穿某种类型的上衣时她希望传达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真实的意义并不存在,只存在不同的解释(罗兰·巴特称之为多义分歧的论点)时,那么,一个富有逻辑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放弃对意义本身的寻求。后现代观点认为寻求真实简直徒劳;但是,后现代论者非但没有对此感到绝望,反而建议我们放弃如此寻求去体会存在的快乐。例如,或许你不知道怎样使一个特别的发型有意义,或许你会感到困惑因为你的每一位朋友都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它,但这又怎样——去享受这种外表吧,不要指望它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法语的愉悦(jouissance)一词表达了此意,它的一个通常出处是康德(Kant)的《判断力批判》(*Critque of Judgement*, 1972)。康德指出崇高(the sublime)是在认识到某事物的美丽之前便在它身上感受到的快乐;而后现代主义者的中心思想是,当每个人都认识到意义的无限性时,我们同样应放弃对任何意义的渴望。如同涂鸦一样,不要想着能找出猫王(Elvis)在《浪子泪》(*Jailhouse Rock*)中试图唱出什么,它"只是摇滚乐",所以站起来去感受那种节拍吧。

而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又何苦对意义的放弃忧心忡忡?与我们一样,普通人同样清楚地意识到,发现"真实的意义"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他们同样意识到每一个情境都会产生多重的意义,意识到对真实的寻求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因此,人们不会急于找到最近电影的真实意义:他们会满足于享受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有趣、无聊、娱乐、从家务事中逃离、向伴侣求爱的一个机会、晚间外出、讨论的话题……

现代主义的狂热者们担忧"电影的意义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

子民放弃了如此久远的渴望，而满足于在体验的多重快感中陶醉。类似地，后现代旅行者们非常了解他们得到的并不是一种真实的体验；他们鄙视那些销售“真实的”饰品的精品店，那些在海滩上晃荡的拉拢寻求性事者的皮条客，那些位于偏远角落却声称提供最新的录像带、流行音乐和饮料的舞厅的虚伪。旅行者们完全了解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但他们依然满足于在假期去旅行，参与造就安排有序的事件，因为他们在假期所期望的是“快乐时光”、“快乐”，他们不关心“意义何在，也不关心这些食物、人和环境是否真实”（Featherstone，1991，p.102）。

在较早一些时候，我观察到后现代主义非常强调差异性——诠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此与抛弃真实性的信仰有所关联。例如，后现代观点鼓励人们拒绝精英主义（elitisms），这种精英主义主张教授孩子们一种统一的、丰富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或者一种文学的“伟大传统”。所有此类主张都被拒绝接受，因为它们涉及太多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太多的关于某个特定群体施加权力的例子。但是，后现代文化远不止于此，其主张另有深意：例如，他们认为文学和历史会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因此能把作为公民的我们聚集起来，但凡人们没有受到如此教育与熏陶，那么文化也就碎片化了。一方面，这是因为“共同文化”的认识，不管是阿诺德意义上的“所说过和所想过的最好的事物”，还是仅仅指“所有对我们的社会有价值的事物”，共同文化通常是排他性的权力表现，并且是强加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群体之上的权力压制（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对于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工人阶级和当代英国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那种担心文化碎片化的观点，假定人们会很困难地在一个破碎的环境中生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面临的事物缺乏一致性和整体性，那么我们便会体会到疏离感、焦虑和沮丧。

但是后现代视角因差异性而繁盛，所以，它同样因碎片化的文化而百花齐放。例如，阅读一些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同时也听雷盖音乐（reggae music），这有什么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文化监护者（cultur-

al custodians)擅自告诉人们他们应该阅读什么，看什么和听什么(当他们偏离了所指定的著作和判断时，他们至少会感到一丝内疚)。在这种道德监管之后隐藏着的是一种现代主义忧虑，认为碎片化是有害无益的。后现代文化反对这种观点，弃绝了对“真实的意义”(“英国风格意味着你熟悉这个历史、这些小说，以及那些诗歌”)的寻求，认为人们可以享受并且正在享受这种碎片化，并没有因为相互冲突的讯息和价值观而烦恼。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赏心悦目、欢乐庆典的多样来源，无需任何意义：霓虹灯、法式烹饪、麦当劳、亚洲食品、比才(Bizet)、麦当娜(Madonna)、威尔第(Verdi)以及弗朗兹·斐迪南德(Franz Ferdinand)，混杂的快乐来源备受青睐。

此外，很容易理解，在现代主义对一种碎片化的文化的忧虑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对自我本身正在受到威胁的担心。这种担心假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的自我”(real self)、一个真正的“我”(the authentic “I”)，它们应该是一致的，统一的，应该受到保护以免暴露于一些与之彻底迥异的文化符号之中，受到干扰。例如，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怎能保持他们的自我意识，如果他们在阅读柏拉图的著作之后去赛狗？一些重要的思想家怎能在支持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Tottenham Hotspur Football Club)的同时，还能沉浸在他们的学科中？基督徒们怎能在享受色情的同时，还能践行他们的宗教伦理？一些可敬的人们怎能在板球运动中作弊？一个人如果他同时拥有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韦恩·鲁尼(Wayne Rooney)和伍迪·艾伦(Woody Allen)等多样化的模范角色，他又如何才能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呢？

后现代文化并没有致力于去化解上述矛盾，而是否定了一个基本的真实的自我的存在。后现代观点坚称对一个“真实的我”(real me)的追求，预先假定了一种潜在的意义(an underlying meaning)和真实的存在(an authentic being)，但这些都不存在，所以不值得去追求。反之，后现代认同我们在广大的社会中和自我一己之内与差异共存，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对意义的忧虑，把“正直诚实”(integrity)和“道德”(morality)之流的限制性概念抛诸脑后，而用“快乐”(pleas-

ure)取而代之。后现代观点重复提到只有知识分子们才会担心“自我”的碎片化,而平庸凡夫却非常高兴地去享受快乐时光,并且不会被沮丧所烦扰,只因为一些书呆子们相信我们的“真实的自我”将陷入混乱。

与一种沉迷于人工雕琢和表面现象的文化相适应,后现代主义与城市生活最紧密地相关。后现代文化赞颂浅薄,藐视曲高和寡的深入分析,它们更愿意寻求“现实”而不是快速的变化、好玩的事物(the playful)以及时尚的不确定性。再没有什么地点能比城市与后现代文化更合拍的了,城市包容人造品、不同风格的碰撞、对变化和折中主义的开放、多样性和差异性、对固定性的缺乏、对感官的持续刺激、不同文化和不同外地人(strangers)的混合(正是这些外地人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经验和视角,从而毁坏了确定性,并带来了新的风味和快乐源泉)。与之相关的是后现代性对速度以及一种不断加速的文化的步伐和混乱的认识,它们正在侵入意识领域并在持续不断地使之动摇(Virilio, 1998)。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创造了一个术语“速度学”(dromology)来描述如此情形,这与高度复杂的军事技术的扩张有关,其正是 2003 年初对伊拉克的“威慑”式入侵中所体验到的军事技术类型(Virillo, 2005),破坏稳定,持续不断而且难以抵抗。

最后,后现代论者敌视一切试图去揭示事物的“真实意义”的人,他们强调普通人的创造性和玩家本性。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以决定论的解释说明行为的来由,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分析富有特色的一点是他们对行为的描述通常自圆其说,而不是深入行为当事人的解释,好像只有他们才能洞悉他们的研究对象的真实动机以及基本的推动力。例如弗洛伊德式的言论,认为在这么多行为背后都存在着性动机(sexuality)——不管研究对象们会有什么感受;再如女性主义者们对妇女经验的描述,常常显示出分析者们首要关注的是妇女“真正需要的”,不管她们研究的女性会如何建议,那都无关紧要。

如同我们所见,后现代主义者们反复重申知识分子们并不比大街上的男人和女人更有权利去识别“真理”。许多知识分子普遍杞人

忧天，他们担心人们正在受到愚弄，正被一些操纵他们的政客、无价值的娱乐以及消费主义的诱惑牵引着远离“真理”。同样地，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如此担忧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傲慢（知识分子们自己的履历至少受到质疑，当不同的知识分子对“真理”有不同的看法时，他们有什么权利声称他们能够洞悉“真理”?），同时也是无稽之谈，因为凡夫俗子也能像任何一位知识分子一样去观察和创造，何苦还要听命知识分子的叫嚷？在一个只存在真理的不同版本的世界中，人们拥有巨大的能力去创造一系列不受任何控制的意义，甚至是在创造意义之前，早就游刃有余，对自我遭遇与经验的另类用途驾轻就熟。

在一本包含万象的著作中，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1984）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奇巧之处，若干例子说明了凡人富有创造性的冲动。由此，我们明白知识分子们断言他们比普通人能更明察秋毫时，他们是在说谎。德·塞尔托认为，甚至从那些最常规的事物和活动中，人们都能持续不断地并令人印象深刻地创造出不同的意义、用途和快乐。例如，对于德·塞尔托来说，像驾驶一辆车这样的普通行为都是一种特别令人惊异的展现创造性的舞台：可以慢速行车、往返、加速、低速驾驶、周末驾驶、单人驾驶、在驾驶时思考、在驾驶时幻想、放音乐、休息、观察其他驾车人。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们怎么敢强行认为他们有特权去了解普通人们在想些什么，或者甚至是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呢？

当读者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们不会感到惊讶，后现代主义最讨厌试图去识别任何现象的本质特征的主张。“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激发了后现代主义者们想起他们所熟悉的对妄自尊大的现代主义假定的谴责，即分析家们可以无偏见地认识到“真理”；一个有特权的观察者能认识到隐藏于事物表面之下的特征；一个更有能力的分析家可以建立起核心的意义；那些非常努力并且花了足够长的时间的研究者们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真实要素（authentic elements）。

因为笔者并不同意后现代思想，仅概要性地回顾一下作为一种智识现象和一种社会现象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要素，包括：

- 对现代主义思想、价值观和实践的拒斥。

- 反对那种认为可以识别“真理”的观点，理由是只存在“真理”的不同版本。
- 拒绝对真实性的追寻，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不真实的。
- 拒绝任何试图去识别意义的追寻，因为意义是无限的（这颠覆了对意义的追寻本身）。
- 赞颂解释、价值观和风格的差异性。
- 对快乐、愉悦和崇高的强调，强调感性经验优先于分析。
- 喜欢肤浅的事物、表面现象、多样性、变化、拙劣的模仿、讽刺和模仿作品。
- 认识到普通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这否定了对行为的决定论解释。

后现代主义和信息

讨论至此，与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后现代主义的第一类回应，来自于论者坚持认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语言是描述现实的一种工具，这种现实与言语和文字相分离。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们断言这是一种“透明的迷思”（myth of transparency）（Vattimo，[1989] 1992，p. 18），因为它对这种事实视而不见：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现实”是符号（symbols）和影像（images）（信息）。换言之，我们不能通过语言去认识现实；反之，语言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现实。正如米歇尔·福柯曾经指出的，“现实并不存在……语言是一切，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语言，我们是在语言中说话”（引自 Macey，1993，p. 150）。

“语言从来都不单纯”（Barthes，[1953] 1967，p. 16），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导致的后果如何，可以在文学批评中找到例证。曾几何时，批评家们认为他们的职志是辨明一些路径（ways），比如仰赖此一路径，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来获得一个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更清晰的图景，或者可以通过阅读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短篇小说去考察男性气

质，或者是考察 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所受到的教养是如何的熏陶他后期的写作。这些批评家们的假设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家的语言了解到语言背后的现实(一个历史时期、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家庭背景)。他们的雄心是尽可能谨慎地——尽可能明晰地，于是尽可能客观地——阐明语言的这种功能。这些知识分子们认为，无论是对艺术家，还是对批评家来说，写作的清晰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首要任务是通过语言看清存在于语言之外的现实。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罗兰·巴特在与著名的批评家雷蒙·皮卡德(Raymond Picard)的论争中攻击了清晰性的假设，当时(1963，1964)在法国文学界掀起了激烈的论战。巴特以莱辛(Racine)的一部作品为例，后者是法国古典文学的象征，他首先反对那种认为莱辛的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具有内在清晰性的假设，其次他坚持认为所有的批评路径在他们的评论中都发展并吸收了某些元语言(metalanguages)(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元语言的论点颠覆了批评家们自身希望通过使文本产生的历史环境更易被了解而去改善文本的任何抱负(Barthes，1966)。当然，在此，巴特的中心观点在于“语言不是透明的”，写作与透过语言去了解存在于彼的现象无关，它只是一种制造语言的行为，首先是作者，然后是批评家们制造此类语言。

当我们意识到巴特和其他一些人把他们的原则(语言是我们了解的一切现实)扩展到更广泛的学科领域(从历史到社会学科)时，这场文学论争与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的相关性就变得明显了。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内，他们努力去分析刻画特定对象的“措辞体制”(phrase-regime，Lyontard)。于是，他们质疑其他知识分子们所主张的真理，并提出了另一种研究路径——把对象作为一种语言问题(matters of language)(或者，采用他们喜欢的词汇，话语[discourse])来研究的后现代路径。

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巴特(1979)把后现代研究路径应用于解释当代世界中极为多样的现象，从政客、摔跤运动员、电影、时尚、烹饪、广播、摄影到杂志文章，他一直是把他的讨论对象当作某种语言类型

来讨论的。沿着巴特的思路，我们会发现，如果现实是一种语言/话语的问题，那么我们所经历、遭遇和了解到的任何事物都是信息化的。没有什么是透明的或清晰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语言中建构的，必须在语言之中才能被理解。总之，我们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只不过拥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反之，我们栖居在信息化的世界中，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与对信息的思考之间的一种相关性认识。

让·鲍德里亚

让·鲍德里亚(b. 1929)大概是最著名的后现代评论家，他详细阐述并讨论了能在一些思想家比如罗兰·巴特(1915—1980)的作品中找到的原则，并把他的讨论与信息领域的发展联系了起来。通过强调他讨论的主题和洞见，我们可以对后现代主义与信息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鲍德里亚认为当代文化是一种符号(signs)的文化。如今，几乎任何事物都是某种表意(a matter of signification)，这显然与媒介的爆炸性增长有关，但这同样与日常生活行为中发生的变化、城市化和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关联。我们只要看看周围就能理解其观点：在每一处，我们都被符号和表意的各种模式笼罩。我们醒来之后开始听广播、看电视、阅读报纸，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来自立体声系统和磁带的音乐所萦绕，我们以符号化的方式来设计我们自己，穿具有符号意义的衣服，利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手工艺品来装饰我们的家，为我们的身体喷上香水以传播(或者避免传播)特定的信号，乘能传达某种意义的交通工具去上班(它们包含能够持续传播符号的系统)，吃充满各种表意的膳食(中式的、意大利式的、素食的、含脂肪的)，经过和走进向世界传达出某种符号的建筑(银行、商店和学校)。

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社会都要求使用符号，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怀疑如今我们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的表意的海洋中漂浮。虽然前工业社会拥有复杂的地位层级、复杂精美的宗教仪式和华丽盛

大的节日，但是生存的严峻、地点的固定和惯例限制了符号的使用。如今，我们再也不用在相同的地点与相同的一群人交往，选择一种相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与陌生人互动，通过符号我们向他们展现出部分的自己——例如，作为汽车上的一位乘客，或者是作为牙医诊所的一名病人，或者是作为一家酒吧的顾客。同时，通过我们的报纸、书籍、广播、MP3 播放器、手机、电视和互联网，我们接收到来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讯息。

这是让·鲍德里亚的出发点：如今的生活展布于永不停息的符号流动中，包罗万象的符号囊括了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与新闻有关的符号）、人们期望展现出的身份（关于自我的符号）、个人地位（关于地位和尊重的符号）、某些建筑是为了什么目的（建筑学的符号）、审美偏好（墙壁上、餐桌上和餐具柜上的符号）等等。正如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1991）（赞同鲍德里亚的评论者）所观察到的，我们的社会充斥各类，这体现了“我们的时代与以前的时代之间……的截然有别。在一个小时的电视收视中，一个人可能能够体验到比一个生活在非工业社会的人一生能够体验到的还要多的影像”（p. 58）。

但是，借用居伊·德波（Guy Debord），1977）以“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对一代之前特别显著特征的描述，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的情境主义者们（situationists）对此话题津津乐道（Hussey，2001），毕竟获得了其他思想家们的注意，他们反对后现代标识以及任何认为符号的饱和（sign saturation）宣告了一种系统性变化的观念。鲍德里亚和其他持有同样观点的思想家们远远不局限于仅仅言说现在流行如此海量的符号传播。实际上，他们认为后现代文化还存在其他一些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后现代与过去决裂。

当我们回想起一个现代主义者会怎样解释“符号超市”时，甚有助益于我们的深入理解。我们在前面一些章节讨论的思想家们，比如赫伯特·席勒和尤金·哈贝马斯都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表意（signification）的爆炸性增长，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这些表意被熟练使用，它能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生存处境。这些研究路径认为符号存在着许多不足，如果可以纠正符号的缺失，那么矫枉过正的符号便会有

助于促进一个更加公共的社会(a more communal society)和更民主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从现代主义解释中,显而易见的是批评家们认为他们能够识别在符号中存在的扭曲,也就是说,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如果改进符号的局限性,那么拓展符号至更加真实和开放的情境,尚有可能性。例如,这些学者们经常哀叹电视上放映了许多肥皂剧,他们的理由是这些肥皂剧是逃避现实的、琐碎的,并且是对日常生活方式的非常不真实的描述。如此批判言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观点——可以制作更加真实的叙事性节目在电视上放映。同样地,例如,现代主义学者们不懈地试图去识别新闻媒体歪曲真实的事件和问题的方式,言下之意为——真实的新闻报道可以实现。有关时尚的现代主义论题如出一辙,在风格和式样的选择上,年轻人被一些不合适的模范角色和商业贿赂(commercial venality)所误导了——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未阐明的信念,即可以追寻到更加地道的时尚。

但是,鲍德里亚从来都不渴求"未受到扭曲的传播"和"真实",他认为,既然任何事物都只是一种表意,那么无可避免地任何事物都只是一种人工雕琢和打造,因为毕竟这才是符号。现代主义批评家们会坚称在符号背后存在着某种真实,或许此一真实被一些不可靠的符号所遮蔽了,但它们依然真实存在。但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只有符号是存在的。所以,人们不可能逃避人为打造的环境,假装能够逃避这种不真实毫无意义。例如,观众们在收看电视新闻节目时,会以为那些符号再现出了他们所不了解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但只要稍想片刻,我们就能够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只是事件的一种版本,被记者的接触范围、道德价值、政治倾向以及是否能接触到新闻事件和人物所形塑的一种版本。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轻易地说明电视新闻再现的不是"现实",而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构建——学术研究者们常常着手进行的一项任务,并且对于那些以一种后见之明来回顾录制的新闻节目的任何人来说,多么显而易见,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还能够主张在符号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真实的"情境?对于鲍德里亚来说,"现实"伴随着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符号而

开始和结束，任何对媒介符号的批评不可能提供一种更加真实的新闻版本，只不过提供了自认为能描述存在于符号之外的现实的另一套符号。

鲍德里亚更加深入地拓展了媒介符号如何被建构的洞见，他断言如今每个人都了然于胸——即符号的不真实性是后现代文化中一个公开的秘密。换言之，以前或许有人会认为符号是再现的(representational)(符号指示了其背后的真实)，但现在人人皆知符号只不过是模拟(simulations，Baudrillard，1983a)。例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广告或许能真实地展现特定对象的性质。但事实并非如此，广告显而易见的不真实呈现常常激起了一些现代主义批评家们的愤怒，他们主张揭露广告对事实的扭曲，例如，某种洗发香波带来了一种性诱惑，或者某种含酒精的饮料能够促使一个人擅长社交等等。现代主义者直接揭露了广告商的诡计(虚假的联系、深层心理学等等)，其抨击的立场秉持两种假设：首先，他或她有特权去发现广告商的欺骗行为，而大部分消费者蒙昧无知；其次，能够设计出广告的一种真实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广告便可以真实地反映产品。

鲍德里亚反驳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普通人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相比，见识比肩，例如凡斯·帕克德(Vance Packard)就和肯尼斯·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一样有智慧，但是普通人嫌麻烦不想对此小题大做。他们当然意识到广告仅仅是广告，它们不是“真实的东西”，是虚假的，只是一些模拟。每个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都知道可口可乐并不会“教世界唱歌”，李维斯的牛仔裤并不能使人到中年的男人摇身一变为年方 20 的魅力帅哥，箭牌口香糖并不能带来令人激动的性体验。所以，我们何苦忧患广告，因为“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ies)(Baudrillard，1983a)根本对广告无所挂怀。

鲍德里亚的确声称人们喜欢广告，但他们并不是因为广告试图传递的任何讯息而去喜欢广告的，当然也不是因为他们可能会被广告说服在看过广告之后便去购买某种产品；他们喜欢广告只是因为广告能够带来快乐。广告“犹如景观且令人陶醉”(Baudrillard，1983a，p. 35)，仅此而已。谁知道谁又在乎福特、健力士(Guinness)

或者本森-海吉斯(Benson & Hedges)的广告表达了什么意义呢？我们可能(或者不)只是享受观看这些符号的体验。①

与此类似的情况，想想哈贝马斯教授在表达对当代民主社会中政治的包装的忧虑时，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代主义焦虑。对于像哈贝马斯这样的批评家来说，对政治信息的操纵到如此程度，怎不令人叹惋？政客和他们的公关顾问为应付媒体采访所做的极度细心的准备(排练、简报、扮演出来的事件、无记录的讨论、为了展现出一个好的形象而选择的化妆和着装、媒体顾问在政客们展示他们的政策和内阁成员时扮演了一种不相称的角色)应受到谴责。批评家们开门见山或含沙射影地指责政客的品质，要求政客应该是正直诚实、意见开放、真诚直率，而不是躲藏幕后，以一些误导性的和虚假的媒体"形象"矫情虚饰。

鲍德里亚以两种论述回应现代主义者的指责。一方面，他坚持认为要求媒介符号正确再现政治和政客，简直就是幻想，痴人说梦而已。媒体不可避免地只能再现某些议题、特定的人物和有限范围的政党。无关别的原因，单单是时间的有限性就意味着政治报道只能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问题和政治立场。再加上政客们倾向于向媒体施加压力以发布有利于他们自身立场的报道，对于媒体要精确无误地再现政治而遭遇的困难，我们相当容易理解此情此境实在无法克服。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体聚集起各种报道以向公众再现政治的事实，其意味着任何另类的再现(alternative presentation)只是另一种模拟。在一个电子媒介时代，我们只能拥有一种模拟的政治(simulated politics)。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主张——既然每一个人都知道情形是如此，那么人们也就无需烦恼，因为我们可以忽略符号的存在，我们都知道符号虚假，所以我们仅仅享受符号景观，大可不必在意讯息，一看媒介符号就心照不宣地推论："不过是政客们再次粉墨登场上电视了"。

由公众的此等见识推想，忽略媒介符号不就等于宣告了"意义"的

① 这是心照不宣地为再现讽刺、幽默开心与滑稽取笑的广告制作者所分享，嘲弄看过广告而被说服购买宣传产品的受众的盲目。

死亡"(the death of meaning)？如果人们意识到符号只不过是模拟，所有可想象得到的一切只不过是另类的模拟，那么任何模拟都可以，或者也都不可以。于是，我们可以得出鲍德里亚的结论："我们生产出了极其丰富的影像，不过，其中没有什么可看"(Baudrillard，[1979] 1990，p. 17)。如果"大众们"(masses)意识到符号仅仅是模拟，那么我们就和极其丰富的无表意符号处于同一世界。我们拥有的符号没有意义，不过很"壮观"(Baudrillard，1983a，p. 42)。人们可以去观赏符号、体验符号，或许会喜欢符号，但其毫无意义可言。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

笔者用来举例说明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文化概念的例子，大部分来自于媒体，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表意领域，也就是人们一提及信息爆炸时最容易想到的领域。但是，意识到鲍德里亚的言论很重要，他认为媒介景观和表意的社会无处不在，甚至比一个正在疯狂扩张的媒体要更深地渗透进社会世界。为了洞彻其中的深意，让我们回想起如今一切都是符号：服饰、体形、酒馆装饰、建筑、商店陈设、汽车、兴趣——这一切都严重地信息化了。此外，现代主义论者趋向于以一种潜在的真实性来考察符号事物，例如对特定体形的人来说，存在着一种正常体重的标准；商店可以按照某种特定方式来陈设，顾客们可以最方便和最不引人注目地找到他们所需的产品。不过，鲍德里亚拒斥了此类观点，他的理由，我们并不陌生，也就是认为现代主义对真实的寻求，简直大谬，因为所有这些符号都是模拟(simulations)而不是再现(representations)。

他的意思是，比如，体形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是人们可以塑造和设计身体的符号。如果你想象一下如今体形的可塑性(通过节食、运动、服饰，甚至是通过外科手术)，你就会认识到人类身体的可塑性。现在，现代主义大概会采取两种立场回应：要么指责人们对体形的痴迷会导致他们逐渐远离他们"真实"的体形(这给人们尤其年轻女性带来了重重焦虑)；要么指责人们拥有一种不适当的体形，不利于维持他们"真正的"健康("true" health)(或许应该少吃一些)。无论哪种言论，现代主义者所呼吁的是一种真实的而不

扭曲的体形，不合时宜的模特与过度饮食者是扭曲体形的案例，他们忽视了关于饮食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的专业建议。

鲍德里亚的回应是他不认为存在一个真实的体形，关键在于如今我们都在遵守一种不变的食谱（我们都在从丰富的食物中挑选我们食用的食物），而专家们本身也对健康和体形之间的联系问题意见分歧，而且，在一个充满选择的时代，我们也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体形。在这种情况下，只存在一些不真实的体形，它们只是一些模拟。这些模拟既没有再现“真实的”/理想的体形，也没有与之违背，体形就是身体外观，只是一些缺乏表意的符号。如此言论可以通过询问如下问题来检验：如今体形意指（signify）什么？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它的意义已经坍塌，恰恰是因为人们知道了不管什么类型的体形符号都是不真实的。例如，如今一个苗条的体形意指什么？美丽？厌食？自恋？健康？妄想？体形正在丧失意指能力，在丧失了意指能力之后，它只是一种可被体验而不是一种可被解释的符号。

在此，鲍德里亚所反复重申的是一种关于符号的社会建构主义言论。也就是说，如果现象属于社会建构，那么它们就是模拟，在它们之外并不存在“真实”。这解释了鲍德里亚的著名论断，即迪斯尼并没有象征性地再现位于娱乐中心之外的真实的美国（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论断，认为迪斯尼神话般地再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于是在参观者们正忙于娱乐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陷入某些意识形态的圈套）。与此相反，鲍德里亚认为，迪斯尼是使人认识到模拟的一种方式，这种模拟是现代美国的全部：关于美国的一切都是人工雕琢、建构和创造，从小镇的大街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司办公室。鲍德里亚声称，所有这一切都是超现实的（hyper-real），符号（通常具有物质形式）不指代任何事物，只指代它们自身。他的评论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 迪斯尼乐园被展现为一种虚构的幻象，以使我们相信余下的世界（the rest）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它周围的洛杉矶和美国都不再是真实的，只是一种超现实和模拟的状况。
>
> （Baudrillard，1983b，p. 25）

在后现代时代，现实和非现实、真实和不真实、正确和错误之间的区别已经崩塌了：当一切都不过是人工雕琢时，这种确定性便不复存在。所以，“具有历史意义”的小镇、“海滨胜地”和“娱乐”城都是超现实的，因为它们与一种根本的现实无关，旅游胜地和娱乐只是一种伪造，在它们自身的模拟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真实性。所以，与现代主义者一道去寻求“真实”，愚蠢之极，他们认为可以在伦敦塔或黑池塔(Blackpool Tower)中找到这种“真实”的想法，纯属幻想，因为在这些符号之后并不存在任何真实性。与之相反，那里存在的一切就是这些不真实的历史遗迹。它们属于超现实的“由一种缺乏起源和真实性的关于现实的模型所生产”的超现实 (Baudrillard, 1988, p. 166)。

在这种情形下，鲍德里亚提出了一个与之联系的观点，其建立在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970)在 20 世纪 30 年代轰动一时的思考艺术的“机械化生产”首次提出的论断基础之上。本雅明声称，随着电影、印刷术、摄影和广播的出现，艺术曾经从它的唯一性(uniqueness)(只有一幅米开朗其罗的《大卫》，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是建筑装饰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获得的“光晕”被毁损了，因为在它最初产生的环境之外，艺术作品可以不断被复制。鲍德里亚的观点比本雅明的观点更深入，他发明了一个术语“拟像”(simulacrum)来指代 “缺乏原件的复制品”的符号。如果你购买一个 CD 机或下载一首曲子到你的 iPod 中，原作(an original)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如果一个现场音乐会的录音带被销售，你便会了解到它已经在录音棚中被小心翼翼地“合成”和“处理”了，那么它与实际演出之间的关系也就微不足道了。同样地，关于一部原版电影或视频的观念也不敏锐，在一个“拟像”的时代，再思考真品和原作有什么意义？

既然上述观点已表明真实的不存在，在“真实被废弃”(Baudrillard, 1983a, p. 99)之处，符号也丧失了意义(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说，意义被“内爆”[imploded]了)。尽管如此，我们何必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一直都会记起后现代的万应灵药，即无论如何观众都有颠覆

讯息的能力。现代主义者们会担忧“沙发土豆”式的电视观众和旅行者，观众缺少电视批判能力，而旅行者参观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景点，摄影留念一番，继而在“完成了例行之事”之后，并没有欣赏到“真正的东西”而离开景点。不过，此类言论，严重小瞧了普通人的创造性——实际上，电视观众们一直都是活跃的，他们积极地切换频道，与伙伴们聊天，打电话或者大声叫嚷着一些不尊敬的或不相关的评论；而当旅行者们在游览国家历史博物馆时，他们一直都在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做白日梦，好奇为什么导游看起来像一位亲戚，准备晚餐，与其他参观者们交谈，默想梁龙(diplodocus，恐龙的一种)是不是曾经有过牙齿。受众对有意图的传播符号(intended signs)并非缺少抵制能力，我们大可断言：后现代观众决非现代主义者们如此惧怕的“文化傻瓜”(cultural dopes)，迄今为止，实际上，他们没有听到和看到任何东西，只是体验到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景象。

吉安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

意大利哲学家和欧洲议会曾经的成员吉安尼·瓦蒂莫(b. 1936)声称媒体的发展对预示后现代主义的来临尤为重要(Vattimo，1989)。信息从此到彼，再到各处的爆炸性增长是电视、电报、视频以及其他媒体形式的一个特征，它破坏了现代主义对“真理”和“现实”的信心。瓦蒂莫认为，虽然在思想阵线上，启蒙信条已经被一些另类历史诠释成功地挑战，同样媒体的扩张也削弱了任何对单一思维方式的更普遍效忠。

如下情形在现代主义思想家中很普遍，即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哀叹“大众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变得如同牧群一样(herd-like)，他们被提供同质化的娱乐和宣传节目的媒体所灌输。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的读者们，自会意识到此类悲观的景象，而且保守主义批评家如 T. S. 艾略特、弗兰克(Frank)和昆尼·里维斯(Queenie Leavis)对电影、广播和大众化发行的报纸产生的影响，一样感同身受(Swingewood，1977)。

与悲观言论相左，瓦蒂莫认为媒体的扩散使不同的团体、宗教和国家拥有了发出声音的机会，发表的观点是如此多样化，以至于观众们要面对的问题和事件的“真实”与“观点”逐渐增多。如今，“任何类型的少数派都拿起了麦克风”(Vattimo，[1989] 1992，p. 5)，他们传播的世界观使各种各样的关于“真实”的观念崩塌。瓦蒂莫认为如此境遇带来了自由，因为对真实以及与之相关的说服信仰(“你必须做这件事，因为正确”)丧失了。当媒体每天都向你展示对于某些事件的许多相互冲突的解释和对于什么事件值得回想的许多相互冲突的界定时，你怎么会再相信有“真实”或“正确”的存在？

当广播和电视再现多样化的现实(社会性别的、宗教的、文化的、种族的、政治的和美学的)时，差异便成为每个人关注的重点。在非常多样化的符号的轰炸之下，人们感到迷惑和动摇，不再确定任何一件事。但是，这实际上带来了解放和一种确定无疑的后现代，人们的体验再现出“摇摆、迷惑和游戏的特征”(p. 59)。就此言论，瓦蒂莫与鲍德里亚的立场，何其一致。符号的多样性有些自相矛盾地破坏了符号的意指(signify)能力，给人们带来了景观、无意义和来自真理的自由。注意，瓦蒂莫是在互联网的大规模流行之前发表上述观点，而互联网所带来的聊天群、博客、即时消息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壮观的景象，无疑为他的观点增加了可信度。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马克·波斯特(b. 1942)，一个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作为根据地的美国人，是鲍德里亚的一位长期的学生和译者。他认为后现代时代迥然有别，因为现代时代以“信息模式”为特征 (Poster，1990)。其论点值得探索，时代最基本的变化来自于信息的发展主题在鲍德里亚的著作中已有详细阐述，波斯特不但有所提炼，而且还强调了后现代时代的新奇性。

波斯特认为信息技术的扩张(于是带来了以电子媒介为中介的信息扩张)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思考自身的方式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Poster，1990，p.8)。为了详细阐述此一原则，他提出了一个建立在不同类型的“符号交换”(symbolic exchange)的基础之上的变化模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1. 面对面互动的口述(oralism)时代。在那时，生活方式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自我植入群体之中，符号也与这种固定的生活方式相符合，符号交换就是阐述已经被社群所了解和接受的事物。

2. 书面交流(written exchange)时代。此时代的符号担任一种再现的角色，自我被认为是理性的，个人对自我负责。

3. 电子中介(electronic mediation)时代。在这个时代，符号是信息化模拟(informational simulations)，它们的非表征特征至关重要。在此，自我是“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不稳定情景中去中心化的，分散的，多重身份的”(p.6)，在一种“多重身份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回旋(Poster，1994，p.174)，因为“能指的流动”(flow of signifiers)才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特征，而不是指示某个特定事物的符号。

波斯特认为一旦人们描述和思考别人对他们的期待，他们就会发展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主意识，并且特别会通过写作去描述在他们之外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而在现在这个后现代时代，模拟的扩张已经粉碎了先前的确定性。人们不再相信在符号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现实”，自我被碎片化，不再有重心，而且再也不能分辨出一种客观现实。尽管如此状况中的人们失去了地方传统，但同鲍德里亚和瓦蒂莫一样，波斯特把这视为一种解放，因为“再现的危机”(Poster，1990，p.14)导致了一系列不能意指的符号，这最终使人们从“真理”的专制中解放出来。

波斯特(2001)支持后现代主义对“真理体制”(truth regimes)的反抗，这与他对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热情是一致的。在他看来，那些能不受任何阻碍而任意使用互联网的“网民”(netizen)取代并且超越了“公民”，后者的权利和义务在现代是通过民族国家行使的，这些权利和义务被某些国家利用以向西方以外的世界强加西方的价值观。波斯特认为启蒙时代所推行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是一种支持了殖

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话语。既然全球化推翻了民族国家，互联网许诺了更进一步的解放，那么这种自由的核心要素就是拒绝对公民权利的要求。

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在此，审视利奥塔(1924 -1998)的著作，尤其是时候，因为他的著作特别关注真理的主张是怎样被后现代发展所颠覆。而且，他在讨论的进程中，聚焦了信息化趋势，他声称正是信息变化引起了人们质疑真理的存在，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此外，利奥塔与前述三位思想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得出了与他们类似的结论，但是他的出发点却与他们不同。虽然鲍德里亚、瓦蒂莫和波斯特强调了符号(尤其是在媒体中)的迅速发展，利奥塔却另辟蹊径，他对信息和知识的角色和功能的变化更加高度概括，且深刻剖析。

这位法国哲学家认为在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知识和信息正在被深刻地改变。首先，它们日益只有在它们符合效率和效果的要求时，或采用利奥塔的术语，在“表现绩效原则”(principle of performativity)盛行时，才能被生产出来。这意味着只有在符合效用标准(utility criteria)时，信息才会被搜集、分析和生产。这或许可被看成是一种“系统”倾向(“systems” orientation)，其倾向决定了什么将会被了解。“系统”的“程序”默认信息/知识只有在它们具有实用价值时才能够被生产出来。由此，信息/知识具有与计算机类似的特征(此外，只要可能它就会被转换成数据——绩效指示器——这样，它就会最易被量化，而它的绩效也就最易被测量)，这种机制致力于“使全球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最优化——换言之，绩效优先”(Lyotard，1979，p. 11)。此外，与其他系统一样，它也以一种自我延续的循环为特色：其运行需要知识/信息，且又决定了何种知识/信息将会被生产出来。

其次，在此，利奥塔认为其马克思主义背景显露了，因为他论述知识/信息越来越被当作是一种商品。此前，我们已经看到赫伯特·

席勒的著作对此主题炉火纯青的讨论，与席勒的观点相同，利奥塔认为信息日益成为一种可交易物，受到市场机制的支配，而市场对绩效的判断具有决定性影响。

这两种作用力综合作用，甚至足以宣告一种后现代情境的来临。首先，表现绩效原则的运用意味着在效率和效果上不合格的信息/知识会被贬低，或者甚至会被抛弃。例如，从表现绩效原则看，美学和哲学在绩效上很容易被判断成难以达标，而金融和管理将备受青睐，得到支持。于是前者必然会遭到降级，而后者必然会得到提升，在学科内部，更具有实用价值的领域将会比其他领域获得更多的支持。例如，对技术转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对市场具有实用价值，于是研究资助机构比如 ESRC(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便会认为技术转化研究更值得支持，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的“宗旨”要求它所资助的研究应为产业的竞争力做出贡献。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的兴趣比较另类或者不实用(根据绩效标准来评判)，那么他就会遭到排斥。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作为一名政府部长，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就呼吁应把支持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资金转移到一些更加实用的学科，应该从那些“研究古埃及手稿和上沃尔塔流域(Upper Volta valley)的人”手中拿走资金，以应用于产业界认为比较实用的研究主题。如今在英国，在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问题时，考量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已成既定的正统观念。

其次，现代主义崩塌的信号——知识开发(knowledge development)正日益转移至大学之外，传统上在大学里有一群隐居的精英们安于一种寻求“真理”的使命。挑战传统大学支配地位的是一群智囊团(Cockett，1994)、私有公司的研发部门，以及基于效率和效果而生产和使用信息/知识的压力集团。例如，评论家们现在认为“公司课堂”(corporate classroom)与美国的大学和学院一样举足轻重。很容易列出一些重要机构的名单：如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IBM 的研发部门以及辉瑞公司(Pfizer)，后者雇用了几十名博士，除了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以及指导他们工作的原则不同，许多观察家

认为该企业看起来“就像一所大学”。

而且，在企业之类的替代性知识/信息中心和大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变得更容易，这表明高等教育已经从内部嬗变，它越来越与绩效标准相一致。如果我们回溯任何发达经济中的高等教育历程，便可勾勒出同样的趋势：实用学科更上层楼，而很难展现“绩效指标”（体现了它的实用性）的学科却日渐萎缩。三十多年来，在英国高等教育中迅速繁盛起来的是如同法律、计算机、商业和管理之类的学科；如今每一所英国大学都以在有限范围内的一些学科中，拥有一些受到赞助的教授职务（sponsored professorship）为豪；大学为公司提供培训项目甚至是批准私下创设的课程变得越来越平常；大学承受着持续的压力，即通过向学生们传授“能力”和“可转化的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使教育与雇佣的“真实世界”的就业市场“更相关”，这些“能力”和“可转化的技能”可以使学生们成为更有效率和效力的雇员。

利奥塔把这个论断扩展到了整个教育领域，他坚称这个领域如今的动力来自如“它怎样才能增加我的潜在收入？”和“这怎样能为促进经济竞争力做出贡献”。这种转变不仅对学校和大学产生了影响，而且改变了教育的概念本身。在利奥塔看来，表现绩效原则意味着教育不再被视为人生独特的接受知识的阶段，反之，教育被当成一种职业，工作需求强烈地支配了这个领域。利奥塔（1993）论述道，“知识不再作为一个整体而一劳永逸地被传递……反之，它是成年人的‘菜单’，他们要么已经工作过或者将要工作，他们来接受教育的目的是改善自身的技能和增加升迁的机会”（p. 49）。这是对当今正统教育政策的重复，而“终身学习”和“弹性”在此类教育政策中是支配性的口号。

第三个方面是由于教育已被重新定义，导致真理长期以来确立的概念被摧毁了，绩效和商品化使人们从效用的角度来定义真理。真理不再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也不再是大学为之仰慕、憧憬的圣地；反之，各类追求绩效和商品化利润的机构之实际需求定义真理之内涵。这种发展是后现代主义的决定性要素，因为用“真理的多元性”

(plurality of truths)来取代了“真理”,意味着再不可能有任何人以任何标准合法地裁决真理本身。引用利奥塔(1988)的话,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真理只是一种“措辞体制”(phrase regime),根据人们谈论真理所运用的各类术语定义其意义。

从此而论,传统大学(一度是合法的知识定义者)的衰败,和与之相关的知识分子的衰败,正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Bauman, 1987)。利奥塔认为,无论关乎人文,还是普通大众,或是启蒙、无产阶级,或是其他,知识分子都应该以一种“普遍的”热望来追求知识。毋庸赘言,许多知识分子就该抵制以绩效为标准的专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嘲笑以实用性来指导信息/知识的发展者,认为他们“仅仅是技术匠人”。知识分子们反对技术专家们只在“与某种运行相关的输入/输出……比率”(Lyotard, 1993, p. 4)的范围之内工作,而他们通常渴望为更广大的对象研究、写作和讲授。

但是,在教育界之内和之外,知识分子们的辩解听起来日益显得空洞。这部分是因为资源的缺乏,资源的分配变得困难,并且无可避免且富有争议地减少了。但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这是自战后以来(至少)知识分子们存在的理由不复存在造成的结果。在此的要点正是知识分子们自认为他们更有特权接近真理,并且拥有一种总体性视野的主张已经被颠覆。如今,如果有人认为某个特定的学科、职业或者志向要比其他学科、职业和志向优越,那么人们会普遍认为此一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党派性的主张,不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理性的“措辞体制”。与旅游学、公共关系和商业管理在英国大学中激增的程度一样,任何来自学术界的人认为他们的学科——哲学、英语或古代文明——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为学生们提供了能接近真理的开阔路径,能使他们更了解“人类处境”,或者更能获取渊博的知识。如此结果,非实用学科的人少则遭受嘲弄,更为常见的是人们会指责此流言论简直不切实际,完全就是天真而无用的恃才傲物。

知识分子们曾经藐视“技术匠人”的坚定立场已经倾颓了,此一情形已广为人知。利奥塔宣称,没有人还以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由——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公民——去追求教育事业,虽然这曾

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普遍观念。历史已经摧毁了该观念的理性：如今“没有人会期望通过教育……去培养更文明的公民”，利奥塔论述道(1993)，“只存在表现绩效出色的专业人士……获取知识只是一种能带来更高薪酬的专业资格”(p. 6)。

第四，也是最后，绩效标准在信息/知识领域的应用，改变了什么人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段，接受教育意味着掌握特定的知识。但是，计算机化之后，数据库的掌握与运用比在大脑中储存信息更重要。在后现代时代，绩效性决定了“怎样使用终端”比个人知识迫切。所以，如“键盘技能”和“信息检索”之类的技能会取代传统的知识观念(并且学生简介也会证明电子技能，至少与更正统的学业成就一样受到了同等的重视)，因为“数据库成为了明天的百科全书”(Lyotard, 1993, p. 51)。

而且，数据库和使用数据库的能力更进一步削弱了传统精英们关于真理的主张。实际上，他们敲响了“教授时代的丧钟”，因为“教授在传授现有知识方面不再比电脑记忆库更有能力”(p. 53)。实际上，教授的实际运用能力与全面处理数据库的能力比团队雇员们还薄弱，而工作世界日益需要团队工作，为此需求形式做准备，学生们便会在一些“技能”比如“在团队中工作的能力”、“领导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受到培训和奖励。

现实变化的一切把我们带回到知识/信息的相对主义。对于利奥塔来说，绩效性、商品化以及“宏大叙事”明显失败，所有认为有特权去接近真理的观念遭到人们的拒斥。某些知识分子可能会对此感到绝望，但与后现代信徒鲍德里亚和瓦蒂莫一样，利奥塔(1993)认为此一趋势带来解放，因为，

> 普遍观念的衰落可以使思想和生活从“整体强迫症”(totalizing obsessions)中解放出来。责任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它们之间的不相容)强迫并且将会强迫重任在肩者……灵活、宽容和优雅。
>
> (Lyotard, 1993, p. 7)

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再次深陷入后现代文化。

批判的观点

上文讨论的每一位学者都是深信后现代思想的后现代思想家，他们还推崇如今时代存在所谓的后现代情境。笔者的困境是我能够接受大量与后者相关的判断（并不同意这标志着一种新型社会的产生），但是我不能赞同前者的立场，这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我对关于后现代情境的描述所做出的回应。在讨论到信息化发展（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的特征和产生的影响时，后现代思想家们的确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和富有洞见的观点。我坚持，如果不考量表意的中心性和特征（Baudrillard），不考虑到传播模式发生的变化（Poster），或是没有认识到现代媒体造就的多样化的世界观（Vattimo），或者说不领会绩效标准和商品化在信息领域的重要性（Lyotard），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审时度势地理解当代世界。

但是，后现代思想刚愎自用地将所有的知识相对化；坚称只有真理的不可穷尽的版本存在而没有真理本身，由此，我们需要扬弃后现代思想。最主要是因为论题本身的矛盾，它显示出了古老的克里特悖论（Cretan paradox）——“所有人都是说谎者”。我们如何能相信后现代的主张，如果认为所有主张都是不可信赖的？借用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话来说（1992），这是“超级空话”（metatwaddle）（p. 41），其不承认在分析家们的“话语”之外还存在着真理。

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提出一条“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来反对后现代思想家们，即在人们的想象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Norris，1990）。这并不是说，真理就在那里，如同星星一样闪耀。当然，真理必须在语言中建立，因为真理并没有向我们显露。但真理并不仅仅是语言游戏，并未因此而被颠覆。而且，尽管我们从未曾在任何绝对和终极意义上紧握住真理，但我们可以通过展示更好的论据形式、更可信的证据、对学问的更精确的运用以及通向研究对象的更可靠的方法论途径，来发展出真理的更充分的版本。如果不这样，那么

一个宗教狂热者所透露的“真理”与一个无偏见的学者所展示的“真理”应当等同(Gellner, 1992),这便陷入了一种能带来潜在性的灾难性后果的相对主义(Gibbs, 2000)。

正是绝对相对主义的坚持,常常使鲍德里亚的观点沦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蠢言。可以确定的是,在引起人们对新闻生产的关注和在提醒我们媒介符号的构建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所遭遇到的唯一现实(比如发生在伊拉克、科索沃和克什米尔的事件)上,鲍德里亚还是有功之臣。但是,当他继续争辩新闻只是一种模拟,除此之外不再是任何其他事物时,他做出了如此荒谬而夸张的论述以至于他的观点变成了谬论。他是荒谬的,因为显然所有称得上是新闻的新闻都有再现的特征,尽管新闻是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并不完美的反映,这可以通过如下手段得到证实:比较对相同问题和事件的不同新闻报道,或者/并且意识到的确存在着一个新闻采集者们对之做出回应的经验意义上的真实(empirical reality)。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坚持此一原则,即新闻报道是(能够)再现现实,惟其如此,人们才可以质疑哪些新闻具有可靠性(如果他们有怀疑),他们才能判断出一篇报道要比其他报道更准确和更真实。在我们开展这项比较的任务时,我们也能意识到我们正在区分出那些对事件的再现是更充分还是更不充分,更真实还是更不真实,由此而令要么存在一种“真理”,要么存在无限的“真理”的后现代论断成为谎言。

但是,比保持新闻报道具有再现特征这样一条原则更紧迫的,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新闻所报道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真实。新闻对经验世界的提炼自有成功之处,但如果拒绝承认经验世界的存在,我们就会落入鲍德里亚(1991)在评论海湾战争时愚蠢而不负责任的立场,除非我们记住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鲍德里亚坚持,战争开始之前,海湾战争(1991)从未发生,因为其完全只是一种媒介模拟,或者说,在事件结束之后,它仅仅只是一种模拟核战争的战争游戏(Baudrillard, 1992, pp. 93—94)。

这并不是要否认第一次海湾战争只被大多数人看成是一种信息事件,或者是要否认直到 1999 年的北约入侵科索沃、2001 年的阿富

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海湾战争为止，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受到媒体最大规模报道的战争。这也不是要忽视大量的媒介报道深深烙印着党派偏见，甚至宣传色彩。与之相反，只是因为战争新闻缺陷多多，所以我们可能想要了解这些新闻有多大可能性是再现现实的，又有多大可能能够区分更可靠的报道和不那么可靠的报道。例如，大多数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与欧洲媒体相比，美国媒体被认为是更倾向于美军以及这场攻击本身，因此美国媒介报道普遍没有质疑当局发动战争的合法性，而只是主观臆测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只是关注入侵军队将有可能造成伊拉克采取报复性的毁灭行动。这不是我的主观判断，而是通过系统分析、现有证据以及比较不同国家的新闻报道而得出的合理结论(Tumber and Palmer, 2004; Tumber and Webster, 2006)。此外，处于美国境内的领导性新闻机构，特别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几个月之后，新闻机构开始指责自身在2003年早期的几个月中的报道缺陷甚多。如果同意鲍德里亚的观点，我们就必须认为这些不同看法只是不同看法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沙文主义的福克斯新闻与《自由》(*The Independent*)的报道没有区别。这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这种观点同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与鲍德里亚的观点相比，已故的雨果·扬(Hugo Young, 1991)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他告诫他的读者要注意到“随处可见的电视”(wall-to-wall television)报道所传达出来的“真实的幻象”。告诫读者要注意“任何人都不能假设他们在任何媒体上听到的都是真实可靠的”，他继续指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同意依照半真半假的陈述来行动”便要求“记者应该坚持虚虚实实的报道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的确应该对新闻报道持怀疑态度，但这使得我们要更坚定地最大程度地去获取可靠的信息。如果我们最终相信一切战争报道都纯属虚构，缺少可信度，那么我们对于解决冲突争端，也就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因为媒介报道都沦为了语言游戏。

在一个“虚拟现实”技术(可以精确地模拟一些体验，比如开飞机

和驾车，以及潜在地还包括亲密关系）盛行的时代，以及在英国之流的社会中（遗产工业正在坚定不移地重建历史景象），鲍德里亚对寻求真实的理性提出的责难一呼百应。不过，再赘言几句，鲍德里亚的问题在于他一发不可收拾的相对主义，他拒绝区分不同程度的真实性。我们提议要区分不同程度的真实性，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些核心的具有永久真实性的事物，而是主张通过批评，人们可以区分出哪些现象更真实，而哪些更不真实（Webster，2000）。

最后，鲍德里亚主张我们只剩下要去体验而不是去解释的“景观”的论断，再一次反映了他对经验性证据的蔑视。无可否认，在当代世界，我们被暴露在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变化的符号之下，但是并没有严肃的证据能够证明可以抛弃意义。可以确定的是，这使得对符号进行清晰的解释变得异常困难，但其复杂性并不能贸然以为解释既然易变，那么解释本身不再可能或是必要。人们并没有被符号所笨拙化，并没有成为鲍德里亚所想象的愚蠢的“沉默的大众”。

马克·波斯特有许多观点和鲍德里亚一致，与此相关，他的著作也受到了许多类似的批评。不过，在此可以再次批判他的历史分析。波斯特主张历史由三部分组成——口述、书写和电子交流（electronic exchange），如此历史观具有强烈的技术决定论色彩，所以，我们已经如雷贯耳的批评也适合于评价他，即他的言论实在是对历史的不尊重（Calhoun，1993）。

当然，吉安尼·瓦蒂莫警示我们关注媒体扩张所导致的多重视角，这个提醒很中肯。电视让我们看到来自其他文化以及来自我们自己的社会体验（Meyrowitz，1985），这些体验可以引发我们挑战现状并且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不过，稍稍留心若干的经验证据，我们就会发现视野论调缺陷相当显著，因为一切证据清晰地显示某些视野——特别是美国视野，然后是欧洲视野——比其他视野获得了更多再现的优势（Tunstall，1977）。我们都在说好莱坞支配了世界电影业，美国电视占据了其他国家电视节目的大部分，或者说摇滚乐大体上是发源于伦敦、洛杉矶和纽约，但我们并不是主张其他视野都被忽视了。与此相反，我们认识到其他文化也受到了关注，甚至在此发

出了声音——例如，想想饶舌音乐和城市电影，通过少数族群的视野，它们可能展现出另一种生活。

但是，承认媒体急剧扩张，的确丰富了主流视野之外的景观，但并不等同于说媒体就为大众提供了“多重现实”。与此相反，情形肯定与学者赫伯特·席勒反复论述与批判的现实一致，即媒体再现何种视野必然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也就是说，尽管一些文化可能在媒体上发出声音，但这种声音却受到了扭曲，它们通常以一种媒体公司认为适宜和可接受的方式被包装起来，最重要的是，它们很可能是——或者已经被制造成为——迎合市场的产品，由此而限制其他视野的媒介再现机会，比如中国视角和乌克兰视角获得大量播放时间的潜在可能。

对瓦蒂莫的评价，也适合于运用对其他后现代思想家的一种基本批评，即瓦蒂莫的论述中缺乏一种致力于评估媒介产品的经验性分析。他认为如山似海的媒介内容带来了许多“另类现实”(alternative realities)。但是，我们的分析应该超越不言而喻的道理，应该展示出视野的变化(以及使用媒介的局限性之所在)，以及对这些视野的不同再现机会。这当然需要对权力进行分析，而后现代思想家们断然忽视了权力分析(虽然他们声称权力到处存在)。

虽然利奥塔的作品对绩效标准的影响和信息/知识的商品化的论述给人以启迪，但同样显著地存在着权力分析的缺乏。人们很容易在一个很广泛的领域中看到绩效性和商品化的影响：技能性书籍(“how to”)和“畅销书”支配着出版业；在电视领域，带来广告收入的“收视率”(ratings)是成功的关键测量标准；在研发活动中，投资者们所追求的是“市场卖点的解决方案”(marketable solutions)，科学家们被迫签署版权弃权书，在专利呈递中，“知识产权”受到保护。或许最重要的是，利奥塔重新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教育领域(无疑这是“信息社会”的核心领域，但是经常被忽视)，他论证绩效标准以及事务的日益商业化对教育事业的入侵(Robins and Webster, 1989; 2002)。

但是，利奥塔的主要问题在于他的结论——所有知识的可靠性

都荡然无存，一个适当的回应是庆贺我们从真理的“专制”中解放了出来。如此惬意的放纵似乎遗忘了引导且会继续引导绩效性和商品化扩张的权力和利益。而且，如果有人想要识别权力和利益的过程和作用，他就会描述出至少暗示了以另一种方式组织社会可能性的现实：“这就是社会的真相，之所以真相如此，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真相有所不同。”简言之，这就是秉持启蒙运动的理想，即追求另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的理想。

一种后现代情境？

无可否认，后现代思想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影响深远，特别是影响了关注信息问题的分析家们。此一思潮弥漫于社会学、文化研究和传播研究领域，其中像利奥塔和鲍德里亚之类的学者——最显赫的是福柯，不胜枚举的学者频繁地引用他们的论述。显然笔者承认后现代思潮的贡献和影响，虽然我很不赞同后现代思想。后现代似乎太经常地自作聪明和不负责任，它在恶作剧式地质疑一切事物时显露出了一种极端的愉悦，而同时它又不能区分问题的相关性和证据的质量。所以，后现代主义显示出了一种深刻的保守主义倾向，它只是在不停地纸上谈兵，却没有任何结果举措（不同于袖手旁观），这与中世纪的宫廷弄臣如出一辙。这说明了尤金·哈贝马斯（1981）的睿智，在多年以前，他就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新保守主义，尽管福柯和他的追随者们具有非常时髦的吸引力。此外，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相对主义是前后矛盾的、自我否定的，并且根本不负责任，这种相对主义认为差异意味着一切，所有的解释都是对解释的解释。思忖小规模互动的复杂性或许会让人感到有趣，甚至是受到启迪，但是，如果把相对主义应用到如战争、军事性宗教派别，以及 2004 年 9 月发生在别斯兰（Beslan）的恐怖主义分子对将近 200 名学童的残暴的大屠杀上时，后现代主义在智识上和政治上的破产已是昭然若揭。

我对后现代思想的异议，并非否定已为若干学者讨论的后现代情境的存在。我们居住在一个后现代社会而不认同后现代思想，两

者之间其实未尝不可以兼容呢？享乐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许甚至是离心的)行为，对确定的“真理”主张的怀疑，对“专家们”的嘲弄和敌意，对新事物感到愉悦，在体验中感受到快乐，以及对讽刺、模仿作品以及表面性事物的强烈偏好，都可被视为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也是后现代性的象征甚至是特征。

齐格蒙特·鲍曼(b. 1925)是分析后现代情境的旗手。自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他发表了深刻认识和考察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虽然他并没有旁征博引，但是他对当代社会的洞见却是明察秋毫。鲍曼把现代性描述成一个以寻找秩序为特征的时期，一个寻求稳定和控制的社会(其得到关心其公民的民族国家的庇护)，一个对规划持有信心的时期，以及一种想象理性能够为我们如何优化组合而造就更多确定性的场域。与此相反，后现代性带来了不稳定和不安全，国家的力量萎缩，全球性的市场胜利了；这导致了选择的自由，但却使得人们对未来忧心忡忡，怀疑理性本身，尤其是质疑特别声称自己能够接近理性的专家们；后现代性也使国家的控制被消费主义的“诱惑”所取代，影响人们生活在矛盾和不确定性中的需求(Bauman, 1997)。这种“流动的生活”(liquid life, Bauman, 1997)是一种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更新和可能性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潜在可能，却缺乏一种判断如此可能是否达到的标准。于是这造成人们在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难尽如人意，从私人生活(Bauman, 2003)到全球领域，都缺乏一种对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信念，虽然人类正在不断地改变环境的事实获得了广泛的承认(Bauman, 2006)。

鲍曼认为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相互关联(如果不是可化约为资本主义的话)。实际上，被资本主义的坍塌以及全球化的加速所释放的喧喧嚷嚷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富有弹性的生活方式的核心元素，而后者是后现代性的特征。鲍曼只是在论述资本主义怎样与后现代性联系上时有些不清晰，但是他对市场的持续显著性的承认，远离了后现代思想家们，比如鲍德里亚，后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决裂。还有一些人比鲍曼更加直率，他们认为我们如今生活在其中的后现代情境是资本主义关系长期发展

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一些卓有建树的学者们能够识别出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些潜在的特征，其有助于解释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变化。

有部分思想家并不情愿认为后现代情境是由一种决定性的历史原因造成。例如，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1)的一篇著名文章中，他仅仅提到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对于詹姆逊来说，现实主义文化与市场资本主义相关，现代主义文化(超现实主义等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一致，到如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消费者资本主义难脱干系，彼此之间有最紧密的关系。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约翰·厄尔里(John Urry)(1987)的分析模式与之如出一辙，他们认为由受过教育的、以职业为取向的、个人主义的和流动性的人群所组成的“服务阶层”正在出现，他们对“社群”(community)和“传统”相当冷漠，这与后现代生活方式便是近亲结合了。

大卫·哈维(1989b)毫不犹豫地明确上述关联性的存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在资本主义积累中发生的变化所造成的结果。直接地说，我们与当代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弹性——雇员们的适应性、公司进行变革的能力，以及变化本身的加速——促使后现代文化的产生。哈维认为战后的福特主义时代提供了按照标准化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产品；现在，后福特主义盛行，通过一种经济制度提供了选择、多样性和差异，此种经济制度遭遇经济危机的困扰，面对新环境(信息传播技术、全球范围的竞争、全球化)而急切地想通过“弹性生产”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弹性消费”找到解决方案。后现代文化是这些趋势的结果；如同哈维所述：

> 福特现代主义的相对稳定的美学标准已经完全让位于一种后现代美学，这种美学以动乱、不稳定和暂时性为特征，它赞颂差异、短暂、景观、时尚以及文化形式的商品化。
>
> (Harvey, 1989b, p. 156)

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与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从福特主义到

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是一致的。

有趣的是，丹尼尔·贝尔的出发点与大卫·哈维完全不同，但贝尔在解释后现代情境时却与哈维持有同样的倾向，即把后现代情境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运行的结果”(Bell, 1976, p. 37)。贝尔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在创造和支持大规模消费，赋予人们汽车、时尚、电视以及其他所有事物上所取得的成功，带来了一种快乐、享乐主义、刹那满足的文化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还没有称之为后现代文化，但这就是后现代文化所指的全部。这种成功也助长了一种经验高于意义的观念(Bell, 1990)，矛盾之处在于经验高于意义是与以节制和效率为导向的价值体系相冲突的，而正是后者的价值体系首先为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我认为这些为后现代情境的论述提供了历史分析，并且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性信息来支持其论断，颇具说服力。不过，坚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仍然可以忽视一切论争，果断地认为这些观点就是自负的“宏大叙事”，哈维仅仅把后现代情境解释成资本主义力量的内在逻辑的呈现；而贝尔秉持坚定的现代主义立场，只是把后现代视为一种比以前所有文化都要明显低级的文化。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些论述都断然不可接受，因为他们都假设看到了真理，但实际上真理并不存在。例如，哈维声称他透过后现代文化的表象看到了一种潜在的，但却是决定性的经济现实，后现代论者以为他不过是展现他仰慕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此一视野把他所研究的后现代对象贬低为“文化傻瓜”，因为他们没有像一位知识渊博的教授那样清楚地看到隐蔽的资本主义力量(Harvey, 2003)。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哈维的观点只是无限的可能性中的一种看法和一种解释，并且是一种相当病态的解释(Morris, 1992)。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研究中没有一项可以超脱于批评，相当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指出作者的缺陷、遗漏甚至是偏见的若干批判论点。所以，例如，大卫·哈维或许会承认他的著作，如果敏锐地吸收女性主义的滋养，那么他的论著更加受益(Massey, 1991)。但是，承认批评的价值，并非等于接受认为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解释的后现代主

义信条，其间有不可逾越的沟壑，因为两者之间是迥然有别的实质分析的领域。我们会欣然接受每种论述都是片面的，但不可以借此理由就抛弃论述，或者任何论述仅仅等同于任何其他“解读”，简单以为两者难分高低或是断然以为各有千秋，因为人们必须展示某些论述存在何种偏见，而另外一些论述又是如何完善。换言之，我们想起了后现代对相对主义的礼赞难以立足，这在否定所有主张真理观点的同时推翻了它自身的论断。

结论

作为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描述，“后现代性”这一术语颇有价值。其对令人不安的变化、流动性、怀疑主义，对讽刺的强烈偏好，以及对关系的不稳定性的强调，都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研究后现代性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阐明了当代生活的核心要素，尤其是隐藏于过多的选择之下的永恒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对一切事物做出选择，从头发的颜色到是否支持国际特赦组织。作为一种情境，后现代性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与加诸于我们的祖先身上的约束相比，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哪些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枷锁已经废除；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它是不是强调了令人烦扰的要求：我们现在必须选择我们要怎样去生活，虽然在其中进行选择的清晰场所已经瓦解了。反过来，鲍曼对“诱惑”的关注警告我们要注意市场、广告和名流的特殊意义——所有的媒体以及与之相连的影像在以前的控制体系都大规模地衰落的时期中至关重要。此外，后现代思想家们对符号和表意、模拟和不真实，和对应用于信息和知识的绩效标准的改革能力的强调，以及对电子中介信息的重要性的承认，对“信息革命”的研究者们来说，上述一切都受益匪浅。

但是，认为“我们正在步入一种全新的历史结构（historical configuration）”的观点却是问题重重。恰恰与之相反，后现代情境的大部分特征可以通过正在发生的（加速的）趋势来说明，现代主义思想

家比如赫伯特·席勒、尤金·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和大卫·哈维都振振有词地解释了当代社会的趋势。与后工业理论相同，后现代主义宣告了信息已经获得全新的首要地位，并且认为伴随而来的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类型的诞生。同样，与后工业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也经不起经验证据与理论洞察的考量。

第十章

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理论》的主要论旨是分析信息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本书一直在质疑：为什么信息能成为定义我们时代的特征？这一探索路径的合理性何在？因此，笔者研究的出发点是评析各路信息思想家的言论，他们都一致认同信息在当代事务中的重要性——与往昔的社会相比，现代的信息不仅在量上大大超越于过去，而且在当前的商业交易、休闲娱乐以及政府活动等各种事务中，信息还扮演着核心和关键的角色。

不过，思想家们除了上述共识之外，其理论分歧也甚为鲜明。尽管所有人都承认社会上的信息量正在有针对性地增加，但除此以外，其他与信息有关的讨论总是充满争议性。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笔者才尽量尝试理解和解释信息领域的过往风云。笔者希望清楚地了解各种不同理论方法的根基，同时用所能收集到的经验证据、外部理论以及批判视野去检验它们。

笔者有时会强烈地怀疑“信息社会”的合理性，虽然这一概念常被运用于社会科学及其以外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社会”的说法颇具价值。概念是思考的工具，它帮助人们组织观察世界的方式，并建立一个清晰的思路。但在我们思考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批判地审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而批评的一部分任务又涵盖了

以更加一语中的术语推陈出新。信息社会这个概念有其相当的功用，继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之后，大卫·里昂(David Lyon)也曾描述“信息社会”的作用——它是一个“有问题的”、“基本的组织路径”，用以“组织一系列特别的、总是不断产生新的研究课题的社会现象”(Abrams, in Lyon, 1988, p. 8)。“信息社会”的概念有助于学者汇总范围广泛而数量繁多的现象，其中包括了职业转变、新媒体、数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等等。尽管如此，信息社会的概念还是存在缺陷，特别是把信息社会描述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时，弊端就更加昭然若揭了。笔者相信考察信息趋势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特征至关重要，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信息社会设想都缺少这部分的实践。

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对不同的“信息社会理论”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评价。许多对“信息时代”的评论总是源自于幼稚而想当然的立场——“信息革命已经发生了，它会带来许多深刻的社会影响，在此就是某种我们可以预期并见证的新冲击。”这种想法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坚定的直觉感，并追随着一条整齐的线性思路——科技革新导致社会的变革。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把该思路作为研究信息化、科技化等等先进趋势的出发点，谬误百出。虽然科技决定论所向披靡，但是社会理论的贡献就在于让我们远离科技决定论的影响(当然有的思想家十分暧昧，他们对科技决定论游移不定)。

除此以外，笔者以为当人们通过本书阅读到赫伯特·席勒、安东尼·吉登斯、曼纽尔·卡斯特和齐格蒙·鲍曼等人的理论时，他们对于信息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一定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丹尼尔·贝尔主张服务业的增加带领着信息职业的扩张，这是“后工业”社会自我运行的最重要因素。吉登斯的理论是，信息社会起源于监控活动，而这些监控活动主要被组织世界紧急事件的国家所掌握。读到这里，谁能不被吉登斯的论点吸引呢？赫伯特·席勒则认为，二战后的信息爆炸使资本主义公司得以稳定前进。尤尔根·哈贝马斯担心“公共领域”中的信息质量正不断下降，因为“公共领域”是民主政治正确运行的基础，而信息则为民主参与者提供氧气。信息理论家提

出社会—经济组织的形式正从福特主义转型到后福特主义，谁能不承认此理论的合理性？吉恩·鲍德里亚有一句格言，他认为对符号的观察实际上是一种模拟，或者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说的“表现绩效原则”一样，对符号的观察加强了信息在“后现代”的产生和应用。我们深受这些理论家的高见的熏陶、启示、震撼、激励而认真反思。最后，当人们遇到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时，谁还会说有关“信息时代”的所有言论都属于无可救药的愚蠢？

如果笔者就此挂笔，然后对读者说，我已经介绍了各种与信息化趋势相关的阐释，这显然不够地道。认真地阅读过本书的读者会发现，本书辨别了某些思想家的说服力，孰强孰弱，字里行间已浸透笔者的诠释。

本书主要通过引用别人的著作来完成笔者对这些信息理论家的深入批评，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认真地审视思想家的理论原则，还需要了解这些理论运行的突出经验证据。细心的读者会在这本书前面的研究中收集到笔者的诸多个人见解。然而，为了使本书的主题更加清晰，笔者开门见山的论述如下。

笔者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尝试了解信息领域以及信息在当前时代的意义，那么他首先必须从赫伯特·席勒、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的观点、研究以及其重要著作中提取信息。但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像丹尼尔·贝尔、吉恩·鲍德里亚以及马克·波斯特等学者的思想。相反地，在分析后一类思想家时，笔者会利用他们著作中入木三分的观点补充我过去研究的缺陷。即使本书批判了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的某些内容，但笔者依然认为这部作品是当代世界最具说服力的分析论著（Webster and Dimitriou，2004）。

笔者赞同某类思想家主要有两个关键要素。首先，我考虑的是这些思想家的研究方法是否阐明了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他们的假设是否充分地建立于经验研究之上。在我看来，赫伯特·席勒的批判理论（他的整个理论是果断而有效的，但他对事实发展的思考远胜于他对理论的发挥）、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历史社会学家安

东尼·吉登斯的理论确实比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的著作更具说服力。更明确地说，笔者偏爱他们的理论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些学者的任何一个观点，也不说明席勒、哈贝马斯以及吉登斯等人对信息领域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读者能明显地发现，席勒留意资本主义的必要强制性，而哈贝马斯则关注民主讨论的必要条件，而他们二者的侧重点又有别于吉登斯，吉登斯强调国家的军事与公民权利，以及这些因素对信息收集和运用的影响。

虽然这些思想各有侧重，但是在他们的理论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点。笔者之所以偏爱这类思想家，正是因为这个共同点不仅使他们区别于其余思想家，也使他们的理论比其余思想家对信息的阐释更具说服力。席勒、哈贝马斯以及吉登斯都确信，信息化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发展的趋势，不过在 19 世纪的时候，随着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国家权力的巩固而加速发展。到了 20 世纪末，由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在过去世界市场从未接触的国家领域建立了公司(地理上遥远的地域也能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使得信息化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也就是说，这些学者相信信息化的发展必须以历史事例和连续性的方式进行研究分析。因此，每一个思想家在独立观察现象之前，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次建立信息化模式和程序，以确保他们在不确定和偶然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最好的信息，同时这也是为了保证现存的社会形式能永久地持续下去。例如，在赫伯特·席勒的著作中，他不断地强调资本主义特征支配着信息领域的起源和运行：在信息领域中，企业家和市场规则拥有决定权，而权力的不均等也是十分明显的。类似的，哈贝马斯通过阐释信息误传、假信息、信息娱乐(信息所有的伪装姿态)的发展过程，以及商品化、市场标准对各领域的入侵等手段，论证“公共领域”正不断被削弱的观点。因此，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信息爆炸”只不过是理解资本主义扩张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

而吉登斯的信息研究路径则是将信息发展特别置于结合国家的发展以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语境中考虑，例如工业化的战争、公民权

利和义务的开展等时代背景思考信息的意义。调节学派理论学家的研究侧重点也与之殊途同归，他们强调全球化蔓延的机遇和挑战使资本主义国家沿袭经济衰退和结构重组，在此阶段后发展起来的先进资本主义是信息化趋势的必要条件。

那些强调历史延续性的思想家并不认为世界上没有发生变化。正好相反，在他们作品中的“信息化”正说明了他们承认变化已经发生，并把信息的地位看得比过往社会更重要。然而，他们确实反对利用“信息革命”推翻过去的一切事物，他们并不认为“信息革命”标志着新的社会类型。当这些思想家解释信息化的时候，他们坚持信息化是已经存在与持续关系的结果与表现，而且使现存的各种关系延续并产生共鸣。因此，这些思想家确信，现在导向信息化生活的力量，即使到了公元 3000 年，也一样引领风骚。

与丹尼尔·贝尔、吉亚尼·瓦蒂莫以及马克·波斯特的假设相比，拨开重重迷雾，日渐清晰地看出笔者更偏爱信息化生活是既存势力的延伸这个观点的诠释。在所有的方法和观点当中，最大的分歧始终还是选择变化优于延续性，还是接受延续性优于变化。选择变化的方法论不断强调这些信息现象是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出现而引起的，并标志着一种系统的断裂。这类思想家使用了形式各异的术语来描述新型社会——从最普通的信息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信息时代和弹性专殊化等等。

当然，这其中没有一个思想家会缺乏历史的想象力，不过，他们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分析信息社会区别于过去社会的新颖性。在本书中，笔者努力去证明这些思想家的提议是不可靠的，在证明的过程中，为了有足够的理由反驳他们的观点，我不断地引用那些以连续性为优先的思想家的观点。

可能有人会认为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争论是被误解的，且毫无意义。如果人们把这个争论理解为必须在这二者中挑选一个，社会要么只有连续性，要么只有变化，那么这的确是被误解了。实用主义者会坚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现代社会的发展混合着连续与变化。如果我们要致力于检验世界如何运作，我们并不需要过多地涉

猎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矛盾。笔者赞同自己的立场，而且以实际分析超越社会学家中那些老掉牙的论争。

尽管如此，实用主义者也还是会被问及主导力量究竟是连续性，还是变化？当类似的问题一旦被提出，就不是那么容易回避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评价两类思想家的论点和判断他们的经验证据，看谁更具说服力等途径来解答。这也就是笔者本书努力进行的尝试，正是因为经过比较后，笔者才更倾向于信息社会是过往社会的连续而不是变化，至少有两个理由让笔者必须质疑那些强调信息时代新颖性的观点。首先第一个是现时主义(presentism)的陷阱，它假设每个人的时间都与过去的时间完全不同。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所有历史场景都是唯一的，因此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但是从一个长远的视野来看，现时主义对现在(now)的热情使它过度强调新颖性。阿兰·本内特（Alan Bennett）在他的电影《历史系男生》(*The History Boys*，2004)中提出“没有一个时期会像不久前的过去那么遥远”，可能也意味着对于现在的这一刻也如此。虽然现在具有紧迫性、强迫性和显性，但本内特提醒我们，“现在”会霸占我们的精力，常常使我们不能以正确的观点看待问题。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对此道理了然于心，同样可以诉诸更广阔的当代领域中去理解。但凡论述信息社会的观点，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上述现时主义的弊端。其次，那些把信息社会视为新时代的人总是强迫别人接受或者同意当今世界与过往的迥异，他们宣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舒适的新型社会，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变化，且只能根据变化的要求适应现实。但历史的轨迹和连续性又使人们注意到，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是由人类建立并能被重建的(cf. Bruke,2000)。

在笔者看来，我们要把信息趋势置于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压力中理解。其中，历史确实今非昔比，因此，没有人会说现在的资本主义与过去的一样。今天的信息资本主义与20年代早期建立的企业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有着明显的区别，就像企业资本主义时期明显区别于19世纪中后期放任主义时期一样。要准确说明

当代资本主义，我们必须确定它的突出特征：规模空前庞大的跨国公司、激烈的全球竞争（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变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国家权力的相对削弱，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它会将世界改造为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态。《纽约时代》（*New York Times*）的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在其《世界是平的——凌志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上述特征，并为它们重新赋予了贴切的概念。弗里德曼直率地说：在“地球村里只有一种游戏”，而美国（最强大和最有经验的操纵者）是这个游戏中的头号种子选手。现在的时代被“美国权力、美国文化、美元甚至美国海军所支配”（p. xiv），在当代世界，同质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准确来说，全球化使美国的胜利成为引领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同质化意味着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必须接受美国化。弗里德曼指出，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将“让麦当劳的巨无霸、电子巨无霸和米老鼠”覆盖全球。

不过，无论笔者，还是弗里德曼，都不认为非西方世界向西方方式看齐，世界就泰然稳定，反而是直接巩固了美国的国家霸权（Friedman，2005）。除此以外，全球化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竞争的激烈化，过去曾经各自独立的领域如今变得紧密相连，推动着社会变化的同时也加速着变化本身（Soros，1998；Greider，1997）。汤姆·弗里德曼（1999）与笔者论旨一致，他那本精彩的书指出——如今的世界是活动的、变化的和不稳定的，它不断地发明新产品和改革方法（凌志车）。但人类需要稳定、根基和一致性（橄榄树）。因此，需要安定的人类与动荡的世界之间必然存在着张力，而弗里德曼认为，凌志车将会成为最终的未来。

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全球化驱使我们所说的“商业文明（business civilisation）”压倒性地覆盖全世界。因此，虽然我们的确见证着世界的许多变化，但是实际上，在变化的深处也潜藏着一套普遍规律。它们包括：

支付能力将是决定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最主要标准。

供应将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而不再是集体供应。

市场标准(也就是决定收益或损失的标准)将成为决定事情的首要因素。

竞争(调节的对立面)是组织经济事务的最有效机制。

商品化活动(服从价格规律的关系)将成为规范。

私人财产所有权将高于国家权力。

工资劳动是组织劳动活动的最主要机制。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实践活动的理想化,但不可置疑,上述规则在近几十年间将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蔓延至全球。

形成"商业文明"的原因复杂多样,虽然现在还有少数,但却有重要的力量在抵制其扩张,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商业文明"在近几年依然不断大肆入侵各个领域。"商业文明"扩张之深度与广度所向披靡。在深度上,市场实践已经极大地入侵了隐私生活,这些个人领域在过去,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你只要思考一下,就能举出一大堆例子,比如育儿(有趣的玩具和儿童电视泛滥)、日常的食材供应(现在每一个人每天都必须依赖超级市场来获取食物,而在很久以前,许多家庭的服务都是自我供应的,他们在花园和土地上种上蔬菜和饲养牲畜)以及制衣和编制等手工活动的衰落等等(Seabrook,1982b)。

在广度上,我们当然会举全球化扩张的例子,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扩展到许多过去曾经是自给自足的地方。农民阶级在全球大部分地区被淘汰便是一个说明全球化发展的最好例子。在过去,农民阶级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可是现在,这个阶级已经站在了消亡的边缘(Worsley,1984)。据统计,在 1900 年,全世界有九成人口是农民(Ponting,1999,p. 13),但当时最大的农业社会(中国和俄罗斯),到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而在欧洲,农民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农民阶级与市场文明不相容。农民主要是自给自足,他们质疑科技革命的力量,抵制工资劳动和市场组织。因此,由于商业实践,农民的生活方式不再被牢牢地束缚于土地,过去曾经远离商业领域的活动现在正与商业紧密结合(Robins and Webster,1999)。

"商业文明"中是否包含有信息元素,有的人可能还有一点疑问。

不过，只要想想“品牌”在日常生活的传播，或者“知识产权”在各种领域（从科学研究到体育商品）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得出肯定的答案。信息领域中商业化成分不断增加，过去使用录制的音乐，电影画面等所需获得的批准或者其他的“创意产权”在今天都受到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2004）所说的“混搭文化（remix culture）”的制约。“混搭文化”把画面、音乐和文字合并到一个数字媒体上，它代替了过去的文本表达形式。过去，文本形式能受到“正当使用原则”（指的是允许人们在不影响作者利益的情况下有限地引用他人的作品，而不必征得作品所有者的同意）的保护，而现在，当作品以图像和声音产品出现时便不再表明出处了。当然，在信息领域中也会出现反商业化的逆反倾向，比如政府免费信息的散布、公众服务网络和不受版权保护的文学电子作品集等等。但是，这不能算是一种有效的反抗企业化浪潮和为了最大化产权所有者在投资创意和知识产业收益上的立法努力。

有人曾经了解过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时代吗？在此，且容笔者强调几句。首先，市场机制的渗透并不意味着会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相反地，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依赖食物和衣服商店总比局限在沉闷的家庭烹饪菜肴和忍受过时的衣服要好。同样地，信息市场化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拥有资金，他的才干和人生的旅程便会无比地崇高。此外，身处资本主义的制度，即使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也能过着被大部分农民所羡慕的生活。第二，农业阶级被各种各样的方式所破坏，其中当然也有镇压和剥夺，但最重要的蚕食手段还是市场社会的推进，市场社会所提供的变化和机遇与农民生活的方式相去甚远，后者无能力分享前者的恩惠。

全球化已经确保社会无法再回到19世纪的放任政策时期。商业文明如雷贯耳，它为19世纪的自由商人所承认，但是到了现在，商业文明已置身于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其当今的商业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存在于全球化范围内的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竞争，并排斥那些被边缘化的小型企业。现在的资本主义被大型公司（比如通用汽车、壳牌、松下和西门子等）所控制，这些公司总是拥有

惊人的研究与开发预算、国际化的分布和全球化销售活动。此外，全球化资本主义与世界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额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市场）实时相连。如今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和速度都盛况空前，它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今天资本主义的许多方面已经在全球化范围内运行着，比如世界商品销售、国际分工和全球品牌创造等趋势。

虽然在此笔者尽力强调当前时代的新颖性，但这些趋势基本上属于巩固和拓展了过去长期存在的规则。现代全球化经济象征着资本主义行为方式的蔓延和发展，见证着市场机制的使用增加、私人而不是公共财产的膨胀、收益性成为各种组织存在的理由、工资劳动的出现以及支付能力支配着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质量等现象。简而言之，我们所生存的“全球网络社会”延续着（有人喜欢用“转变”）长久以来的资本主义原则。正如克里夏·库马（Krishan Kumar，1995）所总结的，信息爆炸：

> 并没有使工业社会的组织方式在根本上产生转变，也没有改变工业社会发展的方向。现在支配社会的利益、权力和控制规则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时期早已存在。而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这些规则运用的广度和强度……但这些规则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
> （Kumar，1995，p. 154）

赫伯特·席勒的作品因缺乏理论的世故圆滑而被嘲笑，不过在笔者看来，其作品还是十分有效地让我们明白到在信息领域中资本主义胜利的意义；其研究同样提醒我们把平常的问题（信息革命对我们做了什么？）进行反向思考，甚有助益。席勒所提出的“我们能够对信息做什么？”的问题，能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需求中，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需要利用广告、信息与传播科技、公司计划和有效销售等手段。

虽然笔者坚信，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我们理解信息化的最好方式，但是笔者并不以此指代信息化的全部内涵。本书还

分析了理论知识及其在当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不过信息社会思想家认为理论知识无助于我们理解信息与传播科技、信息贸易、职业转变和信息流通（显然，这些趋势都影响了理论知识）。所以他们最后还是把理论知识作为当代社会的其中一个显著特征。丹尼尔·贝尔介绍了“理论知识”的术语，但他却没有对这个概念给予足够的重视，反而去关注高等教育、研究与开发职业等事物发展程度的量化测量方法，并把这些现象作为信息社会出现的证据。抽象、概括而系统化的理论知识总是会让人认为它与科学和技术相关。但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指出，理论知识流通于科学领域以外更广阔的范围，实际上，理论知识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安东尼·吉登斯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着力于个人和社会事务中的抽象而概括的知识，因为知识支撑着我们的决策、风险评估并控制着我们的命运。正因为这个原因，理论知识是当代社会关系的核心。尽管如此，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认可我们栖息于信息社会的主张（虽然比起计算信息与传播科技的运算总量，理论知识更加能说明信息社会的到来），吉登斯努力地说明，理论知识来源于现代性本身，而当前社会的“高级现代性”早已根深蒂固，其进程发展得更激烈。当然，理论知识会有很多层的含义，但是理论知识的优先性使我们区别于我们的前辈，并可能是我们决定自我特征的最重要因素。最后，当我们把信息置身于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背景中，我们便能理解信息在今天的意义。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自反性现代化”和理论知识正以崭新的方式引领着我们的未来。

这种看法会与那些声称信息社会正在出现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信息社会理论家总是不断为新时代的到来寻求决定性的解释。不过比起像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90）、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1995）和迈克尔·德图佐斯（Michael L. Dertouzos，1997）等支持科技决定论的科技拥护者而言，信息社会理论家的理论要老练得多。不过，这些信息社会的支持者还是保留着科技决定论的潜在倾向，比如“第二次产业分化”（Piore and Sabel）、新的“信息模式”（Poster）和“信息化模式的发展”（Castells）等

理论都有着科技决定论的影子。此外，克里夏·库马(1978)尖锐地指出，在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概念后隐藏着类似于科技决定论的思想，不过贝尔对变化的思考更复杂深奥。在贝尔的理论中，社会潜藏的“合理化”原则主要表现在对科技的改进和技术的重组方面。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竭力强调这些信息社会思想家的共同观点。虽然他们的理论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同，但其中交织了一个共同的原则：宣称信息社会到来的人，都热衷于科技(或者是贝尔所说的技术)决定论的规则。

在此，笔者又要重申科技决定论的两个主要问题：科技决定论直接指出科技/技术是一切变化的先决条件(但未免过度简单化了)，并同时假设科技/技术远离价值和信仰的范畴(这是更值得注意的一点)。证明科技决定论是错误的观点并不是一件难事，不过科技决定论的思想的确影响着许多有关信息发展的分析。笔者以为科技决定论误解了社会变化，它将社会变化的关键因素去社会化，坚持把科技/技术隔离于社会世界(拥有价值和信仰的世界)之外，并断言科技这种独立的力量是引发社会变化的特权机制。毫无疑问，那些把“信息科技革命”去社会化和/或相信科技功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人，都很容易接受信息社会的观点——科技带来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形态焕然一新。

本书第二章已经提到，主张信息社会已经到来(或者正在到来)的人，他们运用的测量方法与科技决定论如出一辙。明显地，他们尝试通过计算新秩序的现象总量来确定信息社会的到来，这些现象包括了信息科技、信息的经济价值、信息职业的增加、信息网络的扩张和符号与意义的表面(太显而易见了，根本不需要计算)扩张。支持信息社会理念的人计算了上述范畴或其他类似的代表现象的数量，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社会被越来越多的信息和信息科技所包围，他们把这些量化的元素标志为质的转变，也就是信息社会的出现。

当我们尝试检验他们对信息概念的定义时，我们往往会看到类似的原理——假定信息是一系列量化的现象，并按现象的内容将其分类——因此我们能看到许多的“位元”、“价格”和“符号”，这些单位

表面上都不具有意义(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1986]指出,信息的内容是最本质的东西)。没有语义含义的信息更便于统计数量,但我们又再一次回到这个结论——信息量的增加预示了社会和社会组织在质的方面的变化——也就是信息社会。

因此,笔者认为以历史发展解释信息化趋势的理论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在现今世界的意义。一方面,他们抵制了用人为的测量方法观察信息社会和信息本身。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思想家承认信息科技、信息流通和信息网络等方面在量上出现巨大的增长,但是他们厌恶去社会化的孤立概念,他们喜欢回到现实社会中寻找解释。利用大量的历史知识,他们能够准确地定位信息爆炸的意义,辨析出每种信息都有一个确定的起源和背景——这种类型的信息是为了某个目的,为吸引拥有某种共同兴趣的群体而设立。

人名和学术关键词

(一)人　　名

第一章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

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

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

拉里·赫希霍恩(Larry Hirschhorn)

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

阿兰·利比茨(Alain Lipietz)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

第二章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

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

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

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tch)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哈罗德·柏金(Harold Perkin)

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

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
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
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
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
乔治·布什(George Bush)
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
乔治·斯蒂芬逊(George Stephenson)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

第三章

克里夏·库马(Krishan Kumar)
拉尔夫·米利本德(Ralph Miliband)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ph Dahrendorf)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恩斯特·恩格尔(Christian Engel)
亨利·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乔纳森·格舒尼(Jonathan Gershuny)
伊恩·迈尔斯(Ian Miles)
勃朗宁(Browning)
辛格曼(Singelmann)
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
亨利·福特(Henry Ford)
阿兰·图灵(Alan Turing)
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

第四章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
约翰·厄里(John Urry)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罗贝尔·博耶(Robert Boyer)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
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威尔·哈顿(Will Hutton)
乔易斯·科尔科(Joyce Kolko)
乌尔夫·汉纳斯(Ulf Hannerz)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
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
帕特里克·詹金(Patrick Jenkin)
肯尼斯·摩根(Kenneth Morgan)
艾伦·西利托(Alan Sillitoe)
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
派卡·海曼(Pekka Himanen)
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
约翰·艾金森(John Atkinson)
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
乔纳森·莱特林(Jonathan Zeitlin)
肖沙娜·朱伯夫(Soshana Zuboff)
迈克尔·萨贝尔(Michael Sabel)
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

安娜·波勒特（Anna Pollert）

第五章

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C. 赖特·米尔斯(C. Wight Mills)
彼得·狄金(Peter Dicken)
理查德·巴内特(Richard Barnet)
罗纳德·穆勒(Ronald Muller)
丹·席勒(Dan Schiller)
熊彼特(Schumpeter)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默多克(Murdoch)
霍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
冯·莫里森(Van Morrison)
丹·奎尔(Dan Quayle)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
阿兰·杜连(Alain Touraine)
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
塞尔日·马莱(Serge Mallet)
肯尼斯·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
罗伯特·迈克尔(Robert Michel)
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
马丁·阿波罗(Martin Albrow)
戴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乔治·史蒂芬孙(George Stephenson)

第六章

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
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
哈姆林克(Cees Hamelink)
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
卡尔·诺顿斯壮(Kaarle Nordenstreng)
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
格罗德·苏斯曼(Gerald Sussman)
斯图亚特·伊文(Stuart Ewen)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道格拉斯·凯纳(Douglas Kellner)
丹·席勒(Dan Schiller)
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
迪森(Dyson)
亨弗里斯(Humphries)
理查德·夏普(Richard Sharpe)
大卫·迪克森(David Dickson)
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达里奥·福(Dario Fo)
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大卫·梅勒(David Mellor)
劳伦斯·勒辛格(Lawrence Lessig)
约翰·萨勒兰德(John Sutherland)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
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
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
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
戴维·诺贝尔(David Noble)
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
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
凯文·威尔森(Kevin Wilson)
约瑟夫·图罗(Joseph Turow)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W. H. 史密斯(W. H. Smith)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T. S. 艾略特(T. S. Elliot)
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
杰弗瑞·阿奇尔(Jeffrey Archer)
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F. R. 利维斯(F. R. Leavis)
杰若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
科伯特(Cobbett)
哈代(Hardy)
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

第七章

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爱德华·伯纳斯(Edward Bernays)
A. J. P. 泰勒(A. J. P. Taylor)
帕迪·斯堪纳尔(Paddy Scannell)
大卫·卡迪夫(David Cardiff)
瑞斯勋爵(Lord Reith)
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
吉恩·瑟顿(Jean Seaton)
伯顿·保劳(Burton Paulu)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修·格林(Hugh Greene)
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迈克尔·萃西(Michael Tracy)
埃尼德·布莱顿(Enid Blyton)
蒂姆·寇兹(Tim Coats)
约翰·格里斯夏姆(John Grisham)
约瑟芬妮·考克斯(Josephine Cox)
鲍勃·阿夏伍德(Bob Usherwood)
罗伯特·休森(Robert Hewison)
大卫·M. 威尔森(David M. Wilson)
雅努茨扎克(Januszczak)
艾恩·吉尔默(Ian Gilmour)
克劳斯·莫瑟(Claus Moser)
德雷克·雷纳(Derek Rayner)
伯纳德·本雅明(Bernard Benjamin)
霍华德·裘伯(Howard Tumber)
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罗杰·B. 史密斯(Roger B. Smith)
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
戈登·里斯(Gordon Reece)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彼得·赖特(Peter Wright)
布鲁斯·宾博(Bruce Bimber)
约翰·基恩(John Keane)
布拉姆勒(Blumler)
科尔曼(Coleman)
吉姆·马奎根(Jim McGuigan)
彼得·朗特(Peter Lunt)
保罗·斯坦纳(Paul Stenner)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第八章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大卫·里昂(David Lyon)
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
皮诺切特(Pinochet)
哈维尔(Vaclav Havel)
T. H. 马歇尔(T. H. Marshall)
帕迪·希尔亚德(Paddy Hillyard)
杰尼·帕西·史密斯(Janie Percy-Smith)
边沁(Jeremy Bentham)
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
泰勒(F. W. Taylor)
大卫·伯汉姆(David Burnham)
切瑞·布斯(Cherie Booth)

第九章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乔伊斯(Joyce)
毕加索(Picasso)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大卫·赛尔本(David Selbourne)
里维斯(F. R. Leavis)
简·奥斯丁(Jane Austen)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莫扎特(Mozalt)
安德鲁·洛伊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
阿尔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
康德(Kant)
比才(Bizet)
麦当娜(Madonna)
威尔第(Verdi)
弗朗兹·斐迪南德(Franz Ferdinand)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
韦恩·鲁尼(Wayne Rooney)
伍迪·艾伦(Woody Allen)
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冯·莫里森(Von Morrison)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
雷蒙·皮卡德(Raymond Picard)
莱辛(Racine)
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
居伊·德波(Guy Debord)
凡斯·帕克德(Vance Packard)
肯尼斯·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
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吉安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

弗兰克(Frank)
昆尼·里维斯(Queenie Leavis)
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
雨果·扬(Hugo Young)

第十章

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
迈克尔·德图佐斯(Michael L. Dertouzos)

人名和学术关键词

(二) 学术关键词

第一章　导论

信息化(informatisation)
电子化的社会(e-society)
无重经济(weightless economy)
电子经济(e-economy)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强大的微电子(the Mighty Micro)
有线社会(the wired society)
数字化(Being Digital)
什么将会发生(what will be)
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ism)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弹性专殊化(flexible specialisation)
信息化的发展模式(the 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
调节学派理论(Regulation Theory)
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
自反性现代主义(reflexive modernisation)

第二章　什么是信息社会

科技的(technological)
经济的(economic)
职业的(occupational)
空间的(spatial)
文化的(cultural)
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s)
技术(technologies)
新熊彼特式(neo-Schumpeterian)理论
准企业(quasi-firm)
综合服务数字网(ISDN,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
纽约知识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
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
采掘工作(extractive)
制造(fabrication)
从农业转向服务业(from agriculture to services)
社会结构(social construction)
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
收敛论(convergence theory)
服务业的生产者(producer services)
有意义的(meaningful)
生产性的(productive)
行动性的(action)
强烈自反性(intensified reflexivity)
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工业社会(industrial)
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
现代(modern)
后现代世界(postmodern world)
组织化资本主义(organised)
无组织的资本主义(disorganised)
集体主义(collectivist)
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
整体的(holistic)
福特主义(Fordist)
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
新福特主义(neo-Fordist)
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
弹性专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
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
符号环境(symbolic environment)
苏黎世侏儒(gnomes of Zurich)
临时劳工(contingency labour)
资本主义的积累(capitalism accumulation)
市场魔法(magic of the market)
自身连续性(self-perpetuating)
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
调节的模式(mode of regulation)
自耕农民主(yeoman democracy)
再技能化(reskilling)
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Fordist-Keynesian)
自反性(reflexivity)
信息化(informating)
设计强度(design intensity)
平淡地带(tame zones)
死亡地带(dead zones)
流通活动(circulation activities)
全球性的信息服务业(glob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integrated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s)
通讯基础结构和庞大的电脑设备(infrastructure of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er facilities)
新国际劳动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
雇员弹性制度(flexibility of employee)
收入的弹性(wage flexibility)
劳动力的弹性(labour flexibility)
时间弹性(time flexibility)
弹性生产(flexibility of production)
弹性消费(flexibility of consumption)
多样化的(different)
工业生产能力的衰减(deindustrialisation)
活跃地带(live zones)
疯狂地带(wild zone)
符号分析者(symbolic analysts)
全球化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
全球地方化(glocalisation)
垂直解体(vertically disintegrating)
高价值产品(high value production)
劳动区隔(segmented labour)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
网络企业(the network enterprise)
去官僚化(debureaucratisation)
流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
永恒的时间(timeless time)
即时的战争(instant wars)
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ies)
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
信息劳工(informational labour)
英才管理(meritocracy)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市场标准(market criteria)
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
信息趋势(informational trends)
新世界信息秩序(a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NWIO)
信息帝国主义(information imperialism)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阶级不平等(class inequalities)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支付能力标准(ability-to-pay criteria)
跨国帝国(transnational empire)
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
消费者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
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理性辩论(rational debate)
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
再封建化(refeudalisation)
资本主义国家(capitalism state)

史料编纂法(historiography)
平民公共领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
启蒙的宫殿(palaces of enlightenment)
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
信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

第八章　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
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ation)
"第三条道路"政治理论("Third Way" politics)
激进现代性(radicalised modernity)
日常监控(routine surveillance)
非嵌入化(disembedded)
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
强化的自反性(heightened reflexivity)
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
监控(surveillance)
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
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
信息战(information war)
感知操纵(perception management)
人权体制(human rights regimes)
公民权(citizenship)
公司监控(corporate surveillance)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象征(symbols)
符号(signs)
后现代情境(a postmodern condition)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后现代(post-modern)
现代(modern)
现代主义(modernism)
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
达达主义(Dadaism)
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无调性主义(atonalism)
现代化(modernisation)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
启蒙理想(Enlightenment aspirations)
总体性理论(totalising theories)
美学相对主义(aesthetic relativism)
真实性(authenticity)
精英主义(elitisms)
文化的破碎(fragmentation of culture)
碎片化(fragmentation)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表意(signification)
"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意义的死亡(the death of meaning)
模拟(simulations)
再现(representations)
信息化发展(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

第十章　信息社会

信息化(informatisation)
表现绩效原则(principle of performativity)

现时主义(presentism)
企业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
商业文明(business civilisation)
混搭文化(remix culture)
新自由主义共识(neo-liberal consensus)

参考书目

Place of publication is London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brams, Philip (1982), *Historical Sociology*. Shepton Mallet: Open Books.

Ackerman, Bruce and Fishkin, James S. (2004),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dam Smith Institute (1986), *Ex Libris*. Adam Smith Institute.

Adam Smith Institute (1993), *What Price Public Service? The Future of the BBC*. Adam Smith Institute.

Addison, Paul (1975), *The Road to 1945: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Quartet, 1982.

Adonis, Andrew and Pollard, Stephen (1997), *A Class Act: The Myth of Britain's Classless Society*. Hamish Hamilton.

Aglietta, Mich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New Left Books.

Aglietta, Michel (1998), 'Capit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hange', *New Left Review*, (232) November–December: 41–90.

Alberts, David S. (1996),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Information Age Technolog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Albrow, Martin (1996),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Allred, John R. (1972), 'The Purpose of the Public Library: The Historical View', reprinted in Totterdell, Barry (ed.) (1978), *Public Library Purpose: A Reader*. Clive Bingley.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second edition. Verso, 1991.

Anderson, Perry (1990), 'A Culture in Contraflow – Parts I and II', *New Left Review*, (180) March–April: 41–78; (182) July–August: 85–137.

Ang, Ien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Methuen.

Ang, Ien (1991),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Routledge.

Angell, Ian (1995),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SE Magazine*, 7 (1) summer: 10–12.

Angell, Ian (2000), *The New Barbarian Manifesto*. Kogan Page.

Annan, Noel [Lord] (1977),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of Broadcasting*, Cmnd 6753. Home Office.

Arquilla, John and Ronfeldt, David F. (1997), *In Athena's Camp: Preparing for Confli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Arrow, Kenneth J. (1979),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in Dertouzos, Michael L. and Moses, Joel (eds), pp. 306–17.

Atkinson, John (1984), *Flexibility, Uncertainty and Manpower Management*. Brighton: Institute of Manpower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Atkinson, John and Meager, N. (1986), *New Forms of Work Organisation*. Brighton: Institute of Manpower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Bagdikian, Ben (1987), *The Media Monopoly*, second edition. Boston, Mass.: Beacon.

Bailey, Stephen J. (1989), 'Charging for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Policy and Politics*, 17 (1): 59–74.

Ball, Kirstie and Webster, Frank (eds) (2003),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urveillance: Crime, Terrorism and Warfar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luto Press.

Bamford, James (1983), *The Puzzle Palace: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It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Britain's GCHQ*. Sidgwick & Jackson.

Bamford, James (2001), *Body of Secrets*. New York: Doubleday.

Barnaby, Frank (1986), *The Automated Battlefield*. Sidgwick & Jackson.

Barnet, Richard J. and Müller, Ronald E. (1975), *Global Reach: The Power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ape.

Barnet, Richard J. and Müller, Ronald E. (1994),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Barnett, S. and Curry, A. (1994), *The Battle for the BBC: A British Broadcasting Conspiracy?* Aurum.

Barnouw, Erik (1978), *The Sponsor: Notes on a Modern Poten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ron, Iann and Curnow, Ray (1979), *The Future with Microelectronics: Forecasting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inter.

Barthes, Roland (1953), *Writing Degree Zero*. Translated by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Cape, 1967.

Barthes, Roland (1963), *Sur Racine*. Paris: Seuil.

Barthes, Roland (1964), *Essais Critiques*. Paris: Seuil.

Barthes, Roland (1966), *Critique et Vérité*. Paris: Seuil.

Barthes, Roland (1979), *The Eiffel Tower and Other Mythologies*.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 Wang.

Baudrillard, Jean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k Poster. St Louis, Mo.: Telos.

Baudrillard, Jean (1976),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lated by Iain Hamilton Grant. Introduction by Mike Gane. Sage, 1993.

Baudrillard, Jean (1979), *Seduction*. Translated by Brian Singer. Macmillan, 1990.

Baudrillard, Jean (1983a),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Paul Foss, John Johnson and Paul Patton. New York: Semiotext(e).

Baudrillard, Jean (1983b), *Simulations*. Translated by Paul Foss, Paul Patton and Philip Beitchman. New York: Semiotext(e).

Baudrillard, Jean (1986), *America*. Translated by Chris Turner. Verso, 1988.

Baudrillard, Jean (1988),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k Post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udrillard, Jean (1991), *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 Paris: Galilée.

Baudrillard, Jean (1992), *L'Illusion de la fin, ou, la grève des événements*. Paris: Galilée.

Bauman, Zygmunt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Polity.

Bauman, Zygmunt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Bauman, Zygmunt (1997),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Cambridge: Polity.

Bauman, Zygmunt (200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Cambridge: Polity.

Bauman, Zygmunt (2005), *Liquid Life*. Cambridge: Polity.
Bauman, Zygmunt (2006), 'Melting Modernity', Ralph Miliband Programme Lecture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miliband/Bauman Lectures.htm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Sage.
Becker, Jörg, Hedebro, Göran, and Paldán, Leena (eds) (1988), *Communication and Domination: Essays to Honor Herbert I. Schiller*. Norwood, NJ: Ablex.
Bell, Daniel (1962),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Bell, Daniel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Heinemann.
Bell, Daniel (1979), '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Dertouzos, Michael L. and Moses, Joel (eds), pp. 163–211.
Bell, Daniel (1980), *Sociological Journeys, 1960–1980*. Heinemann.
Bell, Daniel (1987), 'The World in 2013', *New Society*, 18 December pp. 31–7.
Bell, Daniel (1989), 'The Thir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ts Possible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Dissent*, 36 (2): 164–76.
Bell, Daniel (1990),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ity and Modernism', *Society*, 27 (3) March–April: 43–50; 27 (4) May–June: 66–75.
Bell, Daniel (1991), 'First Love and Early Sorrows', *Partisan Review*, 48 (4): 532–51.
Bell, Daniel (1999),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Bellah, Robert N., Madsen, Richard, Sullivan, William M., Swidler, Ann and Tipton, Steven M.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llah, Robert N., Madsen, Richard, Sullivan, William M., Swidler, Ann and Tipton, Steven M. (1992), *The Good Society*. New York: Knopf.
Beniger, James R. (1986),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njamin, Bernard (1988), *Accessibility and Other Problems Relating to Statistics Used by Social Scientists*. Swindon: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Benjamin, Walter (1970), *Illuminations*.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Fontana, 1973.
Berkowitz, Bruce (2003), *The New Face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Berman, Marshall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Verso, 1983.
Bernal, John Desmond (1954), *Science in History*. Watts.
Bernays, Edward L. (1923), *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Boni & Liveright.
Bernays, Edward L. (1952), *Public Relations*. Norman, Okl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0.
Bernays, Edward L. (1955),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 Norman, Okl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Bernstein, Carl (1992), 'Idiot Culture of the Intellectual Masses', *Guardian*, 3 June, p. 19.
Best, Steven and Kellner, Doug (1997),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York: Guilford.
Bhagwati, Jagdish (2004), *In Defence of Globalis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mber, Bruce (2003), *Inform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echnology i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ackwell, Trevor and Seabrook, Jeremy (1985), *A World Still to W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st-War Working Class*. Faber & Faber.

Blackwell, Trevor and Seabrook, Jeremy (1988), *The Politics of Hope: Britain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aber & Faber.

Blair, Tony (2005), 'We Are the Change-makers', speech to the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Brighton, 27 September. Downing Street: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Block, Fred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lock, Fred and Hirschhorn, Larry (1979),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 Post-Industrial Perspective', *Theory and Society*, 8 (5): 363–95.

Bloom, Alexander (1986), *Prodigal Son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umler, Jay G. and Coleman, Stephen (2001), *Realising Democracy Online: A Civic Commons in Cyberspac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Boggs, Carl (2000), *The End of Politics: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Decline of the Public Sphere*. New York: Guilford.

Bolton, Roger (1990), *Death on the Rock and Other Stories*. W. H. Allen/Optomen.

Bonefeld, Werner and Holloway, John (eds) (1991), *Post-Fordism and Social Form: A Marxist Debate on the Post-Fordist State*. Macmillan.

Boorstin, Daniel J. (1962), *The Image; or, What Happened to the American Drea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rja, Jordi and Castells, Manuel (1997), *Local and Global: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arthscan.

Boulding, Kenneth E. (1966), 'The Economics of Knowledge and the Knowledge of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2): 1–13, reprinted in Lamberton, Donald M. (ed.) (1971).

Bourdieu, Pierre (1998), *On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 Translated by P. Parkhurst Ferguson. Pluto.

Bowers, N. and Martin, J. P. (2000), 'Going Mobile? Jobs in the New Economy', *OECD Observer*, http://www.oecdobserver.org/news/fullstory.php/aid/391

Boyer, Robert (1990),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Craig Charn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oyer, Robert and Saillard, Yves (eds) (2002),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Routledge.

Boyle, James (2002), 'Fencing Off Ideas: Enclosure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ublic Domain', *Daedalus*, spring, pp. 13–25.

Boynton, Robert S. (2004), 'The Tyranny of Copyright', *New York Times*, 25 January.

Bracken, Paul (1983),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Nuclear Forc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radshaw, Della and Taylor, Paul (1993), 'Putting a Price on Research', *Financial Times*, 23 March.

Braun, Ernest and MacDonald, Stuart (1978), *Revolution in Miniature: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Semiconductor Electron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iggs, Asa (1985), *The BBC: The First Fifty Ye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itish Telecom (1990), *Competitive Markets i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ng Customers*. British Telecom.

British Telecom (1993), *Report to Our Shareholders*. British Telecom.

Brock, Gerald W. (1981),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The Dynamics of Market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 Jessica (2003), 'Cross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 Ermann, M. David and Shauf, Michele S. (eds), *Computers, Eth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2–71.

Brown, Phillip and Lauder, Hugh (eds) (1992), *Education for Economic Survival: From Fordism to Post-Fordism?* Routledge.

Brown, Phillip and Lauder, Hugh (2001), *Capitalism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Future of Society in a Global Economy*. Basingstoke: Palgrave.

Brown, Phillip and Scase, Richard (1994), *Higher Education and Corporate Realities: Class,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Graduate Careers*. UCL Press.

Browning, H. L. and Singelmann, J. (1978),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Labor Force: The Interaction of Industry and Occupa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8 (3–4): 481–509.

Budd, Leslie and Whimster, Sam (eds) (1992), *Global Finance and Urban Living: A Study of Metropolitan Change*. Routledge.

Bulmer, Martin (1980), 'Why Don't Sociologists Make More Use of Official Statistics?', *Sociology*, 14 (4): 505–23.

Burke, Peter (2000),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Polity.

Burnham, David (1983), *The Rise of the Computer State*. Weidenfeld & Nicolson.

Burns, Tom (1977), *The BBC: Public Institution and Private World*. Macmillan.

Burrows, William E. (1986), *Deep Black: Space Espion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Butcher, David (1983), *Official Publications in Britain*. Clive Bingley.

Calhoun, Craig (ed.) (1992),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alhoun, Craig (1993), 'Postmodernism as Pseudo-Histor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0 (1) February: 75–96.

Calhoun, Craig (200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Sphere', in Schuler, Douglas and Day, Peter (eds), pp. 229–51.

Campbell, Duncan and Connor, Steve (1986), *On the Record: Surveillance, Computers and Privacy – The Inside Story*. Michael Joseph.

Campen, Alan D. (ed.) (1992), *The First Information War: The Story of Communications, Computers, and Intelligence Systems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Fairfax, Va.: AFCEA International Press.

Cantor, Bill (1989), *Experts in Action: Inside Public Relations*. Edited by Chester Burger. New York: Longman.

Castells, Manuel (1972),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7.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stells, Manuel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1994), 'European Citie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ew Left Review*, (204) March–April: 18–32.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Vol. 1 of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1996–8),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3 volumes.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1997a), *The Power of Identity*. Vol. 2 of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1997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formation Age', *City*, (7) May: 6–16, reprinted in Mackay, Hugh and O'Sullivan, Tim (eds) (1999), *The Media Reader: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Sage, pp. 398–410.

Castells, Manuel (1998), *End of Millennium*. Vol. 3 of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2000a), 'Materials for an Exploratory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1): 5–24.

Castells, Manuel (2000b),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New Economy', lecture at Delivering the Virtual Promise Conference, Queen Elizabeth Hall, London, 19 June. At http://www.brunel.ac.uk/research/virtsoc/text/events/castells.htm

Castells, Manuel (2000c),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 (5) September: 693–9.

Castells, Manuel (2000d),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2000e), *End of Millennium*,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anuel (2004a), 'Universities and Cit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Networks', Eighteenth Sir Robert Birley Lecture, City University London. Available at http://www.city.ac.uk/social/birley2004.htm/

Castells, Manuel (2004b) (ed.),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Castells, Manuel (2005), 'The Message Is the Medium: An Interview with Manuel Castells' (conducted by Terhi Rantanen),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 (2): 135–47.

Castells, Manuel and Hall, Peter (1994), *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Twenty-First-Century Industrial Complexes*. Routledge.

Castells, Manuel and Himanen, Pekka (2002),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Finnish Mod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anuel, Carnoy, Martin, Cohen, Stephen S. and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1993),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University Park,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Census of Employment Results, 1991, *Employment Gazette*, 101 (4) April 1993: 117–26.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83), *Annual Abstract of Statistics*, no. 119. HMSO.

Certeau, Michel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teven F. Rendall.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ndler, Jr, Alfred D.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ark, Colin (1940),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Progress*. Macmillan.

Cockerell, Michael (1988), *Live from Number 10: The Inside Story of Prime Ministers and Television*. Faber & Faber.

Cockerell, Michael, Hennessy, Peter and Walker, David (1984), *Sources Close to the Prime Minister: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the News Manipulators*. Macmillan.

Cockett, Richard (1994),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Think-Tanks and the Economic Counter-Revolution, 1931–1983*. HarperCollins.

Cole, Jeffrey (2005), *5th Digital Future Report*.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nenberg Cen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

Connor, Steven (1989), *Postmodernist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Oxford: Blackwell.

Connors, Michael (1993), *The Race to the Intelligent State*. Oxford: Blackwell.

Cooke, Philip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Locality*. Unwin Hyman.
Corner, John and Harvey, Sylvia (eds) (1991), *Enterprise and Heritage: Crosscurrents of National Culture*. Routledge.
Coyne, Diane (1997), *The Weightless Economy*. Oxford: Capstone.
Craib, Ian (1992), *Anthony Giddens*. Routledge.
Crook, S., Pakulski, J. and Waters, M. (1992), *Postmodernization: Change in Advanced Society*. Sage.
Curran, James (1990),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2–3) June: 135–64.
Curran, James (1991),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A Reappraisal', in Curran, James and Gurevitch, Michael (eds), pp. 82–117.
Curran, James (1998),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A Reappraisal', in Liebes, Tamar and Curran, James (eds), *Media, Ritual and Identity*. Routledge, pp. 175–202.
Curran, James (2002), *Media and Power*. Routledge.
Curran, James and Gurevitch, Michael (eds) (1991),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ward Arnold.
Curran, James, Gurevitch, Michael and Woollacott, Janet (eds) (1977),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dward Arnold.
Curran, James and Seaton, Jean (1988),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 third edition. Routledge.
Curry, James (1993), 'The Flexibility Fetish', *Capital and Class*, (50) summer: 99–126.
Curtis, Liz (1984), *Ireland: The Propaganda War*. Pluto.
Dalrymple, Theodore (2005), *Our Culture, What's Left of It*. Chicago, Ill.: Ivan R. Dee.
Dandeker, Christopher (1990), *Surveillance, Power and Modernity: Bureaucracy and Discipline from 1700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Polity.
Dawes, Len (1978), 'Libraries, Culture and Blacks', in Gerard, David (ed.), pp, 131–7.
De Chernatony, Leslie and McDonald, Malcolm (2003), *Creating Powerful Brands*.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De Landa, Manuel (1991), *War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New York: Zone Books.
Debord, Guy (1977),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Mich.: Red and Black.
Dertouzos, Michael L. (1997), *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 Piatkus.
Dertouzos, Michael L. and Moses, Joel (eds) (1979), *The Computer Age: A Twenty-Year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Diamond, Larry (2003), 'Universal Democracy?', *Policy Review* (119): 1–28.
Dicken, Peter (1992), *Global Shif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second edition. Paul Chapman.
Dicken, Peter (2003),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fourth edition. Sage.
Dickson, David (1974), *Alternative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ical Change*. Fontana.
Dickson, David (1984), *The New Politics of Science*. New York: Pantheon.
Dosi, Giovanni, Freeman, Christopher, Nelson, Richard, Silverberg, Gerald and Soete, Luc (eds) (1988),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Pinter.
Drucker, Peter F. (1969), *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Heinemann.
Drucker, Peter F. (1993), *Post-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Duff, Alistair S. (2000), *Information Society Studies*. Routledge.
Duff, Alistair S., Craig, D. and McNeill, D. A. (1996),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2 (2): 117–22.

Dutton, William H. (ed.) (1996), *Visions and Realiti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tton, William H. (ed.) (1999), *Society on the Line: Information Politics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yson, K. and Humphries, P. (eds)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Routledge.

Eatwell, John, Milgate, M. and Newman, P. (eds) (1987),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2. Macmillan.

Elegant, Robert (1981), 'How to Lose a War', *Encounter*, 57 (2) August: 73–90.

Eley, Geoff (2002), *Forging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1976), *Raids and Reconstructions: Essays in Politics, Crime and Culture*. Pluto.

Eurostat (2005), *The Digital Divide in Europe*. Luxembourg: Eurostat.

Evans, Christopher (1979), *The Mighty Micro: The Impact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Gollancz.

Ewen, Stuart (1976),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Ewen, Stuart (1988), *All Consuming Images: The Politics of Styl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Ewen, Stuart and Ewen, Elizabeth (1982), *Channels of Desire: Mass Images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onsciousness*. New York: McGraw-Hill.

Ezard, John (2003), 'Nation of TV Slackers Dimly Aware of Ignorance Is Not Bliss', *Guardian*, 3 November, p. 11.

Feather, John (1998),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Study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second edition. Library Association.

Featherstone, Mike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Sage.

Featherstone, Mike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Lash, Scott and Friedman, Jonathan (eds), pp. 265–90.

Feigenbaum, Edward A. and McCorduck, Pamela (1983), *The Fifth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Japan's Computer Challenge to the World*. Pan, 1984.

Ferguson, Marjorie (ed.) (1990),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Future Directions for Media Research*. Sage.

Ferkiss, Victor (1979), 'Daniel Bell's Concept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ory, Myth, and Ideology',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 fall: 61–102.

Fiske, John (1987), *Television Culture*. Methuen.

Fiske, John (1991), 'Postmodernism and Television', in Curran, James and Gurevitch, Michael (eds), pp. 55–67.

Florida, Richard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Cambridge, Mass.: Basic Books.

Ford, Daniel (1985), *The Button: The Nuclear Trigger – Does It Work?* Allen & Unwin.

Forester, Tom (ed.) (1989), *Computers in the Human Contex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ivity and People*. Oxford: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righton: Harvester.

Fox, Stephen (1984), *The Mirror Makers: A History of American Advertising and Its Creators*. New York: Vintage, 1985.

Fox, Stephen (1989), 'The Panopticon: From Bentham's Obsession to the Revolution in Management Learning', *Human Relations*, 42 (8): 717–39.

Franklin, Bob (1994), *Packaging Politic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Britain's Media Democracy*. Edward Arnold.
Freeman, Christopher (1974),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Freeman, Christopher (1987),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inter.
Freeman, Christopher, Clark, J. and Soete, Luc (1982), *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 Study of Long Wav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inter.
Freeman, Christopher and Perez, Carlota (1988), 'Structural Crises of Adjustment, Business Cycles and Investment Behaviour', in Dosi, G. *et al.* (eds), pp. 38–66.
Friedman, Thomas (1999),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Friedman, Thomas (2005),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Fröbel, Folker, Heinrichs, Jürgen and Kreye, Otto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ranslated by Pete Burg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uchs, Victor R. (1968), *The Service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amish Hamilton.
Fukuyama, Francis (1997), *The End of Order*.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Fukuyama, Francis (1999),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Free Press.
Fussell, Paul (1975),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72),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second e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Gamble, Andrew (1988), *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Macmillan.
Gandy, Jr, Oscar H. (1993), *The Panoptic Sort: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Garnham, Nicholas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age.
Garnham, Nicholas (2000), *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rguments about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rrahan, Philip and Stewart, Paul (1992), *The Nissan Enigma: Flexibility at Work in the Local Economy*. Mansell.
Gates, Bill (1995), *The Road Ahead*. Harmondsworth: Penguin.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Gellner, Ernest (1992), *Postmodernism, Reason and Religion*. Routledge.
Gerard, David (ed.) (1978), *Libraries in Society*. Clive Bingley.
Gershuny, Jonathan I. (1977),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 Myth of the Service Economy', *Futures*, 9 (2): 103–14.
Gershuny, Jonathan I. (1978),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 Macmillan.
Gershuny, Jonathan I. (1983), *Social Innov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rshuny, Jonathan I. and Miles, Ian (1983), *The New Service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Pinter.
Gibbs, David N. (2000), 'Is There Room for the Real in the Postmodernist Universe?', in Waters, Neil L. (ed.) *Beyond the Area Studies Wars*. Hanover, NH: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 pp. 11–28.
Giddens, Anthony (1971),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81),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second edition. Hutchinson.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nthony (1985),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Vol. 2 of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nthony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nthony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nthony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nthony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nthony and Pearson, Christopher (1998),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Cambridge: Polity.

Gilbert, Martin (1989), *The Second World War*. Weidenfeld & Nicolson.

Golding, Peter (1990),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in an Inegalitarian Social Order', in Ferguson, Marjorie (ed.), pp. 84–100.

Golding, Peter (1992), 'Communicating Capitalism: Resisting and Restructuring State Ideology – the Case of "Thatcherism"',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4: 503–21.

Golding, Peter (1998), 'Global Village or Cultural Pillage? The Unequal Inheritan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in McChesney, R. W., Meiksins Wood, E. and Foster, J. B. (eds)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69–86.

Golding, Peter (2000), 'Forthcoming Featur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Future', *Sociology*, 34 (1): 165–84.

Golding, Peter and Murdock, Graham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Curran, James and Gurevitch, Michael (eds), pp. 15–32.

Goldthorpe, John H. (1971), 'Theories of Industrial Society: Reflections on the Recrudescence of Historicism and the Future of Futur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 (2): 263–88.

Goode, Kenneth (1926), quoted in Stephen R. Shapiro (1969), *The Big Sell: Attitudes of Advertising Writers about Their Craft in the 1920s and 1930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Gordon, David M., Edwards, Richard and Reich, Michael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rz, André (ed.) (1976), *The Division of Labour*. Hassocks: Harvester.

Gouldner, Alvin W. (1976), *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The Origins, Grammar and Future of Ideology*. Macmillan.

Gouldner, Alvin W. (1978), 'The New Class Project', *Theory and Society*, 6 (2) September: 153–203; 6 (3) November: 343–89 (this two-part article appeared in 1979 as a book,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Macmillan).

Gouldner, Alvin W. (1980),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Macmillan.

Graham, Stephen and Marvin, Simon (1996),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City: Electronic Spaces, Urban Places*. Routledge.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awrence & Wishart.
Gray, John (1997), *Endgames: Questions in Late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Polity.
Greenhalgh, Liz and Worpole, Ken, with Charles Landry (1995), *Libraries in a World of Cultural Change*. UCL Press.
Greider, William (1997),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Grint, Keith (1991), *The Sociology of Work: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Gurevitch, Michael, Bennett, Tony, Curran, James and Woollacott, Jane (eds) (1982),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Methuen.
Habermas, Jurgen (1962),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9.
Habermas, Jürgen (1976),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Heinemann, 1979.
Habermas, Jürgen (1981),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22): 3–14.
Hacking, Ian (1990),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kim, Catherine (1987), 'Trends in the Flexible Workforce', *Employment Gazette*, November: 549–60.
Hall, Peter and Preston, Pascha! (1988), *The Carrier Wav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1846–2003*. Unwin Hyman.
Hall, Stuart and Jaques, Martin (eds) (1989),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Lawrence & Wishart.
Hallin, Daniel C.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melink, Cees J. (1982), *Finance and Information: A Study of Converging Interests*. Norwood, NJ: Ablex.
Handy, Charles (1995), *The Age of Unreason*. Arrow.
Hannerz, Ulf (1996),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Routledge.
Harris, Robert (1983), *Gotcha! The Media,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alklands Crisis*. Faber & Faber.
Harris, Robert (1990),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 of Bernard Ingham*. Faber & Faber.
Harrison, Bennett (1994), *Lean and Mea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orporate Power in the Age of Flexibi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Harrison, J. F. C. (1984), *The Common People: A History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Flamingo.
Harvey, David (1988), 'Voodoo Cities',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30 September.
Harvey, David (1989a),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lackwell.
Harvey, David (1989b),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vel, Václav (1999), 'Kosovo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9 April.
Hayek, Friedrich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4): 519–30. Reprinted in Hayek, F. (1952),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Routledge.

Hays, Constance (2004), 'What Wal-Mart Knows about Customers' Habits', *New York Times*, 14 November.
Haywood, Trevor (1989), *The Withering of Public Access*. Library Association.
Heath, Anthony, Ermisch, J. and Gallie, D. (eds) (2005), *Understanding Soci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ld, David, McGrew, A., Goldblatt, D. and Perraton, J.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Henderson, Jeffrey (1989), *The Globalisation of High Technology Production: Society, Space and Semiconductors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Modern World*. Routledge.
Henderson, Jeffrey and Castells, Manuel (eds) (1987),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Sage.
Hepworth, Mark (1989), *Geography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Belhaven.
Hewison, Robert (1987),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Methuen.
Hickethier, Knut and Zielinski, Siegfried (eds) (1991), *Medien/Kultur*. Berlin: Wissenschaftsverlag Volker Spiess.
Hill, Michael W. (1999),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on Society*. Bowker-Saur.
Hillyard, Paddy and Percy-Smith, Janie (1988), *The Coercive State: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in Britain*. Fontana.
Himanen, Pekka (2001), *The Hacker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Vintage.
Himmelfarb, Gertrude (1968), 'The Haunted House of Jeremy Bentham', in Himmelfarb, Gertrude, *Victorian Minds*. Weidenfeld & Nicolson, pp. 32–81.
Hirsch, Joachim (1991), 'Fordism and Post-Fordism: The Present Social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Bonefeld, Werner and Holloway, John (eds), pp. 8–34.
Hirschhorn, Larry (1984), *Beyond Mechanization: Work and Technology in a Postindustrial 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irst, Paul and Zeitlin, Jonathan (eds) (1989), *Reversing Industrial Declin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licy in Britain and Her Competitors*. Oxford: Berg.
Hirst, Paul and Zeitlin, Jonathan (1991), 'Flexible Specialisation versus Post-Fordism: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 (1) February: 1–56.
Hobsbawm, Eric J. (1968), *Industry and Empir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Hobsbawm, Eric J. (1994),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20th Century*. Michael Joseph.
Hobsbawm, Eric J. and Ranger, Terence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ggart, Richard (1995), *The Way We Live Now*. Chatto & Windus.
Hohendahl, Peter (1979), 'Critical Theory, Public Sphere and Culture: Jürgen Habermas and His Critics', *New German Critique*, (16): 89–118.
Hollingsworth, M. and Norton-Taylor, R. (1988), *Blacklist: The Inside Story of Political Vetting*. Hogarth Press.
Holub, Robert C. (1991), *Jürgen Habermas: Critic in the Public Sphere*. Routledge.
Horkheimer, Max and Adorno, Theodor W. (1944),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John Cumming. Allen Lane, 1973.
Howard, Robert (1985), *Brave New Workplace*. New York: Viking.
Hussey, Andrew (2001), *The Game of War: The Life and Death of Guy Debord*. Cape.
Hutton, Will (1994), 'Markets Threaten Life and Soul of the Party', *Guardian*, 4 January, p. 13.
Hutton, Will (1995), *The State We're In*. Cape.
Hutton, Will (2004),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Observer*, 2 May, p. 28.
Ignatieff, Michael (1991), 'Gradgrind Rules in the Public Library', *Observer*, 2 June, p. 19.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 Panel (ITAP) (1983), *Making a Business of Information: A Survey of New Opportunities*. HMSO.

Ito, Y. (1991), '*Johoka* as a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Change', *Keio Communication Review*, 12: 35–58.

Ito, Y. (1994), 'Japan', in Wang, Georgette (ed.) *Treading Different Paths: Informatization in Asian Nations*. Norwood, NJ: Ablex, pp. 68–98.

Jackson, Michael (2001), 'Channel 4: The Fourth Way', *New Statesman*. Media Lecture. Banqueting House, Whitehall. 31 October.

Jacoby, Russell (1999), *The End of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Jacoby, Russell (2005), *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ouis (1963), *Fiction for the Working Man, 1830–1850: A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Produced for the Working Classes in Early Victorian Urban Engl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Verso.

Jamieson, Kathleen Hall (1984), *Packaging the Presidency: A History and Criticism of Presidential Campaign Advertis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owitz, Morris (1974), 'Review Symposium: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 (1): 230–6.

Janus, Noreene (1984), 'Advertising and the Creation of Global Markets: The Role of the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in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pp. 57–70.

Januszczak, Waldemar (1985), 'The Art World Can't Tell Jacob Duck from Donald', *Guardian*, 28 December.

Januszczak, Waldemar (1986), 'No Way to Treat a Thoroughbred', *Guardian*, 15 February, p. 11.

Jencks, Charles (1984),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fourth edition. Academy Editions.

Jessop, Bob (2002),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Johnson, Pauline (2001), 'Habermas's Search for the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4 (2): 215–36.

Johnson, Steven (2005), *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 How Popular Culture Is Making Us Smarter*. Allen Lane.

Jones, Gareth Stedman (1971), *Outcast Lond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Jones, Trevor (ed.) (1980), *Microelectronics and Societ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Jonscher, Charles (1999), *Wired Life*. New York: Bantam.

Jumonville, Neil (1991), *Critical Crossing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Postwar Americ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nt, I. (1972 [1790]), *Critique of Reason*. Translated by J. H. Bernard. New York: Hafner.

Kasperson, Lars Bo (2000), *Anthony Giddens: An Introduction to a Social Theorist*, Oxford: Blackwell.

Kavanagh, Dennis (1990), *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 The End of Consensus?* New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ane, John (1991),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Keane, John (1998), *Civil Society: Old Images, New Visions*. Cambridge: Polity.

Keating, Peter (ed.) (1976), *Into Unknown England, 1866–1913: Selections from the Social Explorers*. Fontana.

Kellner, Douglas (1989a),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Kellner, Douglas (1989b),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Kellner, Douglas (1990), *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Kellner, Douglas (1999), 'New Technologies: Technocities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Downey, John and McGuigan, Jim (eds), *Technocities*. Sage, pp. 186–204.
Kellner, Hans and Berger, Peter L. (eds) (1992), *Hidden Technocrats: The New Class and New Capita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Kennedy, Maev (2004), 'Visitors Flock to Museums without Charges', *Guardian*, 28 December, p. 8.
Kennedy, Paul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Unwin Hyman.
Kleinberg, B. S. (1973),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Technocracy, Power,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Columbus, Ohio: Merrill.
Knightley, Phillip (1986), *The Second Oldest Profession: The Spy as Bureaucrat, Patriot, Fantasist and Whore*. André Deutsch.
Knightley, Phillip (1991), 'Here Is the Patriotically Censored News', *Index on Censorship*, 20 (4–5), April–May: 4–5.
Kolko, Joyce (1988), *Restructuring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Pantheon.
Kranich, Nancy (2004), 'Libraries: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of Civil Society', in Schuler, Doug and Day, Peter (eds), pp. 279–99.
Kroker, Arthur and Cook, David (1986), *The Postmodern Scene: Excremental Culture and Hyper-Aesthe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Kumar, Krishan (1977), 'Holding the Middle Ground: The BBC, the Public and the Professional Broadcaster', in Curran, James *et al.* (eds), pp. 231–48.
Kumar, Krishan (1978), *Prophecy and Progress: The Sociology of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llen Lane.
Kumar, Krishan (1986),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MacCabe, Colin and Stewart, Olivia (eds), pp. 46–61.
Kumar, Krishan (1987),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Oxford: Blackwell.
Kumar, Krishan (1992), 'New Theories of Industrial Society', in Brown, Phillip and Lauder, Hugh (eds), pp. 45–75.
Kumar, Krishan (1995), *From Post-Industrial to Post-Modern Society: New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Blackwell.
Kumar, Krishan (2005), *From Post-Industrial to Post-Modern Society: New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Lacqueur, Walter (1980), *The Terrible Secre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uppress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Hitler's 'Final Solution'*. Weidenfeld & Nicolson.
Lamberton, Donald M. (ed.) (1971),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Landes, D. S.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des, Joan B. (1995),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phere: A Feminist Reconsideration', in Meehan, J. (ed.) *Feminists Read Habermas*. Routledge, pp. 91–116.
Lang, Tim and Heasman, Michael (2004), *Food Wars: The Battle for Mouths, Minds and Markets*.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asch, Christopher (1984), *The Minimal Self: Psychic Survival in Troubled Times*. Pan, 1985.
Lash, Scott (1990),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Routledge.

Lash, Scott (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Routledge.
Lash, Scott and Friedman, Jonathan (eds) (1992), *Modernity and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Lash, Scott and Urry, John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Lash, Scott and Urry, John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Sage.
Lasswell, Harold D. (1934), 'The Vocation of Propagandists', in Lasswell, Harold D, *On Political Sociology*.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Lasswell, Harold D. (1941), *Democracy through Public Opinion*. Menasha, Wis.: George Banta (the Eleusis of Chi Omega, vol. 43, no.1, part 2).
Lawson, Hilary (1989), Narrator and Director, *Cooking the Books*. Channel 4 television programme in *Dispatches* series. Broadcast 26 April (first shown autumn 1988).
Leadbeater, Charles (1999), *Living on Thin Air: The New Economy*. Viking.
Leadbeater, Charles (2003), *Overdue: How to Create a Modern Public Library Service*. Laser Foundation.
Leavis, Frank Raymond (1948), *The Great Tra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Lebergott, Stanley (1993), *Pursuing Happiness: American Consumers in the 20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igh, D. (1980), *The Frontiers of Secrecy: Closed Government in Britain*. Junction Books.
Leigh, D. and Lashmar, P. (1985), 'The Blacklist in Room 105', *Observer*, 15 August, p. 9.
Lessig, Lawrence (2000),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Lessig, Lawrence (2002), *The Future of Ideas: The Fate of the Commons in a Connected Worl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Lessig, Lawrence (2004), *Free Culture: How Big Media Uses Technology and the Law to Lock Down Culture and Control Creativity*. New York: Penguin.
Levitas, Ruth (1996), 'The Legacy of Rayner', in Levitas, Ruth and Guy, Will, pp. 7–25.
Levitas, Ruth and Guy, Will (1996), *Interpreting Official Statistics*. Routledge.
Lewis, D. A. and Martyn, J. (1986), 'An Appraisal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c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slib Proceedings*, 19 (1) autumn: 23–33.
Libicki, Martin (1995), *What Is Information Warfare?* ACIS Paper 3,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 (1997), *New Library: The People's Network*.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Library Association.
Liebowitz, Nathan (1985), *Daniel Bell and the Agony of Modern Liberalis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Lipietz, Alain (1986), 'New Tendenc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Regimes of Accumulation and Modes of Regulation', in Scott, Allen J. and Storper, Michael (eds), pp. 16–40.
Lipietz, Alain (1987),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Verso.
Lipietz, Alain (1993), *Towards a New Economic Order: Postfordism, Ecology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Lippmann, Walter (1922), *Public Opinion*. Allen & Unwin.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81),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Proletariat? An Historic Mission Unfulfilled', *Encounter*, (56) June: 18–34.
London, Louise (2000), *Whitehall and the Jews, 1933–1948: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nt, Peter and Stenner, Paul (2005), '*The Jerry Springer Show* as an Emotional Public Spher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7 (1): 59–81.
Lyman, Peter and Varian, Hal R. (2003), 'How Much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sims.berkeley.edu/research/projects/how-much-info-2003/

Lynd, Robert S. and Hanson, A. C. (1933), 'The People as Consumers',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McGraw-Hill, pp. 857–911.

Lyon, David (1988),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sues and Illusions*. Cambridge: Polity.

Lyon, David (1994), *The Electronic Eye*. Cambridge: Polity.

Lyon, David (2001), *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Lyon, David (2003), *Surveillance after September 11*. Cambridge: Polity.

Lyon, David (2006), 'Surveillance and Privacy', in Avgerou, C., Mansell, R., Quah, D. and Silverstone, R. (eds),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79),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88), *The Differend: Phases in Dispu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93),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lated by Bill Readings and Kevin Paul Geiman. UCL Press.

Maasoumi, Esfandias (1987), 'Information Theory', in Eatwell, John *et al.* (eds), pp. 846–51.

McAllister, Matthew P. (1996),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New Advertising, Control and Democracy*.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MacCabe, Colin and Stewart, Olivia (eds) (1986), *The BBC and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cCannell, Dean (1976),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Schocken.

Macey, David (1993), *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Vintage, 1994.

McGregor, A. and Sproull, A. (1992), 'Employers and the Flexible Workforce', *Employment Gazette*, May: 225–34.

McGuigan, Jim (2000), 'British Identity and "The People's Princess"',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 February: 1–18.

McGuigan, Jim (2005),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 (4): 427–43.

Machlup, Fritz (1962),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chlup, Fritz (1980), *Knowledge: Its Creation,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Vol. I: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chlup, Fritz (1984), *Knowledge: Its Creation,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Vol. III: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and Human Capit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chlup, Fritz and Mansfield, Una (eds) (1983),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Wiley.

McKendrick, N., Brewer, J. and Plumb, J. H. (1982),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Hutchinson.

MacKenzie, Donald A. (1990), *Inventing Accuracy: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Nuclear Missile Guida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McPhail, T. (1987), *Electronic Colonialism*, second edition.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McQuail, Denis (1987),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Sage.

McRobbie, Angela (1991), 'New Times in Cultural Studies', *New Formations*, (13) spring: 1–18.
Madge, Tim (1989), *Beyond the BBC: Broadcasters and the Public in the 1980s*. Macmillan.
Madison, James (1953), *The Complete Madison: His Basic Writings*. Millwood, NY: Kraus Reprint.
Mallet, Serge (1975), *The New Working Class*. Nottingham: Spokesman.
Marchand, Roland (1985),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shall, T. H. (1973),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Martin, Bernice (1992), 'Symbolic Knowledge and Market Forces at the Frontiers of Postmodernism: Qualitative Market Researchers (Britain)', in Kellner, Hans and Berger, Peter L. (eds), pp. 111–56.
Martin, James (1978), *The Wire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Marwick, Arthur (1982), *British Society since 1945*.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rx, Gary T. (1988), *Undercover: Police Surveillance in Americ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ssey, Doreen (1991), 'Flexible Sex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31–57.
Massing, Michael (2003), 'The Unseen Wa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0 (9) 29 May: 16–19.
Massing, Michael (2004a), 'Now They Tell U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1 (3) 26 February.
Massing, Michael (2004b), 'Unfit to Prin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1 (11) 24 June: 6–10.
Massiter, Cathy (1985), 'The Spymasters Who Broke Their Own Rules', *Guardian*, 1 March, p. 13.
Mathieson, Thomas (1997), 'The Viewer Society: Foucault's Panopticon Revisited',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1 (2): 215–34.
Mattelart, Armand (1979),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Culture: The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of Imperialism*. Brighton: Harvester.
Mattelart, Armand (1991), *Advertising International: The Privatisation of Public Space*. Translated by Michael Chanan. Comedia.
Maxwell, Richard (2003), *Herbert Schill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Mayhew, Henry (1971), *The Unknown Mayhew: Selections from the Morning Chronicle, 1849–50*. Edited by E. P. Thompson and Eileen Yeo. Merlin.
Melody, William H. (1987), 'Information: An Emerging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1 (3) September: 1313–39.
Melody, William H. (1991), 'Manufacturing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nomy', *CIRCIT Newsletter*, 3 (1) February: 2.
Meyer, S. (1981), *The Five Dollar Day: Labor Management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Ford Motor Company, 1908–1921*.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eyrowitz, Joshua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chels, Robert ([1915] 1959),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Dover.
Middlemass, Keith (1979), *Politics i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xperience of the British System since 1911*. André Deutsch.
Miles, Ian (1991), 'Measuring the Future: Statistics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Futures*, 23 (9) November: 915–34.

Miles, Ian *et al.* (1990), *Mapping and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Boston Spa: British Library.

Miliband, Ralph (1969),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Quartet, 1974.

Miliband, Ralph (1985),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50) March–April: 5–26.

Miliband, Ralph and Panitch, Leo (eds) (1992), *Socialist Register 1992*. Merlin.

Miliband, Ralph and Saville, John (eds) (1974), *Socialist Register 1973*. Merlin.

Ministry of Defence (1983), *The Protection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n Censorship*, Cmnd 9122. HMSO.

Ministry of Defence (1985), *The Protection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n Censorship*, Cmnd 9499. HMSO.

Monk, Peter (1989),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Pinter.

Morgan, Kenneth O. (1990), *The People's Peace: British History, 1945–19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Meaghan (1992), 'The Man in the Mirror: David Harvey's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9: 253–79.

Morrison, David E. and Tumber, Howard (1988), *Journalists at War: The Dynamics of News Reporting during the Falklands Conflict*. Sage.

Mosco, Vincent (1982), *Pushbutton Fantasi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Videotex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wood, NJ: Ablex.

Mosco, Vincent (1989), *The Pay-Per Society: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Toronto: Garamond.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4), *The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view*, Vol. 2: *Changing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s Control*. Norwood, NJ: Ablex.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oser, Sir Claus (1980), 'Statistics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A*, 143 Part 1: 1–31.

Mount, Ferdinand (2004), *Mind the Gap: The New Class Divide in Britain*. Short Books.

Mouzelis, Nicos (1995), *Sociology Theory: What Went Wrong? Diagnosis and Remedies*. Routledge.

Mowlana, H., Gerbner, G. and Schiller, H. I. (eds) (1992),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lo.: Westview.

Muirhead, Bill (1987), 'The Case for Corporate Identity', *Observer*, 25 October.

Mulgan, Geoff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tworks and the New Economies of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Mulgan, Geoff (1998), *Connexity: Responsibility, Freedom, Business and Power in the New Century*. Vintage.

Munro, Neil (1991), *The Quick and the Dead: Electronic Combat and Modern Warfa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urdock, Graham (1982),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Gurevitch, Michael *et al.* (eds), pp. 118–50.

Murdock, Graham (1990), 'Redrawing the Map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Concentration and Ownership in the Era of Privatization', in Ferguson, Marjorie (ed.), pp. 1–15.

Murdock, Graham and Golding, Peter (1974),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in Miliband, Ralph and Saville, John (eds), pp. 205–34.

Murdock, Graham and Golding, Peter (1977),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Curran, James *et al.* (eds), pp. 12–43.

Murray, Robin (ed.) (1981), *Multinationals Beyond the Market: Intra-Firm Trade and the Control of Transfer Pricing*. Brighton: Harvester.

Murray, Robin (1985), 'Benetton Britain: The New Economic Order', *Marxism Today*, November: 28–32.

Naisbitt, John (1984), *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Futura.

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Hodder & Stoughton.

'New Times' (1988), *Marxism Today*, October: 3–33.

Newby, Howard (1977), *The Deferential Worker: A Study of Farm Workers in East Anglia*.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Newby, Howard (1985), *Green and Pleasant L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England*, second edition. Wildwood House.

Newby, Howard (1987), *Country Life: A Social History of Rural England*. Weidenfeld.

Newman, Karin (1986), *The Selling of British Telecom*. Holt, Rinehart & Winston.

Nguyen, G. D. (1985), 'Telecommunications: A Challenge to the Old Order', in Sharpe, Margaret (ed.) *Europe and the New Technologies*. Pinter, pp. 87–133.

Noam, Eli (1992), *Telecommunications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ble, David F. (1977), *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New York: Knopf.

Noble, David F. (1984), *Force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New York: Knopf.

Nordenstreng, Kaarle (1984), *The Mass Media Declaration of UNESCO*. Norwood, NJ: Ablex.

Nordenstreng, Kaarle and Varis, Tapio (1974), *Television Traffic: A One-Way Street?* Reports and Papers on Mass Communication, no. 70. Paris: UNESCO.

Norris, Christopher (1990), *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Norris, Christopher (1992), *Uncritical Theory: Postmodernism, Intellectuals and the Gulf War*. Lawrence & Wishart.

Oettinger, Anthony G. (1980), 'Information Resource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Science*, 209, 4 July: 191–8.

Oettinger, Anthony G. (1990), *Whence and Whither Intelligence, Command and Control? The Certainty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Mass.: Program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Office of Arts and Libraries (1988), *Financing Our Library Services: Four Subjects for Debate. A Consultative Paper*, Cm 324. HMSO.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88), *Informing the Nation: Feder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an Electronic Age*. Washington, DC: US Congress.

Ohmae, Kenichi (1993), 'The Rise of the Regional State', *Foreign Affairs*, 72 (2) spring: 78–87.

O'Neill, John (1986),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 From Weber to Foucaul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1) March: 42–60.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1991), *Universal Service and Rate Restructuring in Telecommunications*. ICCP series, no. 23. Paris: OECD.

Oxford Internet Survey (2005), *The Internet in Britain*. Oxford: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At http://www.oii.ox.ac.uk

Paulu, Burton (1981), *Television and Radio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cmillan.

Penn, Roger (1990), *Class, Power and Technology: Skilled Work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Cambridge: Polity.

Perkin, Harold (1989),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 Britain since 1880*. Routledge, 1990.

Phillips, Melanie (1988), 'Hello to a Harsh Age of Cold Economies, Farewell New Society', *Guardian*, 26 February.
Phillips, Melanie (1989), 'Standing Up to Be Counted', *Guardian*, 8 December.
Phillips, Melanie (1990), 'Statistics and the Poverty of Integrity', *Guardian*, 27 July.
Phillips, Melanie (1991), 'Private Lies and Public Servants', *Guardian*, 9 January, p. 21.
Phillips, Melanie (1993), 'The Lost Generation', *Observer*, 17 October, p. 23.
Phillips, Melanie (1996), *All Must Have Prizes*. Little, Brown.
Pick, Daniel (1993), *War Machine: The Rationalisation of Slaughte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ilger, John (1991a), 'Video Nasties',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25 January, pp. 6–7.
Pilger, John (1991b), 'Information Is Power',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15 November, pp. 10–11.
Pilger, John (1992), *Distant Voices*. Vintage.
Pilkington, Sir Harry (1962),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Broadcasting*, HMSO.
Piore, Michael and Sabel, Charles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Pollard, Sidney (198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914–1980*, third edition. Edward Arnold.
Pollert, Anna (1988), 'Dismantling Flexibility', *Capital and Class*, (34) spring: 42–75.
Pollert, Anna (ed.) (1990), *Farewell to Flexibility*. Oxford: Blackwell.
Ponting, Clive (1999), *The Pimlico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tto & Windus.
Pope, Daniel (1983), *The Making of Modern Advertis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Porat, Marc Uri (1977a),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T Special Publication 77–12 (1).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contains executive summary and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Porat, Marc Uri (1977b),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Sources and Methods for Measuring the Primary Information Sector (Detailed Industry Reports)*. OT Special Publication 77–12 (2).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Porat, Marc Uri (1978), 'Communication Policy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in Robinson, G. O. (ed.), pp. 3–60.
Porter, Henry (1999), 'For the Media, War Goes On', *Observer*, 4 July, p. 16.
Poster, Mark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Cambridge: Polity.
Poster, Mark (1994),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and Postmodernity', in Crowley, David and Mitchell, David (eds)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p. 173–92.
Poster, Mark (2001), 'Citizens, Global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of Athens, 10–12 May (mimeo).
Postman, Neil (1986),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Heinemann.
Potter, David (1954), *People of Plenty: 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tter, David, Goldblatt, David, Kiloh, Margaret and Lewis, Paul (eds) (1997), *Democratisation*. Cambridge: Polity.
Potter, Dennis (1994), *Seeing the Blossom: Two Interviews and a Lecture*. Faber & Faber.
Preston, Paschal (2001), *Reshaping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Sage.
Preston, W., Herman, E. S. and Schiller, H. I. (eds) (1989), *Hope and Fo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ESCO*.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rivy Council Office (1981), *Government Statistical Services*, Cmnd 8236. HMSO.

Pusey, Michael (1987), *Jürgen Habermas*. Chichester: Ellis Horwood.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Raphael, Adam (1990), 'What Price Democracy?', *Observer* (colour supplement), 14 October, pp. 7–47.
Rawnsley, Andrew (2000), *Servants of the People: The Inside Story of New Labour*. Harmondsworth: Penguin.
Rayner, Sir Derek (1981), *Sir Derek Rayner's Report to the Prime Minister*.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Reich, Robert B.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Vintage.
Reich, Robert B. (2001), *The Future of Success*. Heinemann.
Reith, J. C. W. (Lord) (1949), *Into the Wind*. Hodder & Stoughton.
Rheingold, Howard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Richards, Thomas (1993), *The Imperial Archive: Knowledge and the Fantasy of Empire*. Verso.
Richelson, Jeffrey T. and Ball, Desmond (1986), *The Ties That Bind: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K./U.S.A. Countries*. Allen & Unwin.
Rieff, David (1991), *Los Angeles: Capital of the Third World*. Phoenix.
Rieff, David (1995), *Slaughterhouse: Bosnia and the Failure of the West*. Vintage.
Rokowski, Ruth (2005), *Globalisation,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s GATS and TRIPS Agreements*. Oxford: Chandos Publishing.
Robertson, Geoffrey (1999),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Justice*. Harmondsworth: Penguin
Robertson, Roland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Sage.
Robins, Kevin (1991a), 'Prisoners of the City: Whatever Could a Postmodern City Be?', *New Formations*, (15) December: 1–22.
Robins, Kevin (1991b), 'Tradition and Translation: National Culture in Its Global Context', in Corner, John and Harvey, Sylvia (eds), pp. 21–44, 236–41.
Robins, Kevin (ed.) (1992),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Business, Technology and Geography*. Belhaven.
Robins, Kevin and Webster, Frank (1989), *The Technical Fix: Education, Computers and Industry*. Macmillan.
Robins, Kevin and Webster, Frank (1999),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 Routledge.
Robins, Kevin and Webster, Frank (eds) (2002), *The Virtual University? Knowledge, Markets and Manag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 G. O. (ed.) (1978), *Communications for Tomorrow*. New York: Praeger.
Rochlin, Gene I. (1997), *Trapped in the Net: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Computer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jek, Chris (2001), *Celebrity*. Reaktion Books.
Rose, Jonathan (2001),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sen, Jeffrey (2000), *The Unwanted Gaze: The Destruction of Priv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Ross, George (1974), 'The Second Coming of Daniel Bell', in Miliband, Ralph and Saville, John (eds), pp. 331–48.
Roszak, Theodore (1986), *The Cult of Information: The Folklore of Computers and the True Art of Thinking*. Cambridge: Lutterworth.

Rule, James B. (1973), *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Surveillance.* Allen Lane.
Rustin, Mike (1990), 'The Politics of Post-Fordism: The Trouble with "New Times"', *New Left Review,* (175) May–June: 54–77.
Sabel, Charles F. (1982),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id, Edward W. (1984),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Vintage.
Saunders, Peter (1990), *A Nation of Home Owners.* Unwin Hyman.
Savage, Mike, Bagnall, G. and Longhurst, B. (2005), *Globalisation and Belonging.* Sage.
Sayer, Andrew and Walker, Richard (1992), *The New Social Economy: Rework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Scannell, Paddy (1989),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nd Modern Public Lif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1: 135–66.
Scannell, Paddy and Cardiff, David (1991), *A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Broadcasting,* Vol. 1, *1922–1939: Serving the Nation.* Oxford: Blackwell.
Schement, Jorge R. and Lievroux, Leah (eds) (1987), *Competing Visions, Complex Realities: Aspect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orwood, NJ: Ablex.
Schiller, Anita R. and Schiller, Herbert I. (1982), 'Who Can Own What America Knows?', *The Nation,* 17 April: 461–3.
Schiller, Anita R. and Schiller, Herbert I. (1986), 'Commercializing Information', *The Nation,* 4 October: 306–9.
Schiller, Anita R. and Schiller, Herbert I. (1988), 'Libraries,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erce', in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pp. 146–66.
Schiller, Dan (1982), *Telematics and Government.* Norwood, NJ: Ablex.
Schiller, Dan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chiller, Herbert I. (1969),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Schiller, Herbert I. (1973), *The Mind Managers.* Boston, Mass.: Beacon.
Schiller, Herbert I.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Schiller, Herbert I. (1981), *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Norwood, NJ: Ablex.
Schiller, Herbert I. (1983a),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Who Benefits?', *Media Development,* (4): 18–20.
Schiller, Herbert I. (1983b), 'The World Crisis and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8 (1) spring: 86–90.
Schiller, Herbert I. (1984a),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 Norwood, NJ: Ablex.
Schiller, Herbert I. (1984b),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Old Objectives',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December: 382–3.
Schiller, Herbert I. (1985a), 'Beneficiaries and Victim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Systematic Diminution of the Public's Supply of Meaningful Information', *Paper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4: 185–92.
Schiller, Herbert I. (1985b), 'Breaking the West's Media Monopoly', *The Nation,* 21 September: 248–51.
Schiller, Herbert I. (1985c), 'Information: A Shrinking Resource', *The Nation,* 28 December 1985/4 January 1986: 708–10.
Schiller, Herbert I. (1987), 'Old Foundations for a New (Information) Age', in Schement, Jorge R. and Lievroux, Leah (eds), pp. 23–31.
Schiller, Herbert I. (1988), 'Information: Important Issue for '88', *The Nation,* 4–11 July: 1, 6.

Schiller, Herbert I. (1989a),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iller, Herbert I. (1989b),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An Interview with Herbert Schiller', *Afterimage*, November.
Schiller, Herbert I. (1990a), 'Democratic Illusions: An Interview with Herbert Schiller', *Multinational Monitor*, 11 (6) June: 19–22.
Schiller, Herbert I. (1990b), 'An Interview with Herbert Schiller', *Comnotes*,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4 (2) winter: 1–5.
Schiller, Herbert I. (1991a), 'Public Information Goes Corporate', *Library Journal*, 1 October, pp. 42–5.
Schiller, Herbert I. (1991b), 'My Graduate Education [1946–48], Sponsored by the U.S. Military Government of Germany', in Hickethier, Knut and Zielinski, Siegfried (eds), pp. 23–9.
Schiller, Herbert I. (1992), 'The Context of Our Work', *Société Française des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Huitième Congrès National, Lille, 21 May, pp. 1–6.
Schiller, Herbert I. (1993), 'Public Way or Private Road?', *The Nation*, 12 July: 64–6.
Schiller, Herbert I. (1996), *Information Inequality: 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Schiller, Herbert I. (2000), *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Schiller, Herbert I., Alexandre, L. and Mahoney, E. (1992), *The Ideolog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Media Analysis.
Schlesinger, Philip (1987),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BC News*, second edition. Methuen.
Schlesinger, Philip (1991), *Media, State and Natio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Sage.
Schonfield, Andrew (1969),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Encounter*, 32 (2): 15–26.
Schudson, Michael (1984), *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 Its Dubious Impact on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udson, Michael (1991), 'National News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the Informational Citizen', in Wolfe, Alan (ed.), pp. 265–82.
Schudson, Michael (1992), 'Was There Ever a Public Sphere?', in Calhoun, Craig (ed.), pp. 143–63.
Schuler, Douglas and Day, Peter (eds) (2004), *Shaping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New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Cybersp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cott, Allen J. and Storper, Michael (eds) (1986), *Production, Work, Territory: The Geographical Anatomy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Boston, Mass.: Allen & Unwin.
Scott, John (1982), *The Upper Classes*. Macmillan.
Scott, John (1985), *Corporations, Classes and Capitalism*, second edition. Hutchinson.
Scott, John (1986), *Capitalist Property and Financial Power*. Brighton: Wheatsheaf.
Scott, John (1991), *Who Rules Britain?* Cambridge: Polity.
Scott, John (1996), *Stratific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s of Class, Status and Command*. Cambridge: Polity.
Scott, John (1997), *Corporate Business and Capitalist Clas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ott, Peter (1995), *The Meanings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Seabrook, Jeremy (1982a), *Unemployment*. Quartet.
Seabrook, Jeremy (1982b), *Working-Class Childhood*. Gollancz.
Seaton, Anthony (1994), *Tourism: The State of the Art*. Wile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1996), *Statement of the Defence Estimates*, Cm 3223. The Stationery Office.
Selbourne, D. (1993), *The Spirit of the Age*. Sinclair-Stevenson.
Seltzer, Kimberley and Bentley, Tom (1999), *The Creative Age: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the New Economy*. Demos.
Sennett, Richard (1970), *The Uses of Disorder: Personal Identity and City Life*. Allen Lane.
Sennett, Richard (1998),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Norton.
Servan-Schreiber, Jean-Jacques (1968), *The American Challenge*. New York: Atheneum.
Shaiken, Harley (1985), *Work Transformed: Automation and Labor in the Computer Age*. New York: Holt, Rinchart & Winston.
Shannon, Claude and Weaver, Warren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4.
Sharpe, Richard (n.d., *c.*1990), *The Computer World: Lifting the Lid off the Computer Industry*. TV Choice/Kingston College of Further Education.
Shaw, Martin (2005), *The Western Way of War*. Cambridge: Polity.
Shaw, Roy (1990), 'An Adjunct to the Advertising Business?', *Political Quarterly*, 61 (4) October–November: 375–80.
Shils, Edward (1975),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nclair, John (1987), *Images Incorporated: Advertising as Industry and Ideology*. Croom Helm.
Singelmann, J. (1978a), 'The Sect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1920–197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5): 1224–34.
Singelmann, J. (1978b), *From Agriculture to Servi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Employment*.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Sklair, Leslie (1990),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Sklair, Leslie (2001),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lackwell.
Slaughter, Sheila and Leslie, Larry (1997),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levin, James (2000), *The Internet an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Sloan, Alfred P. (1963), *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 Pan, 1965.
Slouka, Mark (1995), *The War of the Worlds: The Assault on Reality*. Abacus.
Smart, Barry (1992), *Modern Conditions, Postmodern Controversies*. Routledge.
Smith, Anthony (1973), *The Shadow in the Cav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oadcaster, His Audience and the State*. Quartet, 1976.
Smith, Anthony (ed.) (1974), *British Broadcasting*. Newton Abbott: David & Charles.
Smith, Anthony (ed.) (1979), *Television and Political Life: Studies in Six European Countries*. Macmillan.
Smith, Anthony (1980), *The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 How Western Culture Dominates the World*. Faber & Faber.
Smith, Anthony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Smith, Roger B. (1989), 'A CEO's Perspective of His Public Relations Staff', in Cantor, Bill, pp. 18–32.
Smythe, Dallas W.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Social Trends (1992), 22. HMSO.
Soros, George (1998),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 Little, Brown.

Steger, Manfred B. (2003), *Globalis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hr, Nico (1994), *Knowledge Societies*. Sage.
Steinfels, Peter (1979), *The Neoconservativ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Stigler, George J. (1961),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9 (3) June: 213–25.
Stiglitz, Joseph (2004),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Harmondsworth: Penguin.
Stonier, Tom (1983), *The Wealth of Information: A Profile of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 Thames Methuen.
Stonier, Tom (1990),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An Exploration into Information Physics*. Springer-Verlag.
Strangleman, Tim (2004), *Work Identity at the End of the Line? Privatis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UK Rail Industry*. Basingstoke: Palgrave.
Sutherland, John (1999), 'Who Owns John Sutherland?', *London Review of Books*, 7 January: 3, 6.
Swingewood, A. (1977), *The Myth of Mass Culture*. Macmillan.
Talbott, Stephen L. (1995), *The Future Does Not Compute: Transcending the Machines in our Midst*. Sebastopol, Calif.: O'Reilly & Associates.
Taylor, A. J. P. (1965), *English History, 1914–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F. W. (1947),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Taylor, Keith (ed.) (1976) *Henri Saint-Simon, 1760–1825: Selected Writings on Science, Industr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Croom Helm.
Tedlow, Richard S. (1979), *Keeping the Corporate Image: Public Relations and Business, 1900–1950*.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Terkel, Studs (1977), *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 Harmondsworth: Penguin.
Thompson, Edward 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Thompson, Edward P. (1980), *Writing by Candlelight*. Merlin.
Thompson, John B. (1993), 'The Theory of the Public Sphe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0: 173–89.
Thorn-EMI (1980), *Annual Report*. Thorn-EMI.
Thurow, Lester (1996),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Nicholas Brealey.
Toffler, Alvin (1980), *The Third Wave*. Collins.
Toffler, Alvin (1990), *Powershift: Knowledge, Wealth, and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Bantam.
Toffler, Alvin and Toffler, Heidi (1993), *War and Anti-War*.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Tomlinson, J.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inter.
Touraine, Alain (1971),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omorrow's Social History; Classes, Conflicts and Culture in the Programmed Society*. New York: Wildwood House.
Tracey, Michael (1978), *The Production of Political Television*. Routledge.
Tracey, Michael (1983), *A Variety of Lives: A Biography of Sir Hugh Greene*. Bodley Head.
Tracey, Michael (1998),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rachtenberg, Alan (1982),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Hill & Wang.
Tumber, Howard (1993a), '"Selling Scandal": Business and the Medi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5: 345–61.
Tumber, Howard (1993b), 'Taming the Truth',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4 (1): 37–41.
Tumber, Howard and Palmer, Jerry (2004), *Media at War: The Iraq Crisis*. Sage.

Tumber, Howard and Webster, Frank (2006), *Journalists under Fire: Information War and Journalistic Practices*. Sage.

Tunstall, Jeremy (1977), *The Media Are American: Anglo-American Media in the World*. Constable.

Tunstall, Jeremy (2006), *The Media Were Americ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Stansfield (1991), 'Intelligence for a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70 (4) fall: 150–66.

Turner, Stuart (1987), *Practical Sponsorship*. Kogan Page.

Turow, Joseph, Feldman, L. and Meltzer, K. (2005), *Open to Exploitation: Shoppers Online and Offline*.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June.

Twitchell, J. B. (1992), *Carnival Culture: The Trashing of Taste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Urry, John (2000),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outledge

Urry, John (2001),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second edition. Sage.

Useem, Michael (1984),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S. and U.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eem, Michael (1985), 'The Rise of the Political Manager',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7 fall: 15–26.

Usherwood, Bob (1989), *Public Libraries as Public Knowledge*. Library Association.

Vanderbilt, T. (1998), *The Sneaker Book: Anatomy of an Industry and an Icon*. New York: New Press.

Varis, Tapio (1986), *International Flow of Television Programmes*. Reports and Papers on Mass Communication, no. 100. Paris: UNESCO.

Vattimo, Gianni (1989),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 Cambridge: Polity, 1992.

Venturi, Robert (1972),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Virilio, Paul (1986), *Speed and Politics: An Essay on Dromology*. Translated by M. Polizotti. New York: Semiotext(e).

Virilio, Paul (1998), *The Virilio Reader*. Edited by James Der Derian. Oxford: Blackwell.

Virilio, Paul (2005), *The Information Bomb*. Verso.

Walsh, K. (1992),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Museums and Heritage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Routledge.

Waters, Malcolm (1996), *Daniel Bell*. Routledge.

Weber, Max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Allen & Unwin, 1976.

Weber, Steven (2004), *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bster, Frank (1995),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first edition. Routledge.

Webster, Frank (2000), 'Virtual Culture: Knowledge, Identity and Choice', in Bryson, J. R., Daniels, P. W., Henry, N. and Pollard, J. (eds) *Knowledge, Space, Economy*. Routledge, pp. 226–41.

Webster, Frank (ed.) (2004),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ader*. Routledge.

Webster, Frank (2005), 'Making Sense of the Information Age in Britain: Soci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8 (4): 439–58, 477–8.

Webster, Frank and Dimitriou, Basil (eds) (2004), *Manuel Castells: Masters of Modern Thought*. 3 volumes. Sage.

Webster, Frank and Erickson, Mark (2004), 'Technology and Social Problems', in Ritzer, George (ed.), *Handbook of Social Problem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p. 416–32.
Webster, Frank and Robins, Kevin (198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Luddite Analysis.* Norwood, NJ: Ablex.
Weizenbaum, Joseph (1976), *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From Judgement to Calcul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Wellman, Barry (2001), 'Physical Space and Cybersp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sed Networ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 (2): 227–51.
Wernick, Andrew (1991), *Promotional Culture: Advertising, Ideology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Sage.
West, William J. (1992), *The Strange Rise of Semi-Literate Engl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ibraries.* Duckworth.
Westergaard, John and Resler, Henrietta (1975), *Clas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Britain.* Heinemann.
Whitaker, Reg (1992),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Miliband, Ralph and Panitch, Leo (eds), pp. 111–30.
Whitaker, Reg (1999), *The End of Privacy: How Total Surveillance Is Becoming a Real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Whitehead, Alfred North (1925),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Mentor, 1964.
Williams, Raymond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Williams, Raymond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Fontana.
Williams, Raymond (1980), 'Advertising: The Magic System', in Williams, Raymond,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Verso, pp. 170–95.
Wilson, David M. (1989), *The British Museum: Purpose and Politics.* British Museum.
Wilson, Kevin (1988), *Technologies of Control: The New Interactive Media for the Home.*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Wolf, Martin (2005), *Why Globalisation Work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olfe, Alan (ed.) (1991), *America at Century's End.*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olgar, Steve (1985), 'Why Not a Sociology of Machines? The Case of Soci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ology,* 19 (4) November: 557–72.
Woolgar, Steve (1988), *Science: The Very Idea.* Chichester: Ellis Horwood.
Worsley, Peter (1984), *The Three Worlds of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Weidenfeld & Nicolson.
Young, Hugo (1989), *One of Us: A Biography of Margaret Thatcher.* Macmillan.
Young, Hugo (1991), 'Nothing but an Illusion of Truth', *Guardian,* 5 February.
Zolo, Danilo (1997), *Cosmopolis: Prospects for World Government.* Translated by David McKie. Cambridge: Polity.
Zuboff, Shoshana (1988),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Oxford: Heinemann.